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7

清代卷（下）

汪家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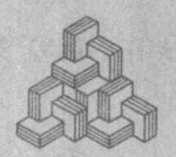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7 清代卷（下）

汪家熔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汪家熔著．—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68-1789-9

Ⅰ．中…　Ⅱ．汪…　Ⅲ．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清代　Ⅳ．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912号

责任编辑／庞　元
责任印制／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26.25　彩页4
字　　数／379千字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4.00元



詩經

大雅卷阿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傳 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

正義 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鳳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凰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修木職致東方龍



第四課 蠅食蜜

有一蠅飛至室中。四周覓食。適有一蜜糖甌。藩於桌上。蠅繞甌而飛。嬰嬰然有聲。忽得一隙。遂入。即飛集甌邊。就蜜食之。心尚不足。又飛集蜜上。足踐於蜜而食。焉及飽

彩图1（左）
《古今图书集成》

彩图2（右）
《蒙学读本全书》



慶應元年開成所翻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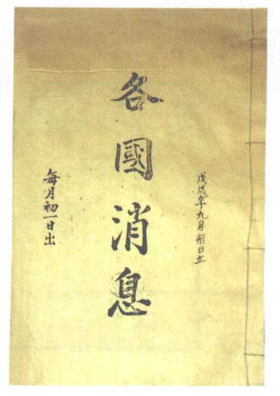
同治三年歲在甲子孟冬月鐫

萬國公法

京都崇實館存板

萬國公法序

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雖時厶氏宅厶土其詳弗可得聞已顧或疑史氏侈詞不則通九州外數之今九州外之國林立矣不有法以維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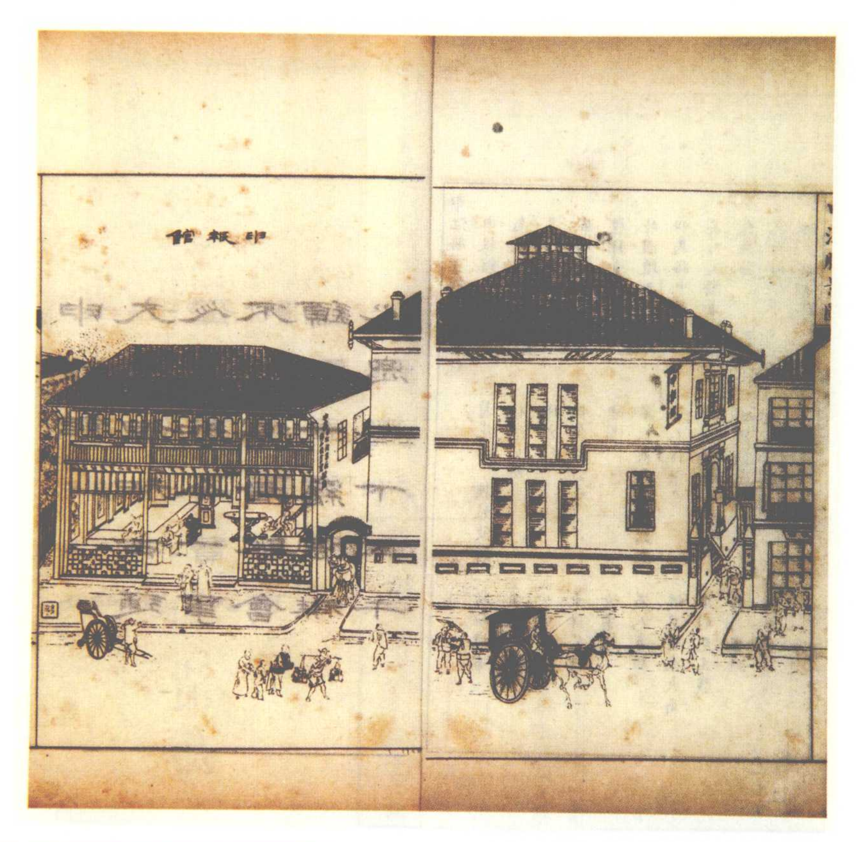
彩图3
《万国公法》

彩图4
《各国消息》



彩图5
石印版的《点石斋画报》

彩图6
上海申报馆（光绪十年点石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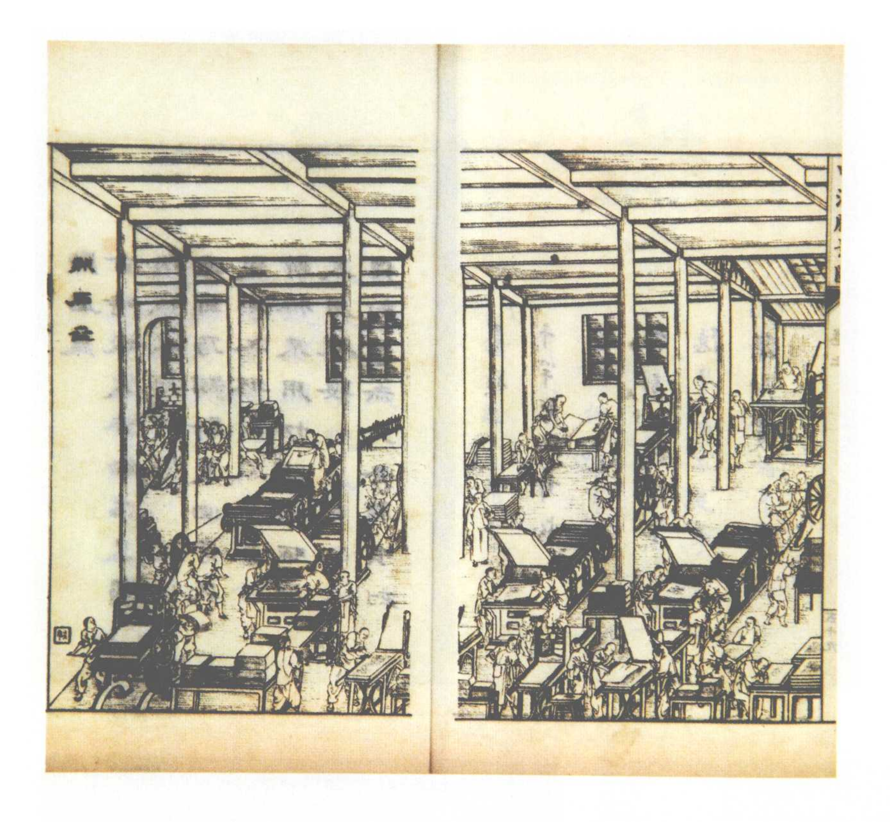






彩图7（左）
清末天津著名的单本石印画刊《醒华》

彩图8（右）
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的《格致新报》



彩图9
光绪十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厂（吴友如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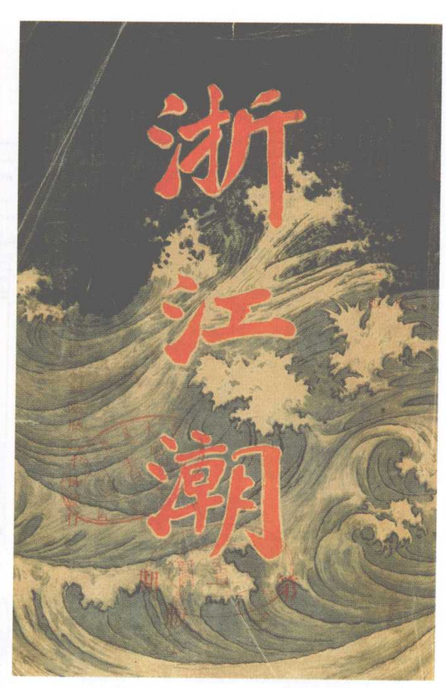
彩图10（左）
《绣像小说》

彩图11（右）
清代年画木雕版

彩图12（左）
《教育杂志》

彩图13（右）
《浙江潮》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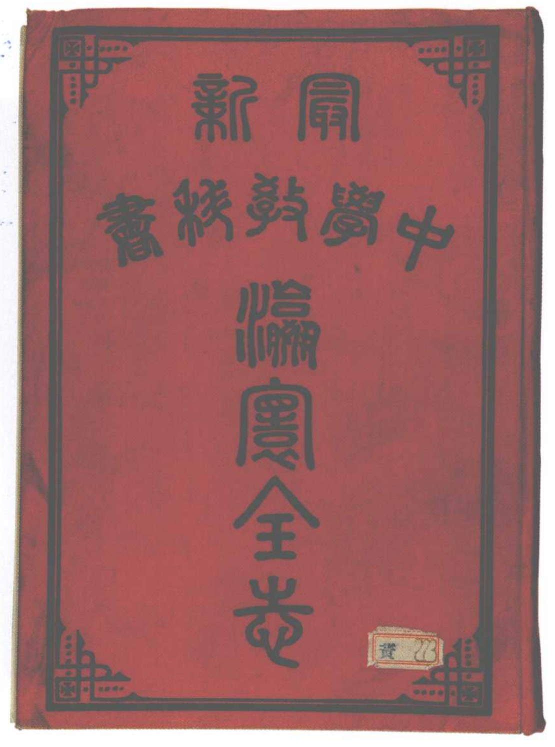






第五十課 電話

人之言語。輕者達數尺。重者達數丈。數丈以外。不復可聞。自有電話。則雖相去千里。而無語不可以達矣。電話之製。略如電報。而以受語遞語二機。傳達聲音。故所隔雖遠。對語自若。便孰大焉。幼稚之童。嘗有以數丈之線。分系其端於兩竹筒。而藉以傳細語者。其理與電話同。惟選料不精。又不知用電。故未足以及遠。然仰其理



彩图14
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初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

彩图15
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学部颁发的世界地理教科书《瀛寰全志》

编辑委员会

出版工作委员会

目 录

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

叶圣陶在《翻译本〈倪焕之〉序》中说："外国读者如果大略知道我国的现代史实，一定会了解就在我有生以来的60多年间我国变革之大，之快，是史无前例的。""叙述这个变革，表现这个变革，是我国的历史家和文学家非担当不可的任务。这是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目的不但在认识以往，而且在启发未来。"[1] 叶圣陶诞生于1894年，此后的60多年，我国的变革世人都清楚，而在这60多年中，出版担当了帮助先进分子启发未来的任务。

【1】叶圣陶:《翻译本〈倪焕之〉序》,《叶圣陶序跋集》,80页,三联书店,1983年。

第一章　经世之学的视角转换

第一节　内外交困的中国近代前夜

晚清，中国处在一种十分窘迫的境地。

1840年是道光二十年，离所谓康乾盛世才45年，中国已经没落了。真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当时西方已经达到了"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使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2] 而我们当时还是个与千年前景象一样的男耕女织、皇帝专制的小农经济社会。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如果男有田能耕，女有纱可织，民众也还可以糊口。而清代

乾隆末年就危机四伏，老百姓没有饭吃。所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不得不开放禁令，容许贫民到它的“龙兴宝地”开垦；六十年，贵州、湖南苗族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等地白莲教起事，前仆后继，不断斗争，他们的口号是“官逼民反”。白莲等教波及燕、齐、晋、豫、秦、蜀诸省，甚至闯入皇城；参与人数达200万，历时7年。此役军费二万万两，被杀教徒数十万，兵士、乡勇被难者无法计数；暴露了清廷的吏治腐败、军队无能、财政空虚。

事物变化内因是根据。不能想象仅仅是对外深闭固拒才形成落后。清廷的经济政策、对汉族知识分子压迫是根本原因。

清代贵族在全盘接受含有保守基因的儒家思想的同时，又强调它自己的“祖宗家法”不能变。所以清代在经济政策上仍然继承汉初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上海已经有钱业公所，名为“内园”。内园有历年钱庄碑记，据现存碑记记录，1776—1786年上海有石源隆等有名有姓钱庄18家，1786—1796年有隆茂庄等有名有姓64家，两共82家；碑刻上尚有24家名称已经难已辨认，则共有106家。[1] 如此众多融资、汇划的金融机构，证明康雍乾时商业已极为发达。但雍正、乾隆之际多次明令禁止新开牙行，雍正五年颁布出洋逾限不归者不准回籍令。这些都有碍商业发展。咸丰初年发行不可兑现的纸钞作兵饷，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提出钞法有缺点，“兵民怨恨”，建议逐步改为可兑换。而皇帝批评：“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款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2] 其剥蚀商人可以推想。嘉庆前近200年丁口滋生，除提倡开垦别无他策。开垦，加重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水患严重。为了缓和缺地矛盾，清廷规定财产继承的嫡庶平等：“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3] 原有耕地的逐次分割，一户户有那么一小块土地，真是“小”农经济：丰年不够衣食，更无余钱剩米买其他用品，影响商业发展；灾荒之年填尸沟壑，百姓只能铤而走险。

【1】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9~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2】王先谦等编：《东华续录》，咸丰四年三月初一至初八各条。

【3】《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户役“卑幼私擅用财”，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政权衰败的典型特征是政治腐败。清王朝把皇权专制推到历史的极点，必然加剧中枢和地方机构的低效和腐败。六部逢到坐班之日，官员竟有不齐。皇上有时下旨命九卿集议，有“彼此推委，不发一言，或假寐闲谈，迟延累日”。[1]

清代官员实行低俸，默许地方官贪污和浮收田赋。清代官员贪贿无艺在在皆是，如道光年间每年用于维修黄河大堤的款项五六百万两，实耗不及五六十万两，其余均被逐级中饱。河工年年耗巨资，结果黄河年年成灾。

“官以贿成，刑以钱免”，清代的腐败是历代所不及的：乾隆自命英明，虽对贪黩时加严惩，但身边最受信宠的和珅为相20年，家财敌全国岁入十年以上。官吏贪婪之风始终不戢，不是上行下效，而是必须如此。当时司员甚少才望。一则满员之荫生太易，二则汉员之捐班太多。当时督、抚满员既多贪黩，道、府汉员亦少清望，州、县尚在府、厅、司、道之下，层层管辖，层层剥削，有志节者亦无以自保。乾隆时进士、嘉庆亲政后因批评朝廷而被流放的洪亮吉说：“十余年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又说：“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之前。”至于胥吏，洪亮吉说：“今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者七八百，至少一二百人。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则万家之邑亦嚣然矣。”[2]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清代皂吏的贪黩，竟是制度决定的！林纾在甲午战败后愤慨时事，撰有歌谣30首，其中有《饿隶》一首，说明皂隶贪黩的合法性：“饿隶饿隶当县门，无钱到手休号冤。剥肤得钱隶惊笑，内丁外胥齐劫剽。幸逢好官惩隶贪，大杖责隶隶勿惭。仰首问官府，容隶伸一语：隶子今年二十余，不许登科难读书。朝制未颁隶俸钱，清廉望隶追前贤。能贤作官不作隶，隶家禁锢须三世。隶有子，隶有妻，奈何望隶为夷齐。操业既猥贱，渐觉良心变。虎不伤生虎不生，无食迫隶吞平民。隶言近理官亦许，今将何术能匡汝？”[3] 这是清代包干财政制度规定的官员必须贪污：1895年3月11日《纽约时报》有篇述评指出：“就拿这里的道台来说吧。就其收入而言，他简

[1]《清实录·世宗朝实录》，卷十一，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2] 钱穆：《国史大纲》，866~86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3] 林纾：《闽中新乐府》，第27首，闽侯魏瀚家刻本。

直就相当于一个苦力。道台一年俸禄［衙门费用定额］不过2 000两白银，根本不够支撑衙门里众多师爷和衙役的开支，但他又不得不设置这些职位。因此，为了维持局面，他只有从他经手的各项钱财中捞取一些油水。清国的军队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武将们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不受尊敬；国家发给他们的俸禄完全不够用，于是只有通过虚报兵额或贪污公款来增加收入。”[1] 正是这种制度，官吏唯恐天下不乱。咸丰年间遍地饥荒，朝廷不恤，导致会党纷起。太平天国起事后，遍布南方的天地会乘势大举，咸丰四年佛山陈开“分路包围广州，达半年之久。清军因得外国枪炮、火药、粮米接济，陈开未能攻下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肆意滥诛，被杀者七万余人，强半为无辜”。[2] 广州被围而陈开没进广州，被杀者，据当时文人笔记，都因衙役以叶名琛“混入奸民格杀勿论令”任意勒索未遂而杀。朝廷任何规定都是官吏的生财之道：光绪十九年七月初十薛福成上《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海禁旧例折》，谈到雍正、乾隆以来限制民人不能在海外久留，规定逾期不许回国令，说：《江宁条约》规定中英民人均可自由往来对方国家，到英属东南亚侨居的，应该弛禁了。但侨胞不敢回来。他说侨胞虽拳拳爱国，“惟筹及归计，则皆蹙额相告。以为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讹索，种种贻累，不可胜言。凡挟赀回国之人，有指为逋盗者，有斥为通番者，有谓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谓其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有强取其箱箧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藉索逋欠者。海外羁氓，孤行孑立，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3] 一个100年前的禁令尚且可以如此做文章，可见胥吏鱼肉民众之一斑。

【1】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09~110页，三联书店，2001年。

【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光绪朝东华录》，3241页，中华书局，1958年。

贪污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科学落后和强大是不能并存的。军队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不能想象一个腐败的政府能有强大的对外军事力量：所以鸦片战争被打败是必然的。

康雍乾三朝世称“盛世”，其实很早就危象丛生。钱穆说：“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衰世的重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

点：一、因帝皇精神一代不如一代。二、因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三、汉人亦志节日衰，吏治日窳。四、因户口激增，民间经济情形转坏。[1]

整个清代，皇帝自封比谁都聪明能干，除规定事事需要“圣裁”外，更对他批评不得。高压政策下谁都不敢说真话。魏源在《圣武记》中批评赵翼在《皇朝武功纪盛》一书粉饰清代武功：“近人纪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如三藩之役，顺承郡王、简亲王逼迫于楚，贝勒洞鄂失机于陕，将军舒恕观望于粤，准噶尔之役，蒙古王丹津纵寇于鄂尔昆河，一概不书。即如傅尔丹和通泊之败，额愣特喀喇乌苏之败，亦略及而不详。参赞额勒登额逗援于缅甸，温福偾事于金川，巴忠、成德、额辉贿和于西藏，恒瑞老师于台湾，亦一概不书。”[2] 赏罚言而无信。太平天国起义，清廷毫无办法，后来咸丰帝有谕：“无论何人，克南京封郡王”，而事后食言，曾国藩仅得封一等勇毅侯，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皆仅封一等伯。

清代由于狭隘的种族政策，压制汉族士人，禁止他们问政：“顺治九年，立卧碑于各直省明伦堂，凡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又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监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3] 明清史学家孟森说：“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4] 自宋以来读书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已经消沉。这就是乾嘉时读书人只能用考据消磨时光的原因之一。后来魏源说：“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乌乎！”[5]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为笼络百姓，按省县规定税额后永不加税。平三藩财政紧张，“各省钱粮扫数解京，地方绝无存留，更不必言建设”。“雍正以后，并以‘火耗’归入正项，地方更无余款，更说不到实济”。乾隆十年柴潮生上疏，说：地方毫无可支配财物，应办各事必向上申请，“有司上畏户、工二部

【1】钱穆：《国史大纲》，865~870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2】钱穆：《国史大纲》，846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3】钱穆：《国史大纲》，84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4】孟森：《明清史讲义》，614页，中华书局，1981年。

【5】魏源：《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24页，中华书局，1976年。

驳诘，下畏身家之赔累，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日奔走之以为勤，遂成天下之大弊”。[1] 后来稍微有事，经费无着，以纳捐卖官补助财政，政治更加腐败。

【1】钱穆：《国史大纲》，840~84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统治阶级的日益腐化，作为统治阶级组成部分的士人，也被侵蚀，与官僚腐败相表里。其表现为：“一是标榜义理。‘他们略窥语录，便自命为第一流人，而经史概未寓目’，言行不一：标榜理学，以盗虚名，猎厚赀。二是醉心考据。这类士人‘东抄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疏剔字句小节，不能旁通其大义’，既‘不精求古人所以为学之本，而急于著作，捃拾唾余琐碎，动成巨帙，以此自炫炫人。后生小子为之目夺心惊，亦争希其所为’，其结果害己害人。三是雕琢诗文。这类士人只会‘猎古人之辞华’，‘率雕琢无益之词，雍容揄扬，铺饰盛美’。四是兼商兼吏。此种人‘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至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五是沉缅制艺。此类士人为数最多，前几种人也与之有关。”[2] 由于清代恪守重农抑商政策，不仅农民只能挤在农田上讨生活，知识分子也是过剩，只能在考据中讨生活。

【2】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189~191页，中华书局，1981年。

第二节　正眼看世界者

“后见之明”：道光时及其后的知识界，虽然已经自觉地接触国家兴亡，但并不是说士大夫群体，更不是说他们思想认识发生了本质变化。社会仍然不断新编《经世文编》，说明他们仍然用传统的经世思想，甚至很多是几千年前的办法在观察、应对当时的社会危机。而当时，国家实权掌握在一个不顾能力、只力图保持自己权力的女子手里。国家更走入绝境。君主独裁制度已面临末日，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来替代。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还不具备产生新的社会形态的基础。虽然关心国家命运的读书人还是用旧的、毫无实效的经世思想在观察、思考，然而我们要看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正是这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思想，为对

付西方挑战作了最好的舆论准备。

嘉庆至道光早期，身处社会动荡中的精英为了理顺国家内部秩序，已在企求积极的改革。

1839年7月和9月中国水师与英国军舰发生了穿鼻洋炮战。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古老的中国在炮口下迈出走向近代的第一步。相应的经世谋略重心已必须改变，首先就是谋边防。在文字上就是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著作问世。

一、《海国图志》

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发生后，魏源编写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书互为表里：《圣武记》是为“里”，叙满洲灭明到道光重定回疆，满族还是有力量、有作为的，意在激励国人。《海国图志》为“表”，立意在说英国不足惧。该书前后有50卷本、60卷本（图1）、100卷本，都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筹海篇”，论述他的海防思想；第二部分分量最大，是以地理为中心的外国知识；第三部分是杂录。历史上关注抵御外侮是注意其第一部分《筹海篇》：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十五日、十六日与英国、法国签订《天津条约》后，二十九日兵部左侍郎王茂荫有《请广印〈海国图志〉作宗室八旗子弟教本并变通考选之法以求人才折》，指出该书防御方面的价值。[1] 日本人也非常注意：“有人常提到《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行，产生巨大影响，实则许多日本刻本都只是部分译本，[19世纪] 50年代中期的最初的几种译本甚而仅是《筹海篇》的翻刻而已（见增田涉《西学东渐和中国事情》），因为日本当时急于



图1
《海国图志》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刊》，第一辑，597~598页，台北，1972年。

从中英鸦片战争吸取经验教训，而《筹海篇》是对付外来侵略最有针对性的言论。"[1] 在当时和稍后也有人批评《筹海篇》。陈沣在《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张维屏）先生》中以两千字篇幅批评《筹海篇》，说："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指出历史上强盛时利用甲帮我打乙可以，现在有什么能力指挥他人；如果帮我打赢了英国，要求报酬，则"唐之请回纥，是其覆辙"；"兵凶器，战危事，不可易言之也……信影响之谈，则其计必误"。[2] 委婉地批评书生不要轻言兵法。冯桂芬批评他"'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不宜为此说；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3]

【1】周振鹤：《随无涯之旅》，106页，三联书店，1996年。

【2】陈沣：《东塾集》，卷2，23~26页。

【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49页，上海书店，2002年。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著名命题，原话是："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也就是为知己知彼。这是痛定思痛之语。

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得名，但这句话源自林则徐。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上》说："先是林则徐奏言：'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此时但固守藩篱，即足使之自困。若许臣戴罪赴浙效力，必能殚竭血诚，克复定海，以慰圣廑'。不报。"[4] ——"师夷长技以制夷"源自林则徐。

【4】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177页，中华书局，1976年。

《海国图志》的第二部分则是中国近代出版了解世界的第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受林则徐之托所写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林则徐被遣发至新疆"效力"，从浙江路过镇江时，魏源从扬州过江相见时林则徐请他写的。鸦片战争初期，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正是林则徐被革总督职，受命以四品卿"戴罪"至镇海襄助裕谦的时候。魏源在裕谦幕，参与浙东抗英战争。为了解敌情，曾审讯英俘，从中得到许多英国情况，整理成《英吉利小史》。他的研究得到林则徐的赞誉，两人堪称同志。魏源有《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五律两首讲《海国图志》事。第一

首有“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句，小注说：“时林公嘱撰《海国图志》。”第二首有“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句。[1] 说明林则徐让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是预防资本主义新的侵略。《海国图志》于1842年完成，共50卷。1847年魏源丁母艰时补成60卷，木活字重排于扬州。1852年又邀汪士铎协助，再补成100卷，用木活字排于南京。

[1] 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魏源集》，781页，中华书局，1976年。

魏源曾交待过《海国图志》的材料来源。《海国图志》有三个本子，后两个有序，60卷本的习惯称“原叙”，100卷本的称“后叙”。魏源在《原叙》里交代了材料来源，说：“《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并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是用的古代通行的编纂方法。在此前后我国兴起的东南岛屿志和西北边疆志，莫不用这种“钩稽贯串”编纂方法。这种方法使这些著作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魏源说“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四洲志》”。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作了具体介绍：“《四洲志》是1836年伦敦出版的当时最新版本的世界百科全书，中文编译本《四洲志》译介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这四大洲主要国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译文约87 000多字，《四洲志》主要是通过魏源《海国图志》的流传而产生学术影响。《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发行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四洲志》的材料全部分别辑入第3、5、7、13、14、16、20至33、36至43各卷，魏源把《四洲志》的材料放在各篇之首，然后再辑入其他材料。以后魏源不断修订，1847年扩大为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魏源称该书的特点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强调了材料的可靠性。……他把《四洲志》列在所有材料的第一条，并注明‘原本’。试图建立起不抹杀前人成果的近代研究方法。在介绍美国时，则把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辑在最前面，称《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而将《四洲志》原本列为《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下》，并特别声明：‘志例当先原本，次重辑。惟《美理哥志》出

【1】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312~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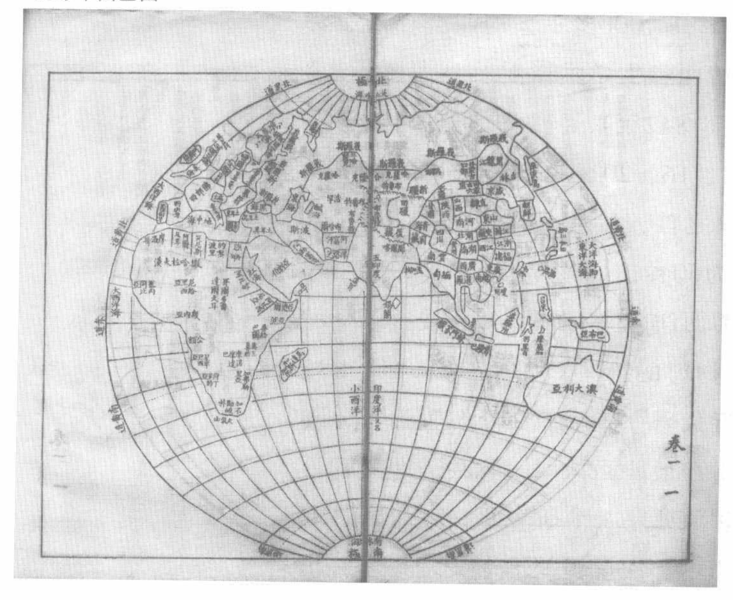
其本国,实较原本尤提纲挈领,故先之。'"[1] 《海国图志》100卷本的《后叙》称:"谈西洋舆地者……在粤东译出者,则有抄本之《四洲志》、《外国史略》,刊本之《万国图书集》、《平安通书》、《每月统纪传》,灿若星罗,了如指掌,始知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之浑圆也。"魏源说他还参考了《每月统纪传》,在文中引述时也称引自《每月统纪传》。《每月统纪传》在当时出现过两个:《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后者1833年在广州创刊,后移新加坡,曾刊载过较多地理文章;近年黄时鉴先生作过专题研究,弄清了魏源所参考和引用的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引用达28处,黄先生列了对照。[2]

【2】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影印本导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27~29页,中华书局,1997年。

二、《瀛环志略》

整个鸦片战争,清廷以中世纪的世界知识、中世纪的政治、中世纪的社会、中世纪的武器和战略战术面对近代化的入侵者。使皇皇上国遭遇到屈辱,割地赔款,严酷的现实暴露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一批爱国知识分子考察了这种差距。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子从横向量出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承认我们的短处,提出赶上的途径。魏源则将这一思想结合实际,详尽介绍世界知识和御敌对策,完成了《海国图志》。此外还有徐继畬,经几年采访,完成了《瀛环志略》,讲世界地理。(图2)

图2(a)
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一所画"地球平圆全图"



徐继畬,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历任知府、道台、巡抚,后来任职总理衙门,主管同文馆。他对时

事、吏治极为留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任福建汀漳龙道，助防厦门，在厦门从美国人雅裨理处得到地图。次年升任闽抚，“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为之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1]《瀛环志略》是部研究性成果。他的修改，任复兴先生作了统计：“据已发现的两种全稿、四种残稿的粗略统计，前五种稿本正文680页，143 845字，修改增补达1 907处。”[2] 1844年完成初稿，1848年杀青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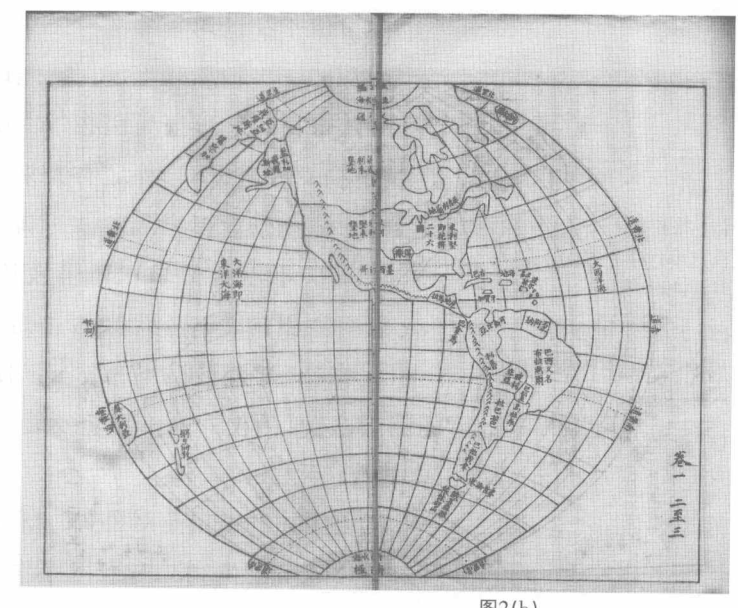


图2(b)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一所画“地球平圆全图”

【1】徐继畲：《〈瀛环志略〉序》，《瀛环志略》，6页，上海书店，2001年。

【2】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三、地理书的贡献

以往地理是历史的附庸，《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基本按传统地理著作的方法编撰，——从书本到书本。自魏、徐后，续有姚莹等人辑集、翻印地理书的活动。然而一段时间内没有超过魏、徐二位的。30年后王韬说：“近来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松龛中丞之《瀛环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已……此诚当今有用之书。”[3] 冯桂芬在《制洋器议》中批评魏源的《筹海篇》，他另有《跋海国图志》，还从地理学角度批评其缺点。[4] 诚然魏书和徐书都有缺点，然而这两

【3】王韬：《〈瀛环志略〉跋》，朱维铮主编：《弢园文新编》，138页，三联书店，1998年。

【4】冯桂芬：《显志堂集》，卷12，19页。

本书的价值不在这两本书本身。只要我们看看下面这段文字，知道当时深闭固拒的愚昧程度，就能理解这两部书的意义。

康熙帝虽然能接受外国数学、历法，乾隆帝则很胆小。《乾隆御制诗》中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1] 雍正初年开始禁教，乾隆帝累次重申；嘉庆十年四月十八再申教禁外并令“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2] 禁教进而旁及西书：有记载，“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之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3] 显然查禁的或是本英汉词典，或是本英汉分类词汇，并不是宗教书。

[1] 乾隆五十二年诗，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1页，1992年。

[2] 方豪:《中西交通史》，1027~1028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

[3] 魏源:《海国图志 ·卷二筹海篇三 ·议战》。

常年闭关的结果是对外界一无了解，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

鸦片战争刚失利，有光禄寺少卿、顺天府尹曾望颜，在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夷情反复请封关禁海设法剿办以清弊原折》，说只要“急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伏其命，彼未有不惧而求我者也……再查明沿海各山，有淡水可取之处，专派弁兵把守，不准夷船往汲”。[4] 如果不加说明，难以理解这位官员的科学水平。当时有种说法，欧洲人吃肉，必须以茶叶和大黄才能消化，如果没有这两样，就要胀死。所以只要断绝茶叶和大黄贸易，就能迫使英国人遵守中国法律，不再走私鸦片。其实，茶叶贸易是近年的事：“前代市舶，从不闻茶叶出洋，自明季荷兰通中国始，及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自荷兰购归百斤，饮而甘之，国人饮者岁增一岁。”[5] 之前欧洲人不饮茶，并没有胀死。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分册，209~210页，台北，1972年。

[5] 魏源:《海国图志 ·卷二筹海篇四 ·议款》。

皇帝看到这个好方法，命令林则徐考虑。皇帝命令，林则徐只能放下手头事回复：“至大黄、茶叶二物，固属外夷要需。惟臣等历查向来大黄出口，多者不过一千担。缘每人所用无几，且尚非必不可无之物，不值为之厉禁。”“即各山淡水，上年本已派弁守之，始则夷船以布兜接雨水，继而觅诸山麓，随处汲取不穷。则已守不胜守，似毋庸议。”[6] 社会高层人士的知识水平尚且如此，就能理解林则徐、魏源、徐继畬介绍“世界知识”工作

[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分册，165~166页，台北，1972年。

的伟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理之嚆矢。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徐松庵《瀛环志略》十卷，并时先后成书。魏书不纯属地理……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徐书本自美人雅裨理，又随时晤泰西人辄探访，阅五年数十易稿而成，纯叙地理。视魏书体裁较整。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1] 他的评论从历史实际出发，很平直。他在《三十自述》中说："日治帖括，虽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年十八计偕入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2] 康有为接触西学也还是从这两本书开始：他22岁时到香港，"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3] 就他们师徒两位自白，可概见两书的影响。

上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瀛环志略》"纯叙地理"，不很正确。《瀛环志略》用"志"字，就是志书体，就不是仅仅叙述地理，还有历史、物产，还有政治制度介绍。如"英吉利国"中，就有大段介绍英国国会。他在介绍首相和各部大臣等政府职能后，介绍国会："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上议院和下议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西教师（天主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若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8册，459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梁启超：《三十自述》，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95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3】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4册，1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民间有控诉者亦赴乡绅房具状，乡绅斟酌拟批，上之爵房核定。乡绅有罪，令众乡绅议治之，不与庶民同囚禁。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又说：“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1] 这是所见国人著作中最早介绍议会操作的文字。国人对议会政治介绍较早而详细的，当是咸丰十年（1860年）蒋敦复的《大英国志》。但他认为君主立宪行之于我国必天下大乱：“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未闻王者不得操予夺生杀之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未有草野细民得曰立君由我。”[2]

【1】徐继畬：《瀛环志略》，235页，上海书店，2001年。

【2】蒋敦复：《英志自序》，《啸古堂文集》，卷7，5页。

有一种说法，《海国图志》完成后魏源曾请朱琦代呈。此说可以相信。因魏源仅仅是知州，六品，不能和皇帝对话，只能托人转达。言官朱琦，桂林人，道光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御史。他和苏廷魁、陈庆镛被称为“谏桓三直”，这部书他是敢递的。另外，《海国图志》100卷本里可见每卷、每事的按语有三种用语：“臣源曰”、“魏源曰”、“叙曰”。“臣源曰”应该是50卷本曾作上呈本的明证。“魏源曰”当是60卷本所添，“叙曰”谅是汪士铎助修100卷本所添文字用语。这部书在鸦片战争刚告一段落时，由朱琦代递给道光帝；天津条约签订之时王茂荫又建议咸丰帝看看，而前后两位皇帝竟然全无反应，可见清代是应该灭亡了。《江宁条约》有一个《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条约文字里有六处称《江宁条约》为“万年和约”。“万年和约”四字可能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可以苟安一世了。不知道这仅仅是刚开始，半年后《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都订明12年后续约。续约，续出了英法联军之役，虽然又一次唤醒了知识分子，但又耽误了20年。

第三节　昏睡20年后

林则徐、魏源、徐继畬之后，关心周边成为自觉者不乏其人。因为沙俄的关系，并将视线转向西北。

一、最早的同志

姚莹（1785—1852）字石甫、号明叔，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古文家首领姚鼐的文孙。小时即跟祖父学习，以博通知名。功古诗文，留心经世学问。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累官知县、知州、两淮盐掣同知。所至有政声，为江督陶澍、苏抚林则徐所激赏。道光十八年（1838年）授台湾兵备道。鸦片战争，与总兵达洪阿布兵于鸡笼海口，诱沉英船，俘获百余人。《江宁条约》谈判时，英人要求惩办他，清廷以“妄杀夷人冒功”“罪”，被逮入狱。后赦出，以同知发四川。二十六年，奉檄赴藏。访察西藏、印度形势，搜集地图，考订前人著述，著《康辎纪行》16卷，记海外形势。太平军起，咸丰元年（1851年）奉命往广西参赛尚阿军。二年，湖南巡抚张亮基留署按察使。《康辎纪行》是部很重要的边疆史著作，有着很多实地考察资料。他另有《东溟奏稿》、《东溟文集》、《识小录》等著作共9种，汇刻为《中复堂全集》。

鸦片战争期间，王蕴香以烽烟告警，海外地志宜加留意，汇辑《海外番夷录》出版；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以静观斋斋名辑刻《域外丛书》，收书九种。道光二十三年琴川郑光祖辑、郑氏青玉山房刻《舟车所至》丛书，收域外和边陲地志书21种。

在前，有广东嘉应金盘堡人谢清高，乾隆四十七年至六十年曾在外人海船上13年，后来曾将海外所见所闻先由吴兰修笔录、李兆洛整理成书，名《海国纪闻》；后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由杨炳南笔录，名《海录》。《海国纪闻》正文已佚，仅存序；而《海录》原未刻，鸦片战争开始后1840年付刻，当时就被多次翻刻。汪文泰著《红毛番英吉利考略》（1841年）。陈逢衡著《英吉利纪略》（1841年）。闭塞多年的中国甚至不知道打到京师大门口的英国在天地之何方，从世界地理入手了解世界也是情理中事。梁廷枏主修《广东海防备览》和《粤海关志》，战后又搜集海外旧闻和传教士所编书籍，撰写《合众国说》和《海国四

说》（1846年）。《海国四说》介绍英美形势，是国人第一位称道民主政制的书。又有《粤道贡国说》（1844年）、《兰仑偶说》（即伦敦，该书说英国，1846年）。何秋涛有《朔方备乘》（1843年），并续有所作。夏燮以战时所闻，辑《中西纪事》（1850年）一书。我国地理，其他学者原先一直将研究区域所在位置，作为史学附庸，考察地志，仅为读史。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这个书名最能说明它的附庸性。而世道变化，现在地理在某种程度和不同角度成为研究外国，服务经世思想。新的时代内容形成一股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思潮。

二、墙内开花墙外香

然而可悲的是，这第一步跨出后又有停顿。类似梁廷枏、夏燮、姚莹、何秋涛等的著作再无出现。《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文献上能见到的、注意这两部书的仅广州学海堂的陈澧和张维屏（张南山），而真正重视的是日本人；中国人认识这两部书是20年后！读史至此，令人扼腕久久！

《海国图志》，据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调查，在咸丰二年（1852年）之前，仅魏氏家刻本和木活字，至1866年后被翻印，从1842—1902年国内有14个版本。[1] 据文献，咸丰初年北京有一副50卷本版子。《瀛环志略》则有18个版本，[2] 也是在1866年后才被翻印。两部书在国内被冷落了20年。

【1】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345~3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3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两部书都有十多个版本当然不算少，但初期仅有作者家刻本，较之在日本受重视就相形见绌了：我们受到西洋大炮轰击时，日本也受到打击。他们被炮声惊醒了："1853年《海国图志》60卷本和《瀛环志略》相继传入日本，有识之士如广濑旭庄、桥本佐田等对《海国图志》不断进行搜求和朱批；自1853年幕臣川路左卫门尉圣谟首命盐谷世弘训点翻刻开始，以后各种翻刻、训解、和解、校正本，几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1854年后的一二年间，《海国图志》的'训点翻刻本'与'邦刻本'等便有20余种。《瀛环志略》在日本也大受欢迎，1861年出版有德屿小西等

同刊的对嵋阁本，由井上春洋等训点，该版在印刷和装帧的质量上远远超过了同期的中国版本，地球图用红、黄、绿三色套印，人名地名有英、日两种文字注音，年代日期则用日本纪年标示。”[1]用训点、用日文标音，目的是为更多汉文水平较低的读者方便。这个差距足以说明在此后不久，日本就占领了琉球，又几年甲午打败中国，等等的原因。

[1]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317~3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前面提到，咸丰八年（1858年）我国关心边防的兵部左侍郎王茂荫还只见过《海国图志》50卷本：他在当年五月二十九日有一个题名《请广印〈海国图志〉作宗室八旗子弟教本并变通考选之法以求人才折》。折中说："臣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云云。而早在四年前，1854年日本已经大量翻刻60卷本，可悲！

三、"国耻足以兴之"

从1840—1860年这20年间，清廷经历了内外两大打击：太平天国运动和英法联军之役。

早在19世纪30年代，龚自珍以一个忧时之士的敏锐，感受到地层底下岩浆的涌动，就说："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他所感觉到的是内忧，还不能设想外患的到来。道光前期国内已经非常不安定。"鸦片战争更使加剧。广东商民捐饷助银，官吏征夫、征粮，追呼日迫，道殣相望。浙江民户半数流离，半数观望，地丁漕粮不能催纳。江苏负荷一向独重，战后漕粮每亩一石，浮收多至三石，地丁每银一两收钱多至四五千文，如不遵勒索，即诬以罪名，横加摧残。富庶如苏州、松江两府，竟有以所得不敷完纳，弃田不顾者。……加之广州不再独占对外贸易之利，内地土产出口，外来洋货内销，取道粤北者日少，成千成万以挑运、护运及开设旅店者，失了谋生之路。"[2]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清廷八旗和绿营军队在太平军面前无一能抵挡。很快，不再是清廷，而是汉族地主对抗太平军。英法联军至天津、北京，"车驾北狩"、"出巡热河"，外国大兵在京师奸淫

[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85~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掳掠；圆明园收藏被外国大兵抢掠一空至无法掩饰地步而放火灭迹：咸丰帝为保面子阻止红毛番进北京而丢尽面子。沙俄乘机订约，掠夺割去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

“车驾北狩”、“出巡热河”、割乌苏里江以东地，士大夫痛苦的称之为“庚申（1860年）之变”。“国耻足以兴之”，痛苦促使以国是为己任的读书人进行了新一轮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对此，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四省、民族危机又次严重，顾颉刚和谭其骧组织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历史系师生成立“禹贡学会”，研究边疆地理。在计划书里说到：“清道光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相号召。察此种运动之主要起因，实应于外患之压迫。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首将老大帝国之病态揭开。咸丰八年，英法联军长驱入北京，订立天津条约。是年，政府又割黑龙江以北之广土于俄。十年，以俄人之无厌，又将乌苏里江和图门江以东及沙宾达巴哈以西之两地割与之。国中经此数度戟刺，遂激起一班学人跳出空疏迂远之范围而转向经世致用之学术。边疆学者，经世致用之大端也。”“当时之新学风，其方式有三：一曰外国史地之研究……二曰《元史》之研究……三曰边疆史地之研究。”[1]

【1】顾颉刚起草：《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

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俄罗斯佐领考》，沈尧的《新疆私议》，林则徐的《荷戈日记》等，都可见他们的忧患之心。再有何秋涛的《朔才备乘》、《北徼水道考》、《北徼城邑考》、《色楞格河源流考》、《额尔齐斯河流考》、《库叶附近诸岛考》、《尼布楚考》、《雅克萨考》，《俄罗斯诸路疆域考》等等20种书。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签记》、《俄罗斯事补辑》。稍后有缪祐孙有《通俄道里表》、《俄罗斯源流考》、《俄罗斯户口略》、《取中亚细亚始末记》、《俄游日记》等九种。管斯骏的《俄疆客述》等。所以研究这些从不被读书人重视的学问，因为“彼时群谓足为中国之大患者，以壤地之毗连，必为俄国，而西北受害最先。”[2] 从海域转而关注西北、东北边疆。

【2】顾颉刚起草：《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百年来中国之边疆学》。

也有海域、陆地全面关心的，这位叫沈敦和，他著有《英吉

利志略》、《法兰西志略》、《弥利坚志略》、《德意志志略》、《俄罗斯志略》等。这时《北徼汇编》等又一批边疆丛书陆续出版，直到光绪初《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俄国疆界风俗志》丛书的出版。乾隆时有位户部郎中祁韵士，被充军伊犁，两年后被召回，在新疆期间，他考察史地，写有《藩部要略》、《西陲要略》、《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己庚编》等，到同治元年（1862年）陆续被广雅书局雕版传播。

四、从根本上认识

英法联军之役后不久，除研究边疆地理，有条件的人还开始接触社会治理。其中具有代表性和前瞻性的有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黄遵宪、郭嵩焘、邵作舟、汤寿潜等等。他们有人从与来华洋人的接触和洋人的书中感受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有一部分则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这些人提出的，可能更在行些。他们的议论，或说建议，已触及民主政治。但是社会环境迫使他们文字中有所顾忌，唯一例外的是王韬，他避居香港，清廷无可奈何他，所以可以畅所欲言，影响内地；而郭嵩焘说了一点点，下半辈子就倒了大霉。这一段时间出现的著作，虽然由于社会历史还没有到达相应程度，不可能被采用，但对后来维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思想资料。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又字景亭。江苏吴县光福镇人。

光福有邓尉山，所以冯桂芬自号邓尉山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顺天、广西乡试考官，国史馆协修，教习庶吉士。丁忧归，主讲南京惜阴书院。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回籍办理团练。十年太平军克苏州，迁居上海，主讲敬业书院。太平军拟攻上海，沪上士绅募洋枪队、入皖乞援，均参与商议。后入李鸿章幕。著有《显志堂稿》、《弧矢算术图解》、《西学新法直解》等；而其论集《校邠庐抗议》最被人重视，收晚年议论42篇，极具见解。《抗议》

在上海写作，其中多篇是代李鸿章拟的奏折，如《上海设立同文馆议》。全书完成于1862年。该书最具价值的是力主改革腐败的胥吏制度。全书曾请曾国藩作序，或认为难以实现，或怕招物议，曾国藩迟迟没有作序，但将全书，或大部，抄送军机大臣李棠阶参考。丁日昌在江苏巡抚任上曾以其设想奏请开科考试法律，以征新胥吏，未见用。1874年冯去世后，后人始将其中不致招物议者付刻；到1885年才有42篇本，但其中言论始终没有被人采用。

戊戌变法时，其言论始上达：大学士孙家鼐向光绪帝进呈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汤寿潜《危言》、郑观应《盛世危言》。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孙家鼐上疏，说三本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版在天津广仁堂，请让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要他们将其中某条可，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应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光绪帝接受建议，命印书。后来六月初六内阁奏："内阁奉上谕，前据孙家鼐奏，请将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刷印发交部院等衙门签议。当经谕令荣禄迅速刷印咨送。兹据军机大臣将应行颁发各衙门及拟定数目开单呈览。朱批：即著按照单开，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核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咨送军机处汇核进呈，以备采择。钦此。"[1]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中华书局，1996年。该朱批实图见宋原放等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卷端图第一幅。

马建忠（1845—1900），江苏丹徒人，字眉叔。

马建忠的大哥马良，就是马相伯，信仰天主教，因而和法国传教士交往密切。受其熏陶，马建忠年轻时即学习英、法、拉丁文和研究西学。光绪二年（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并任清使馆翻译（据《辞海》说。另外林庆元的《福建船政局史稿》说，马尾船厂第一批留学生于1877年3月31日出发，"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2] 马、陈同在法国政治学堂学法律）。回国后马建忠入李鸿章幕办洋务。曾因办理外交事务去印度、朝鲜。他以在

[2] 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14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法、印、朝鲜所见闻，撰有《适可斋纪行》；他在法国留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精于法律，留心经世之务，于时事有所发，撰有《适可斋纪言》，于政事改革颇多建言，其中有《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梁启超后来曾说：《纪行》、《纪言》“非君特撰之书，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1]

黄遵宪（1848—1905），广东梅州人。

黄遵宪有很多身份，《辞海》说他是近代诗人。而就其社会贡献讲，首先和思想有关。他是外交官，是我国与日本发生外交关系后最早到日本的参赞。光绪八年（1882年）春天他调离日本到美国旧金山任总领事时，有一首诗：“海外偏留文字缘，新诗脱口每争传。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后一联指他在日本完成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这两本书对我国近代社会影响极大。

中日交通虽有千多年历史，但日本了解中国的多，中国却了解日本极少。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说：“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考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不谓狭隘欤！”[2] 钟叔和在《走向世界》一书中说：1853年香港英华书院的《遐迩贯珍》上刊载了在美国海军柏利将军迫使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时担任翻译的华人罗森的《日本日记》，记录日本事。但“罗森的文字并不高明，尤其是诗，带着非常庸俗的市井气。《日本日记》对日本的历史文化很少记述，而于物产、贸易、市容却很注意”。[3] 所以，还应该说黄遵宪是第一个对日本有研究的中国人。

光绪八年（1882年）他诗中说“草完明治维新史”，《日本国志》仅成草稿。后来没有时间整理。光绪十一年从旧金山回国后，多处要他任职，他“念是书弃置可惜，均谢不往，家居有

【1】梁启超：《适可斋纪言纪行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8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黄遵宪：《〈日本国志〉叙》，《日本国志》，正文2页下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1年。

【3】钟叔和：《走向世界》，117页，中华书局，1985年。

【1】黄遵宪:《〈日本国志〉叙》,《日本国志》,正文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1年。

暇，乃闭门发箧，重事编纂。又几阅两载，而后书成”。[1] 全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 夏完成，计40卷，分12类，200余万字。这是本按专题述史的书，有天文、地理、国统、职官、礼俗等等。邻交、学术、食货等志尤有价值。在《邻交志》的序中说：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车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在《学术志》中讲派遣留学生和国内学校的变化：“明治元年，海外留学者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余人”，“今之当路诸公，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国内学校“争延西人为之教师。明治六七年间，各省所聘、府县所招，统计不下五六百人”。吸收先进文明，正是日本人能在短时期迅速发展的根本。《日本国志》在定稿出版后并未引起注意，甲午战败后才被人重视。戊戌年正月，光绪帝向翁同龢索取该书，总理衙门进呈一部，光绪又要了一部。

《日本国志》是国人第一部依靠自己研究完成的外国史志，不仅对被研究的主体的认识深，而且角度选择正确。他不是为史而史，他将明治维新作为认识的中心，对明治维新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并委婉地对改变中国现状提出看法。他略古详今，于是，几乎可以看作“中国维新参考手册”。书完成于光绪十三年，虽然在光绪十六年已经排铸完成，但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才出版，已是甲午战败。梁启超在次年十一月的《日本国志后序》中不无责备地说：“黄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濇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致今日也。”[2] 将甲午战败的责任放在黄遵宪出书晚的头上是不公平的。如果怪出书晚，要怪李鸿章：黄遵宪光绪十三年

【2】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黄遵宪:《日本国志》,正文433页上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1年。

撰写修改完成后，曾呈一部抄本给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李读后的批语说：该书“于彼国改法从西，原委订证，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匡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1] 既然看到了是“匡时之具”，就应该有所动作，而不该一推了之。（图3）



图3
《日本国志》原首页

《日本杂事诗》2卷，共154首短诗，从日本历史、民情以及风俗到当时维新，每首咏一事，其中咏中国影响于日本的有35首，而讲传入日本的西方事物有41首。实是了解日本学习西方从而富强的便捷途径。1879年总理衙门和王韬的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几乎同时出版。《日本杂事诗》是黄遵宪到日本两年多写好的，后来到美国，又到英国，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看法更有新的理解。《杂事诗》在他生前出的最后一版于戊戌年在长沙刊印，他对旧本进行了修改：删除了一部分；改动了一部分，有的等于重写；增加了几十首，全书共增至200首。他在后记中说：“今此本为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

【1】李鸿章:《禀批》,黄遵宪:《日本国志》,正文434页上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1年。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后改名瀚，字瀬今。

王韬的名、字、号极多。他后来因为上书太平天国，遭清朝政府缉捕，改名韬，字仲韬，一字子潜（紫诠），晚号天南遁叟，等等，都从韬晦一词所派生。祖籍苏州昆山甫里。他父亲在墨海书馆做笔录。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他父亲过世，他接受麦都思邀请到墨海作文字修润工作，从此一直到1861年（咸丰十一年）墨海结束为止。

王韬经历的变化是1861年冬被清政府缉捕引起的。他逃亡到香港，帮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1867年（同治六年）理雅各探亲，邀请他去英国继续合作。王韬在英国耽了两年

多，回港途间又到埃及、法国等国家，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他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以私人身份去欧洲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去过日本。前后两次，“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加以原在上海、后在香港和西方人多年接触，他完成了由封建读书人到一个理解民主主义思想的人的转变。

1870年（同治九年）他随理雅各回香港；1873年理雅各受牛津大学聘请回英国，王韬和黄胜等集资接盘了理雅各英华书院的印刷器材，办了中华印务总局：“癸酉，香海诸同人醵赀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即创刊《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在1873年10月30日创刊。他的欧洲之行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对国家落后挨打的原因比其他人从书本接触认识要深；懂得报纸和舆论的作用：“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事，皆视其所言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1]《循环日报》开创了言论，“多出于王氏手笔，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2] 当时，所有议论时政的人，没有谁能比他和外国人接触的时间长接触深，他对时局的看法真是“一时无两”，文字又犀利，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他的文字主要在1872—1883年办报期间，当时的时髦话题是洋务，认为办了洋务一切迎刃而解。他在《洋务》和《变法》两组文章中指出，从江南造船厂开始，到派幼童留洋，用了洋法并不一定能颉颃洋人。如果始勤终怠，畏难苟安，或者过几天经费不足，或者某天某位说不要搞了而停办。他说：“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进而又指出：“有明之季，西洋人士航海东来，……泰西能敏之人所在多有，亦无救于明亡。盖治国之要不系于是也。”“枪炮则在施放之巧，舟舰则在驾驶之能。行阵之器固不可不利，而所以用利器者则在人也。”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变革首先是人的因素：“在乎当轴者之转移推变耳，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

【1】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朱维铮编:《韬园文新编》,109页，三联书店,1998年。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22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

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1]

王韬在香港，清廷管不到，可以介绍和评赞西方的政体：君主国、民主国、君主立宪国。他赞赏君主立宪：“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君民共识，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也。”“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2] 王韬的变法思想影响了后来者，首先就是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1），广东人，字正翔，号陶斋。

郑观应是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他在香港、上海英商洋行当买办。因为地缘，和洋人接触多，从而了解西方。他的著作共有十部，以《盛世危言》最闻名。《盛世危言》是由最早的《救时揭要》，进而扩充成《易言》，再而成《盛世危言》。《救时揭要》收文24篇，《易言》有36篇，初版于1888年。两书不是简单的增加，“《救时揭要》所显示的只是一位忧患民众苦难有良知的读书人的心态。(图4) 而《易言》则是醒世的号角，拯世的新药”。[3]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14卷本的例言中谈到《易言》的出版：“同治十年，又将续集分上下本，名曰《易言》，寄请香港印务局王子潜广文参校，不期亦付手民，风行日、韩。”[4] 他说的“子潜”就是王韬。他的三本书，唯独《易言》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初版，现在还能见到1880年的初版。王韬在《〈易言〉跋》中指出郑观应的主张：“窃杞忧生之意，尤在睦邻御侮”。[5] 要能睦邻而又御侮，根本在自强，自强根本在重商。所以添了论商、论税、论货币、交通各篇。这些都切中时弊，和中法战争后甚嚣尘上的“练兵、制器、筹饷”的洋务正唱反调。（图5）

【1】以上王韬文字，见朱维铮编：《韬园文新编》中王韬《变法》、《变法自强》、《洋务》各篇，13~20、28~39页，三联书店，1998年。

【2】王韬：《重民》，朱维铮编：《韬园文新编》，26~27页，三联书店，1998年。

【3】王贻梁：《郑观应与〈盛世危言〉》，郑观应：《盛世危言》，1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4】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盛世危言》，5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5】王韬：《杞忧生〈易言〉跋》，朱维铮编：《韬园文新编》，167页，三联书店，1998年。



图4
《救时揭要》



图5
《易言》

他的书当时被翻印的就不下20多个版本。在改名《盛世危言》时从36篇陆续增加到115篇。他的《议院·下》一文，是在甲午后所添，以破除议院不适用于东方论，说："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凌侮中朝，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1]

《危言》，包括后来的《盛世危言》，出版后被广泛翻印，甲午战争后成为最受人欢迎的读物之一，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资料。当时可能仅仅郭嵩焘与他同调，所以郭在出使英国时曾想请他随行。

【1】郑观应:《议院·下》,《盛世危言》,10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湖南湘阴人，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

郭嵩焘是清末外交官。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以大臣衔出使英国。逾年兼使法国。光绪三年奏请设新加坡领事，以保护东南亚侨民，四年二月批准，[2]是为我国设领之始。

【2】《光绪朝东华录》,656页，中华书局,1958年。

据郭氏自言，出使英国时，与总理衙门"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先以从上海至伦敦途间50天见闻、感想成《使西纪程》一册，"介绍和所见西方。报呈总理衙门被刊行。京城大哗。李慈铭谓'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刻之者又何心也'。何金寿劾郭'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华臣事之'。'后有诏申斥郭嵩焘，毁其《使西纪程》版'。"[3] 四年，归国，自是不仕。本拟办内河航行，始终未被批准，以讲学终于故里。义和拳时，郎中左绍佐甚至上疏，请歼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3】钟叔河:《走向世界》,196页，中华书局,1985年。

郭嵩焘有丰富的经历。鸦片战争时他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十八岁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和刘蓉、曾国藩换帖订交，又结识左宗棠、江忠源、罗泽南等人，和曾国藩、左宗棠是儿女亲家。在曾左诸人的“中兴”事业中，郭出过一些重要主意：如劝左出山助张亮基，曾国藩丁忧时，他劝曾遵旨夺情办团练。湘军军饷缺乏，他提出开厘捐解决，建议练水师保持长江交通。对湘军出山他提过很多有效建议，但仅仅在湘军出省初期到江西、湖北时帮带过几个月兵，很快就不干了。他随僧格林沁办理天津海防。中进士后被选翰林院编修，曾国藩功成名就退出政界后，李鸿章照料他，保奏出任苏松粮道，代理广东巡抚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巡抚任上因与总督瑞麟不合，被黜开缺。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授福建按察使，光绪元年迁兵部左侍郎，兼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二年八月，出使英国，翌年兼使法国。虽然在英国仅两年，由于多方面的实践，加之他对我国传统学术有很深的研究，又亲自在西方注意见闻，所以他有独到见解。

他在任兵部侍郎时提出的《条议海防事宜》中已对练兵、制器、造船、筹饷等当时普遍认为的自强之道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很多事政府根本不必管，办法是扶持商贾，制器、造船等商人自会办好，税收就可以解决薪饷。他在英国是使臣，和严复、马建忠、萨镇冰等留学生往来，后者帮助他了解西方经济学说，亲历西方后，他有可能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作较深的对比。他的议论比王韬深刻，但都记在他的日记中，可惜，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料被当时保守势力所扼杀。除《使西纪程》外，他还有《郭伯琛奏疏》、《养知书屋文集》、《养知书屋诗集》影响于当时。[1]

[1] 本段关于郭嵩焘各项，曾参考钟叔和：《走向世界》的《西方文明对郭嵩焘的影响》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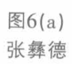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出国笔记

自从慈禧与奕䜣合作罢斥八顾命，设立专理外交的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和成立同文馆后，外交开始上轨道。虽然与洋人有所交往，但对外国情况仍然非常隔阂。后来总税务司赫德准备回英国休假，因为他“主管”同文馆，建议带几个学生跟随去欧洲见识世面。恭亲王奕䜣等军机大臣同意，在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初六有个奏折说：“自换约以来，……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准备派三位同文馆学生，因怕年轻人出事，所以派一位曾当过知县的65岁的旗人斌椿和他的儿子广英一起去。并“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 第三天，正月初八斌椿接到命令。他们一行五个中国人在外四个多月跑了11个欧洲国家。斌椿回来后，他的记述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版，名《乘槎笔记》。此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出使人员有交代笔记的任务。前面提到郭嵩焘50天路途日记就是；而且出使人员涉及驻在国的著作也给予出版，如前面提到的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从而使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借以了解海外情况。从1866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近30年，当时“公费出国”的笔记还有：

【1】钟叔河：《走向世界》，61页，中华书局，1985年。

张彝德：《航海述奇》、《四述奇》、《八述奇》。1866—1906年（图6）


图6(a)
张彝德



志刚：《初使泰西记》。1868—1870年

刘锡鸿：《英轺私记》。1876年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1876年

何如璋：《使东述略》。1877年

黎庶昌：《西洋杂志》。1878年

徐建寅：《欧游杂录》。1879年

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年

曾纪泽：《出使英法日记》。1881年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1887年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1890—1894年

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年

值得注意的是，笔记诸位的经历、水平不同，在外接触的对象不一，而且前后30年社会演进，关心的视角有所差异。斌椿的《乘槎笔记》所记以新奇见闻为主，而薛福成在他《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的《凡例》中说："必于洋务关涉者始笔之于书，即有偶读邸抄、阅新报而记之者，亦以其事关时局不能不录"，说明了这种变化。这些笔记开始虽只给有关洋务衙门的官员，但也很快被翻印流传，对人们了解世界无疑是个非常好的简易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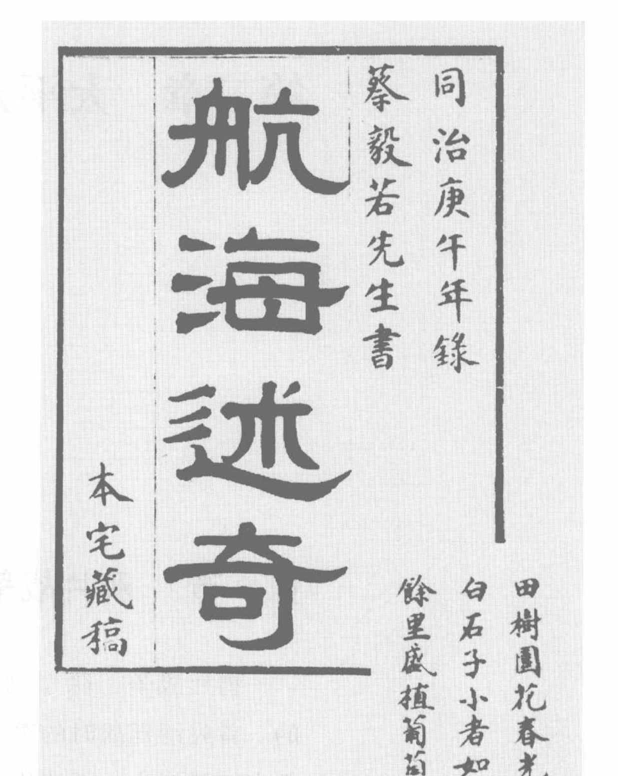


图6(b)
《航海述奇》内封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与出版

第一节　鸦片战争导致的民变

鸦片战争，除了割地，对中华民族经济的强制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清廷战时的军费和赔款，相当于一年的财政岁入。这些都由加赋解决。而清代自从丁亩合一后，岁入主要出自丁，所以就由农民负担了几乎全部的因战败而导致的费用。而农民交纳赋税，又必需承受四五倍的浮收。

鸦片战争最直接的结果之一是肆无忌惮的鸦片贸易，白银的大量流失，进一步加深了银贵铜贱，使主要收入铜钱，而税赋支出以白银计算的农民无形中又增加负担。

“我们香港和新加坡居留地之成为武器弹药的仓库，对东方是一个极大的灾难。这个地区的海盗和土匪就是由我们装备起来的。”[1]

【1】福克斯:《海盗》,147页,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第1卷,47~48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两次鸦片战争马克思都称之为商业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洋货直入，农村手工业受到重大冲击。

这些灾难全国农民是普遍遭受的。对广州附近的农民讲，还有一项是因五口通商引起的。有批评明清“闭关锁国”的，说清代对外贸易仅限广州一地。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明代东面受倭寇200年骚扰，南面葡萄牙人也肆虐闽浙沿海，还伙同倭寇组成

几大批国际盗群。从地理大发现后的300年，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到处是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进行的并非公平的“自由贸易”，而是掠夺。我们知道，印度等地成为英国殖民地，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完成的，只是到了1834年英国废除该公司的专利从而解散时，才将印度等地作为“财产”移交英国政府。1683年郑成功后人归顺清廷后，次年清政府就开放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四地对外贸易。到了1755—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译员洪任辉（James Flint）带武装商船要求在舟山群岛占一岛屿，作基地。当地官员以澳门为前车之鉴，拒绝了，并报告北京。乾隆帝从边防考虑，收缩了口岸。缘由清制，全国设相当于总督级的驻防大臣若干。沿海杭州、福州、广州三处有驻防大臣。四地通商时，宁波来往商船不多，现在居然有武装商船。舟山是宁波的岛屿群，宁波离杭州驻防大臣所在很远，舟山更是“滨海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而通商四地，仅广州有驻防大臣：“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所以规定通商仅限广州。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这样规定是合理的。同时规定，俄罗斯例外。[1] 英国后来还有一件事：作为揭露自大，我们常提到马嘎尔尼（George Macontney）觐见乾隆事，甚至认为因而失掉一次跟上世界进程的机会。但是，我们往往忘了去翻阅他的副手斯丹东的觐见记（Sir George Leonard Stau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看看他们的实际。

当时，一般出口商品以丝绸、茶叶为多，都是江浙一带所产。出口限定广州后，广州买办从江浙购回商品，由广州附近劳苦者担任货物运输。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广州出口优势尽失，附近劳苦者失掉一个生活机会。鸦片战争的赔款，和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和白银流出更多，银贵铜贱，一切都由农民负担。道光二十六年到三十年（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遭受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第1卷，4~15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严重的水旱灾。两广地区则还有蝗灾。普遍的贫穷激起了连续不断的反抗斗争。鸦片战争后的十年中间，各族人民的大小起义有100多次。广西、湖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声势尤其大。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骚动。当时拜上帝会力量已经很大。农历“六月，在广西浔州府桂平县金田村团营起事，平南、贵县、武宣、陆川、博白各地同时响应。蓄发易服，以驱逐胡虏，毁灭神偶，拜真上帝为号召”。[1]“蓄发易服”就不是普通造反，而是要建立朝代。这就是太平天国。

【1】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77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

第二节　有理论的农民造反

自秦末以来至晚清造反者都因为活不下去才造反。他们之间需要传播的造反思想简单明了，只要几个字：如“迎闯王，不纳粮”。靠口口相传。但是当革命主旨不仅仅为吃饭而含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内容时，就需要有文字辅助传播。这也是近代开始的社会变革赋于出版的新内涵。

我国从陈胜、吴广两千年来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是少数运用文字宣传革命道理的，为我国的思想文化作出了一定贡献。太平天国出版物最受人注意的是《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其实就历史文化贡献讲，重要的是起义之前洪秀全的三篇短文。

一、洪秀全的早期理论

洪秀全原名洪火秀。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去广州应试又一次被黜悲愤成疾，昏迷中梦见到了天堂上帝接见，醒来后他告诉父亲和哥哥，说他是真命天子，于是改名洪秀全。[2]洪秀全从基督教的人人都是上帝之子的教义出发，结合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的大同理想提出了“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天堂。[3]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二十六年（1846年）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本小书。[4]1847年洪秀全到紫荆山区后，“每天

【2】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4~15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

【3】《天朝田亩制度》。

【4】金田起义建国后，该三书的“歌”、“训”二字，均改为“诏”；该三书后来汇刻，名《太平诏书》，另有《百正歌》一首，附于《原道救世诏》后。

同南王（冯云山）写书送人，时将此情教导世人，多有信从真道焉。”[1] 这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最早运用文字的革命宣传动员。这三篇歌诀在太平天国刻书中流传最早、最广、最有历史文化价值。

[1] 洪仁玕:《太平天日》,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6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洪秀全早期思想的主要来源并不仅是基督教，更有我国传统伦理观念和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思想，而愈到后来，宗教色彩愈益浓重，而且独尊上帝。在《原道救世歌》里，反对淫、忤父母、杀害、盗贼、巫觋、赌博、吸鸦片、饮酒、堪舆、相面。[2]《原道救世歌》在某种意义上讲，近似传统的善书。除内中的文字具有善书的一般特点外，结尾还有“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这样传统善书的必用语。所附《百正歌》说明宣讲“正”是宗旨。

[2]《原道救世歌》,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88~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歌中说:“第一不正淫为首”,“第二不正忤父母”,“第三不正行杀害”,“第四不正为盗贼”,“第五不正为巫觋”,“第六不正为赌博”。

在《原道救世歌》里，还具有多神论观念，虽提出了上帝，还有其他：“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他把上帝看作最伟大而不是唯一，周文王和孔子可以配享从祀，和后来他把孔子扫地出门不同。

二、洪秀全理论对后世的影响

在最早的三首原道歌里，洪秀全就宣传天下一家的思想：在《原道救世歌》里说：“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3] 在《原道醒世训》中洪秀全提出：“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近而中国是皇上帝主宰化理，远而番国亦然。远而番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近而中国亦然。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4] 在《原道觉世训》中提出了：“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5] 他的思想有来自基督教的，更是现实生活中归纳出的，因而具有批判现实的价值。他出生在自明末至鸦片战争拒御强暴与抵抗异族侵略最激烈的广东；后来长期在人多地少，强势群体欺凌弱势群体，汉族与苗族、本地与客家之间不断争斗的广西活动。现实使他感受“世

[3]《原道救世歌》,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4]《原道醒世训》,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5]《原道觉世训》,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92~93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凌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1] 他首先以上帝名义，给予人人以人格上的平等，指出国内各族间、乡里间、地区间，进而国家间，不应该“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这就为后来起义提供了先行思想：既然人格上彼此平等，就不应该有种族间的压迫。中国的积弱、腐败，源于满族专权和压迫遏制汉族知识分子；英国侵占我香港也是于理不合的，所以能如此，也由于满族统治者认为英国侵占的不是它的“龙祥地”。太平天国二年（1852年）的《奉天讨胡檄》提出反对满清统治。使“他们已与乾嘉以来屡次的变乱不同，他们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一更重大的影响，正因他们能明白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2]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是近代早期救国思潮及其政治实践逐步形成的时期……但基本上仍表现为调整或重建传统帝国理想秩序的努力”。[3] ——唯独太平天国提出推翻清廷。

洪秀全起义反清，提出种族观念，实为制胜清政府的一个最有力的口号。但洪秀全指出在当时“复明”已经过时：洪秀全谓：“三合会之目的，在反清复明。其会组织在康熙朝，目的亦可谓适当。然至今二百年，今日反清可也，复明未见其是。吾既恢复旧山河，不可不建立新朝。”[4] 受历史发展的局限，社会既无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也没有这种要求，洪秀全等还不是以较封建制度优良的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只是遵循老路。他们建立的新朝，仅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年）初刻的《太平礼制》看，规定幼主及每位诸嗣君以及各级官员及其夫人应受的礼制待遇，远比清廷还要荒唐，完全抛弃了平等观念。然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这3本小书作为思想资料，对后世发生重大影响，却是不可抹杀的：1894年孙

【1】《原道醒世训》，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一），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钱穆：《国史大纲》，874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3】程啸：《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前言》，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4】钱穆：《国史大纲》，874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中山组织兴中会，入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1905年同盟会入党盟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1904年在美国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系统地指出清廷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总根源，必须推翻。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接过太平天国按平等原则提出的推翻清廷的口号，付之实行。毫无疑问，“驱除鞑虏”并不是民族团结的方针，是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统一民族的要求所不符的。后来孙中山重新诠释了他的民族主义；而推翻腐朽的清廷则始终是正确的。

革命党人黄世仲对太平天国有不同于传统的看法，认为“雅得文明风气之先。君臣则以兄弟平等，男女以官位平权”。[1] 他鉴于“四十年来，书腐忘国，肆口雌黄，‘发逆’‘洪匪’之称犹不绝耳”。花三年时间收集撰写《洪秀全演义》54回，以表彰太平天国提倡平等、推翻清廷的活动。该文光绪31年在香港《有所谓》报连载，次年该报停办，自六月初六第30回起在《香港少年报》连载。刚连载完，上海广益书局有石印单行本出版，接着《中国日报》在香港发行单行本。“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2] 现在有踪迹可查的，在辛亥革命前短短四年，就不少于18个版本；绝大多数是上海石印本，除广益书局外，还有中原书局、萃英书局、江东书局，大部分不署作者名。[3]

谭嗣同在《仁学》中极力同情太平天国而否定湘军：“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虽洪杨所至，颇纵杀……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逋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是则湘军助纣为虐。”[4]

【1】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自序》，《洪秀全演义》，卷端，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42页，中华书局，1981年。

【3】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39~240页，清末小说研究会，1997年。

【4】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345页，中华书局，1998年。

三、洪秀全的其他著作

洪秀全还有《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又名《十全大吉诗》，是

十首洪秀全作的七绝。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萧一山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收有得自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的、书名为《天父皇上帝言题皇诏》，“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的全文。

《天命诏旨书》，是记录洪秀全自戊申（1848年）三月至壬子（1852年）“圣旨命令最关紧要者汇录镌刻成书”。在癸好（1853年）三年正月所刻。

《天父诗》，录洪秀全的500首诗。诗的内容极难识读，诗意不浓，如第254首全诗八个字：“还不分高低拿然来。”不知所云。现有太平天国丁巳七年（1858年）新刻本。萧一山说：“就此内容审之，其初刻行当在太平天国初期，最少其中一部分诗系成于太平天国初期。”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又名《福音敬录》。是洪仁发、洪仁达奉命回忆、“记录我主上天预诏，以传万代”。洪秀全看过后又添加了“自证”，然后刻印。

《太平天日》，书成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系洪秀全的早期历史，经洪仁玕修改后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3年）出版。

四、杨秀清的著作

《颁行诏书》，汇刻杨秀清颁发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诏书，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初刻。

《太平救世诰》，是杨秀清著作，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初刻；未刻前流传时名《太平救世歌》。

《天父下凡第一诏》，杨秀清传上帝命，审周锡能，初刻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

《天父下凡第二诏》，杨秀清传上帝命，杖责洪秀全40棍，初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

第三节　金田起义后的早期出版物

金田起义前的文字主要是宣传革命理论。既然前面讲过洪秀全说“吾既恢复旧山河，不可不建立新朝”，起义后就需要建立制度。

一、《太平礼制》

太平天国元年（1851年）就发布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臣子对天王的儿女，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丞相、师帅等等及他们的妻子、子女等的尊称。所规定的称呼，称洪秀全的儿子为“幼主万岁”。称各王其妻子及家人的礼制待遇，远比清廷还要荒唐。这个礼制的面世说明他们刚起义，就完全抛弃了原来宣传的平等观念，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狭小贵族圈。

二、部队制度

在金田起义前夕，为了起义人员有军事化组织，规定了建制。从下往上是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六级。每级管的下级都为5，1军为13 125人。规定各级的旗帜尺寸。是为《太平军目》。颁行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金田起义前夕。据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说，道光三十年（1850年）初刻本和壬子(1852年）刻本，“内容大异”。

另有《太平条规》。内分“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条”十条，简单明了。前者规定军中纪律，后者规定行军时的部队纪律和与民众关系。现在见到的文件最早初刻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颁布时间不详。

《行军总要》。现存的《行军总要》署太平天国乙荣五年(1855年）新刻。太平军起义后转战数省直抵金陵，部队均由杨秀清指挥，他规定了陆路、水路、点名、传官、查察、防敌、行军纪律等，致大军行动有条不紊。本书是上述各项规定汇编。

三、颁发历书正朔

旧时一个新王朝建立必定"正朔"。所谓"正朔"，据《礼大传疏》："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因而每当改朝换代时，往往重订历法，以旧朝代的某天改为正月初一，表示"应天承运"。太平天国建国后，即按我国历史上的传统"正朔"。太平天国的历法称"太平天国历"，《颁行历书》。历书应当每年有一本，现在能见到的太平天国历书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四本。郭廷以认为，"太平天国历创行于永安城，约在1851年11月至1852年2月间"。

每年颁发则是在每年10月：洪秀全命令："永远天历颁天涯。甥们遵诏，每年十月命史官献明年新天历，盖玺刻颁，永远依东王前奏天历例制。"[1] 太平天国历的制订由杨秀清主持。他当年的《献天历本章》说："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故臣等造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太平天国历也有24节气，但严格固定交节日期。"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每节］俱十六日（天），余［每节］均十五日（天），每月两节气"；"御批：准"；"奉旨造癸好三年新历，颁行天下"。[2] 每月第一个节气固定在1日；第二个节气逢单月固定在17日，双月固定在每月16日；元旦就是立春。[3] 太平天国基本用阳历，每年12个月，但和公历略有不同：太平天国历以咸丰元年农历一月三日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正朔"，即元旦；当天阳历为1851年2月3日。第二年，元旦为农历十二月二十六，阳历2月3日。[4] 因有宗教礼拜，用星期，但与西历比，早一天，即西历星期一，它为星期二。并同历代传统，用六十甲子循环纪年、纪日。天干、地支22字中，太平天国忌"丑、卯、亥"三字，相应改为"好、荣、开"三字。所以太平天国元年称"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太平天国除禁忌字，还有避讳字，更有意识形态的禁忌字，如带"鬼"旁的字，将鬼旁一律改写"亻"旁。读

【1】洪秀全：《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49页，中华书局，1979年。

【2】4处原件均见于《癸好三年新历》，转引自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65页，中华书局，1979年。

【3】太平天国历与我国阴历、世界通用的阳历的具体每天的换算，见郑声鹤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853~880页，1936年商务印书馆版或1980年中华书局翻印本；又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附录·天历与阴阳历对照及日曜简表》，商务印书馆，1946年。

【4】据郭表，郭表与郑表不同，差1天。

太平天国书要熟悉洪仁玕起草的《钦定敬避字样》，才能识得拦路虎。

第四节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必须确定社会秩序模式，于是产生《天朝田亩制度》。制度规定：组织以《周礼·地官》的“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为蓝本。而财用受《礼运》篇的儒学乌托邦和基督教使徒时代财产均用的影响；战时的军事共产实践，“圣库制度”和起义前的社会土地现实，《天朝田亩制度》的组织化、计口授田、圣库，是必然之笔。(图7)



图7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将田分为九等，以家庭人口多少分田。天下田男女同耕。此处田不足，则迁彼处。丰歉相通，此处荒则迁至彼丰收处。民众亦以伍长、两司马管理。秋收后留够各家食用，余粮归国库。25家为一社会单位，设国库和礼拜堂各一。两司马住在礼拜堂。儿童每天至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圣书。礼拜日由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1] 这是《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基本社会制度。

[1]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一)，321~326页。

但是看来《天朝田亩制度》并未实行：从打乱原来生产秩序到新秩序建立能提供必须的财政，要一段时间。这和当时残酷的外部军事斗争，须要稳定的财政支持相矛盾。残酷的军事斗争需要，不可能腾出手来将部队分散，到各乡村作改制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现今留存的当时布告说明，至少在江浙，太平军仅驻在城镇，广大村落也就不可能有派出去组织圣库的“酵母”。《天朝田亩制度》里没有触及中小城市必备的商业政策。只有城市商业才能源源不断提供现金，太平天国后期使用的火器，需要现金向英美商人购买。

提供一些没有实行《天朝田亩制度》的证据：杨秀清在甲寅四年《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中说："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批："胞等所议是也。"[1]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洪秀全看了李秀成的奏本后，诏苏省及所属郡县："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2] 现在能见到的当时书面材料，江浙一带太平军所到之处，生产秩序没有变化，原有地主即使逃跑了，还保护其所有权："以锡金（无锡）城各业户完赋无力，本阁节经示谕：佃农照常输租，抵办钱粮在案。兹届年岁丰稔，新谷现在登场，除已另行晓谕各佃赶早还租外……。"[3] "向来地、丁、漕粮、田捐、税契，业户自行完纳。每遇水旱借种借资，业户佃户情同一室，彼此相顾。我天朝克复苏省，安抚之后甫征之初，即经前爵宪熊，推念在城业户流离未归，出示晓喻，姑着各佃户代完地粮，俟业户归来，照租额算找。其在乡业户，仍自行完纳，照旧收租，不准抗霸。"[4] 太平天国的《醒世文》里有"百般贸易都可做"句，也是没有实行《天朝田亩制度》的证据之一。

《天朝田亩制度》"书刻于一八五三年，但张德坚编《贼情汇纂》时竟未之见"。[5] 张德坚是曾国藩幕僚，他受命陆续将湘军获得的太平天国书籍等和从战区出来的人和俘虏的口述整理呈报供参考，这些资料后来汇编成《贼情汇纂》。书里多次讲到截获成捆成堆的太平天国书，在《贼情汇纂》中对各书都有著录分析，而《天朝田亩制度》关系到政治、经济、村社重要制度的书却没有提到。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实行，因而散发得少。

【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68~169页，中华书局，1979年。

【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51~52页，中华书局，1979年。

【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34页，中华书局，1979年。

【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45~146页，中华书局，1979年。

【5】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181页，附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

第五节　基督教文献

在起义前，可能基督教的文献不一定能在群众中抄写传布。到金田起义，进入永安，有了雕版可能。应该说这时的基督教基本文献有了传播条件。所见有四种：

《旧遗诏圣书》，即基督教《圣经》的《旧约》。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初刻。“旧约”“新约”的“约”一词，原文Le Testament在汉语中有两层意义，太平天国用了该词的“遗嘱”义项而译为“遗诏”而未循“约”字，较之当时来华传教士所译更贴切。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Sir Samuel George Bonham）和海军大佐费士班（Captain Fishbourene）到南京。费士班说：太平军散布《圣经》极广，有四百人终日从事印刷。他所得到仅《旧约》《创世纪》第1—28章。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到南京，《旧约》已印至《约书亚记》。太平天国所印《圣经》，根据郭施腊（Charles Gutzlaff）的译本。

《前遗诏圣书》，即基督教《圣经》的《新约》。初刻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原名《新遗诏圣书》，晚年刻本改题《钦定前遗诏圣书》。《新约》太平天国是出全了的。

《天条书》，由各式祷告词和十条表达宗教伦理观的规定。

天条全来自基督教《十诫》，壬子二年初刻。最早在《原道救世歌》中已经述说了《十诫》的内容，还有反对鸦片和酒；《天条书》中则几乎是《十诫》的原文。其他文件中多次提到天条，《英杰归真》中说干王府干殿正中有洪仁玕书写大幅“天兄基督登山垂训九福之言”，即《十诫》。

《天理要理》，以“尚德者”（传教士麦都思的笔名）的同名著作为蓝本写作，是本宣传基督教的书。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初刻。

第六节　文化读物

太平天国有《三字经》，初刻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共352句1 056字，前半部述《创世纪》、《出埃及记》和耶稣降世救赎；后半部讲自秦始皇崇拜神后中华才遭殃，上帝派次子洪秀全降世拯救中华。有学者认为这《三字经》是以传教士麦

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同名著作为蓝本的。

《幼学诗》以34首五绝，讲述对上帝和人伦各点箴言，初刻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

《天情道理书》是《太平天日》的姐妹篇：讲杨秀清的历史。现存“己未（九年）遵改”本，封面仍署甲寅四年新刻。萧一山说，此书“可以补史之阙文者颇多，于史料之价值亦巨”。

《御制千字诏》此书现存有多个刻本：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每句四字，267句，全书1 104字。和《三字经》相一致，以《创世纪》故事开始，述十诫，耶稣事迹和丁酉年洪秀全见上帝受命救世。与《三字经》不同处是还有很多动植物等生活用字。本书和《三字经》、《幼学书》、《天条书》都特别禁止男女接触。这和太平天国四年前实际生活中男女分开的制度，都源于原罪说。

《醒世文》，122组对仗七字韵文，共1 708字。除开头一些《创世纪》内容，和内部规定外，是述说政策最多的文字：“士农工商各安业，纳款当差凛遵行。百般贸易俱可做，烟酒禁物莫私营。”“有才放胆来受职，有勇趁时早投诚。”“丰衣足食儿安乐，父母妻子准随营。同享天福食天禄，骨肉团聚享福深。”这些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政策。

第七节　官刻及其制度

洪杨最早的“出版”是手抄。起义军到永安后，就有条件利用雕版刻印。到金陵就更加兴旺。从洪仁玕的“谊谕”中还透露刊刻是集中在朝廷的：“查东王在日，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东王在的时候，主管刻书的或许是杨秀清。洪仁玕奉命“总理朝纲”后，刊刻的管理人当然是他了。

一、刻书衙

起义时和起义后，众多义士必须有号令调教，才能统一步

骤，要用书籍；建国后政令、制度亦用书籍传播。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四月，从永安突围向湖南进军途中，李寿晖被任命“典镌刻”。此时太平军尚处于被围追堵截之中，可见对刻印书籍的重视。到南京后条件变好，便逐步出版基督教的经典。并且成立有关誊录、雕刻、印刷部门。太平天国设有“诏书衙”、“删书衙”。“诏书衙”门口有楹联：“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1] 有先生据当年张德坚《贼情汇纂》所说：“洪逆所下伪诏，由贼诏书衙汇修发刻。”而说“诏书衙也根据天王的口述，整理成书稿交镌刻衙刊刻成书”。此说不值得研究，说洪秀全的文字由普通人修改后发刻，绝非太平天国制度的情理中事。“反革命阶级不能澈底懂得革命队伍的情况，张德坚等把很多事情弄错了。”[2] 当有镌刻、刷书、宣诏各衙，从事书籍刻版、印刷、分发。

太平天国刻书现在能见到实物和正式记录的有39种。金田起义前后就有一些规章制度，这些到永安后就雕版印刷，这就是最初一二年所出书籍，以《颁行历法》、《太平礼制》、《天条书》、《太平军目》、《太平条规》等制度法规性著作为主。第三年建都南京后所出书籍以正思想为中心：《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太平救世诰》等。

二、“删书衙”

有学者说：删书衙“定都天京的次年设立，按天王洪秀全命令，删改孔孟诸子百家，取其中合乎天情道理者，镌刻发行”。[3] 此说不必存疑。

在壬子二年的《天命诏书旨》中有《删改诗韵诏》，说：“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语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到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钦此”。显然他将《诗经》删改后让人誊清然后他自己再看一遍就能付刻。但在《钦定士阶条例》中有“至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镌颁后再行诵读”。[4]

【1】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46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2】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太平天国序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卷端、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3】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46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4】《钦定士阶条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5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钦定士阶条例》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刻，说明四书五经到那时还没有删改。或是在太平天国二年（1852年）在永安有了雕版条件，洪秀全有删改四书五经的旨意，但次年到金陵后他的文化政策有了很大改变：反映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年）刻的《诏书盖玺颁行论》里黄再兴的一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说明那时孔孟已经没有被删的价值了。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洪仁玕、蒙时雍、李春发有《戒浮文巧言谕》的布告。布告中说："以前蒙我真圣主天王降诏，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即六经等书亦皆蒙御笔改正，非我真圣主不恤操劳，诚恐其诱惑人心，紊乱真道，故不得不亟于弃伪从真，去浮存实"。这一布告说明：一、后来旧时各书中有部分经过洪秀全删改后可以流传。二、删书是"真圣主不恤操劳"，是否需要设"删书衙"。太平天国印书中有《武略书》，萧一山说，本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合刻者，惟未言颁刻年代。约计之，当在戊午八年或丁巳七年。"罗尔纲先生指出，该书是洪秀全删改古书之一。此外并没有发现其他删改的古书实物和记录。

三、诏书盖玺颁行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有三本由数十篇短文合成的书：《诏书盖玺颁行论》由40篇同名短文汇成，《建天京于金陵论》由32篇同名短文汇成，《贬妖穴为罪隶论》由25篇同名短文汇成。

三书都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在金陵建都前后的集体著作。都是由若干人的同名文章集合而成。《诏书盖玺颁行论》、《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三书，郭廷以说："此三论，大概洪、杨等为辨明太平政府为正统，满清朝廷乃僭窃。因有《建天京》、《贬妖穴》（妖穴指北京）二论；为取缔异说，统一思想，因而有《诏书盖玺颁行》一题。"[1]

《诏书盖玺颁行论》是了解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重要文献，

【1】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引用书目》，附录，197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

由25篇同名文章汇编而成，其中以黄再兴一篇最详细，从而可了解太平天国当时排斥孔孟等传统思想之猛烈，取缔百家诸说之严厉。宋溶生一篇简述了操作。

黄再兴说："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命诏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又说："今将真命诏书一一录明，呈献我主万岁万万岁旨准颁行。但世间有书不奏明、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由此为之，邪说不能生，真道永宣矣。"

所说盖玺印。印文见到的有"旨准"和"旨准颁行"两种。两者差别的原因不清楚。印文在玺印的正中，文的周边均三寸半，四周有宽大的龙凤边框。玺印骑缝"搭角"盖在封面阴面页和正文第一页阳面，是一对轴对称正三角。这种盖印的办法适合文化较低普通士兵识别"真伪"：有这印的是诏书，没有印的是妖书。

"旨准颁行"，有严格手续。太平天国己未九年（1859年），陈玉成建议立法。洪仁玕转给洪秀全建议采纳并印发。"陈玉成……请定章程，以救时弊。其所议赏罚之法，致为森严，本军师嘉其忠款，即携原书缮本呈奏，当蒙旨准，并赐御照，刻书颁行。"[1] 可见当面请示获准后还得有书面凭证。洪仁玕的"谊谕"中还透露刊刻是集中在朝廷的："查东王在日，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2]

四、《旨准颁行诏书总目》

太平天国的印书，每本除盖有"旨准"玺印外，正文前还都附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现在能见到的最晚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是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上的，计列书名29种。"旨准"书的数量不多。

多年来国内学者在国内外博物馆、图书馆查访，找到了相当一部分太平天国印书和文书，陆续刊发。其中有十部书在《旨

【1】《干王洪仁玕立法制谊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95页，中华书局，1979年。

【2】《干王洪仁玕立法制谊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95页，中华书局，1979年。

准颁行诏书总目》中没出现过，而且这些书有的也不盖“旨准颁行”印。这些书大多是洪仁玕所著，或他修改过的，即后期出版物。

在《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中有《钦定制度则例集编》，至今未发现实物。“制度则例”是清廷的词汇。清代中央各部门制度合称《大清会典》，会典的新例、疑义补足等编成行政法典。六部及朝廷各寺和宗人府，各省有各自的增添和疑义的补充，称“则例”，近于“实施细则”。太平天国的《钦定制度则例集编》，显然是天国朝廷各部门的章程、制度，没有发现《会典》。

五、“旨准”政策下文化被摧残

太平天国的“旨准”政策，对固有文化是种重大的摧残。是书，只要打开封面看不见“旨准”的方印就是“坏书”。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一切书籍、书版都被毁灭。

太平天国的“旨准”政策，实质是洪秀全的唯我独尊，排斥其他一切。这个策略不仅消灭了他力量所及地区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他的起义得不到社会中层，即读书人的支持，最后被读书人的力量消灭。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中讲，洪秀全“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大变，凡读书识字者，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有种说法，左宗棠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曾去见过洪秀全，献攻守建国的策略，还劝洪秀全抛弃耶稣，专崇儒教。洪秀全不能接受。左离去后，成为削平太平军的重要人物。关于左宗棠的传说，说明当时读书人对清廷异族统治的不满；如果洪秀全举反清义旗而不崇尚基督，读书人会从恢复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为他服务，则必能成功。

第八节　《资政新篇》



图8
《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给洪秀全的建议书。郭廷以说："于此可见洪仁玕之西洋知识及其政治主张。"虽然洪秀全看了后在书上批注他赞同，但都没有下旨采纳。太平天国已未九年（1859年）颁刻，十一年（1861年）重刻本有个别字修改。(图8)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已未九年受命辅佐，针对当时危急状况提出的"致治大略"，供洪秀全"广圣闻、备圣裁、资国政"的，其中心或者可以说指出了"天国往何处去"。共提出34条具体意见，分为用人察失、风风、法法、刑刑四类，"惟量度时势二字，以行所当行可也"。后3类是治国方略；用人察失是对洪秀全说的，虽仅一条，极中肯綮：提出"禁朋党之弊"。太平天国实行军、政、财合一，入金陵后，将领已毫无大局观念，有严重的政治离心倾向和由此必然的拉帮结伙，形成"朋党之弊"；所以调度军队都很难。次年安庆危急，调兵解围只能由洪仁玕带兵七万，自天京出发，经太平、芜湖，赴皖、浙催调各军西进，以援安庆。其他33条在当时中国是最早提出、最全面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我们是"后见之明"，他的纲领离开当时中国的任何一块土地的实际都太远，没有实现的经济基础，当然不可能在天国引起反响。1860年容闳到天京，向洪仁玕建议设学校、开银行。干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人无能为用，必俟协议，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此时诸要人皆统兵于外"。[1]

【1】容闳:《西学东渐记》,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资政新篇》印本卷端有93个字"谊谕"，说明"已蒙旨准，并蒙圣照此篇传镌刻官"，而且书里还将洪秀全的批语全文照刻。批语对建议大都是肯定的，三条保留：对办报纸和广泛搜罗言

论，批："恐招妖魔反间"；对不要杀人，批："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针对洪秀全对外交往莫名其妙的狂妄自大而有所建议，则王顾左右而言他，未置可否。

第九节　太平天国后期出版物

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很困难的时候到天京，在治理上有所改善，有些新的出版物。从中能见到改革的大概。

《钦定士阶条例》，洪仁玕、陈玉成、蒙得恩编纂。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年）十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命每年正月举行考试，他们三人拟定各项规定、办法。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刻。

《英杰归真》，洪仁玕纂刻。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有清军军官弃暗投明，干王和他的对话，宣传洪秀全的获天命事迹。刘闳忠等有叙文，报洪秀全，"旨准刊刻颁行"。次年镌刻。朱希祖和萧一山都极推重该书的意义。在当年八月初一干王给英国翻译官富礼赐（R. J. Forrest）的信中，说寄给他"圣书四包内之《英杰归真》一包"。

《诛妖檄文》，洪仁玕撰。全书檄文两通：第一通作于咸丰帝病卒，拟出师北伐时作的檄文；第二通劝谕清兵弃暗投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刻。

《军次实录》，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干王洪仁玕奉命出发，自天京经太平、芜湖，赴皖、浙催调各军西进，以援安庆。途间见民众思想不稳，多有宣谕。此项文字，结集后名《军次实录》。

《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洪仁玕制。当年印制。试题全文为："天父上帝圣旨：'三星共照日出天，天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1] 试题印本后附有洪仁玕600余字注文，表达他对试题的理解。或许是给应试者的标准答案。

【1】该诗即《天父上帝言题皇诏》第一诗。

《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论兵事与论宗教者，首政论檄

文一篇；次《克敌诱惑论》，目的为“力挽人心，以维世道”；再次为用兵之法四则；宗教宣讲文、祈祷文各一，共五短篇，刻本附于《九年会试题》后。

此外从文字中可考出的还有五部：《钦命记题记》、《会议辑略》、《御笔改正诗韵》、“赏罚之法”。这五种书至今未能见到，可能并没镌刻，已无法再找寻到了。

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上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计列书名29种，加有实物而《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上没有列出的10种，和其他文字中提到的5种，也就是44种。从张德坚《贼情汇纂》上说，太平天国的书“汗牛充栋，人人见习”，费士班说太平天国“散布《圣经》极广，有四百人终日从事印刷”，可能是每种书印刷的印数很多，不是著作很多。

荣孟源《历史笔记》说：“天朝拥有上万人的编、印、发队伍，十多年仅刊行书籍61种。这是已知名者，实际出书可能不止此数。”[1] 44种是据实物、文字，61种是据荣孟源所说，未见书目。《诏书盖玺颁行论》说明了洪秀全的文化政策是一种专制政策。不仅对前代，对自己队伍也专制。而且前期出版各书又有“旨准书目”，遗漏的不会多。后期由洪仁玕辅政。洪仁玕有民主意识，他在《资政新篇》中介绍西方治国情况后，提出34条建议，第二条就是“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第十条又说“兴各省新闻官……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以资圣鉴”，但洪秀全都不表同意。洪仁玕受命辅佐朝政后，仍然萧规曹随，但也有改进。刻书或许较前多些。前面提到的10种见到实物没在“旨准书目”的书都是后期出版物。后期出版物上不再刊载“旨准书目”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也容易“失踪”。譬如所引陈玉成提出的“赏罚之法”已经“蒙旨准，并赐御照，刻书颁行”，这是己未九年的事，即使有所耽误，也会出版，然而现在没有踪迹。

[1] 郑士德：《中国图书发行史》，46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必须注意，太平天国出版物有两种：书籍和“文件”。两者都是广泛传播的，一般出版史不提“文件”。大致按有否“旨准”

章和是否编入“旨准书目”作为书籍。而有些，甚至杨秀清的文字也仅仅以文件形式流传。如癸好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攻陷南京，五月初一发的《安抚四民诰谕》，和甲寅四年（1854年）二月命黄生才、许宗扬从江苏丰县与黄益芸会合北上援助北伐的李开芳、林凤祥军。北上援军带有署杨秀清名的“谕城厢内外兄弟姐妹知悉”，讲解太平军政策，以破除谣言的《劝告[北京]人民诰谕》。后来重刻杨秀清的《颁行诏书》时，这两份告示就没有补收进去；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是当时的单张花边刻印大布告。

前面引《干王洪仁玕立法制谊谕》，所谓“片文只字刊刻，必自京内颁行”，湖南省博物馆藏有“殿左拾伍指挥曾”的安民告示，安徽省博物馆藏有“殿右陆拾肆指挥赖”乙荣五年（1855年）二月二十七和二十八日两件劝民“从真向化”的晓谕，以及其他人的布告，都是黄表纸墨笔书写。但我们在博物馆偶尔能看到丙辰六年（1856年）的石达开部布告有刻印的。

太平天国自天京事变后已出现颓势，虽然年号有14年，但辛酉十一年（1861年）出版一批后，除壬戌十二年（1862年）铜版《太平天日》外，至今尚未发现其他更晚的出版物。

第十节　太平天国文献的保藏

民间称曾国藩为“曾剃头”，形容他对太平天国寸草不留的杀戮。寸草不留中很重要的一点，针对的是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因为对清廷讲，那实在是一个仍可以燎原的火种。所以天京陷落后，民间就没有太平天国出版物。到上世纪，国内仅发现《英杰归真》一本。其余都是学者在欧洲陆续发现抄录或摄影带回，我们才有所了解，可以研究。从海外带回材料的各位是：

程演生　1924年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得书八种。1926年北京大学印，名《太平天国史料第一辑》。

萧一山　1933年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得22种。另加

国内发现的《英杰归真》，由商务印书馆在1936年出版，书名《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

王重民 从剑桥大学录得《太平天日》，刊载于《逸经》第13、14、18期。又录得《钦定军次实录》，刊于《逸经》。

许地山 从牛津波德林图书馆得《资政新篇》，刊于《逸经》第17、18、19期。

刘 复 1920年得自英国不列颠博物院，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书名《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1]

【1】以上5位材料均据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引用书目》，附录，197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

* * *

与太平天国同时，另有3类文献值得注意。一是清廷官方文献，最有价值的是曾国藩幕僚张德坚奉命编纂的情报集《贼情汇纂》，很多太平天国材料赖该书而得以保存。但如"太平天国丛刊资料编辑委员会"所说，张德坚不可能懂得农民军的思想，更不知内情，确有武断。一是当时文人的记录，材料非常多，但仅有李汝昭《镜山野史》1种是同情运动的。第三是在华外人的记录文字。

第三章　同光间地方官刻

清代到了嘉庆已经露出衰象，接着鸦片战争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整个咸丰朝则是和太平天国平列。虽然清廷把各驻防大臣职位紧紧抓在八旗手里，甚至辛亥革命发生，广州驻防大臣凤山10月19日被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毙，还要任命一位到不了任所的旗人恩泽接替。但是作为中央指挥的八旗，接着各总督、巡抚管理维持地方治安的绿营，早都没有战斗力了。绿营既没有战斗力，又缺维持的费用，从嘉庆十九年开始就陆续裁减绿营。[1] 甚至咸丰二年、四年、五年还都在裁绿营。清廷面对太平天国毫无办法，既没有可用之兵，又没有能支配的钱，只能容许地方组织团练。湘军、淮军的兴起，意味清廷已经没有统治能力。所以，随着太平天国战事结束，汉族大臣的发言的力量就大增。

【1】罗尔纲：《嘉庆后绿营历年裁汰考》，《绿营兵志》，95~114页，中华书局，1984年。

清代很早实行赋税定额不变，随着中央财政日益拮据，每逢特殊军需，一概另筹。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采用内地货物过境税。过一关口，值百抽一。坐商则按营业额值百抽一，所以称“厘金”。抽行商的称“活厘”，坐商称“板厘”。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厘金在帮助复兴的理由下继续保留。这笔款项因为是地方自筹的，朝廷不能抽调，全部留省，由督抚处理。有了钱就能办事。既然朝廷不必掏钱，地方要办点新事，何乐而不为。所以，江浙、湖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要办些事，奏折上去朝廷都同意。这就形成了同治时期的洋务活动，出版是其中之一。

第一节　同文馆译书

历史上我们曾经自大而不知外面世界，吃了很大亏。知己知彼，林则徐一到广州禁烟，就组织一班人翻译、了解情况。林则徐是近代译书第一人。而建议设译书机构以系统了解世界者，则是魏源。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中说：“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译夷书始。”[1] 姚莹在《康辅纪行》中引《澳门月报》话：“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东方各国如日本、安南、缅甸、暹罗则不然，日本国每年有一抄报，考求天下各国诸事，皆甚留神。”又说：“是彼外夷者，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灭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2] 郭嵩焘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有《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他搬出圣祖康熙帝往年和沙俄用俄文打交道之事，“其后因与俄夷互习语言文字，盖辞命通而往返无阻，乃能悉知其情伪。今英夷枭张于南，俄夷桀骜于北，中国虚实，皆所周知，无复顾忌。而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余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接着，建议有洋人活动各地，大臣推求懂外语人才，由理藩院出资教授学生。[3] 培养外语人才和组织专门的翻译机构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必要条件，虽然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但清廷保守顽固，郭嵩焘搬老祖宗也没有用。结果是白白丢失了20年时间。

[1] 魏源：《海国图志》，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姚莹：《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政事》，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19~2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 郭嵩焘：《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2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一、同文馆的性质

在描写近代化的书籍里，同文馆有几顶桂冠：“我国第一个新式学校”、“中国近代最富典型意义的一所洋务学堂”、“我国

第一所外交学院”、“它所开设的课程，除以外国语言为主外，还有天文、舆图、算学、化学、格致学、公法学、各国史略等”、“京师同文馆的译书在当时影响极大”，等等。这些都源自丁韪良在《同文馆记》开头一句话：“有希望革新这古老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1]

【1】丁韪良：《同文馆记》，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36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办同文馆的根本原因是英法联军之役《天津条约》规定，三年后清廷给予英法的外交文书必须配送他们的文字文本。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二十六日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2] 次日中法《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凡大法国大宪、领事等官有公文照会中国大宪及地方官员，均用大法国字样。惟为办事妥速之便，亦有翻译中国文字一件附之。候大清国京师有通事谙晓且能译大法国言语，即时大法国官员照会大清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法国字样，大清国官员照会大法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清国字样。自今以后，所以议定各款，或有两国文词辩论之处，总以法文做为正义。”[3] 外交上要有懂英法文的官员，所以办同文馆。但为了减少阻力，恭亲王是在早已不存在的“俄罗斯文馆”的“基础”上“改设同文馆”。所以它的学生名额、教习、设提调、月季岁考、授官考、俸饷共六条章程全部从乾隆二十二年的《俄罗斯文馆章程》略事修改而来。章程中月季岁考规定：“俟一年后学有成效，再试以各国照会，令其翻译汉文。”

【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02页，三联书店，1957年。

【3】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05页，三联书店，1957年。

咸丰八年的两个条约因为清政府的反悔而招致第二次英法联军。所以关于在外交文书上各自使用本国文的问题并没有实行。直到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签订《北京条约》，清廷才被迫计划实施。为了实施，中国需要办外语教育。这个“外语学校”，直到同治元年（1862年）才成立，就是“同文馆”。清代“祖宗家法”里没有外交一说，英法联军之役结束时，洋人提出，对外交涉不可以再由带有傲慢性的“理藩院”办理，才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对西方各国事务。应对外事本是军机处的事，

所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军机处大臣兼领。外事设立机构是不得已、"暂时"的，一旦有力量对付洋人就要取消。同文馆实际是临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的临时训练班。

办同文馆首先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守旧大臣不愿意，多次找麻烦。其次学生不愿意。满汉有别，因为学好了或将参与机要，所以开始规定"挑选八旗子弟学习"。可八旗子弟因为学好了也就是个被人看不起的"舌人"，没人愿来。社会上讽刺话很多，如："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等等。

招生受到挫折后，奏请在读书人中派有声望的徐继畬任总理衙门大臣，专管同文馆的事务，但一则年事已高，再则独木难支，一年多后徐年老致仕。此后再也没有派过人。因为"祖宗家法"所没有，而且也没有人能处理好，所以同文馆很快交给了洋人，由洋人办。

总理衙门等于外交部，但它的首脑与六部不同，是由军机处军机大臣兼。军机处也是个"临时机构"。雍正八年因噶尔丹策凌用兵西北，次年在宫内设军机房，协助雍正帝处理军务，后逐渐发展成军机处，协助一切。因为这不是圣祖留下的制度，所以是临时的。临时机构分出的总理衙门当然也是临时机构，它下属的同文馆更不存在长期打算。

丁韪良的《同文馆记》告诉我们："1869年9月（同治八年），我休假回来。去访赫德探询大学的情况。他说：'大学仍然存在'并要我主持馆务，他决计每年从海关方面拨给我一笔整款，以供学院之用。当时我就答道：'擦擦灯盏，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给灯油'。……自此二十五年之间，践行约言未尝或渝。……在学院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1] 这个"看妈"在我国"官办"学校中还进行宗教宣传。

丁韪良这位北美长老会传教士，1864年到同文馆任教习，1869年任总教习。他说："在我最初任教的教室里面原先有份布告，订有规则数条，禁止教授《圣经》。及我就任校长以后，馆

【1】丁韪良：《同文馆记》，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371~37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中提调便把它去了，教否一任我的自由。以同文馆的性质而论，正式讲授宗教本是不许的，但是我却常常和学生谈到宗教问题，并且要求别的教授，如教本中遇有关于宗教的内容时，尽可不必删去。”[1] 丁韪良1895年退休。后来由欧礼斐接任，到1902年，同文馆归入京师大学堂，成为它的译学馆。1869—1902共34年在洋人手里。同文馆的性质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

【1】丁韪良：《同文馆记》，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39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这位“看妈”不仅34年的教育是在“主”的熏陶下，而且还在“主”的代表，即“父亲”赫德的监督下：“光绪五年（1879年）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中，已列有‘监察官布政使衔总税务司赫德’，更早是1871年3月15日，赫德在致其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信中就说‘我接奉总理衙门公文及上谕一道，命我参与同文馆事务，我将一如这道明确无疑的上谕而做。’极有可能便是这一上谕命赫德担任同文馆监察官的。事实上，赫德在此之前已与该馆关系密切：京师同文馆经费向自海关船钞中支用；同治五年，赫德主动建议携该馆学生作首次出国之行；同年恭亲王拟扩充馆务的意图，因他答应代聘西学教习而告确定；同治七年，赫德在海关的通行公文中，明白表示希望自同文馆中培养未来接掌海关的中国人员；同治八年前后，馆务几于名存实亡的困境时，他又推荐丁韪良任总教习，此举与年余之后他奉命参与馆务，双双于京师同文馆关系重大，当时兴致低落的总理衙门将馆务交给两人整顿筹划，以免于事无巨细都要请旨办理的程序，和面对天下士人的困扰。也因为如此，以后的京师同文馆几可以说是在赫德与丁韪良的控制之下。丁韪良固然有校长（president）之称，按照海关各项出版品的记录，将京师同文馆列为海关的教育部门（Educational Department）。甚至宣统三年（1911年）赫德病逝伦敦，清廷优予褒奖的谕旨中，有‘该总税务司供职中国……设同文馆’的说法。”[2] 值得一提的，按《大清会典》中关于总理衙门，说“同文馆管理大臣，于本衙门大臣内特简。无定员，掌通五大洲之学，以佐朝廷声教”。[3] 再，美国汉学家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教授在1961年出版的*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2】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23~24页，1985自刊本。

【3】《大清会典》，卷100，5页。

Schools in China（中国最早的现代官办学校）中说，从丁韪良和赫德主持同文馆后，官方文献中再无同文馆的材料。另外，同文馆洋人的译书里，常能见到总理衙门大臣的序；譬如董恂，是以朋友身份作的。

不妨还引一句丁韪良的话："同文馆既受这种限止，则其不能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不亦明且显耶？"[1]

【1】丁韪良：《同文馆记》，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363~36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二、同文馆的译书

因为乾隆时没有译书的文化交流，源自乾隆时俄罗斯馆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中并无关于译书的规定。[2] 同文馆开始译书，是和丁韪良有关，他说："我一就职就组织一班译员，里面有教授，也有优秀的学生。这个办法是经过总理衙门批准了的，凡用力勤、成绩好的，都有奖励。"[3] 在《同文馆记》中，他列有《同文馆师生辑译书籍表》，列书22种，其中"中西合历"3年，习惯上算1种，则共20种。丁韪良的《同文馆师生辑译书籍表》中，至少他的《万国公法》、毕利干的《化学阐源》都是进"同文馆"前的译品。1864—1895年他任教同文馆，前后32年，他对同文馆有一种感情，把成绩说得大些是情理中事。

【2】《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见《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31~35页。

【3】丁韪良：《同文馆记》，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38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总体上，同文馆译书除汪凤藻译的《富国策》外，很少被人翻印。《万国公法》是丁韪良在进同文馆之前出版的。在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页上《万国公法》的书影上，就标明是"崇实馆"出版，而不是同文馆出版。下面"有关《万国公法》的文献"一节，还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这本书的推荐。后来他教国际公法，这本书当然会重印。这本书也有影响，但译笔是算不上的。现在能找到的有关该书的书面记录颇多，仅光绪二十八年就有两处：贵州学政赵维熙投书《万国公报》，刊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号，题《古吴归洁生来函照登》，就是针对《万国公法》，说外国人译书，务实而不必务文，文字贵浅显，不要追求高雅而弄得纠缠不清。同年二月，吉林将军长顺报告皇上，说在他那儿效力的曹廷杰讲："《万国公法》一书译行最先，文意

深曲，不似各种公法之易阅易解。不揣谫陋，逐条注释，名为《万国公法释义》。"[1]

【1】《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426页。

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处都有化学书籍出版，对化学元素各自给译名，后来化学书籍中的元素译名大多采用江南制造局所创用的译名，而同文馆书所创用的，仅"铂"一种。

三、有关《万国公法》的文献

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译成草稿于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前，而那时他还没进同文馆。奕䜣有关于《万国公法》的奏折，现已在《同治朝筹备夷务始末》卷二十七中找到。这个文字不常见。现录主要文字如下，作本节的结束："恭亲王等又奏：窃查中国语言文字，外国人无不留心学习，其中尤为狡黠者，更于中国书籍潜心探索，往往辩论事件，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无如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而同文馆学生通晓尚需时日。臣等因于各该国彼此互相非毁之际，乘间探访，知有《万国律例》一书。然欲径向索取，并托翻译，又恐秘而不宣。适美国公使蒲安臣来言，各国有将《大清律例》翻出洋字一书。并言外国有通行律例，近日经文士丁韪良译出汉文，可以观览。旋于上年九月间，带同来见，呈出《万国律例》四本。声称此书凡属有约之国，皆宜寓目，遇有事件，亦可参酌援助。惟文义不甚通顺，求为改删，以便刊刻。臣等防其以书尝试，要求照行，即告以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据丁韪良告称，《大清律例》现经外国翻译，中国并未强外国必行，岂有外国之书转强中国以必行之理？因而再三恳请。臣等窥其意，一则夸耀外国亦有政令，一则该文士欲效从前利玛窦等，在中国立名。检阅其书，大约俱论会盟战法诸事，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第字句拉杂，非面为讲解，不能明晰，正可藉此如其所请。因派出臣衙门章京陈钦、李常华、方浚师、毛鸿图等四员，与之悉心商酌删润，但易其字，不改其意。半载以来，草稿已具，丁韪良以无赀刊刻为可惜，并称如得五百金，即

可集事。臣等查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即如本年布国（德国）在天津扣留丹国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似亦一证。臣等公同商酌，照给银五百两，言明印成后，呈送三百部到臣衙门，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之法，未始不有裨益。此项银两即由臣衙门酌提三成船钞项下发给。”

第二节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物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李秀成等破清军江南大营，是清政府衰败的又一标志。九月英法联军侵北京，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已经证明了它自己的价值，于是清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措施，任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四省军务，一揽军政大权”。[1] 为解除捻军对北京的威胁，“1865年5月27日，清廷命曾国藩指挥山东、河南和直隶的全部帝国军队”。[2] 清廷从未将如此大的军权交给过一个人，更何况是汉人。东南以湘、皖军政集团为中心的地方实力派崛起，这就是所谓同治中兴。实际是满族贵族和汉族上层集团接受太平天国起义的教训，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新联盟。

[1] 芮玛丽:《同治中兴》,125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按：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载,咸丰十年六月廿四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次年十月十八被命统辖四省军务。

[2] 芮玛丽:《同治中兴》,129页,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一、江南制造局的建立和译书的开始

湘、皖集团创办有众多军工机构，江南制造局是其中之一，于1865年创办。

作为军工事业的江南制造局而译书，是徐寿的提议。徐寿，江苏无锡人，读书人而精于工艺技巧，当时极少。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来用洋枪、洋船。军械必须修理，1861年在安庆成立军械所。需要人才，同治元年三月，经清廷批准，调集了徐寿、华蘅芳等人。当时上海西方人多，徐寿（图9）、华蘅芳等热心科技，安庆离上海较远，江南制造局在上海成立，他们二位就提出



图9
徐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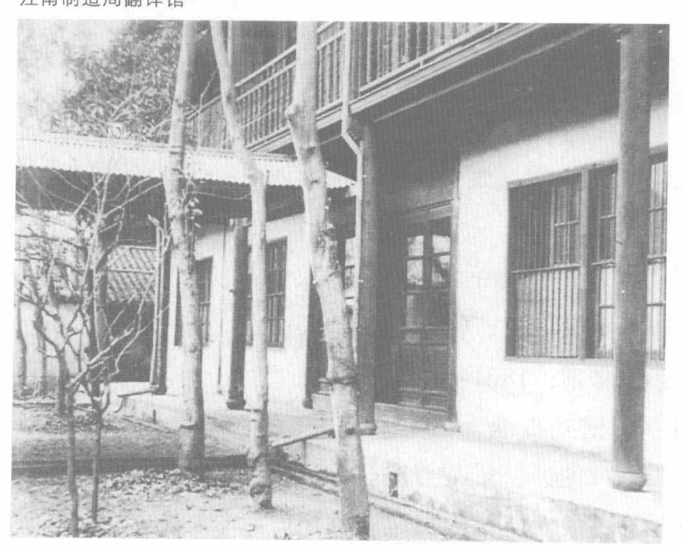
久居上海，考究西方科技，曾国藩让他们到江南制造局。到局后，徐寿向会办沈宝靖、冯焌光提出“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中西艺术共相颉颃。……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见识，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1] 沈、冯二位请示后同意开办。据《江南制造局记》卷二“建置表”，“翻译馆同治六年设”，同治六年即1867年。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口译，国人笔述。这和以前外人译书并无二致。但有两点：一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10）是我国第一所专门译书机构，二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书是按我们自己的需要确定选题。自然，由于文字和学科隔阂，选题还需要外国人帮助。傅兰雅说：本来想译英国百科全书，“后来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又说“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2] 按中国人自己需要选题，这是划时代的。同时代的同文馆译书，选题是由外国人决定的。

【1】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2页，上海杂志公司，1953年。

【2】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7页，上海杂志公司，1953年。

图10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帮助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外国人有好多位，其中傅兰雅最重要。还有金楷理、林乐知，他们三位是被保举获得清廷钦赐官品的。傅兰雅是英国学者，他主张在非传教活动中不掺杂宗教内容。他鉴于江南制造局所译书对一般人略嫌深奥，所以在1875年编印《格致汇编》丛刊，1885年创办《格致书院》，都是和中国同好自费

办理，用以普及科学知识，极有益于上海地区民人。他在华多年，见到盲人因无法接受教育，其苦甚于他人，有意办盲童教育。离华回国后，命他的小儿子傅步兰在美国学习盲童教育来华办学；于1911年他捐银六万两，在上海创办上海盲童学堂(Institution for the Chinese Blind)。

江南制造局最早译出《运规约指》与《开煤要法》两书，呈报曾国藩。曾国藩奏报清廷："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循。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力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其说，另勒成书。"[1] 曾国藩对译书"甚为许可，即出示多添译书西人"，[2] 规模变大。

[1]《洋务运动》四，79页。

[2]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2页，上海杂志公司，1953年。

二、江南制造局译书概况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物，最早出版在同治九年（1871年）前，到1913年停止出版。其中光绪十二三年前出版最多。但究竟出了多少，是些什么，说法不一。原始书目除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有所附外（只记1880年前出书），有魏允恭1905年所编《江南制造局记》卷二建置表所附书目178种，1909年翻译馆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160种，和约1912年由"制造局图书处"编印的《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207种。这些书目都有非译著书。建国前他人著作中提及有180余种、185种，等等，均不列书名，无可根据。今人研究书目有熊月之博士《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所列表151种，均译著。王扬宗研究员《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197种，均译著。叶再生编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198种，有非译著。"长期以来，学者每因袭旧目，未能对沪局译书重新清理，"[3] 不能不说是出版史研究的一个缺陷。上述三个原始书目并非因时间早晚，如1880年出版的Fairbairn的《造铁全法》，原始书目都没登录。三个研究书目

[3] 王扬宗语。

则角度不同，收录不同；计算方法也有差异，如《物理学》共三编，有的算作三种，有的算一种；小种丛书有以丛书名计，有以单书名计；更有将附录算单种书的；三个研究书目有的没有见全书，有的没见过书，从目录到目录时，混淆也免不了。研究书目所以有差错，没有一个完整书目因而不能“按图索骥”找书来核对，是重要原因。所以将这六个书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王扬宗研究员已全部采入，就不再列行）汇总起来，略加核对，比较差次，并以一个书名作一种，则有240种，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刊印书目”，[1] 或可供后来者核查作线索。

【1】限于篇幅，此处不录。

江南制造局所译书，当时人评论甚好。梁启超1896年编的《西学书目表》认为值得推荐之书。兹将其中西学西政部分数字列下（该类数/被选局本/局出版数）：

类别	该类数	被选局本	局出版数	类别	该类数	被选局本	局出版数	类别	该类数	被选局本	局出版数	类别	该类数	被选局本	局出版数
算学	22	9	17	重学	4	0	0	电学	2	1	4	化学	12	8	12
声学	3	1	1	光学	5	1	1	汽学	3	0	0	天学	6	2	5
地学	6	1	3	生理学	11	0	0	动植物学	7	0	0	医学	39	5	13
图学	6	3	4	史志	25	1	7	学制	7	0	2	法律	13	1	6
农政	7	0	10	矿政	9	6	14	工政	38	18	40	商政	4	0	2
兵政	55	33	45	船政	9	8	9								

总计收录293种，其中局本98种，江南制造局出版195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楚编译书局出版张小楼译的《读新学书法》，最后有“循序而读之书目”，译者“就目前本国所出佳本录之”。书前有柳诒徵“甲辰（1904年）冬十月”序。也按上述办法统计，看看八年间江南制造局译书在社会变化中：

类别	该类数	被选局本	局出版数	类别	该类数	被选局本	局出版数	类别	该类数	被选局本	局出版数	类别	该类数	被选局本	局出版数
地理书	4	0	3	历史书	17	0	7	修身书	2	0	0	政论书	2	0	2
政体书	2	0	0	法理书	2	0	0	法律书	5	0	6	经济书	4	0	3
生理书	3	0	0	心理书	3	0	0	论理书	2	0	0	物理书	10	1	9
化学书	9	5	12	动植物书	3	0	0	天文书	0	0	5				

总计收录71种，其中局本6种，江南制造局出版47种。

《西学书目表》中三个数目是3:1:2——即书目中所收江南制造局译书占书目的1/3，是所出有关类目书的1/2。而八年后是12:1:8 ——即书目中所收江南制造局译书仅仅占1/12，是所出有关类目书的1/8。《读新学书法》所收六种，一种是1901—1903年新出的《物理学》，其余五种是傅兰雅和徐寿、徐建寅译的《化学鉴原》等化学书。不仅这些书能经时间，更在于翻译时谨慎。梁启超说：江南制造局的“《化学鉴原》与《续编》、《补编》合为一书，《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合为一书，译出之化学书最有条理者也。广州所译《化学初阶》，同文馆所译《化学阐原》，闻［原文］即《化学鉴原》云。西文本同一书，而译出之文悬绝若此，诚可异也。徐仲虎语余，是书同时尚有教会亦译出一本。盖同时而有四本云”。[1] 《化学鉴原》同时有四个译本而张小楼独推荐江南制造局本，或可见其翻译认真，因而得以流传。梁启超接着谈了《化学鉴原》等译名原则的科学，批评同文馆《化学阐原》译在《化学鉴原》之后而译名不与之统一。他又赞扬江南制造局还将译名汇总后单行，说：“泰西专门之学，各有专门之字。条理繁多，非久于其业者不能尽通其业而无谬误也。况于以中译西，方音淆舛，尤不可凭，毫厘千里知难免矣。局译有《金识别表》、《化学材料表》、《汽机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名表》等书，西字、译音二者并列，最便查验，所定名目，亦切当简易。后有续译者，可踵而行之也。”[2] 书的出版重要的当然着眼于当时的传播价值；但一本认真的书，往往能超越现时而流传更

【1】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皇朝蓄艾文编》，卷72，学术四，25页。

【2】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皇朝蓄艾文编》，卷72，学术四，24页。

远。江南制造局译书，如傅兰雅所说，到1904年大部已落后没用处，即使《化学鉴原》等书没多少年也被更好的本子代替了。但他们苦心研究的化学译名原则，译名表的做法，至今还被我们使用，古人说“天道酬勤”，或是出版的一个规律。

洋务派虽然举办洋务，但他们清楚这不是根本。曾国藩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中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1]

【1】《曾国藩日记全集》，第3册，398页，京华出版社。

第三节　地方官书局

清末有两种官书局：一种是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结束后先由东南原太平天国地区清朝地方督抚办的书局，如“金陵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等等。后来其他省份也陆续办，大致有十多个。他们的招牌上并无“官”字，人们称呼他们叫“官书局”，主管仅仅是候补道。另外有一个，它的名称叫“官书局”，它是为应付言官不满康梁的强学会被封，既不能容他们继续办，又不得不恢复，想出一个不伦不类机构，叫“官书局”，派一品大臣孙家鼐为“管理官书局大臣”。这个所谓官书局，是为应付舆论而设，所以基本没有实际活动，仅仅出过刊登经过删改的总理衙门译报抄件的《官书局汇报》。一年多后并入京师大学堂，所以本节不涉及。

1930年顾颉刚先生因为地方官书局（以下概称“官书局”）“印行的书，既合实用，价又低廉，含有普及性。但现在没有人做广告，年青人不知道”，怂恿朱士嘉编纂一部官书局书目。朱先生编的《官书局书目汇编》仅仅收集到五个书局的目录，不全，但已经有近3 000种。这么大的出版量，加之它开创了由学者主持出版、书籍整批印订的经营模式，对后来的出版模式有很大的影响。

近20多年来出版史对地方官书局毁誉不一。肯定的先生提

出，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四书五经，全是官书局的刻本。否定的先生认为，它们出的无非是些孔孟之书，为的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其实，地方官书局是种历史现象，有十余个，历时半世纪，主管人员数以百计，涉及皇帝就有两个，很难一言以蔽之。要紧的是弄清其产生原因、发展状况、社会效果和经验。图书不仅本身有思想内容，它的出版也是由一定思想指导的，评论其功过不能离开出版的时代背景；而且办官书局的人目的各不相同，不宜一概而论。

一、曾国藩刻《船山遗书》和官书局无关

很多出版史专著和论文，都将官书局的兴起，归之于曾国藩刻《船山遗书》。《船山遗书》完成后，张文虎等治理《船山遗书》的先生后来都在金陵书局从事编校。所以都认为地方官书局始于曾国藩。但从现存的张文虎等的书信看，事情并非如此。

（一）必须经过皇帝批准才能是官书局

雍正八年，因噶尔丹策凌用兵西北，次年在宫内设军机房，协助雍正帝处理军务。后来逐渐发展成军机处，协助一切。六部实际成为处理交办事情的部门。清代从此实行历史上最严格的皇帝专制。地方上除了例行制度外，凡事都要上奏折请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保存有光绪朝的朱批奏折。1996年整理后影印出版，约计12万件。如果加上“留中不发”的、遗失的、后来移到台湾的，数量是相当大的。里面有刘坤一为改善省里监狱的厕所有过奏折。他是总督，监狱改个厕所要请示皇上。他曾经为一些绝户所欠的赋税，均予豁免。但哪怕仅仅一厘一毫银子，必需向皇帝请求，才能销账。须知利国利民，是“皇恩浩荡”，应出自皇上。这种制度下难以想象一个找不到官方文件的出版机构可以称官书局。曾国藩说了编辑《船山遗书》是“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而且他的日记里还有到书局里看望大家的记录。“局”可以是“官署”，也不都是“官署”。“局”可以是Office。Office也可以表示私人办公室。陶潜的《归园田居》，有“洒我新

熟酒，只鸡招近局”句。聚会也可以用“局”字，——“饭局、赌局、牌局”。“骗局”当然另一解。晚清有余治编印《得一录》善书一种，第11卷有《苏郡设局收毁淫书公启》。公启中在批判淫书有害风气后，说：“是用设局而广联众志，毁版而务事消除。”它完全是民间的志愿组织，而集中活动处叫“局”。江南还有一种收集带字废纸的民间志愿组织，他们就叫“惜字局”。

三江两浙，民间对一件稍大事，旁观者会问“结局如何”。书籍用“局”，还有实物证明：现藏南京图书馆的明嘉靖三十五年顾氏奇字斋刻本《类笺唐王右丞诗集》，书后有一页参与该书人员氏里表，就称“无锡顾氏奇字斋开局氏里”表，列参与的30人的姓名和籍贯。最后一行写“自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望授锓至三十五年六月朔完局。”版芯则写“合局氏里”，——即“全体人员名单”。据此，或可说曾国藩因《船山遗书》所设局，应该说是一个编书的活动场所，而不表明其社会属性。



如果一定要说编校《船山遗书》的机构是金陵书局的前身，那么有很多题目是回答不了的。首先，王夫之的身份在同治年间虽已不同于清初，但直到光绪末年，才彻底改变。在同治年间私人出版他的全集可以，“公家”则是不可以的。第二，《船山遗书》的书版雕好了后，保存在哪儿？回答是不在金陵书局，后来在长沙。虽然说曾氏兄弟拿出了三万两银子，如果是给一个“官书局”，或非官办书局，他们是无权支配版子的。——他们捐出了钱，就不再有支配权了。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就不能把《船山遗书》和金陵书局联系起来。（图11）

图11
《船山遗书》之一种《礼记章句》



因为把《船山遗书》看做金陵书局的前身所刻，在有些先生笔下《船山遗书》就成为“官书局第一刻”。各官书局全部

所刻大约在3 000种左右。不必细查，官书局“官”的性质就决定了《船山遗书》是和他们所出版的3 000种书配不上对的。而这正是我们必须明白的。

（二）试探曾国藩刻《船山遗书》的原因

曾国藩为什么刻《船山遗书》，后人虽然有多种推测，究竟没有他自己的文字。章太炎1936年4月16日在《书曾刻船山遗书后》说：“王而农著书，一意以攘清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至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为曾国藩悔过之举，余终不敢信。”他说：“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祆教，保桑梓为言。或曰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洪氏纲纪不具，又訹于异教之说，士大夫虽欲为之谋不可得，国藩之屈而之彼，势也。及金陵已下，麾下则有惰归之气，而左、李诸子新起，其精锐乃逾于旧，虽欲乘胜仆清，物有相制者矣。独有提挈湘淮，以成百足之势，清之可覆与否，非所睹也。然其魁柄已移，所谓制人不制于人，其计亦或如论者所言。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1]

【1】章太炎：《制言》，1936年总第15期，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972页，中华书局，1979年。

曾国藩会通汉、宋，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2]

【2】曾国藩：《书札十三·复夏韬夫》，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4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此外，曾国藩对王夫之等的人格十分佩服。他说：“天之生贤人也，大氐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即幸而苟延，精理已销，恒干仅存，君子谓之免焉而已。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

震而不可夺。”[1] 他在《船山遗书》的《序》中说了王夫之“寸衷之所执”是什么：“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就这些观察，是不是可以说曾国藩在学术上尊重三《礼》，方法上调和宋、汉，思想上注意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明末清初几位大儒的人格学问都为他崇敬。而王夫之因为入清后逃避清廷征召而隐居深山，他的著作历来没有流传。到道光十九年他的后裔才刻了150卷。但不久书版被毁。在安庆时虽然平洪尚未定局，但是已经有十分把握。对于民族的未来，曾国藩应该会有所考虑。章太炎在《制言》里说：“余谓国藩初起抗洪氏时，独以拒祆教，保桑梓为言。或曰檄文宜称大举义旗以申天讨者，国藩不肯用。然则种族之辨，夫固心知之矣。观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亦彰彰矣。”

曾国藩刻《船山遗书》，是用空格替代犯清廷禁忌的。如《读通鉴论·汉武帝十五论》末段：“冀州尧、舜之余民，化为禽俗，即奉冠带归一统，而党邪丑正，与宫奄比，以乱天下。非天也，人之丧也。将孰俟焉以廓风沙霾曀之宇，使清明若南国哉！”方格里的字是曾国藩刻用空格替代的。现复原补全。正是章太炎所说：“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空以避之，其不欲厚诬昔贤。”曾国藩翻刻有违碍文字不删除而以空格，正是曾国藩保护他所说王夫之他们的“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而“其不欲厚诬昔贤”。在《宋论·哲宗三论》中段亦有一句用了空格，是怕慈禧多心。但还正被他猜中：“后一日不亡，帝一日不得亲政。”刻《船山遗书》时，这两部书是曾国藩自己校勘的。说明了他对这两部书的谨慎。用空格，这是所有官书局刊刻的3 000多部书所没有的。也说明了这部书不是官书局的路子。

顾炎武等清初隐居不仕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他们不

【1】曾国藩：《陈仲鸾父母七十寿序》，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4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是简单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还是严肃的思想者和学者。在反清复明无望之际，挺身挑起了民族文化传承的重任，从事著述，使民族赖以维系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1]

【1】薛冰：《文化品牌与城市精神》，《开卷》，2003年，第12期。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凡大思想家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具体的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汩没人才，到这时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种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清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2]

【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8册，4441页，北京出版社。

章太炎"苏报案"出狱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发表演说，开头就讲："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3] 梁、章这两段话，说明曾国藩当年出版《船山遗书》时是有所考虑的。受这部书影响的人当然不仅仅是章太炎。

【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211页，中华书局，1979年。

二、李鸿章是官书局的始作俑者

金陵书局是李鸿章（图12）署两江总督时所办。根据如下：

（1）曾国藩在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九日奉命去山东镇压捻军，总督一职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4]

【4】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1478页左栏，中华书局。

（2）《船山遗书》主要校纂者张文虎在同治四年给曾国藩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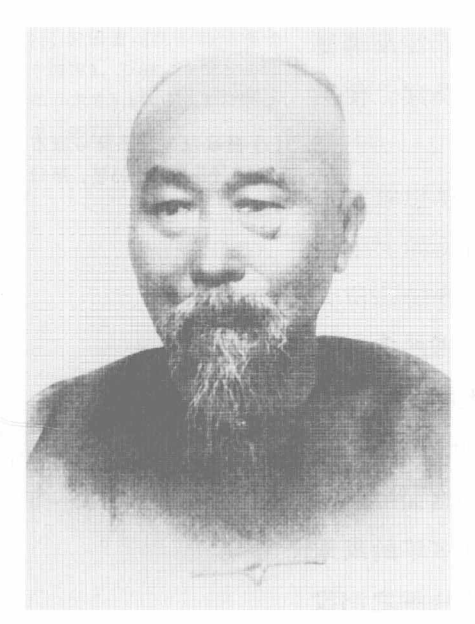


图12
李鸿章

说："自七月以来，合肥宫保，悯乱后书籍残毁，坊刻经书多误文俗字。童蒙之始，在所宜慎。因即旧局鸠工开雕善本。文虎谬承缦云侍御引，佐校雠之役。先校刊《朱子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吕氏音训》，均已竣事。"[1] 所刻前三种都是朱熹的著作，清初就被清廷规定为科举的标准答案。是为读书人的"初级读物"。音训则是了解经学词汇所必须。

（3）莫友芝：《修补毕氏续资治通鉴刊版跋》："同治丙寅春，李肃毅伯开书局金陵，刊六经注。成，且及史汉。问继者何亟。友芝以《通鉴》对。"[2]

（4）闵萃祥在《张先生行状》中说："是年秋，今傅相肃毅伯李公继督两江。议开书局，刻经史各书。"[3]

归结起来，李鸿章同治四年四月署理两江，七月（此时《船山遗书》刚完成雕版），就旧址召集人校刻必要的科举用书。次年，李鸿章议论开设金陵书局，刻六经和史书。

（5）李鸿章可以说很关心设局刻书。除上面几条外，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初十，李鸿章授湖广总督。因为他仍在军中照料兵后各事，到八年正月十六日才抵达湖北省城。二十一日才发出《抵鄂接篆折》，而123天后，八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就为组织江苏、浙江、湖北三省五个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一事上报清廷。[4] 亦可见他在当时严重缺书情况下，能利用时机，组织力量发展刻书事业。

三、官书局的提倡

（一）产生官书局的传统因素

我国刻书是从传抄进化而来，技术不复杂。只要有需要、有兴趣、有钱，就可以刻。所以朝廷、衙门、书院、私人都刻书，成为古代出版的传统。镇压太平天国的将领，都是读书人出身，

【1】张文虎：《舒艺室尺牍·上湘乡相侯》，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44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莫友芝：《郘亭遗文》，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442~44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闵萃祥：《张先生行状》，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44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4】光绪乙巳金陵刻本《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五，第2册，68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军务稍微安定，刻些书很平常：咸丰九年（1859年）胡翼林在军中纂《读史兵略》刻兵书给部下。左宗棠同治三年（1863年）在严州，以收卖茶笋代赈的余利刊刻经书。

元、明时代地方官刻非常活跃。清代由于朝廷的极度集权，官员动辄得咎，思想上的高压政策，加以地方的财政定额远低于实际需要，六部尚书或地方政府不仅根本没有公财力用于刻书，而且也没有兴趣。所以清代中央六部、地方官衙很少主动刊刻图书。仅仅雍正、康熙、乾隆初期曾命令各省巡抚和布政使将颁发的御纂钦定经史重刻。武英殿聚珍版图书也颁发给各省重刻。这些命令重刻书，特别是御纂钦定经史，各省布政使都尽可能集资刊刻。所谓地方官刻仅此而已。朝廷的命令，是清代地方官刻的基本动力。清代官书局之能成为气候，离不开这点。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攻克金陵后，六月廿三由文庆领衔报捷。同治帝曾命曾国藩修缮贡院，准备次年举行乡试。曾国藩检查贡院破坏情况后，回复说计划在十一月举行乡试。八月廿一日同治帝又有谕，如果赶不及，可以明年。[1]

同治三年（1864年）是规定的乡试年，曾国藩想在当年举行。后来来不及，到同治六年（1867年）正常的乡试年，江南省才举行因战争停办多年的乡试。三江两浙乡试的恢复，意味着科举基本的正规用书的需要。所以在同治六年四月，鲍源深在说明收复各地缺少书籍后，提出金陵书局虽刻有四书五经，但当年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颁布的13种经典和康熙、乾隆“御批”的《通鉴纲目》和《通鉴辑览》没有人刻。所以他说：“以上各书请旨敕下各抚藩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遵旧例，听书贾印售，以广流传。”[2] 清廷马上以同治帝名义，颁发上谕：“著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补购。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3] 提出了地方官刻的任务。

【1】《谕曾国藩振兴文教》，《大清实录·穆宗皇帝实录》，第113卷，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40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鲍源深：《请购刊经史疏》，陈韬编：《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五，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40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同治六年五月初六同治帝上谕》，《清实录大清穆宗皇帝实录》，第49册，202卷，604页，中华版；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40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二）产生官书局的原因

产生地方官书局的原因，是战争使战区的书籍受到严重损失导致的。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廿四日至八月初九太常寺卿鲍源深任江苏学政，视学江苏。在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的《请购刊经史疏》中，他对半年所见有所描述："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他慨叹："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1] 兵灾使书籍遭殃，科举应用的经史原著，私人不会去刻，而坊刻完全不能胜任高质量供应的要求。作为科举标准的、清初几个皇帝钦定的几个版本，原由武英殿刊刻后颁发各省翻刻，此时已荡然无存，现在必须以公财力来处理。

【1】鲍源深：《请购刊经史疏》、陈韬编：《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五，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40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三）官书局奉命而兴办

同治五年颁发刻书上谕后，经济发达地区就陆续兴办官书局。因为仅就"先行敬谨重刊"的13种书就是600多卷。这13种书，当初从顺治到乾隆三十三年，前后90多年陆续颁布，每次仅30卷上下，最多一次109卷。那时康乾盛世，布政使筹些款还容易。现在一次600卷，哪年哪月才能弄完，即使正项有钱可以开销，年度又如何报销。所以不如筹笔闲款设一闲局慢慢做。这就形成一批专设官书局。

1. 浙江书局

反应最快的是浙江巡抚马新贻，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十二日上《建复书院设局刊书以兴实学折》，说：见到上谕，"自应在省设局重刊，以兴文教，并于四月二十六日设局，先恭刊'钦定七经'、《御批通鉴》、《御选古文渊鉴》等书，昭示圭臬。其余有关学问经济，为讲诵所必须者，随时访取善本，陆续发刊。"[2]

【2】《马瑞敏公牍奏议》，陈韬编：《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五，日期、文字均略微不同。

浙江书局设在杭州。它常年由近代著名学者俞樾总办。俞樾殿试时诗卷里有“花落春仍在”句，曾国藩阅卷，大为激赏，说言花落而无衰飒意，被置第一。他自从咸丰七年罢官后，常年在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杭州诂经精舍主讲。虽是浙局总办，实际是顾问，对重要著作的版本必加关注，因而浙局刻书以版本讲究称著。

2. 江苏书局

江苏书局，设于苏州。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江苏巡抚丁日昌上《设局刊书疏》。疏中说：“溯自军兴以来，州县中歧途杂出，流品亦至不齐。虽其中固多可造之才，而平日于吏治诸书曾未体会，一旦身膺民社，茫然无所持循……臣现督饬局员，选择牧令，凡有关于吏治之书，著为一编，刊刻一竣，即当颁发各属，俾资程式。至于小学为童蒙养正之基，经史为艺苑大成之具。谨当陆续刻出，广为流布。”[1] 同治七年三月初十，“上谕内阁：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之安危系之。丁日昌现拟编刊牧令各书，颁发所属，著即实力奉行，俾各州县得所效法。”[2] 丁日昌没有着重提到刻印儒家著作，“上谕”没忘了提醒他：“其小学经史等编，有俾学校者，并著陆续刊刻。”[3]

3. 崇文书局

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十五日李瀚章、曾国荃在武昌设崇文书局。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二十日李鸿章为四省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的奏折中提到：“于［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开设书局，派委候补道张炳坤、候选道胡凤丹妥为经理。”[4] 崇文书局后来改称湖北书局，在武昌。

4. 广雅书局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二十五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澂上《设广雅书局奏明立案折》。此时儒家经典已经不缺，所以广东提出的是当年阮元督理两广时汇刻清代释经著作《皇清经解》1 400余卷，张之洞等感到有责任继承，勉绍前规。“深惟治源，亟宜殚敬教劝学之方，以收经正民兴之效。此外史

【1】陈韬编：《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卷六。

【2】《同治六年五月初六同治帝上谕》，《清实录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51册，卷226，同治七年三月戊午。

【3】《同治六年五月初六同治帝上谕》，《清实录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51册，卷226，同治七年三月戊午。

【4】光绪乙巳金陵刻本《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五，684~68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部、子部、集部诸书可以考鉴古今，俾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者，一并搜罗刊布。”[1] 这是明确以出版经部书籍为主的。广雅书局在广州。

【1】《光绪朝朱批奏章》，第一历史档案馆，第104辑，383~384页。按：《张文襄公全集》卷二十三也收录该折，但文字仅3/5。

上面提到的4个，加金陵书局，是经费充足、机构健全的5个书局。出书多、质量高，是几十年官书局的台柱。活动较少的有：

1. 江西书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抚刘坤一上《江西拟设书局刊刻经史折》，说：“臣现饬候补道臣缪德芬会同各司道仿照江苏、湖北等省办法，设立书局，先刊御定经史要籍。”[2]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675页，中华书局，1958年。
录自《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第十二辑，524页。
《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四。

2. 正谊堂

左宗棠年轻时崇拜理学大师张伯行，看重他治闽时汇刻的宋明理学家著作55种，遗憾未见全。督闽浙三年后，于同治五年（1866年）三月发起设正谊书局，重刻张伯行所刻，名《正谊堂全书》。在《左宗棠全集·批札》卷四中有一则当时的招聘愿意参与全集校勘者的告示，讲明为刻《正谊堂全书》。两个月后左奉命移驻陕甘，不久福州成立正谊书院，“正宜堂书局”消失，后来《正谊堂全书》由正宜书院出版。

3. 光绪四年（1878年）十二月初六，云南巡抚杜瑞联上《滇省拟设局刊书疏》。杜瑞联到云南前在湖南，知道湖北“设局最久，刊书较多。其地水陆交冲，四通八达，故各省寄存善本，卷帙尤为浩烦”，购买数十种，“分发两书院存储，藉资讲习。并拟择其尤要者，饬司酌筹经费，陆续校刊，分发各学；仍遵旧例，听坊间印售，以广流传。”[3] 整整20年后云南巡抚崧蕃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有《云南整顿书院并设书局片》，证明杜瑞联当年报告要设局刻书并未实行。崧蕃说：“滇省军兴以后，地瘠民贫，世家既少藏书，坊间亦无善本，以致有志之士欲精进而无由。现已饬令司道，于公款中提银一万两，选绅承领，谕令将经史子集、国朝掌故，暨一切有裨时务实学诸书，择要开单，由各省采买运滇。即在省城设立书局，随购随售。只照原价酌加水脚、薪工等费，并不格外取赢。使书值较廉，多士易于购置。

【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675页，中华书局，1958年。

亦造就人材之一助也”。[1] 这是卖书，而非出版。类似的事，直隶也办过。

[1]《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第十二辑，524页。

4.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巡抚沈秉成奏片：“粤西素称瘠苦，非教养兼施不能挽回敝习。盖不泽以诗书之气，则犷悍不驯；不广以农商之利，则游惰失业。饬各州县设立义学，颁给《弟子规》、《童蒙养正》诸书。将欲力挽颓风，必先广储经籍。拟在省城开一书局，刊六经读本，续刊有关实学诸书。并令兴办蚕桑，在省城设立官蚕局，刊发《蚕桑辑要》及《种桑育蚕谱》等书。”[2] 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己亥，广西巡抚马丕瑶奏：“兵燹后，人士流离，旧书悉毁，旧刊片板无存。寒畯远购无力，每届考试，不过零星书板，或舛错模糊，或洋板缩本，难资诵读。且多系时艺讲章，无以为稽古培才之助，以至流风日下，俗尚嚣漓。即间有刊布各种，或行或辍，究未能推广流传。江南、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各省书局，刊本精博，拟请旨饬下六省，将局刊经史各本及陈宏谋《五种遗规》等籍，每种刷寄十部。以九部分发梧州、浔州、柳州、南宁、太平、泗城、百色、郁林、归顺各府厅州书院，俾士子获资借阅。以一部存省局，为择刊式样。俟仿刊装成，饬发各府厅州县照价分售，以期散布城乡，务使渐渍涵濡，默消悍戾，可以清源化俗，育德兴贤。”“将欲力挽颓风，必先广储经籍。拟在省城开一书局，刊六经读本，续刊有关实学诸书。”[3]

[2]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2641页，中华书局，1958年。

[3]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2700页，中华书局，1958年。

光绪十七年（1891年）二月壬戌，马丕瑶奏：“至省局刊刻六经四书读本及《孝经》、《小学集解》，均已工竣，印发各属分售散布。又《图民录》一书，敷陈治理，深切著明，为居官之宝鉴，亦已刻成，任地方者各手一册。此外应刊之书，陆续筹款刊发。”[4]

[4]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2855~2856页，中华书局，1958年。

5.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左右，贵州巡抚附奏《拟设书局片》，称黔省缺书，“每届考试，不过零星书贩。书少价昂，且多系洋版缩本，难资讲诵读。以致潜修多士，见闻太陋，学识不广。诵读积穷年之苦，生平多未见之书。奴才目睹情形，随与贵

州学政臣严修，并在省司道府面商，拟在省城开设书局，先刊六经读本，继刻有关实学诸书……俟刊装成，饬发各府厅州县，照价分售，以期散布城乡，推广流传。”[1]

[1]《光绪朝朱批奏章》，第104辑，564~565页，第一历史档案馆。

6. 上面这些奏折和上谕以及他处所见到的，计有：金陵、浙江、崇文（湖北）、江苏、淮南、江西、成都（四川）、泾阳、广雅（广州）、桂垣（广西）、贵州、云南12个。此外太原有浚文书局，有说曾国荃光绪五年奏设，共13个。其中贵州、云南虽有奏报，但并未出书。出书的11个书局，江南（金陵、江苏）、浙江、广东、湖北、四川五个省六个书局，除广东外都是同治年间设立，都在经济发达，有一定选书、校勘人才的地方。

四、官书局的出版概况

官书局是在历史上分布十个省，前后40多年，出版书籍3 000多种的一个客观存在。但有两本近年供大学用的出版史统编课本里，官书局居然都没有落一个字。官书局并非一无是处，它的出版物并不仅仅就是四书五经。官书局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于文化传播非常可观。官书局由他们物色的学者决定其出版物的质量。众多官书局首推浙江和金陵两家及后起的广雅书局。

浙江书局　浙江书局得益于俞樾。俞樾自咸丰九年（1859年）罢官后，一直在书院主讲著述。他自己的《春在堂文集》达500卷之多。浙江书局成立，他任总校，仍在书院。浙江书局有两件和俞樾有关的事。一是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梁启超曾说：“汉武罢黜百家以后，直至清代中叶，诸子学可谓全废。若荀若墨，以得罪孟子之故，几莫敢齿及。及考证学兴，引据惟古是尚，学者始思及六经以外……其后俞樾亦著《诸子平议》，与《诸经平议》并列。”[2] 俞樾对诸子的研究，包括着版本的研究。子书是周秦变乱之际，学者各自立说，欲改制救世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四部分类法产生后，我国学术分类囿于四部，子书一类变得非常庞杂。阴阳五行，医卜舆地之书，已经离开了“改制救世”的政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册，3090页，北京出版社。

治范畴。明代归有光辑《诸子汇函》，收书94种。而《四库全书》所收子书竟达915种。这就淡化了子书的改制救世。浙局的《二十二子》，收书限于立说改制，而且在各种子书的版本上亦尽量采择当时最佳版本。到现在看，浙局《二十二子》，除当时孙贻让的《墨子间诂》尚未问世外，其他各书后来始终没有更好的版本问世。

俞樾还组织江苏、湖北、浙江三省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五局合刻本"分别按统一格式雕版后，将版子汇集在湖北书局刷印发行。这事不仅仅是组织五个局，而且所刻的内容，根据当时校订最好的版本——殿版；但版式根据明汲古阁《十七史》本的款式，故每面容纳字数比殿版多。这样读者可以少化钱。以汲古阁《十七史》本的款式装殿版内容，这样做必须和朝廷打招呼，否则就叫"擅改版式"。俞樾只是六品候补道，没资格上奏折，只能请李鸿章具奏。

浙江书局还有谭献、黄以周等名家。浙局出版《十三经古注》、《九通》、《玉海》等大部头书，一直号称善本，受读书人欢迎。见到过两个浙江书局的书目，都没标明年月。一个列出版书163种，一个列出版书290种。

金陵书局　金陵书局主要由戴望、张文虎分任校勘；其他各位亦一时之选。他们校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经张文虎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时本加以考订，择善而从，是清朝后期较好的本子"，[1] 为世所公认。20世纪50年代，国家集合国内各史专家、全国图书馆所藏版本，组织校点出版《二十四史》时，《史记》一书顾颉刚先生就选择金陵局刻张文虎本作母本。金陵书局较为著名的书还有《四书》、《五经》、"前四史"、《昭明文选》等。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该局担任十四史。

光绪初，金陵书局改称"江南书局"。光绪二十一年刘坤一督两江，经费更加困难。戊戌变法时，命各省裁减局所，江南书局从总督府管，改为江宁府管理。金陵书局现在见不到全目。有

【1】中华书局编辑部:《史记出版说明》,《史记》，卷端,5页,中华书局,1959年。

一份1928年的江南书局书目，计列书籍58种。

广雅书局 广雅书局建立得比较晚，但它出的书很多。它由著名校勘家实际主持编务，著名的有王仁俊、叶昌炽等。叶昌炽以他的《藏书纪事诗》名世，他在考取进士、任职翰林院编修前，馆于苏州藏书家潘祖荫家。他学说渊博，尤长金石版本之学。潘家藏书志《滂喜斋藏书记》即出于他手。他的《藏书纪事诗》记五代至清末1 100余藏书家。录所述藏书家事迹，每家冠自作七绝一首，又引录史籍记载，再附自己考评。他读书极博，"肄业所及，自正史以逮裨乘、方志、官私簿录、古今文集"。[1]以这样的学者主持编务，出版物的质量必然上乘。

【1】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端,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广雅书局出书多和精，另一原因可能是运用了广雅书院的人力。可能在以前有书院可以办书局的规定。在陕西味经书院的《味经书院办法章程十一条》有"现仿照前学院许设立书院章程"。这个办法既可撙节经费，又可造就人才。光绪十七年陕西学政柯逢时在《奏刊官书疏》中就说:"调肄业诸生通晓六书、留心古籍者，加给膏火，分司校勘。不更另筹薪水，以期费不虚糜，可成善本。"[2]

【2】柯逢时:《奏刊官书疏》,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233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广雅书局出版特别注重在系列的完整。这是其他官书局所缺少的。一般官书局注重于正经正史，特别是钦定的13部经。而广雅书局没有刻正经正史，而将力量用于释经、补史上。现在可以见到的，属于经解的23种，文字学和小学类27种，补史和史学133种，其他38种。共221种，它们称做《广雅堂丛书》。[3] 此外还有奉命翻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61种。它刻书数量可说是所有官书局中最多的。再加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翻刻的纳兰性德的《通志堂经解》，它的可供书有1 500种之多。

【3】台北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一书，附有《广雅书院刻书目表》,列书178种,2 096册5 746卷。包括《聚珍丛书集部抽印》181册,1 031卷。1925年的《山东书局经售书目》列《广雅丛书》562册,《聚珍丛书》800册。均可见它刻书之多。

广雅书局刻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一些个人无力刊刻、书坊绝不会考虑的大部头书的未刊稿。如严可钧积数十年辑录而成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六朝文》，无力刻版，稿件流落在上海，后来被以收藏稿件著称的方功惠得到，广雅书局付刻出版。这是部辑录六朝以前人已有成书以外的文字，搜吉光片羽汇集而

成，极具学术价值。又如金代张玮等撰有《大金集礼》。元末修《金史》，各志“蓝本全出于此。而志文援引舛漏，失其本意者颇多。……非得此书，无以知史志之疏谬也”。[1] 该书是研读《金史》和研究金代制度必用书。光绪年间廖廷相研究半生，撰有《校勘识语》，因为单行难以表述，必须与原书同刊，原书有40卷之多，而廖廷相是位穷翰林，一直不能刊行。后来经过缪荃孙手，广雅书局刻版付印，流传至今。

湖北官书局 现在能见到的有276种。

江苏官书局 江苏巡抚主管，现在能见到的有156种。

山西官书局 现在见到的书目仅29种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小小官书局，泾阳县书局。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鹿传霖上《泾阳县设立书局校刊经史片》，称“陕西学政臣柯逢时仿照东南各省，于泾阳县设立书局，校刊经史等书。而经费难筹”。后来由一位周姓妇女“首先报捐银五千两，其事遂集”。[2] 泾阳以周姓妇女捐银5 000两，陕西学政柯逢时捐1 000两，共6 000两。

地方官书局的经费均由各省自筹，涩润不一。既然是公款，就是唐僧肉，每年动辄上万两白银，与它的出书比较，是极端昂贵的。虽然都用“闲款”，但一分一厘均属民脂民膏。唯一节省的是陕西泾县味泾书局六千两办成。味泾书局虽规模最小，但刻书不少。仅据李俨《清季陕西数学教育史料》转录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味泾官书局书目》中所载新著算书就有16项35种32册。[3] 味泾书局虽小而能刻如许算学新书，和其他官书局一样与主持人的态度有关。它与味泾书院结合，由书院山长刘光蕡总理。由书院教师和学生任校勘等事，除工人外，总理及校勘等事概不支酬，经费由是宽裕。其“校勘章程”规定：提倡“校书为自家造学问，为吾乡振儒风”，将服务看作提高自己的途径。“章程”说：出书要“重道义，不言利”，因而规定：“时文试帖及鄙俚淫邪犯禁之书永不准刻。学政、院长如发刻书籍或选刻课艺，皆自捐刻，以免支绌。”[4] 纵观它的书目，至辛亥，20年间共

【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大金集礼·提要》，703页，中华书局，1965年。

【2】《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6辑，718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该《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6辑另有陕甘总督杨昌濬奏折，呈报周氏热心文教事迹。

【3】李俨：《中算史论丛》，册四下，347页，商务印书馆，1947年。

【4】《味经书院办法章程十一条》，陈谷家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233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出书300多种，算学外，还有《天演论》、《原富》、《强学会序》、《富国学问答》、《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中国现势论》等新学书。它是官书局中唯一不刻正经、正史和文人笔记的官书局。它是唯一以短小资金维持很长时间的官书局，实在可作今天出版业的范本。

卖书的山东书局 在旧时的地方文献，近年讲官书局的书籍和文章中，谈到山东官书局时，许多问题都不清楚。1990年山东省出版局组织出版史料征集、研究工作，在《山东出版志资料》第六辑发表有《山东书局与尚志堂》一文，其中收集到的山东书局的名称竟然有几个。而在1930年朱士嘉编的《官书局书目汇编》中就有山东书局的书目。从朱编书目里山东书局的书目看，是个经售书目。朱编里山东书目分三部分：一般书籍、尚志堂所刻书目、精刻名抄孤本秘籍。一般书籍1 331种，另丛书91套；尚志堂所刻书73种；精刻名抄317种，另丛书11套。如果这个书目是在山东的一个机构出版的书，那绝不可能什么影响都找不到，什么踪迹都没留下。此其一。其次，书目中很多大部头书都注明出版者。如开宗明义第一页就是五部《十三经注疏》，分别注明：广东、江西、苏州、湖南和李光明书庄版。至于91套丛书全是著名藏书家所刻，共5 486册。内中：

“尚志堂所刻书”。丁宝桢在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年任山东巡抚，期间就旧址建尚志堂。这是一个书院。书院刻书是常事。

“精刻名抄孤本秘籍”项目下，则完全是旧书。有注明是万历刻本；有部《涧泉日记》，注明“内聚本”。“内聚本”者，是版本上一个特殊名称，专指《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出自武英殿活字本，而不是浙、赣、闽、粤四省翻刻本。可以说山东书局是个有规模的书店，不是出版机构。它所经售的书，除91套丛书外，大都是当时其他省份官书局的出版物。

* * *

官书局诞生是在太平天国结束后。三江两浙地区经长期战乱，经济、文化摧残严重。而这些地区以往正是主要的出版地

区。太平天国结束后，民间一时顾不上刻书之类活动，所以官书局承担了此项责任。官书局大致有30年活动时间。

五、官书局的终结和遗产

此后民间经济、文化活力恢复，私家恢复刻书。官书局也因为原先提倡的各官员的退职，和主持学者的凋谢，加之社会进步，文化需求变化，活动的领域日益缩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初五，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复："恭阅电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钦奉上谕：'各省设立办公局所，名目繁多，无非为位置闲员地步，薪水杂支，虚糜不可胜计。著各督抚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限一月复奏。等因。钦此。'臣跪诵之下，钦悚莫名。伏查江苏为东南重镇，财赋要区，统辖南洋，兼管盐政，事体最为繁重，局所亦因之较多：曰营务、曰洋务、曰盐务、曰地方事宜，各有专司。本难尽事裁并，惟既叠奉谕旨诰诫谆谆，如广东、湖北等省巡抚，皆秉节重臣，尚且一并裁撤，改归总督兼管。臣受恩最深，固不敢瞻徇情面……臣就所辖各局所中通盘筹划……金陵、淮南两书局裁撤，员司责成两淮盐运司及江宁府分别管理。"[1] 当时官书局已经没有什么活动了，裁汰冗员，也就让地方官书局完全结束。

庚子事变后，清廷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初十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命内外大臣提出建议。二十七年江督刘坤一、湖督张之洞有个长达二万余字的联合奏折。在提出中国吏治应改的12条意见后，又提出"观自强之政，顾西法纲要，行之亦必有次第。谨就切要易行者，胪举十一条"，其中"十一曰多译东西各国书"。[2] 朝廷批示："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3] 两个月后，两省开办"江鄂编译书局"，从事译书出版，不久改名"江楚编译书局"。出版《礼书初编》、《元宁乡土教科书》、《删订字课图说》、增辑《支那通史》为《历代史略》等书。从这些基本情况看，江楚编译书局除由省提供经费外，和同

【1】《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4228页，中华书局，1958年。

【2】《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4754页，中华书局，1958年。

【3】《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4771页，中华书局，1958年。

治年间开设的地方官书局并无任何相同。后来虽续有出版，但民间翻译正日益增长，江楚译书于学界并无大影响。

官书局克服了千余年来官刻、家刻、坊刻、寺庙刻互不关照，形成出版盲区的毛病。以往中央政府的官刻，完全以皇帝想法为范围，主要编刻类书；地方官刻，除宋代公使库考虑某些实用性外，一般长官由个人爱好以羡余刻书，实际与家刻不相上下，区别仅在不以公款刻自己文集；家刻局限在刻自己文集，明代后期和清代嘉庆后，江南藏书家有翻刻宋元善本，它的致命伤在于没有发行渠道，因而不是经营，绝无扩展；坊刻的盈利宗旨束缚了它的视线，未能发挥其发行长处。于是社会文化发展长期需要的基本典籍，像儒家经典的完整本子，涉及道家以外的先秦诸子，成为出版盲区，明代后期至晚清，200余年竟然没有系统出版。

官书局另一给后人积极影响的是它的总办、总纂制和选题思想。书局的灵魂是总纂，另有总办，可使总纂专心于编纂。这个制度一直为后来有规模的民营书局所延续；现在的出版社也这样。合作机制：当时“三江两湖”督抚均系中兴重臣，关系密切，同治八年（1869年）李鸿章出面，联合江、浙、鄂三省五书局合刻《二十四史》；众擎易举，版片集中武昌，九省通衢，便于发行。长沙三局虽非官局，但他们出书有所协商避免重复；思贤讲舍崇尚王夫之，由于曾国荃《船山遗书》已刻全王著而不再浪费。官书局并非旧时官刻的机构化。历来中央官刻，都是“奉敕”，没有编者自己的选题思想；地方官刻，偶然性是其特征；而官书局则不然，前举张文虎《舒艺室尺牍》丁卯（1867年）八月《上湘乡相侯》书，就清楚地有一个通盘计划。这些除出版者间的合作外，都影响了后来的民间出版。

第四章　佛学和通俗伦理书

第一节　佛学书籍的出版

佛教不是我国的本生宗教，但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传入我国后，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由于读书人的参与，佛经的翻译与研究并和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宗派，构成中国佛教，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思想对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思想、伦理、风俗，甚至语言都有深刻影响，中国佛学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重刻佛经

任何宗教，必然和现实政治发生或正或反的关系。佛教本身不是迷信，它以平等为宗旨，佛教的“佛性论”针对的是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它主张人人平等、博爱、和平相处，强调一切众生皆可为善、去恶，成圣、成佛，也即人人都有资格成佛。佛教的平等思想和多神教原则，与我国历来政治上的强调血统的贵族豪门统治形成反差，所以能获得一般读书人的共鸣。晚清，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的风气。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都采取了佛教中的一部分教理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说谭嗣同的“《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1]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谈到康有为思想时说：“先生此种理想，既非因承中国古书，又非剿袭泰西今籍。然则亦有所凭藉乎？曰，有。何凭藉？曰，藉佛学。”[2] 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到佛学与改革的关系：“日本素以佛教名于亚东，几无不通其说者。近南条文雄诸人至分诣绝域，遍搜梵文古经，成梵文会，以治佛学。故日本变法之易，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佛教］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3] 魏源晚年整理佛经。从魏源到杨度，或可看出佛学在封建——民主的社会转变中的意义。

[1] 梁启超：《仁学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17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9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3]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352页，中华书局，1998年。

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兴起。由于他们借一神教的基督教变化而来，否定除基督教以外的一切文化，故太平军所到之处，儒家经典和寺院经卷均一扫而空。

一个民族经受灾难，如果文化受到打击、侵蚀，首要的就是恢复文化。恢复过程中自然也包含吸收新的文化。我国的近现代，大致就是这过程。任继愈教授讲：“儒家学说当然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然而它并不是我国文化传统的全部，自隋唐以来，佛教经典逐渐被我国知识分子吸收，成为我国传统的不可分的部分”。就文化的延续、发展讲，当时缺少佛典是个缺陷。这时需要佛经。但读书人无法获得研究用的佛经。

晚清在江苏有几位从事佛典的出版。有禅师，有居士。最早从事佛典出版的是杨文会所办的金陵刻经处。杨文会，字仁山（1837—1911）生于安徽石埭（现太平）诗书之家，家中略有田产。父亲中进士后任刑部主事。文会自幼性好读书，即在战乱仍不间断，广泛阅读儒家经典，诸子百家，音韵天算，舆地史学，大都通晓。他性情豪迈任侠，太平军进入安徽后，在社会和家庭影响下曾办过团练。后来在张芾、周天爵幕，曾国藩进南京后，入曾国藩幕，办理谷米局。曾国藩幕中学者众多，精于佛学的饱学之士不少。同治三年（1864年）杨27岁，在乡养病时接触《大乘起信论》，引起他对佛学的兴趣，现在有那么多朋友，正是潜

心钻研的好机会。随着研究兴趣的增高，就觉察到缺乏佛经的严重性，加以金陵书局刻书已有成绩，有所借鉴，所以立志刻经。

杨文会借鉴金陵书局成规，与同好商量，订立章程，于同治五年（1866年）成立金陵刻经处。当年就刻了《净土四经》。[1] 该经由金陵书局刻工甘国有精心镌刻。此后杨文会一心从事刻经事业，婉谢了曾国藩、李鸿章多次保荐，而以传播佛经，有助于祖国文化发展为己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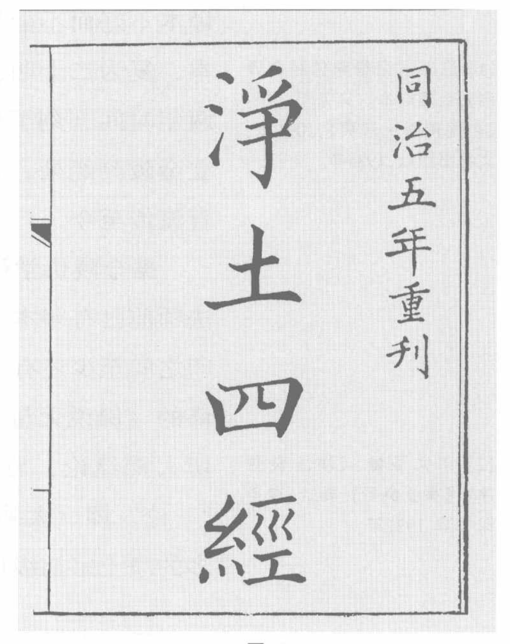


图13
金陵刻经处第一刻《净土四经》

魏源在垂暮之年译辑《净土四经》（图13），咸丰四年（1854年）译辑完成。他在高邮给湘潭周诒朴的信中说："值此难时，一切有为皆不足恃，惟此横出三界之法，乃我佛愿力所成。但办一心，终登九品。且此念佛法门，普被三根，无分智愚男女，皆可修持。"并希望他"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子其力行毋怠。"[2] 让人在危难困苦时去念佛，达到彼岸，自然属于出世。然而从信中这几十个字，我们可以体察到他从意气风发的入世到苦涩而无奈的出世举动。历史进程规定了他只能是补天。十一二年前他编纂《海国图志》时，短短几年中从50卷增至60卷、100卷，还有他编《皇朝经世文编》，应该说对国事还寄予希望。然而20年既无人去"筹海"，也没人在经世，民不聊生，导致太平天国起义。他无力拯救现世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只能以大乘的誓词"我当为十方人作桥，令悉踏我上渡去"，求得他们心里的安定。——编《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会译《佛说无量寿经》和辑序《净土四经》。这才是完整的入世的魏源。

《佛说无量寿经》又名《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自东汉就有安青、支娄迦谶前后两译，经曹魏、两晋、刘宋、唐，陆续有十一个译本。该经原为二十四章，后来翻译，被"敷衍加倍，重复沓冗，［因而］至今丛林不列于日课"。魏源鉴于它的重要，又因

【1】净土基本经典为《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习称《净土三部经》。魏源晚年译辑净土基本经典，增加《普贤行愿品》，称《净土四经》。《普贤行愿品》并非净土宗经典，原是《四十华严经》第四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愿品》。

【2】魏源：《咸丰六年春致周诒朴书》，见《净土四经·原刻叙》，金陵刻经处，同治五年。

译本不好而不能被研究者接受，所以当时找到各本，“会译”旧本，复为二十四，[1] 恢复了这部净土主要经典的地位。周诒朴花两年时间刊刻了魏源译、辑、序的《净土四经》。后来杨文会创立金陵刻经处，首刻《净土四经》，就以周诒朴刻本翻刻，并一直流传至今。

【1】魏源：《无量寿佛经会译序》，金陵刻本。又见丁福保：《中国佛学大辞典》，109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据金陵佛学研究室武延康先生见告，“《净土四经》早在印光法师前已有印本”。印光法师是民国时期的高僧。这句话是说杨、印之间至少还有一刻。印光法师虽崇尚净土宗，但不承认魏源会译的《佛说无量寿经》。1921年他说过“净土三经一论，以及一切大乘经论，皆导师也”。[2] “三经”者，即《净土三部经》。“一论”即《大乘起信论》，系大乘的入门经典。当时出版如此众多的净土宗初级典籍，说明处在苦难境地的民众之多。

【2】印光圣量：《净业良导序》，《净业良导》，卷端，商务印书馆，1921年。

二、杨文会的佛学贡献

中国佛教虽然有宗派，但他们的经典中没有反对异端的言论，在实际活动中没有排斥、打击异端的活动；它的信仰者，对信仰其他宗派，或其他宗教的，或没有宗教信仰者，都宽厚相待。这体现了我们追求和平、尊重他人自由、与其他民族平等友善相处的宽阔胸襟。与之相应，研究经典、编印经典，对其他宗派的典籍也是一视同仁，是值得赞扬的中国佛教的普遍做法。因而，中国佛教刻经都汇刻一切宗派的典籍，所以，中国佛教经典因其数量多而称作“大藏”。

自10世纪宋开宝年在四川刻《开宝藏》至清代，多次刊刻大藏。但到太平天国后，佛经版片仅存他们力量未曾到达的、版藏北京的“龙藏”。刷“龙藏”手续麻烦，以往诸大藏中《嘉兴藏》最好，因为《嘉兴藏》经版太平天国时已经被毁，杨文会有重刻《嘉兴藏》的想法。但困难重重，《嘉兴藏》“以遭兵燹，板已无存者，予与同志欲重刊之而未成也”。[3]

【3】杨文会：《日本续藏叙》，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5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一部大藏，有五六千卷，实属大工程。除宋代由政府外，历来民间刻藏都作为功德，都由寺院主持，依靠众多信徒捐献。金

陵刻经处则很难广泛募集捐献，而大藏中绝大多数经仅仅少数学者需要，不能靠以经养经的办法，又鉴于《嘉兴藏》版虽已毁，但还能找到一些印本，而当时日本正在刻《续藏经》，其中多为中土所缺，因而改为辑刻《大藏辑要》。《辑要》计划共收经疏460部，3 320卷。他并非简单翻刻《续藏经》。他说："日本现刻之续藏，搜求甚富，但其中须加区别，以归纯一。今拟分为三类。一必刊行者，一可刊行者，一不刊行者。"[1] 其收录宗旨为："此书专为初学而辑，分别部类，以便检阅。凡羽翼经律论者，概从本文为主，亦臣随君父之义也。"[2] 《辑要》中特别有会昌灭佛后中土始终未能找到的法性宗、瑜珈，即法相唯识宗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法性、瑜珈两宗在中土已经失传近千年的教义得以复兴。失逸诸经，是杨文会托在伦敦认识的日本佛学人士南条文雄在日本陆续寻觅到的。有此三者，所以《大藏辑要》数量虽少，其价值很高。唯识论中有因明学，法相唯识宗经典的重回中土，使唯识思想的研究有了最必要的文献资料。到1922年《大藏辑要》的集款已用完，1953年起至上世纪80年代，人民政府有所资助，才陆续补刻。

【1】杨文会：《报告同人书》，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8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杨文会：《大藏辑要·叙例》，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杨文会刻经有三个做法，除不分门户，经疏合刻外，还对经进行研究，或比较版本，以去伪存真。信众最多的净土，杨文会就采用魏源所译辑《净土四经》本。研究版本后再刻，刻《贤首法集》最为代表。华严宗第二祖智俨撰有《搜玄记》，传至第三祖法藏（字贤首）继而作《探玄记》120卷，发挥尽致，他人称之为《贤首十疏》。后来新罗国元晓法师获得，命弟子宣讲，遂盛行于新罗，华严宗因而获得大成就，所以又称"贤首宗"。会昌灭佛，宋代以后各大藏所收贤首经疏仅十余卷。后人因未见贤首著述，反而尊他传人澄观清凉法师《疏》，甚至拟将贤首宗更名为清凉宗。杨文会从日本获得《贤首十疏》中的六种：《华严探玄记》、《梵网经疏》、《心经略疏》、《起信议记》、《十二门论宗致义记》、《法界无差别论疏》，连中土原有《楞枷经疏》共七种。经杨文会将华严几代经疏对比研究，确认清凉法师《疏》"抄录原文十

之五六”，重新确定了贤首著述在华严宗的地位。流传有《华严策林》、《普贤观行法门》、《华严经问答》、《华严游心法界记》“四种托名贤首的赝作不予收录”，“今将贤首著述，去伪存真，汇而刻之，名曰《贤首法集》。”[1]

杨文会《大藏辑要》，不仅各派初学及重要经疏俱收，便于各派崇尚者学习研究，而且对以不用典籍为宗旨的禅宗，也有所收录：“禅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语录一兴，浩如烟海，今择其要者，汇为一宗。”[2] 查考到的，金陵刻经处所刻禅宗自六祖《坛经》以下计27家125卷。这是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思想资料。

杨文会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儒、佛、道都有所研究。他著有《论语发隐》、《孟子发隐》，是儒家经典研究；《阴符经发隐》、《道德经发隐》、《冲虚经发隐》、《南华经发隐》，是道家经典研究。对于佛经研究著述，花在经典阐述上的时间不多，仅《观无量寿佛经略论》、《大乘地玄文本论略注》等几种，主要的力量花在像《十宗略说》、《佛教初学课本》这些普及著作上。宋元以降，中国佛法已呈现式微之相了，明代还有四大高僧，清代每况愈下；清末，除忏诵法事、烧香念佛，佛学几绝。以往有试经、传戒规定，通过始能出家。后来停试，“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3] 出家人水平低下，影响学者研究佛学。杨文会提倡各寺院开班，对愿出家诸人“先令其学习文理，然后教以浅近释典，学成者准其受沙弥戒，是为初等。再令学习稍深经、律、论……”[4] 所以他编订《佛教初学课本》。诸多用意在提高一般僧众，使能接近士大夫，所以金陵刻经处还编印有《佛教中学古文课本》甲、乙、丙、丁四本，备一般僧众提高文化修养，能阅读经论。

杨文会不仅办金陵刻经处刻经，还创办祇洹精舍作讲学的场所。他自己讲授过《大乘起信论》；晚清的诸多名人，如谭嗣同、章太炎、欧阳竟无、汪康年、夏曾佑等人，都曾在那儿听过佛学。欧阳竟无还进而和杨仁山合办支那内学院，成为南方研究佛

【1】杨文会：《贤首法集叙》，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杨文会：《大藏辑要·叙例》，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杨文会：《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2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杨文会：《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卷》，2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学的场所。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居士对杨文会的业绩评价很高，他说："近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杨仁山之功居首。"[1] 说："近代的佛学提倡者首推杨文会。为了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讲学和刻经事业。他所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性、相诸宗的重要著作，因而使性、相两宗的教义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是讲学场所，谭嗣同、章太炎等都在那里听过他人的讲学。在杨仁山的培育影响下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其中特出的是欧阳竟无居士，专治法相唯识之学，他在南京举办的支那内学院，成为当时法相学的重要研究场所。"[2]

鲁迅在民国初年也曾读过金陵刻经处的出版物，研究佛学。1915年7月和10月他两次出资60元，请金陵刻经处刻《百喻经》，并为之校勘断句。他"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永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多于谬误，不可尽据也"。[3] 这个本子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50年代曾排印过。1981年金陵刻经处重印1915年《百喻经》刻本，以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

【1】赵朴初:《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法音》,1981年,第4期。

【2】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插图本,17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3】鲁迅:《百喻经校后记》,《鲁迅全集》,第10卷,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三、丁福保的佛学著作出版

就佛学出版，稍晚于杨仁山而能伯仲者，当推丁福保。丁福保（1874—1952）江苏无锡人，与同乡吴稚晖、上海钮永建等同在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六年。后在东吴大学、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南洋公学东文学堂学习，又师从赵益元学医；读书极多，爱好广泛。他终生行医和编书，是最早提倡中西医结合者，创刊《中西医学报》和编印《丁氏医学丛书》，出书300种，其中自译68种。他编书以方便他人为原则，前后30年，曾搜集解释《说文》书182种，按字汇集，不加删节，成《说文解字诂林》1 036卷。搜集、编辑前后30年，而读者检一字，千余年数十家之学说咸备。中年病佛经词语难解，注释佛经，成《法华经注》等十余种出版；书出版后虽一再重印，终觉佛经浩瀚，注释而能出版非

个人精力、经济所能承载，且同一词语多种经书出现，因而改为编撰词典。自1912—1919年，成《佛学大辞典》，收条目三万余，共380万字；编译、整理、出版花费一万银元。这是至今仍被重印的书。

1909年丁福保曾被派东渡考察医学，他常去东京旧书店搜访我国已逸各书，得几十种，其中有慧琳《一切经音义》百卷，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前者公元807年完成而未刻，至五代失逸；后者也未刻印。但高丽曾从契丹获得抄本而雕版，传入日本。丁福保获得后，除影印流传外，因为《音义》查阅不便，将该两书，并更早的玄应编二十五卷本《一切经音义》共三部音义，去除重复，按现代词典方法编排词条，名《一切经音义汇编》。另有《翻译名义集》，也是较难检索的佛学译名工具书，亦按词典排列法重排，名《翻译名义集新编》。

四、其他人刻经

江苏扬州砖桥镇有座法藏寺，据《法藏寺记》，该寺原有刻经处，太平天国后也因佛经短缺而恢复刻经："自同治中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复刊经论。"[1] 法藏寺因为隔江有金陵刻经处，该处习称"江北刻经处"，据说共刻经有4 600余卷。热心于刻经的住持法名妙空，俗名郑学川（1826—1880），字书海，江都人。妙空崇尚净土宗，但他刻"般若部"全经《大般若经》，刻至第425卷时染重病，希望清梵法师刻完其余175卷。《大般若经》，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略称，玄奘所译，共600卷。

【1】《法藏寺记》，卷8。

近代刊印佛经，清季还有上海外国地产商哈同的夫人罗珈陵出资、僧宗仰山人主持的频珈精舍印的《频珈藏》。他们以日本明治年间弘教书院据高丽藏为底本，以宋、元、明本校勘排印的《弘教藏》，略加增减，删去部分日本著作，添加清刊《龙藏》和乾隆《续藏》所独有1 127卷。用4号铅字排印，半页20行，行45字。《频珈藏》收经1 916部，印成40帙，414册，8 416卷；1909年出版，至1913年出齐。

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影印宋代《碛砂藏》，并附印《宋藏遗珍》。不久后商务印书馆又影印日本编的《续藏经》。

此外，北京三时学会、苏州玛瑙经房、苏州洞庭西山祇树庵、常州天宁寺都有刻经。天津也有刻经处所。

海内学者说：“中国人性趋向实用，故文化传统之中，以家族伦理为主的道德制度最为发达，而最不发达的理性之学要等到佛教之输入才有所补救。然而即使佛教盛行，所盛行者主要是较为粗浅的大乘，佛教正宗的小乘则不传。”[1] 我国并非不传小乘，西南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信仰小乘，只是很少刻经。

赵朴初说：“我国佛教自唐武宗毁法以来义学凋敝，达千余年，经过近百年中僧俗大德学者的努力而渐有起色，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和国外的佛教学术研究事业的兴旺情况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亟待进行。如何恢复我国佛学以与祖国当前的伟大时代相适应，还需要佛学界有识之士发大愿心，继承先德未竟之业，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2]

【1】汪荣祖：《从传统中求变》，298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

【2】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17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插图本，1999年。

第二节　通俗伦理书

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但两千年来，旧时统治阶级的思想能传播到穷乡僻壤，渗透到每个识字和不识字者的汗毛孔里，甚至在我们身上还能毫不费力地找到痕迹。我们的思想史著作研究每位思想家的主张，分析其异同，如同离朱，识秋毫之末；但对这些思想如何能传递到社会底层，因而能维持社会秩序，还较少研究。

历史上有一个写作者地位很高，读者面很广，流传时间很长，影响社会很深的图书门类，这类书在思想史著作中，尤其在出版史研究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些书我们可以称它们为通俗伦理书籍。最早这些书的书名含有宗教味道，被认为是宗教书，南宋的真德秀矫正了这看法，提出应该称“善书”，明代袁黄、清代俞樾、民国时陈垣这些学者都或写这类书，或为这些

书作序。建国前影响我国民众的统治思想，正是通过这些书向社会基层传播；这些“善书”的作者将深奥的学说通俗化，韵语化，使读者听得懂，记得牢，看得见，摸得到。这些书是宋明清时期我国民众教化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善书”是伦理学说的通俗化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而300年前有学者说：“六经皆劝善之书也。”这里我们对“善”字不能仅看作“善举”，要回到其本意。“善”字在《说文》中在“誩”部。古文善字，许慎说：“吉也，此与义、美同意”；在“我”部“义”字说：“义与善同意”；在“羊”部“美”字说：“美与善同意”。《段注》：“按：羊，祥也，故此三字从羊。”回到善的本义吉、美、义，就能理解“六经皆劝善之书也。［然而］其词文，其旨远，非好学深思之士，鲜能默识而心知其意，实体而见诸行事”。[1] 100年前又有学者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仲尼因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春秋》，其旨阴，其词微，其大要归于惩恶而劝善。仲尼殁而微言绝，《春秋》之旨，不白于天下，才士悯焉忧之。”[2] 南宋大儒真德秀在代他岳丈写的《感应篇序》中说：“余连蹇仕途，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书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则《大学章句》、《小学字训》等书；以释氏言之，则所谓《金刚经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学’可以诲学者不可以语凡民；‘金刚’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3] 这是最早指出儒家经典属于劝善之书。儒家思想是使社会和谐，其表现形式是规范伦理关系。由于深奥，“鲜能默识而心知其意”，“《春秋》之旨，不白于天下，才士悯焉忧之”，这就有通俗化宣讲的必要。

【1】汪养纯：《引经征事重刊弁言》，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2】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11号。

【3】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影印正德本，第27卷，商务印书馆。

二、明代官方规定教化规则

宣传伦理思想，始于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一书里，就不乏针砭伦理的条目。宋代社会动荡，救助之事必多。文人笔记

多有记载。明代是个有律而“律外用刑”的君主独裁社会，源于朱元璋处心积虑维持皇权，怕功臣恃功不服甚至篡位。“明太祖正是利用了儒学中礼法的资源，使他的律外用刑取得了合理性”。“他空前的教化创举，应该说是利用了舆论动员手段，使他的政策获得民众的拥戴”。[1] 朱元璋花过很多力量，想过很多维持社会秩序的办法，但缺少良好的官吏。最后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他解除地方官吏处理案件的权力，授权给乡老。发布了《教民榜文》，规定除命案，概由乡里长者处理：“户部为教民事。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自古人君代天理物，建立有司，分理庶务，以安民生。当时贤人君子惟恐不为君用，及为君用，无不尽心竭力效其勤劳，显父母、荣妻子、立美名于天地间，岂有坏法之为。所以官称其职，民安其生。朕自混一四海，主纲陈纪，法古建官，内设六部、都察院，外设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名虽与前代不同，治体则一。奈何所任之官多出民间，一时贤否难知。儒非真儒，吏皆滑吏，往往贪赃坏法，倒持仁义，殃害良善，致令民间词讼皆赴京，如是连年不已。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今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家迁外化。”榜文中除规定家族尊卑外，关于如何尊老，还有一条，规定“每乡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循行本里，俱令直言叫唤，使终闻知，劝其为善，毋犯刑宪。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2] 这24个字称《六谕》，亦称《圣谕六言》。后来宣讲之事亦由处理纠纷的乡里长、任“乡约”者担任，可能改“循行”为聚会宣讲。

在前，洪武十八年至十九年，朱元璋还三次颁发“大诰”，共235条，禁戒、劝诫官吏百姓。

朱元璋自己注意品德，除教化民人，洪武初就“命礼部尚书陶凯等采辑汉唐以下藩王善恶事实以为鉴戒，名《昭鉴录》，教

【1】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2】《皇明制书·教民榜文卷八》，7页，在北京图书馆辑印《古籍珍本丛书》，史部政书第46册，290页上栏。

育诸王子。全书11卷，分‘善可为法诸事’、‘先善后恶诸事’、‘恶可为戒诸事’三门”。[1] 洪武中又有谕旨，命编纂《永鉴录》、《历代驸马录》、《公子书》三书。《永鉴录》分六目：曰笃亲亲之义，曰失亲亲之义，训朝廷也。曰善可为法，曰恶可为戒，曰立功国家，曰被奸陷害。六目共两卷。每条各举古事，以俗语演述，教训诸王。《历代驸马录》选自汉至宋各驸马善恶事迹，以示法戒，也用俗话，善、恶各勒一卷。《公子书》三卷，采录古事，分良臣门、忠臣门、奸臣门三门。文字最浅显，训开国武臣的子弟。至此，朱元璋对各色人等都颁布有适合身份的训诫读本。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118页，中华书局，1965年。

从朱元璋开始，明代皇室孜孜于收集历代善恶典型事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宗旨在宣传伦理道德，使社会安定有序。这也是总结历史教训，为巩固政权服务。这些书虽然在宋代就有，但像明代那样规模是空前的。

三、清代善书的发展

清朝在入关前就多方学习明朝，很多做法因袭明代。在教化方面，顺治九年（1652年）清世祖福临颁布《圣谕六训》，接着在十六年规定成立乡约，每月朔望两次讲解六谕。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世祖福临有御制《劝善要言》。《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三有"九年二月庚戌（初八），颁行六谕，卧碑文于八旗及直隶各省"。在《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中有类似文字："庚戌，颁六谕卧碑文于天下。"

《清实录》和《清史稿》两部记录性史实录虽都提到六谕，但都没有记录六谕的内容。康熙时颁布《圣谕十六条》取代《圣谕六训》。雍正进而将《圣谕十六条》加以诠释，成《圣谕广训》。《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中并没有提到世祖六谕的文字。从当时宣讲《圣谕六训》的文字中析出，六谕共6句24字："孝敬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2] 值得注意的是，清世祖福临的这六谕文字和明太祖的

【2】据魏象枢：《六谕集解》，康熙十三年（1704年）。

《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极接近。仅仅"孝顺"变成"孝敬"，"毋作"变成"勿作"。改动两个字，实在只能算清世祖抄袭明太祖了。

虽然实录中没有六谕的具体文字，但"卧碑文于八旗"六个字是极值得重视的信息。顺治一朝的教化政策仍处于草创阶段，只是沿袭明太祖的六谕。经过康熙、雍正两任皇帝的匠心独具，在教化政策上的设计遂成一代制度。顺治颁布六条，康熙颁了16条112字，雍正将112字演绎成1万2千余字。应该指出，清世祖的六条是在顺治八年（1649年）亲政后颁布的。清朝进关后十帝，顺治最注意于泯灭满汉鸿沟。他亲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是清理多尔衮执政时影响满汉关系的诸多弊政。其中心是调整紧张的满汉关系：约束八旗，取消多尔衮建避暑地的计划和加征的钱粮，已征的并退回。他看到旗人因"优越"而胡作非为，必将导致刚取得的政权的丢失，所以他要在"八旗卧碑"，意思是旗人与汉人一样要做到。这正是后来康、雍发布《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时所没能做到的。《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都是通过"乡约"向士民宣讲的。乡约仅在汉人居住地有，八旗不设乡约。所以这后两个"谕"，都没有和满人见面。

海外学者游子安先生说："顺治十二年世祖命令词翰诸臣翻译刊布《感应篇》，并为该篇作序，颁行天下……顺治〔帝〕撰序云：'……名曰《劝善要言》'。"[1] 似乎有两处错：按游先生说，似乎清世祖令人翻译《感应篇》后改名《劝善要言》。按：《劝善要言》全称《御制劝善要言》（图14），翻译书名可以改，但绝不能称"御制"。如果正是皇上将《感应

【1】游子安：《清代善书研究》，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14
《御制劝善要言》

篇》改名《劝善要言》，清代后来就没人敢再用《感应篇》三个字。《感应篇》当时是被译成满文：顺治十四年徐光启孙女的公子许缵曾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就收有《感应篇》的满文译文。[1] 但满文《感应篇》并非《御制劝善要言》。《御制劝善要言》的序在《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八，说得明白，可以一读。而且游先生还引用过《劝善要言·序》："人之立身，为善最乐。故取诸书之要者，辑为一编，名曰《劝善要言》。"既然是"取诸书之要"，自然不是翻译自一本书。

[1] 陈垣：《记许缵曾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卷，234页，中华书局，1980年。

《劝善要言》是"取诸书"之要，共收录格言式的语录264条。《劝善要言》的内容虽也是劝善，但与《感应篇》完全不同，主要从伦理正面说：如"积爱则福，怨积则祸"。"福贵在天，得之有道"。"势不可用尽，福不可享尽，话不可说尽"。"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当止，终生不耻"。"兴必由于积善，亡必由于积恶"。"功顺乎天则天佑之，功逆乎天则天弃之"。"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等等。《劝善要言》不谈"恶目"，而且基本没有鬼神报应。这是与《感应篇》最大不同处。从"天佑、天弃、兴亡、昌"等文字看，加以《劝善要言》当时仅有满文本，可以说是给满人看的。又，如果和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编的36卷《世宗章皇帝圣训》和六卷113则《庭训》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相通。顺治帝显然是要用伦理约束满人，以阻止满洲贵族和八旗子弟的贪婪跋扈，防止满汉矛盾激化影响统治。《劝善要言》用满文印，不是给汉族百姓看的，但这行动无疑给民间善书的发展以重大推动力。

《劝善要言》而标明"御制"，当是清世祖辑录。《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八年（1651年）卷六十二中，有命令所有奏折一律译成满语的上谕，十一年（1654年）又命令宗室子弟停习汉字书。在十二年（1655年）编纂《劝善要言》，显然必须以满文作为工作语言。他要"取诸书之要者，辑为一编"，词臣必须先翻译有关汉籍、格言，才能供他选用。其中有《感应篇》也是当然。说"命令词翰诸臣翻译刊布《感应篇》，并为该篇作序颁行

天下”。游先生说的“为该篇作序”前面已辨清，将《感应篇》翻译后“刊布”和“颁行天下”，似属推想。前面举徐光启孙女的公子许缵曾顺治十四年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翻开内封就是《御制劝善要言序》，陈垣说：“盖不自作序，即以此为序也。”按今天就叫“代序”。[1] 乾隆六十年叶梦宇编印《感应篇直讲》，卷端第一篇也是《御制劝善要言序》。游先生没有觉察他们二位都是“拉大旗作虎皮”。许缵曾《太上感应篇图说》凡例第一，云：“《感应篇》非孔孟之书，然其词深有符于圣贤之旨，且本朝曾命词翰诸臣翻译刊布，则其非异端之书明甚。”《感应篇直讲》有叶梦宇跋，说得明白：“我朝曾命词翰诸臣翻译《感应篇》刊布天下，则是书即为王化之所系。故敬谨以《御制劝善序文》冠诸编首。”如果《感应篇》顺治十二年，不论汉文或满文，已经“刊布”或“刊布天下”，百姓就可以大张旗鼓刻印，许、叶二位就不必用清世祖的序来表明它不是异端，是王化所系了。

【1】陈垣：《记许缵曾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卷，234页，中华书局，1980年。

其实，只要把《劝善要言》一摊开，就不必要前面两大段文字。“游博士花了8年时间，从香港、北京、天津、西安、上海、广州及台湾”。[2] 还有日本和英国共20个图书馆搜集了150种善书和官箴。引用了《劝善要言序》而竟然没有见到《劝善要言》本文。该书是极好找的：在《光绪朱批奏折》第104辑光绪十二年第380–381页有不著年月附片，文曰：“敬观圣制《劝善要言》一书，皆集经书成语编辑，前载御制序一篇，后列大学士党崇雅一序，资政大夫图海一序，奉政大夫傅以渐一序。此书如蒙发下内繙书房译汉，由军机大臣校对刊刻满汉合璧若干部，皇帝时常敬诵，并分颁近臣，实足以有益身心。流传既广，更于世道大有裨补。谨恭缴原书并附管见。伏乞皇太后慈鉴。谨奏。”清制，为便于交办，奏事一事一折。同天一人只能上一折，有他事则用“附片”奏陈。“附片”上不著上奏人姓名和日期。所以，过后后人不知是谁。不久，《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七年八月己亥：“明发。己亥谕：朕恭读世祖章皇帝《御制劝善要言》一书，仰体天心，特垂明训。精详切实，俾斯世迁善改过，一道同风，实

【2】欧大年：《清代善书研究序》，游子安：《清代善书研究》，中文版，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足挽浇浮而臻盛化。惟原编只有清文，特命繙书房加译汉文，发交武英殿刊刷成书。兹据奏刷印完竣，装潢呈览。著每省颁发一部，交该将军督抚照式刊发各属学宫，每月朔望同《圣谕广训》一体敬谨宣讲（图15），用示朕钦承祖训，辅教牖民之至意。"[1]在《光绪朝东华录》上，紧接着有"并著赏给军机大臣世铎……"等近身大臣21名的名单。[2] 该上谕由兵部用"火票"递达各省，在《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中有同年十月至十二月湖南、湖广、山东、两江、江西、安徽、黑龙江、广东、吉林九督抚、将军"已经照式刊刷"的回奏。因而《劝善要言》的汉文版非常好找，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就有三个复本。

【1】《清实录·德宗实录》，卷320，册55，970页。

【2】《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2956页，中华书局，1958年。

清代第二次重视教化是在康熙整肃辅政之后。鳌拜被革职拘禁，次年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壬辰（初八），"谕礼部：朕维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永久。若徒持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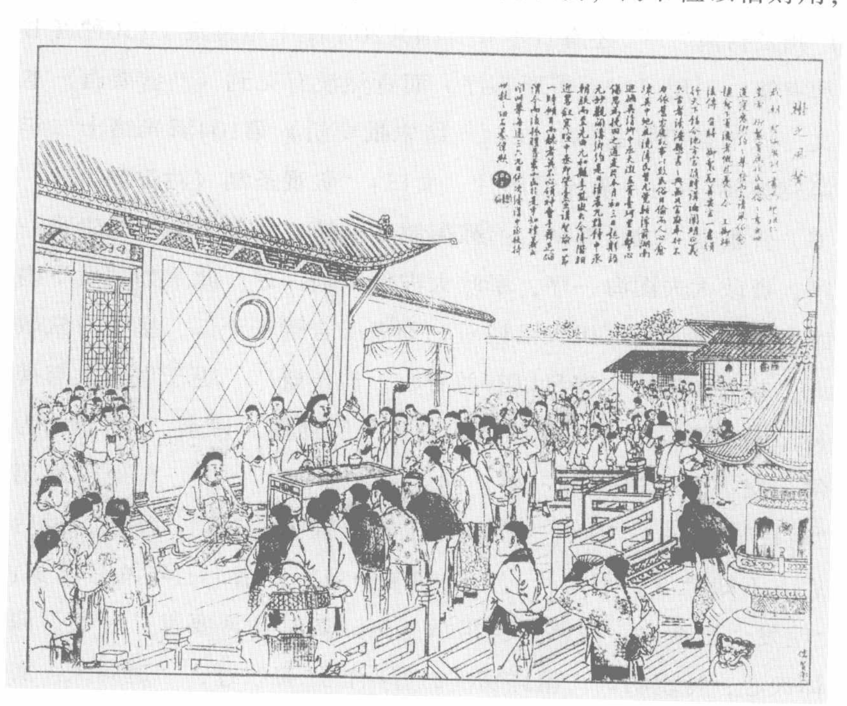


图15
《点石斋画报》所载宣讲《圣谕广训》的图像

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1] 从"敦孝弟"到"重身命"，共16条，所以称《圣谕十六条》。

【1】《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4，第1册，461页上栏，中华书局影印版。

"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训迪劝导"，也就是和顺治帝的《圣谕六训》一样，明令宣讲。16条强调孝悌务本，正是适应家长制农耕的伦理观。

这16条112个字，每月两次，连续宣讲50年，必乏味。最后必连形式都懒得走。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初二，雍正帝说："惟恐小民遵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诰诫，以示提撕。谨将上谕十六条导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2] 所谓"广训"，就是雍正帝将康熙帝定的16条每条加上他的解释，再加一些历代贤人的故事。如"笃宗族以昭雍睦"，就添加"张公艺九世同居"、"江州陈氏七百口共食"宗族和睦的故事。《圣谕广训》颁布时，规定除由乡约朔望宣讲外，儒童应县、府复试，必须背诵《广训》一条。所以《圣谕广训》是学塾朔望必读书，书店必备。虽然到1905年已废科举，但1902年发布的《钦定学堂章程》除蒙学堂外，其余《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七章、《高等学堂章程》第三章、《中学堂章程》第三章、《高等小学堂章程》第三章，都规定"教习、学生一律遵奉《圣谕广训》"。并规定"照学政岁、科试下学讲书，宣讲《御制训饬士子文》例，每月朔由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讲《圣谕广训》一条"。[3]

【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589~59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3】《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526、537、550、562页，中华书局。

四、善书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用教化，使人向善。在这种氛围中形成社会和谐、安定。中国宗教观念不发达，没有神的统治，最基本的儿童教化是由父母进行的，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在进入学校后是教师，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与小农经

济相适应的家长制，社会教化的任务是由政府担当的。县令称作“父母官”正是这种制度最贴切的表述。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教化的责任也上移。因此推断，皇上自然是全国教化的最高责任者。明太祖的《教民榜文》，及其中心《圣谕六言》；清世祖的《圣谕六训》和《劝善要言》，后继各位的《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无不是这种最高“家长”命令全体军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一）清代的学者和官员，对《圣谕六训》、《圣谕十六条》在康熙年间就作出很多诠释性的文字和热衷于宣传的文字。现在能见到的，早在康熙十三年，平遥人魏象枢已有《六谕集解》问世。此后又有常熟人蒋伊的《恭释上谕十六条》，梁延年的《圣谕像解》，李来章的《圣谕宣讲条约》，等等。浙江巡抚满洲镶黄旗栋佳氏陈秉直，在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上奏，说：“臣思从古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之道，总不越乎《上谕十六条》之至理。但恐僻壤穷乡，愚夫愚妇未能仰测高深。臣于政事余刻，不揣固陋，恭绎上谕，逐条衍说，辑为《直解》一书，欲使草野颛蒙一目了然，共闻共见。复以现行律例引证各条之后，使民晓然知善之当为而法之难犯。”又说：“若以此分布州县有司，每逢月朔，集在城绅衿耆庶亲为讲究。”对于乡间，则“每里分给一书，令其地之品行端方之士，各就公所，每逢月朔集讲一次。由一邑以推之各邑，由一府推之各府。父诫其子，兄勉其弟，此感彼应，日渐月深，庶风俗人心之敝可以培植于将来，而文、武、成、康之化不难再见于今日矣。除臣捐资刊刷分发浙省各府州县及乡村里民外，理合恭缮一册进呈御览。与否通行颁布，伏乞敕部议复施行”。三月十一日下旨“依议！”

没有动用朝廷力量、影响很深的，还有梁延年的《圣谕像解》。该书初版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还有新的版本出现，前后流行223年。

（二）从清世祖亲政开始到1905年，254年间清政府实行乡约宣讲制度，企图以孝悌务本的伦理观念维持社会安定。但当吏治

腐败时，这种仅仅要求民众的口头活动，实际必然成为一种具文。而民间仍然以宋代产生的《感应篇》、《阴骘文》，明代发展的《功过格》为伦理活动的中心。“自南宋以来，《太上感应篇》一类的善书也同样对士阶层有深切的影响。南宋的真德秀，明末的李贽、焦竑、屠隆等都曾宣扬过此篇。清代经学大师惠栋且曾为此文作注。朱珪为惠注本作序。说：‘忆予兄弟少时，先大夫每日课诵是书，即以教诸子。其恂恂规矩，不敢放佚者，于是篇得力焉。’汪辉组《病榻梦痕录》卷上云：‘检先人遗箧，得《太上感应篇注》觉读之凛凛。自此晨起必虔诵一过，终生不敢放纵，实得力于此（乾隆十年条）。’‘乃知天下无不忠不孝神仙，成佛作祖，皆非伦外之人，实与我儒道理异室同堂（乾隆五十八年条）’他们的‘不敢放佚’是得力于《太上感应篇》。汪辉祖更进一步接受‘异室同堂’之说。可见民间信仰并不专属于下层人民，而同样是上层士大夫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 我国古代士大夫是社会基层的核心，他们的言行深刻影响周围的民众；士大夫热心于这类书籍，就使儒家学说以善书形式普及到民间。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482~4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三）《感应篇》和《阴骘文》的文字活动分两类，一类是“引经、证事”，一类是“图说”。前者以汪命岳编撰、初版于顺治辛丑（1661年）的《太上感应篇引经证事》。汪养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重印〈太上感应篇引经证事〉弁言》中说：“自宋真西山先生为之序，而世之绘图、注释，刊布流传者，不啻汗牛充栋。”这类书“引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证事”所举例则时有变化。“图说”因为画图和刻板技术原比文字难，基本是翻刻许缵曾顺治十四年（1657年）辑刻的《太上感应篇图说》。

所说“引经、证事”，是将《感应篇》的每句话，在《十三经》中找出根据，即“引经”；“证事”即列举历史上与《感应篇》文字有关的“应验”。兹举《感应篇》开头两句引经举事格式如下：

［感应篇文字］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引十三经文字］《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证事］复述了袁黄的《立命篇》，（详前面介绍《了凡四训》）否定了"命定说"。

［感应篇文字］善恶自报，如影随形。

［引十三经文字］《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证事］举明将常遇春和徐达合力攻苏州事。常遇春从齐门入，所过杀戮殆尽。徐达从阊门入，不杀一人。两人在卧佛寺前相遇，徐达劝常遇春勿杀，民得全活。后来常遇春封开平王而爵不续；徐封中山王子孙袭，与日同休。

（四）从善书进而办善举。善书的基本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保持安定。而当时生产力相对低下，一遇天灾人祸不免有饥饿颠沛。此时从人道或社会安定出发，必然产生救助活动。"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邻朋。……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这是《阴骘文》中话，也正是江南普遍的活动。在江浙经济发达地区，此类项目尤有组织单项善会，名目众多。提倡者说："读善书必见诸事实，而不徒托空言。"开始有善会章程刊印，其中以余治（1809—1874）同治六年（1869年）所编《得一录》搜罗最广，计16卷，收有章程76个。已不仅处置饥寒，包括拯救溺婴、规劝所、救火章程、设义学章程。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个《不费钱功德条例》。佛家说"有钱者固可以出钱为功德，而无钱者则出心出力随在可以种福"。所举上至官员，下止贩夫走卒，各以正直心待事待人就是功德。

（五）近代余韵。近代力主革新的思想家，对善书也很注意，然而减低了报应等迷信成分的运用。如郑观应著有《训俗良规序》，提倡健康的人际关系。戊戌前后，东南富庶地区读书人随着报刊增多，有在城镇举办“阅报”活动，以推广新知识。但其中有些人对新知既欢迎，又害怕：“惟是致力时务，而不从根柢之学入手，非特寸木岑楼，并恐本质易坏，同人惧焉。”所以将阅报和阅善书合在一起，“一扩其识，一葆其真；庶几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浇漓，无使外邦之人讯为顽物，亦不使古道之士病其时趋。是则区区之意云尔。”[1] 该会在浙江余姚县设六处阅书报处，每处开办时有《御制劝善要言》、《圣谕广训》、《太上宝筏》、《阴骘文说证》、《万国公报》、《农学报》、《东亚时报》等各1册，《新闻报》10张、《中外日报》20张。真是中西古今杂陈。这和当时张之洞将《劝学篇》写成内篇和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是一致的，反映了一般开明人士的心态。

【1】经元善：《余上劝善看报会说略章程》，《经元善集》，267~268页，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年。

（六）西方的世俗权力有贵族和教会的联合力量相颉颃，坎特伯雷大主教能发动贵族迫使英王约翰签订《大宪章》，从而保障自由民自由和财产权等诸多权益。而我国“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 皇权没有监督，百姓积怨很深之后则造反，造反破坏很大。因此，“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3] 儒家以安定和秩序作纲领，孔子虽不言鬼力乱神，《书》《诗》中常见鬼神，他全盘接过来。明朝开头两代，清朝开头三代皇帝都接受以约束自己为中心的善书：明太祖的《大诰》和《教民榜文》，一方面剥夺滑吏，一方面教谕子民；

【2】《左传》，卷44。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28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2003年。

又编书教育藩王。明成祖编《为善阴骘》。清顺治在多尔衮去世后大力纠正足以激化满汉对立的做法，而发布《圣谕六训》要满人一体遵行，编《劝善要言》要满人读；在《四库全书》里收录有顺治、康熙、雍正三帝对子女的庭训，这些应该说都有助于社会安定。

第五章　近代印刷技术和纸

曹聚成在《文坛五十年》中《晚清》一文里谈到："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

第一节　近代印刷技术的进入

文化传播至关重要的技术和载体是印刷和纸，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马克思在谈到印刷和纸对马丁·路德改教的帮助时，充分肯定了印刷术的作用。路德改教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大发展；西方社会的发展，又推动了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相应发展。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进入我国。由于我国教禁，他们先在东南亚一带华侨中活动。相应地有些宗教出版物向华侨分发；逢到乡试时，他们也到沿海省城散发。这些传教士的宗教宣传品完全用我国的传统雕版方法。同时或稍后，东印度公司出于他们自身商业等活动需要，将新的印刷技术带入我国领土澳门。

稍涉我国文化的是1815—1823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编印的六卷本《字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它是以《康熙字典》为蓝本的供懂英语的人了解汉字和汉语词汇用的汉英英汉双语词典。共6卷4 800余页。它的英文

用浇铸铅活字，汉字大的字头用木刻活字，例句中的小字用铅坯手刻铅活字随用随刻。1815—1823年在澳门偷印。

鸦片战争《江宁条约》后英国人、《望厦条约》后美国人在我领土公开使用近代印刷。但和我国文化和出版发生关系，则是在19世纪末。1873年和日本订立《修好条约》，仅规定商业往来；1895《马关新约》第六款第四条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1] 日本人遂开始在我国设印刷厂并发售印刷器材和汉字铅活字。因为他们不善于经营印刷业务，1901年后收缩印刷，但他们的技工丰富了我们的印刷工业。1873年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办印刷所，熟练技工也进入印刷市场。

【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616页,三联书店,1957年。

第二节　铅活字技术的进入

凸版以往是印刷的最基本技术。我国固有的雕版和活字就是，新的凸版主要是铅活字，其次是铜锌版等图版。凸版的特点是印版的着墨部分突出于不着墨部分，经过适当压力，墨转移到纸上，成为“白纸黑字”。

一、铅字

新式活字用铅锑锡三种金属的合金，能良好的着油性墨；它有大小不同而又能彼此配合的规格系列。这两点是我们原先的活字所没有的。我们传统的活字，或用木或用铜，用手工制成，尺寸不精细。所以只能以刷子在字盘上刷，不能用压力在上着墨，缺少印刷的机械化可能。现代铅活字用字模铸造，其精密到误差可用分度值0.001—0.005毫米的千分尺测量。因而铅字与铅字可以密合；铅字的高度基本一致，就可以用压力在上着墨，可以用机械印刷。

现代铅字有大小几种字号，使行文层次能比单一大小活字眉目清楚，并活泼版面。为了不同大小的字能组成版，铅字大小以

统一的基数组成。基数称之为“点”，它是1英寸的1/72；某一大小的铅字，必须是另一大小铅字的一定比例。

汉字用铜模铸字，是自美国人开办的美华书馆开始的。为便于中英文混排，以美制铅字规格为标准。最大为“大号”，点数规格是28点，是四号字的两倍；则四号字的点数规格就是14点。比大号小一号是“二号”，点数规格是21点，是五号字的两倍；则五号字的点数规格是10.5点。后来我国人为了方便，以一号至七号称呼。以“大号”起算，叫做“号数系列”，是美制。还有一个“点数系列”，是“五四”前后从日本进入的。点数系列最下为“七号”，点数规格是6点，往上都是6的倍数：小五号9点、小四号12点、小二号18点、小大号24点、小初号30点、初号36点。两个系列合起来就构成从初号、小初号、大号、小大号、二号、小二号、三号、四号、小四号、五号、小五号、六号、七号13个大小不同的使用系列。号数点数混合使用，排版很不方便。我们用两种系列既然以点为基数，36点就不能封顶，往上还有42点、45点、48点、56点、63点五个特号字。但由于铅的热胀冷缩比很大，就不可能有比63点再大的了。铅字铸出后冷却收缩，字面中心就凹下去，字面大的铅字就没法印了。铅字中没有小三号。

为了能拼版，每号字还必须有字身3/4、1/2、1/4的“铅空”和铅条——比铅字高度低一些的铅条，用来垫充成版。

二、中文铜模制成

外国人最晚在1834年就设法制备中文铅字，但一直没有真正成功。外文铜模先在软钢的小四方柱上刻阳文反字，然后淬火使硬，成为钢冲。用钢冲冲紫铜片，得到阴文正字铜壳，裁下镶在铸模体上，就成铜模。铸铅，就成阳文反字。中文每个字笔画太多，刻钢冲非常难。从1838—1859年，外国人经过几个人20年工作，刻成的字模仅够印《圣经》用。直到发明金属电镀工艺，宁波美华书馆的技师姜别利运用电镀法，先刻木质单字，

然后用电镀镀一层铜。当镀层有足够厚度，成为铜壳，再镶入字模体内，又好又省。这时，中文铅字才能供一般出版物运用。最早而有影响的是1872年创刊的《申报》。《申报》就用的美华书馆所制的铅字。但开始时仅仅四号字一种。

1869年姜别利离职返美，路过日本长崎，将制模技术传授给木本昌造。还带去了整套中文字模。日本印刷界和知识界认为美华的那套字不够整齐美观，就重新刻制。在19世纪末，日本进入我国的铅字有筑地活版所的筑地体和秀英舍的秀英体。前者笔画粗壮，一般书籍用它印；后者纤细，报纸喜欢用。

三、活字排检法

汉字检字法曾经制约活字的使用。用活字印刷，活字必须存贮、检出和还原。历史上真正使用过，即有规模的活字印刷为数不多。武英殿使用铜活字和木活字印了《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有零，聚珍版书240余部，质量非常高。从保留至今的金简制定的程式看，程式的严密要求保证了质量。但我们也看到了它的难以推广。缘于汉字是为数众多的表意文字，不是用为数有限的音素构成的表音文字。字与字间看不出能判断前后的次序。所以从最早毕昇起，活字都是按音韵存贮、检出和还原。虽然人人能读汉字，韵虽是读书人作诗必不可少的知识，但懂音韵而能弄清每个字在韵书中的次序的却是极少数。懂韵而不清楚次序，检字、返字效率必低。从金简制定的程式图看，偌大的一副字柜群前，一人唱韵一人检字。不仅需要有相当水平的读书人唱韵、检字，而且效率不高。康熙四十一年底金简根据三年多实际印书30余种的经验说："凡遇大字书，每人一日可摆二版，小字只可得一版之数。"[1] 则每工两人最多排800字。如扣除他说的与检字几乎等量的"归类"，即把印完后的版子拆散将字归回原抽屉的工时，则平均每人只能排200字。这还不算制备活字的工夫。可见效率很低。在皇宫里可以不惜工本，在社会上就难以推广。简单一句话，需要汉字的形状排检法，能方便地将活字存贮和检出，活字

【1】金简：《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2卷，29~3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才能应用于实际。

有人说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在他解决字模后，又“发明”了“24盘”。这说法缺少了一个中间环节——谱师。

我国的宗族观念，使得家谱成为一种特有的重要出版物。家谱有一定印刷量，名、字的用字相对集中，所以极适合用活字印。江南经济发达，编印家谱很普遍，所以形成了“谱师”这个行业。他们的活字用木盘装，便于到印家工作。每个盘隔成若干行，安置木字。木字基本按《康熙字典》排列，略有变化。而且有歌诀，讲部首的次序。部首内各自也按部首歌诀推论次序。它是用木盘的标准的汉字字形排检法。因为到印家印，木盘就地在板凳上按次序排放成几行。因为字有固定位置，每个谱师可以独自检，所以几个人可以同时在字盘行内行走检字。这时活字才成为产业。他们的字盘分两个序次列，一个是常用字，一个非常用字。遇到没有的字则马上现刻。这也是三个层次，和后来铅字字盘盛行的常用字盘、间用字盘、罕用字盘的概念完全相同。[1]

【1】汪家熔:《木活字字盘的排列法》,《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419~422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姜别利正在谱师众多的地方，没理由说不知道谱师的工作方法，甚至有可能吸收谱师到美华工作。姜别利的特殊贡献是统计了大量印刷品，将铅字的常、间、罕区分建立在统计得到的使用频率上，结合谱师的经验和工厂操作的实际，完成了“24盘”。使中文铅字成为可操作的工业行为。

四、石膏型版

有了铅活字后，人们却舍不得用铅活字直接用来印书报。现代铅印用压力使在纸上着墨。压力使铅字笔画变粗，同时使铅身变低。排成一个书版，印三五千份，最后一张和第一张比较，笔划略粗。当时虽然铅字能用铸字机铸，但效率低，很珍贵，必须重复使用。铅字被重复使用时，每个铅字经受过的压力不同，排成一个书版印刷，不仅每个字笔划粗细不一，而且铅身高低不一，低的字就印不好。直到1804年英国人斯戴荷（Earl of Stanhope），一说英国格德（William Ged）1725年，发明石膏型

版才解决。我们用铅活字是在1872年之后，所以一开始就用这方法。具体方法，最早的文献追记在1931年。说："其法以泥覆于排成活版之上，压成阴文，以铅等混合金属熔浇其上，即成阳文铅版用之印刷，而无其弊。"[1] 这儿"以泥覆于排成活版之上"，说是用泥，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称这种中间型版为"泥版"或"泥型"。这是个错误说法：泥覆在排好的铅字版上，必须有一定的湿度才具有可塑性，而且要有相应厚度，才能剥下；粘土颗粒细，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干燥，不合乎现代技术的求速原则。而且干燥必产生裂缝。直到1974年《印刷500年》出版，1996年傅丽君翻译其中部分，我们才清楚，该书说："浇铸铅版。这种方法能保存排好的页面以便再印，因此就避免了重新排版。格德用熟石膏制型，然后再用石膏型按需要铸如数的金属版。"[2] 熟石膏遇水很快还原干燥而没有裂缝。这才知道一直说的所谓"泥型"、"泥版"之说是错的。

[1] 贺圣鼐：《三十五年中国之印刷术》，《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下卷，182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

[2] 傅丽君译：《印刷技术的发展》，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35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铅活字排版后用石膏制型再铸版印刷，印后并保存铅版，有实物和记录的，是江苏淮阴人王锡祺。他长于地理学，并热心收集文献。从光绪六年至二十三年（1880—1897年）前后辑印《小方壶斋丛钞》、《小方壶斋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共1 600余种。他就是用石膏型铸铅版后印，保存其铅版供再印。

铸石膏型的根本原因是求得铅字不受磨损，以求得好的印刷效果。

五、纸型

因为铅合金热涨冷缩的系数大，脱型时石膏版就破碎，一块石膏型版只能浇一次铅版，保存铅版积压资金。1855年瑞士人德拉加纳 (Dallagana) 兄弟发明用柔软的纸制型版并浇铸铅版，替代了熟石膏型版。这就是我们以前熟悉的纸型。一片纸型可以浇铸十余次铅版，就没有必要保存铅版，节省了资金。纸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能弯成一定弧度，铸出圆铅版，改变了原来

铅版平置印刷机上往复运动而改为安置在圆筒上回转运动，大大加快了印刷速度。后来速度更快的用卷筒纸的轮转机也成为可能。

纸型传入我国，大概经由日本。英美虽然在《望厦条约》后印刷已经进入我国，但除了《申报》外，似乎主要着重在宗教宣传上。前面提到1895年《马关新约》第六款第四点规定：日本人可以在我通商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日本印刷业进入我国经营。1901年日本的修文馆印刷所歇业，资材盘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开始使用纸型，或可见纸型在1895年后进入我国。

六、活版在近代出版中的巨大贡献

铅活字技术的成熟和应用，对近代出版在技术上作了最重要的支撑。如果没有铅活字，近代出版的很多项目，如新闻报纸等讲究时间性的出版物就难以产生。原有的雕版印刷术，有原稿后，先要“写样”。因为雕版遇有错字要挖版才能改，技术要求高，费事，所以写好后必须校对无误后才能上版刻。刻好后必须刷出样张再校，才能印。非常费事费时。旧时曾用木活字排印邸报，质量极差。面目可憎的邸报古人是不得已而读之，铅印报纸至少版面不至于让人讨厌。

出版物中主力是书籍。书籍使用铅活字后，因为铅字面积小，书籍的“体积”变小，减低了成本。而且加快了出书的速度，使出版的时效加强。由此出版有了质的变化，原本不成熟的分散的出版，构建成一个集中而有力的、介入社会进程的行业。

雕版时代，书籍的主流是家刻本。家刻本，一部书的版子雕好后，是留待读者随时来刷印的。可以说，雕版是要一本刷一本。所以它没有搁置的存货，不会搁置资金。活字是需要周转的，因而和雕版印刷完全不同，当一个版排好后就要马上印，印完后就要拆版，铅字马上可以供排另一本书用。（石印则需要磨掉供另制新版）所以活字印刷要求书籍批量印刷，就有存货，搁

置资金，就有个经营问题。出版因为铅活字等新方法的应用，使出版和发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新式印刷印数少时，单价很高；印数多单价很低，但超过需要的部分如何处置、费用如何收回都是问题。以往在出版物品种上占主导的是非经营的个人刻书。使用铅活字等新式印刷方法后，个人刻书由于印数少，单位成本高，极大地减缩了私人出书份额而由注重发行的新式出版成为出版主流。扩大发行对书籍的社会功能讲，是种大进步。

经营的个人出版，一般是旧时书坊。面对新式印刷方法，他们不必有大的动作：旧有的书有版子在，不妨慢慢刷照常卖。新的书原有的主顾不要，而且要增加投入。旧书坊多年形成，各地有着适合的供需关系，各个店都难以在他地开拓，所以难以引入新的印刷将书销到外地。随着社会进步、教育改革，这个书坊行业慢慢萎缩，其中有实力的改营古旧书。

适应新式印刷的是应时而起的新式出版。在民族灾难面前，读书人中的先行者，为了唤醒大众，将自己主张以文字传播，选择快捷的新式印刷。开始以赠阅，逐渐认识必须有所回收资金才能持久，于是选择经营道路，从事经营性的传播，成为自有出版以来的新面貌。他们为了能持久经营，收到好效果，着意于发行，以提高单本印数降低成本，减轻读者负担，同时亦为更好推广新思想。他们开始了自己的发行网。报刊则设代销点，书籍则开设分号，极大地提高了发行量，新的出版逐渐成为出版的主流。

第三节　平版技术的传入和使用

一、平版的特点与种类

现在除了有价证券以外，所有书籍报刊以及各种零件，甚至一张小小名片都在用平版印刷了。而在百年前，平版印刷对我们

的前辈讲，完全是陌生的，它完全是外来的。平版，顾名思义版子是平的。其实严格讲，平版的有文字图像部分高于空白部分，仅仅因为文字图像的高度实在太微细了，不是人们的感觉器官所能感觉到而已。

平版最早是石印。石印是奥地利人施纳菲尔特（Alois Senefelder）于1798年发明的。施纳菲尔特是位作曲家。据说他因为没钱将自己的曲子用雕刻铜版印刷而琢磨出了石印。不久，因其方法便利，传教士将之带来我国，供他们印刷中文宣传品之用。现存有实物的，最早有1833年广州印的《各国消息》。

后来有胶印。石印有两个缺点：一是印石在印刷机上和最早的铅版一样，平置印刷机上只能往复运动，因为石板厚重，运动速度慢；二是印石和纸张的密合压力小了有空疏，压力大了印品不细致，三是印版在石头上，印完后不能保存。胶印原理和石印基本原理完全一样，但是把硬的印石改为薄的亚铅版做印版A，装在着墨滚筒上；再增加一个橡胶滚筒B，作为转写；载纸滚筒C接受B的转写，完成印刷。这样既快质量又好。印完后，可以保存印版。这张薄薄的亚铅版，涂上薄薄一层树胶，挂起来不占地方，以后洗掉树胶马上可以上机。

因为食品工业发展，要在罐头上印刷。原有铅版印刷和石印，印版都是硬的，被印物罐头皮也是硬的，硬与硬不能很好着墨，有人发明出用有弹性的橡胶作转写媒质。胶印发明是用在印罐头皮。到1904年美国人鲁泊尔（Ira W. Rubel）将印金属的方法用于印纸，获得好效果，胶印逐渐普及。胶印开始并不是印纸品，是印刷罐头皮实践的“副产品”。

胶印用于纸张印刷后，有石印做不到的细致质量，有三色铜版所做不到的大幅面，以其特长，占领了整个彩色图片印刷市场。现在配合电脑和激光照排，亚铅版改用一次性预涂感光材料的镁铝合金薄板，所谓PS版，而且极度规格化，制版、装版效率极高，凸版的活，不论文字和图片，现在全由胶印在做了。

二、石印术的传入与兴衰

（一）石印的技术原理

石印利用油水不相容的原理在石灰石板上印刷。先将质地十分细腻的石灰石板打磨得非常平整光滑，然后用油性墨在上面绘图或写字，再刷上薄薄一层水，用墨滚在石上滚动。这时有油性图文线条的地方因为没有水就获得油墨；相反，空白处有水，不沾染墨，然后覆上纸，加压，就获得一份印刷品。这是原理。这时纸上得到的图文是反的。所以实际运用时加一道手续：先用油性墨在纸上写字或绘画，然后用压力覆到石上，揭去纸，刷水、上墨，覆纸、加压，就得到一份正的图文：正——反——正。这个方法名为“石印”，只能得到原大的印件，并要工工整整地抄写，才能得到印版。（1940年蔡元培等浙江学者组织出版104卷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就是动用若干人工笔抄写用这种方法得到印版。1983年上海书店改名《王国维遗书》复印，可以一睹这种制版的真面目。）后来维新人士大都利用这个方法，如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他编辑的由慎记书庄出版的大部丛书《西政丛书》都是用这种方法印的。较之雕版又快又省。但是不久铅印普及，石印相对逊色，极少用石印印新书了。

石印能被我国广泛应用，是在1859年奥斯本（John W. Osborne）发明照相石印之后。“照相石印”用照相照书，获得反字负片，在亚铅版涂感光液晒成正片。正片图文部分感光后附着在石上，获得反像，未感光部分用水冲洗掉，上墨，版就制成。因为照相可随意放大缩小，对原稿就不要求严格大小，又可将现成的书作原稿。照相石印为影印旧书提供了极大方便，在我国晚清得到广泛运用。

石印进入我国，长时间只是外国传教士印些宗教小册、画片、杂志。照相石印方法传入，石印才和我国文化相联系。到1872年英国人美查（F. Major）在上海办《申报》。报馆为提高设备利用率，都印书。《申报》就兼办“申昌书局”，承接作者无

力雕版的作品，用铅字；又办点石斋，是为石印，以《点石斋画报》闻名；而影响于我国出版事业的是它翻印《康熙字典》之举。

（二）石印印书业的兴旺

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说："石印书籍之开始，以点石斋为最先。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每名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1] 时间当在1880年之前。我们知道，书籍印数越多，出版者获利越大。解放前一般书印五百、一千就有大利，清末一下印四万、六万，获利之多可以想见。这点石斋真是点石成金了，于是华商跟着也办。先有宁波人开"拜石山房"，跟着广东人徐润复，在1881年创办了"同文书局"，与点石斋鼎足而三。后来更多：富文阁、藻文书局、文澜阁。因为有利可图，连讲究版本、看不起洋法的藏书家，如李盛铎，居然也开办了蜚英馆石印书局。石印集中在上海；苏州、武昌、宁波，杭州、广州等地也有石印书局。杭州的竹简斋能印大书。

[1] 姚公鹤：《上海闲话》，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同文书局影响最大。开始购置石印机12架，雇工达500名，专印大部头古籍。它除也印《康熙字典》外，《殿本二十四史》是它最早用石印翻印。著名的多达10 040卷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它或印过两次。一次受清政府委托按原大印，送各国政府，记录、实物都在；从宣传品上还见到一次缩小印。后来因为存货太多销售不畅亏损而倒闭了。但它的影响至今仍在：中华书局现在还在印的《康熙字典》，就是用它剪贴拼成的本子制成铜版再翻型印刷的。在书名页后还有"同文书局原版，中华书局精印"12个字的牌记，以示对100年前前辈业绩的敬佩。因为武英殿原版二十四史的早期刷印本难找，自它以后到现在，翻印《殿版二十四史》都用它的影印本做母本。

上海有一张颇有年头的英文报纸《捷报》（*China Gazette*），1872年7月6日转载了一则广州消息："此地在外人经营下的印刷

所已引起华人的爱慕，我们听说他们也办了一个印刷所，与之竞争。”10年后9月9日又有一则通讯：“广州另一个进步的征象是在十八街成立了一个机器印刷所。此印刷看来营业兴盛。”广州海关报告在1888年项下说：“以往四年以来，此间一家石印书局营业十分兴隆。”[1] 三则新闻中1872年的一则，相信是个石印厂，国人利用石印的时间还要提前。

【1】以上三则转引自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40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上海现有石印书局四五家，用蒸汽机石印法已印成中国著作数百种，其所印的书行销于全国。各地零售店的增多可以看出大家十分需要这种书籍。石印书比木刻书便宜。以《康熙字典》售价为例：石印各种版本不同，自一元六角至三元。木版大字的售价至十五元。购买石印本的人大半是赶考的举子，年轻，目力好。他们不要宽边大字，而喜欢旅行时便于携带的小本。举子们需要赶路，又喜欢带书。

“上海石印书局大量批发，供给远方省份，北京琉璃厂也设有分店；尤其是在四川商业中心重庆，其他各城市也有分店，如广州。但印刷的中心地则在上海。上海是最早采用铅字，也是最早采用蒸汽机印刷的地方。现在每一个印刷厂都雇佣一百或二百工人。每一架印刷机须要三个印工：一个人在上面往滚筒机上安放纸张，两个人在下面接取印成的纸张。整顿印石，抄写书稿，摄影缩小，以及其他种种手续，都需要不少人手。

“大部分印书字体都很小，奇怪的是居然有那样多的人喜欢买这样小字的书。现在这些石印书局营业十分兴盛。所用的纸是福建的竹纸。这些石印书局雇的工人过多，资本的消耗因而较大，应减少工人人数。”[2] 1889年5月25日《捷报》上的这段报道，从多方面记述了石印印书业的概况和文化效果。

【2】梁长洲：《近代各处印刷业情况》，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404~40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三）石印印书业的贡献

石印书局的贡献在于将一些原来应该普及而并不普及的书普及了。这些书除《四书》、《五经》外，主要指《康熙字典》和《殿版二十四史》。《康熙字典》是我国最早的规范化辞书。但老百姓并不能轻易得到。刚编好后大内刻过，到道光七年又刻过一

次。“版藏大内”老百姓要刷一部岂是易事。虽然没有著作权，但那是“典”，不小心翻刻有错字是要杀头的，从1716年开始，没人敢翻刻。直到160年后，1875年湖北崇文官书局才翻刻。而且42大册，半页幅面比现在八开纸还要大，穷读书人岂能置得起。所以《康熙字典》问世200年，传布极少。再如《殿版二十四史》，也是“版藏大内”。到1851、1869年广东才有两个翻刻本。而考进士是要考“历代政治”的，应读史书。但一般读书人只知有二十四史，极少见过；同光间官书局林立，很多刻二十四史。但用雕版，字小不了，书价贵。条件好的也就是读《纲鉴易知录》而已。1881年，直隶南皮知县劳乃宣上禀给总督李鸿章，建议拨垫银三四千两，调运南方官书局所刻书以原价在直隶各地发售。禀中这样说：“人才之兴，以读书为根本。畿辅民风笃厚，士习敦朴，通儒硕学代不乏人。而人文终不能如南邦之盛者，以舟楫不通，书籍难致。往往有向学之士，无可读之书，是以成就者少也。尝见乡塾所读之本，率皆滥恶俗本，谬误不可读。庠序之士，有终身不识经史篇目者。岂无可造之材，而囿于见闻，不知应读何书，亦不知何从购买，美质因之废弃，可胜惜哉。”[1]“庠序之士，有终身不识经史篇目者”，这句话不一定辛酸，但读书人因书价贵而读不到书，究竟是很值得同情的。他建议垫拨款项代卖书。这件事后来办了，但终不能长，因为读书人穷，买不起雕版书。而照相石印可将字缩得很小，书价就便宜，对读书人比较方便。

当时人这样描写：“石印术翻印之古本，文字原形不爽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笔划清楚。颇得考生之欢迎。”周越然在《书·书·书》一文中说：“清末科举时代，书肆中有所谓铜版四书者，高约三寸，广约二寸，可谓书本之至小者矣。此种书专为场屋之用，字小如蚁。”最近又见报道，有《四书》如指甲大者。这自属出版中左道旁门了。一般石印雕版书，单边可缩成原书的1/5，面积为1/25。《殿版二十四史》每半页十行，行21字，半页210字，711册。同文书局最早影印时依原样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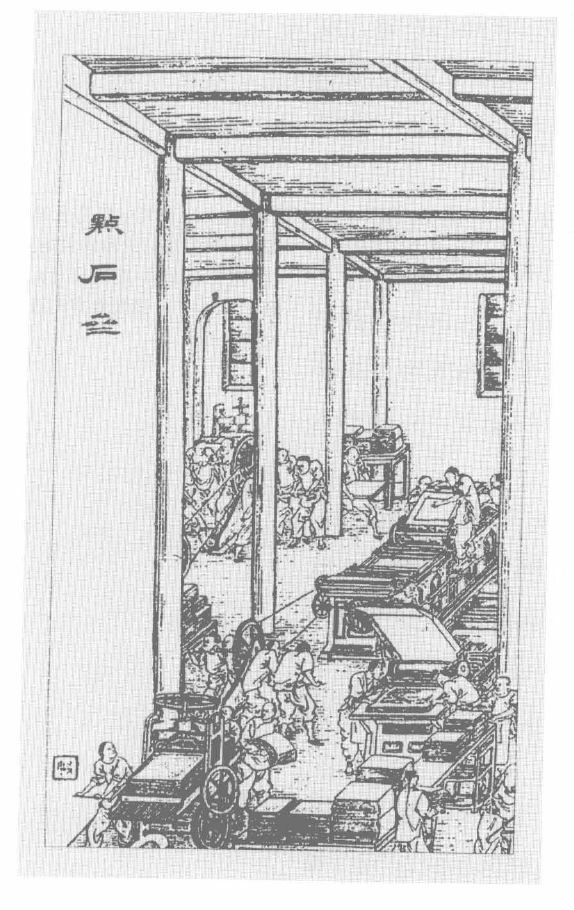
【1】梁长洲：《关于劳乃宣建议直隶售书事》，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29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小。而后来光绪中点石斋第一次印本，用拼贴殿本的办法，每半页三栏，每栏30行，行21字，即原殿版九页拼成一页；每半页1 890字，是殿版的1/9，合订80册。缩印后的价格比雕版书要便宜很多，因而普及。

（四）石印开始了商业出版的选题多样性

雕版印刷出书，最早就是书坊，唐代安史之乱时就有读书人关于印版书的活动记录。书坊千余年不断，其经营规模却始终没成大气候。究其原因，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外，在于书店作为出版主体，它与刻工没有雇佣关系而是临时计件，没有雇工后的压力。石印进入出版业后，一个厂一二百人，必须让机器转起来，才有钱给工人饭吃。1884年点石斋出版《申江胜景图》，其中《点石斋》一图配的文字讲："古时经文皆勒石，孟蜀始以木版易。兹乃翻新更出奇，又从石上创新格。不用切磋与琢磨，不用雕镂与刻画，赤文青简顷刻成，神工鬼斧泯无迹。"又说："机轧轧，石粼粼，搜罗简策付贞珉。点石成金何足算，将以嘉惠百千亿之后人。""搜罗简策付贞珉"才能"机轧轧"。（图16）

图16
点石斋石印厂



以往刻一副版，卖多少刷多少；好卖的早些收回本钱和盈利，但不会有亏损。现在变成要批量印，印少了成本高，利润低；印多了卖不掉可能血本无归。这两者促使石印书店必须在选题上用工夫（很多出版石印书的书店并没有厂，仅委托他人代印）。拓展选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常用书扩及到较常用书，一是发挥石印的特点，开拓。石印作为盈利性出版，始于点石斋。最早在1879年7月27日《申报》的广告题目有"点石斋印售书籍图

画碑帖楹联价目”。后来点石斋出版物集中于书籍和图画。在石印还没有用彩色网纹前，单线描绘的以时事作内容的画报，就是一大新园地，可以源源连续出版。

多少年来，学术界对哪份画报最早颇有争论。但就石印画报讲，毫无疑问是《点石斋画报》；而且出版年头很长，唯一可以媲美的是后来的《良友》画报（1926—1945年）；影响最大也是毫无问题的。《点石斋画报》创刊于1884年5月8日，而它的终刊时间历来有不同看法，近年陈平原教授考证，它终刊于1898年8月。[1] 一个刊物当时能连续办14年3个月，实属不易。它能长期吸引读者，在于将图画与时事结合，就有永不枯竭的题材。创刊时正是中法战争，后期报道甲午战争，《马关新约》后台湾民众反抗日军，都是民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平时关注社会新闻，它融入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市民生活。它介绍的新事物都是读者熟悉和关注的。后来，《点石斋画报》逐期附刊王韬的《淞隐漫录》，配上图画。陆续又刊《淞隐续录》等。当时用连续刊登是为吸引读者，这对后来的连环画想必有一定影响。

《点石斋画报》的主要画师是吴友如，后来他自己办《飞影阁画报》。他靠《点石斋画报》在读者中享有盛名，但他办的《飞影阁画报》虽规模和体制上模仿《点石斋画报》，却没有新闻来源，只能“刻意画仕女人物，新闻则止于一般社会现象”。[2] 没有多少新意。《飞影阁画报》共出4年：1890年3月至1894年3月。

此后石印画报成为一个品种，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提及不多。还有《书画谱报》，但现在还找不到该报，不知内容。沈阳辽宁省图书馆藏有1908—1912年天津出版《醒华》五日刊；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报《醒华日报》几页，不明刊发地点和日期。其中一页标明“第七百四十四号”，画的是两广总督袁树勋受贿事。袁1909年6月至1910年10月督两广。这和戈公振所说“画报出，乃渐有进步，有时讽刺时局，可与大报相辅而行”[3] 相一致。

照相石印以其不爽毫厘的特点，除印书外，还影印图画、碑

【1】陈平原：《点石斋画报选》，8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

【2】阿英语，陈平原：《点石斋画报选》，45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263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

帖。这是雕版完全做不到的事。雕版仅仅能印单线，不能印水墨画；碑一上木版，神、气全无。石印使书籍增加了品种，石印画报图画有助于书法、绘画的普及。

（五）石印的功绩和衰落

1. 书坊创造了古籍影印最好的拼缩法

施纳菲尔德发明了石印术，但使石印术获得充分利用的，是在我国的出版业。雕版印刷时，书籍出版后，经过或长或短一段时间，雕刻的版子就要腐朽不能再刷。如需重印，有一个重新雕版的问题。古代因为读者相对少，古籍重新雕版的可能很少，这从历代经籍志的比较中可以概见。石印出现后，特别是有了照相石印后，古籍重印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历史上石印对于延续古籍生命有很大贡献。

雕版书因为雕刻技术的限制，雕版的字都大，因而行也宽，一般每面仅210字。这样大的字，相应减低了纸张利用率。照相石印能将幅面缩小到原来的1/10，字迹还很清楚。起初，同文书局就这样缩印，他们印的《康熙字典》就是6.5×9.5毫米，书就像一块块豆腐干，不便阅读，所以后来都拼缩成大面积。以《殿版二十四史》为例，当年前后有12个缩印本，他们有几种缩法，可归纳为两种。点石斋的一种整页拼贴法，已成为现在影印拼版的“经典”方法。它又分两种。一种剪掉边框。将原来书页剪掉四周边框，以九面拼贴成三栏，每栏三面。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就用这方法；另一种连边框、书耳等，每四面拼一页。如中华书局影印《经籍纂诂》、《文苑英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文段注》，商务印书馆影印《缩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亦都用四拼。一种是剪贴法：剪贴，不依原书页、行。最典型的是1888年蜚英馆的称为“直栏本《二十四史》”，半页15行，行32字。殿版每行是21字。32除以21是除不尽的。蜚英本正文第一行用殿版三行拼成一行，多出四字；第二行以此4字再加殿版两行，拼够32字又多14字；第三行以此14字再加殿版一行，多三字……。32和21的公约数很大，是672，所以剪贴时要

分外小心，费工费事易错。但这种方法印出来版面是个完整版，好看。这种剪贴费工易错，近年仅仅见到文物出版社影印《佛学大辞典》，其前面的13页《序》、《例言》、《通检》是用剪贴法。

值得我们尊敬的、最费事费工用剪贴法剪贴石印的是同文书局印的《康熙字典》。殿版特点之一是“字大悦目”。一般书以正文为主，读者不一定看注释，所以用双行夹注小字。《康熙字典》则注释是主要部分，双行夹注在字头下，字小了不行，以注释为标准，行宽字大。因为殿版字太大了，用整页拼缩极难处理得悦目，所以用剪贴法。剪贴夹注的难度远比单行难。他们拼成每页大字18行、行24字，小字是36行、行48字，每页还做出详细的“版芯”，现在横排称“书眉”。见过殿版原书的看到同文版是要叹为观止的。这个版制成铜版，后来归到中华书局。中华书局重印时版面上保留了同文书局的原来的全部标识，仅仅在内封反面加了“同文书局原版中华书局精印”12个字。这12个字如实反映了缩印这本字典两代人的劳作，和以往雕版所有权转移后新主人挖改姓名完全不同。这种尊重前贤的风格，是我们研究近代出版史应该关注的地方之一。

2. 石印曾为文化传播作过大贡献

一般印象，好象石印曾为影印古籍效过劳，而能影印的古籍有限，所以又转向科举所需各种读物。其实，铅印因为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当时市场需求很低，所以发展很晚。甲午战争失败，一部分读书人觉醒，需要利用出版的时候，石印独领风骚。当时石印生意兴隆：影印古籍要用它，科举用书要用它，觉醒的读书人要用它。就梁启超的活动，仅编《时务报》，编《西学书目表》两件事，就有石印很多活；后来又编《西政丛书》。《时务报》是旬刊，每期发上万份；《西学书目表》介绍几百种以前外国人翻译，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其中有部分确实有参考价值，免不了要由石印印刷。西方科技、西方政治、外国史地，我国边疆地理，王韬、郑观应、冯桂芬、汤寿潜等等政论书都是热门书。《时务报》创刊后，各地纷纷仿效，上海还有《农学报》，

出版多年，并出版《农学丛书》200余种。这些书报大半用石印。

3. 石印印书方法的转轨

在1898年，有些翻印古籍的石印书局，因为存货过量，难以周转，如同文书局就歇业了。到1905年8月，清廷下令立刻废科举，科举参考书的存书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在维新思潮影响下，铅印小厂开始多起来。这三者夹击下，石印印书业全军覆没。

进入20世纪10年代，石印印书获得了重新发展。上海因为商务印书馆利用照相石印技术，按原貌印制宋、元、明古籍而使石印印书重光。现在仅有两封信记录了这事，是目录版本家缪荃孙推动了按原样石印影印善本古籍，使石印获得发展，使古籍获得新生。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五月廿二日商务印书馆张元济有信给缪荃孙，说："所商影印古书一事，一再受教，谨志勿谖。此时尚应者寂寥。而鄙意期于必得，终当有翕羽之雅，慰我嘤鸣。"[1] 三年后，在辛亥革命前不久，缪荃孙抄寄王夫之《儒统论》给张元济，意思是希望能将影印古籍一事进行，以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续。[2]

【1】《张元济致缪荃孙》,《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1270页第1信，商务印书馆，1997年。

【2】《张元济致缪荃孙》,《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1273页第6信，商务印书馆，1997年。

缪荃孙所希望于张元济者，已不是19世纪末那种缩印常用书，而是用手工纸按原大精印、线装，精细同雕版原本的珍稀古籍。当时出版者访得罕见古籍，以宣纸精细影印复印。因为实在可以乱真，版本家傅增湘曾经将古籍书芯前后的白页抽出，请商务印书馆影印宋版书。在二三十年代，有钱有米者莫不购买此类书，以附弄风雅。石印得以重兴，一批罕传本得以化身千百，读书人得益非浅，这是后话。石印印古籍，得力于照相石印技术的成功。

4. 前面提到石印业挤不掉雕版，有个很好证据。黄丕烈翻刻北宋天圣、明道（1023—1033年）本《国语》，为《士礼居丛书》之一。他刻士礼居丛书都是李福写字，土纸三开本。但往往能见到该书的土纸六开本，和洋纸六开本，即三开本的一半，也是李福字体。原来，上海石印缩印了黄丕烈本，被湖南、湖北的书坊以石印本作底子雕版。可见雕版的潜力。

三、胶印和珂罗版

胶印前面已简单谈到。珂罗版由德国人海尔巴托（Joseph Albert）在1867年发明。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将图画的照相负片反扣覆在涂有胶质感光材料的厚玻璃上，感光后直接可以印刷。这种方法依靠银盐的粒子接受和传递油墨。银盐的粒子远比前面提到铜锌版利用小孔成像原理照相时加网纹、获得由细小圆点构成的图像的粒子要细许多许多。所以珂罗版的层次稍逊于照片而已，印水墨画的效果极佳。成问题的是它的胶在玻璃上的附着力不强，因而一个版只能印100多张；而且版面做不大。

1875年传入胶印和珂罗版。在晚清出版业几乎没有利用。进入民国，有正书局等用珂罗版印过中国画册。胶印则主要印“月份牌”，即大画片。

第四节　图　　版

印刷除了铅字版，还有图版，在书报中或起辅助文字详细说明的作用，或起调剂活泼版面的作用。以前常用的有锌版和铜版，印刷界出版界称“铜锌版”。锌版用“单线平涂"构成；铜版有雕刻铜版和照相铜版之别。

雕刻铜版不是用刀刻铜，而是刻蜡：在平整的铜板上涂蜡，在蜡上勾图，然后刻：将不需要的部分用刀剔掉。刻好后涂酸性液体，没有蜡的部分被腐蚀，留下有蜡部分就是需要的图纹。因为雕刻铜版实际是刻蜡，所以虽细如毛发的条纹亦能刻出。

摄影术发明后，印刷界将之移植到制版，就发明了照相锌版。锌板上涂感光液，感光后，需要的线条感光变硬，不感光部分用水冲掉，再用酸性液体腐蚀。这种腐蚀法线条锌版1850年由法国人吉洛（F. Gillot）发明，到1872年改进后被普遍使用。

1881年美国人艾夫斯（F. E. Ives）、1882年德国人米生白克

(Meisenbach）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发明照相时加网纹，获得由细小圆点构成的图象。原图颜色深处圆点大，反之小，就形成了有层次的图象。就产生了“照相铜版”。后来用分色原理，又成“三色铜版”。因为锌板的结构粗，较铜容易腐蚀，所以不宜做照相锌版。

三种图版除雕刻铜版外，都在1900年稍后一些才被我国人掌握。雕刻铜版由王肇鋐在光绪五六年间留学日本学习舆图时，便中考求了制版技术，回国后用以印图。

除了铜锌版，还有应用很少的黄杨木雕刻版。黄杨木质紧密，可以任意雕刻而纤细不断，雕刻图画比雕刻铜版细腻得多。先将图画以照相感光蛋白膜移到木上，手工刻各式线条组成图形和层次。刻完后用电镀制成铜版印刷。它很早就在我国见到，创刊于1875年的“《小孩月报》，内容有诗歌、故事、传记、博物、科学等，插图均为精细的黄杨雕刻版”。[1] 这些版不是在国内雕刻：陈平原教授说，《小孩月报》“所用图像大都为英、美教会早年用过的陈版，近乎‘废物利用’”。陈先生此说是可以成立的。

【1】张静庐:《清末民初京沪画刊录》,《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297页。

除了凸版、平版印刷，还有凹版印刷。凸版印刷主要用于印刷书、报、刊。平版印刷以往主要用于画面为主的印刷品；现在使用电脑排版，平版印刷已成为印刷的主体。凸版印刷在纸上的着墨部分在印版上是凸起的。凹版则相反：着墨部分低于印版，——凹进去。它的制版原理同雕刻铜版相同：在铜板上涂腊，用缩小仪描绘原图，缩小仪的另一头就在铜板上刻蜡，然后腐蚀。印刷时，在印版上刮油墨，凹下去的线条被油墨填满，其余没有墨；将纸覆在版上，加压，线条中的墨转移到纸上，墨量大，干后线条明显地鼓出来。凹版技术要求高，成本高，因而不易伪造，常用于印制钞票等有价证券。

第五节　装帧形式变化

在19世纪末我国书籍的装帧都是线装。纸页单面印，对折，用线钉好。西方传教士虽然出书不少，或许用铅印，但也用单面印线装。像广学会的《万国公报》，1907年停刊。该刊自始至终是线装。大约是认为这种形式读者更容易接受的缘故。

日本研究我国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说，中文书改用“洋装”是1900年唐宝锷等日本留学时编写的《东语正规》，[1] 接着说到商务印书馆1903年吸收日资，进用日本技师后说，[2] 日本留学生的编译作品“虽然自称是上海印刷，实际上毫无疑问地是在日本印刷装订的。可是商务印书馆的书籍，却真真正正是在上海印刷和装订的，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3] 实藤多年搜集我国出版物，而且1937年及其后，“日本侵略军以查禁‘危险文书’为借口，从沦陷区各大学抢夺大批图书杂志运回日本”。[4] 他谈到我国近现代出版的具体情况时，有远较他人“优越”的条件。虽然他在日本被认为是位“中国狂热者”，他“自信是少数敬爱中国的日本人士之一”，晚年他说“我自己当时的潜意识其实与‘一般日本人’并无多大的差异。这都是明治以来蔑视中国的教育所造成的恶果”。他没有感觉到，明治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民众不仅有蔑视中国的教育，与之相应还有狂妄自大的教育。甲午后中国曾就近向日本有所学习，但仅仅是“借径”而已；中国的先进人士以其历史的宽广兼容传统向世界各民族学习。商务印书馆并不是1903年吸收日资进用日本技师后才开始改变装帧形式。早在19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洪赉编纂的收录四万词条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就是“洋装”。在山东皇华书局的经售书目中就记有《红皮商务书馆华英字典》的记录。这本词典现在还有，红色硬面精装；封面正中压有火印，是早已被毁的商务印书馆北京路馆址的门面。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出版的《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第49

【1】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52页，三联书店，1983年。

【2】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67页，三联书店，1983年。

【3】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68页，三联书店，1983年。

【4】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9页，三联书店，1983年。

页的北京路馆址图，就是根据这火印复原的。

中文书籍用线装或“洋装”，并不是先进与落后。装帧形式必须和用纸相适应，用纸则必须与纸张来源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线装是和我们国产纸薄、柔和、韧性大相适应的。用纸变化才有改变装帧的必要。而洋纸相当长时间一直比国产纸贵，我们现在还不富裕，一个世纪前更穷，出版必须为读者着想。我国的小学教科书，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经济好一些，才不再用手工纸线装，而用新闻纸两面印洋装。

第六节　纸　　张

纸张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缓慢，一直停留在手工阶段。手工纸一则厚薄不匀，机器印转速不能快；二则有纸毛，纸毛落在印版上就形成墨团。随着民族救亡活动的深入，出版物对机器印刷的需求日益增加，对机器纸的要求也随之增加。大致在光绪年间进口外国机制纸。但现在能找到的数字只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始的。光绪二十九年海关统计进口纸张用银2 684 437海关两。[1] 至宣统三年（1911年）分别如下：

光绪二十九年　2 684 437　光绪三十年　2 549 032　光绪三十一年　2 985 492　光绪三十二年　4 063 412　光绪三十三年　3 275 368　光绪三十四年　3 636 928　宣统元年　3 878 145　宣统二年　5 486 764　宣统三年　5 605 755

宣统三年为光绪二十九年的208.82%。以上数字据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转引自李伯嘉《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2] 这是辛亥前十年。另外戈公振有民元至1924年的数据，兹录如下：

1912年　4 323 712　1913年　7 169 195　1914年　6 670 261
1915年　6 335 045　1916年　9 528 637　1917年　6 294 293
1918年　7 243 564　1919年　10 212 652　1920年　14 159 186

【1】“海关两”是清代至1930年海关用的记账单位，各地不同，每两约合纹银1.05两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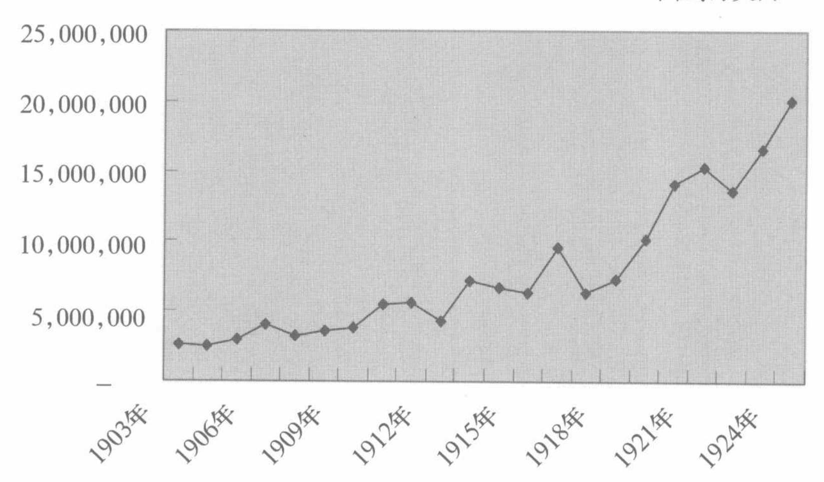
【2】李伯嘉：《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册，386页。

1921年　15 311 873　1922年　13 687 258

1923年　16 626 519　1924年　20 108 678[1]并以曲线图如下：

光绪二十九年至1924年纸张进口数量

单位:海关两



以1903年为100%，1919年为380.44%；以1912年为100%，则1919年为236.20%。

进口纸并非都是书籍纸，主要是新闻纸。由于穷，当时印书主要用新闻纸，藉此可见出版发展一斑。

进口纸虽然没有国产手工纸印刷时的毛病，但却留下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手工纸，其原料都用自然条件沤烂分解成纸浆，再抄制；没有其他酸碱添加剂，所以能很好保存。不要说考古发掘的汉代残纸，就算敦煌发现的唐代写经和印刷品就有千余年历史。而机制纸材料分解就借助于酸碱等化学品。浆化好以后，根据纸的用途调pH值，再抄制。一般说，用来印书的书籍纸的纸浆pH值调到中性，填充剂也多；不需长期保存的纸，如印报纸的纸，纸浆就不多花成本调酸碱度了。两者价格就很不一样。因为读者穷，晚清和民国时期，进口纸张主要是新闻纸和有光纸，这两种纸填充剂多质脆、酸性大，不能长期保存，但价格低。有光纸一面光一面毛糙，只能一面印，后来主要用来印小学课本。一面印，就只能用传统线装装订，直到1920年小学教科书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254~256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

才改用新闻纸。至于用新闻纸印普通书，建国前一直是“主流”。这些书报在图书馆里还保存着，成为图书馆最头痛的事，——目录上有书，都已经朽了，一翻就掉纸屑，特别是封面，订口处一翻就断裂。

第六章　在华教会和外国人的出版活动

西方传教士和在华外国人在我国土上的出版活动，对我国的近现代史有着绝不能轻视的影响。我国是被外国炮舰打开国门从而进入近代的；但在此之前，外国传教士已经进来，外国商人则更早。对这三者，特别对传教士的评价，不是本书的任务。而且这个题目的答案，是随着民族运动的历史进程的认识而变化的。哲学史家贺麟在1929年说过："我们须明白，民族主义运动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同外来宗教的宣传相敌对的；传教组织，不管它抱有如何无私和慈善的动机，一般都被看作是与民族发展不相容的。例如在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处于高潮时期，日本政府甚至会颁布一道法律，使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处于被迫害，甚至或被杀害的地位。但日本一获得独立，反基督教的情绪马上就消失了。"[1] 所以本章只简述此类出版物一般状况。

【1】贺麟:《基督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文化与人生》,158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外国传教士开始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我国来讲是异质文化。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就来到，至1911年的三百余年，西方文化的输入，始终环绕着两个平行的主题。一是西方人对我们的介绍，包括宗教；一个是我们为救亡图存向西方的寻找。两者各自独立，又交叉扭在一起。虽然都是自西徂东，但两者的性质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在本章只谈西方人向我们的介绍和目的，下一章谈我们向西方的寻找。

第一节　禁教时代英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

一、马礼逊来华

基督教新教最早来华是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马礼逊（Robet Morrison 1782—1834）。他于1807年9月7日到达广州，直到1834年8月1日逝世，他一直在我国禁教的法律下从事非法的传教和文化活动。因为清廷禁教，能在澳门居留的外人怕惹事，都不欢迎马礼逊："马礼逊面临中国政府禁止传教、英国东印度公司反对非公司英国人居留中国，以及天主教的葡萄牙澳门当局抵制三方面压力。后来他设法担任东印度公司中文翻译而得以在澳门—广州间居住，但传教方面依旧困难。他除了向数名雇佣的华人助手与佣仆宣传，只能随机散发1810年暗中出版的《使徒行传》。"[1] 这些书"为逃避官厅注意，书面上用了假书签"。[2] 马礼逊来华前"被要求集中精力掌握中国语言的基本知识，目标是能胜任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工作"。[3] 他为此而在伦敦接受汉语初步知识的时候，公理会牧师莫斯利（W.Moseley）在大英博物馆发现了1737—1738年在广州翻译的《圣经》手稿，"包括译成中文的《新约》主体部分"。[4] 马礼逊把这份译文抄录了。

【1】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153页，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上册，2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42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

【4】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43页，大象出版社，2002年。

马礼逊在澳门一面向中文教师学中文，一面从事两项工作：继续翻译《圣经》、编写宗教宣传小册子和编写帮助外国人掌握中文的语法书和词典。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后者更有价值。

既然在中国无法公开传教，就从事"无声却有效"的文字著述。现在可以见到不少于18种篇幅大小不等的文字宣传品：伟烈亚力编纂的早期传教士书目中马礼逊有13种中文书刊，台湾苏精先生据英国各图书馆藏品，补充成18种，其中四种为世俗读物。四种世俗作品为：《古时如氏亚国历代略传》，1814年木刻；《西游地球闻见略传》，1819年木刻；《大英国人事略说》，1832

年马六甲木刻；《杂闻篇》共三期，均1833年，每期四页，澳门铅印；《杂闻篇》“全书以马礼逊儿子马儒翰督工逐字雕刻铅活字印，梁发排版，屈昂与子印刷”。[1] 马礼逊的世俗文字活动，可说是明代耶稣会士和后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文字活动的承上启下者。1867年伟烈亚力编的早期传教士书目，截至当时，338名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一共出版490种中文书刊，其中世俗出版物116种，中间有12种次阴阳历对照表是供外国人用的，有32种是介绍外国史地，13种医药书。介绍外国史地不仅专书数量大，在他们办的期刊中所占篇幅也很大。用意当在使我国人民对陌生宗教的国家“不太陌生”。

[1]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53页，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

二、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开辟

1813年伦敦会派米怜（Willam Milne 1785—1822）来华协助马礼逊。米怜同样难于在华立足。明末耶稣会士是合法活动，所以和上层人物打交道，卓有成效。新教传教士在秘密状态下活动，上层人物格于禁令，攸关身家性命，不敢和外国传教士人交往。马礼逊他们能接触到的都是底层人。他原以为文字宣传是“无声却有效”的方法，其实毫无穿透力。19世纪初，我国的识字人口率极低，和他接触的人基本是不识字的。收下宗教宣传品后的阅读理解完全等于零。他在华27年，亲手施洗的华人仅仅4人，都是他雇用的人。基督教宣教的成绩指标就是施洗登记。对华人传教文字只能是辅助，主要靠面对面。所以米怜来华后，两人商量，前往华人集中而官方无法控制的南洋活动。米怜考察后确定以马六甲为中心。后来在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有四个布道站，同时成为中文传道书的生产地。他们编纂的第一种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图17）就在马六甲诞生。

（一）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米怜编辑，于嘉庆二十年七月创刊。国内丝毫没有踪迹。据戈公振《英京读书记》，该刊共出七年，



图17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封面

除第一年出6期，第二年出8期，余均年12期，凡74册。熊月之先生说共出七卷，八十多期。戈说每册五页，共574页，一处说524页。熊说每册七页。期数和页数无碍大局，要紧的是内容。熊月之说，该刊“80%以上篇幅，刊载的是基督教教义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内容；不到20%的篇幅刊载世界历史、地理、天文、民情风俗等方面的知识”。他又提到“《察世俗》所介绍的天文学说，已不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而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杂志以浅近的文字清晰地说明，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说明太阳、静星（即恒星）、侍星（即卫星）的特点。说明日食、月食发生的原因，同时辅以插图，揭明其理”。[1]明末耶稣会士来华时，不敢介绍哥白尼学说，介绍了稍后的第谷体系（Tychnic system），既保留了托勒密体系中的地球中心说，也具有哥白尼学说中所有其他行星都绕太阳公转的内容。第谷体系被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接受，已动摇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此时哥白尼学说的被介绍，普及了最正确的天文学说。

（二）《特选撮要每月纪传》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因为米怜病故而停办。后麦都思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该刊于1823年7月在巴达维亚创刊。《特选撮要每月纪传》有篇麦都思的《序》，说“弟要成老兄之德业，继修其功，而作文印书……弟如此继续此察世俗书……此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实际不完全如此。白瑞德在他的《中国报纸1800—1912年》（Roswell S.Britti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年）中说：“其实，米怜的杂志（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引注）主要是一种理论期刊，麦都思的杂志（即《特

【1】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选撮要每月纪传》——引注）是一种教科书式的期刊，郭施腊的杂志（即《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引注）是为西方文明辩护的宣传品，它试图用一种不可冒犯的姿态展示欧洲文明的优越性。”白瑞德看到这三种在《江宁条约》前最重要的刊物的全部。可以相信他的分析。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创刊，至1826年停刊。戈公振说：《特选撮要每月纪传》“此报存道光三年六月、八月二册。每册八页，木刻竹纸印”。

三、中国国土上最早的期刊

（一）《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图18）创刊于广州，是国内第一份中文期刊，由普鲁士传教士郭施腊创办。该刊的出版情况说法极多，除了它道光十三年六月（癸巳，1833年8 月1日）创刊一条外，其他情况说法就很不一样了。该刊现存实物比《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要多，海外有148本，国内有5本。这153本除去复本（包括再版），共有33期。最近黄时鉴先生设法将哈佛大学藏39期（其中6期卷号虽不同，内容与33期中的相同）组织影印，为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功德无量。该刊虽名“每月统记”，头3年的刊物，不像期刊那样按时出。可以肯定，该刊5年实际只出33期：道光十三年（癸巳年1833年）6、8—12月，6期；道光十四年（甲午年1834年）2—5月，4期；道光十五年(乙未年1835）5、6月，2期；道光十七年(丁酉年1837）全年12期；道光十八年（戊戌年1838）1—9月，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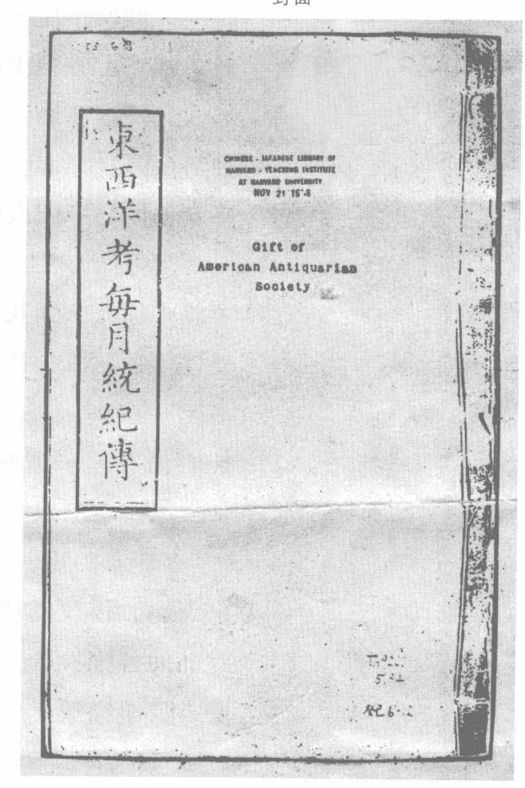


图18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原刊封面

郭施腊办刊并不认真。如1833年6月（农历，下均同）创刊，7月号除封面不同，

内容与6月号完全相同。1835年1月号也是除封面外内容和1834年2月号完全相同。2月与3月同；3月与4月同；4月与5月同。这6期重复的加33期就是39期。重复的各期，版面相同，仅书口上的页码都改动过。可见是用雕版。该刊字体用楷体而非明体。

（二）办杂志的真正目的和经费来源

该刊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六月创刊时有一篇序，至乙未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六月停刊。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正月复刊，又有一篇序，至戊戌年九月停刊。两序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不值得花我们的版面。但是，郭施腊在1833年6月23日为该刊筹款给在华外国人的信，实在是私房话，充分证明了白瑞德所说该刊是"用一种不可冒犯的姿态展示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在满口友善时私底下说些什么。郭施腊在信里说：

"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即使排斥异见的印度人也已开始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依然故我。虽然我们与他们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

"本月刊现由广州与澳门的外国社会提供赞助，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用巧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因为熟知外国人与地方当局关系的意义，编撰者已致力于赢得他们的友谊，并且希望最终取得成功。

"至少在几个月内，不会有很多中国人重视一种如此性质的出版物，仅仅期待他们有限的支持。鉴于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对此间外国社会全部成员具有共同利益，编撰者希望各位订购，使有足够经费。

"订阅限订6个月，每月至少1期，总共投送7期。每期将超过

20页，并附有地图、插图、地理与天文主题等类。如果此事得到社会支持，它将再增加一些内容。”[1]

私房话清楚地说明，办刊是为教育中国人懂得天外有天，不要妄自尊大；是为维护在华洋人的利益。但他所指出的当时国人因长期闭关形成的自大心理也是事实。

[1] 郭施腊1833年6月传单，从 Roswell S.Britti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1933 p.25，汪家熔译出。

四、中国益智会——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合作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道光癸巳（十三年1833）创刊，到道光乙未（十五年1835）六月的各期封面左下角署“爱汉者纂”。“爱汉者”是郭施腊的笔名，应看做是他个人办的刊物。从道光丁酉（十七年1857）正月复刊后，封面不再署编纂者，应该说是改由“中国益智会”办了。广州的外商，在1834年11月29日成立“中国益智会”，郭施腊是积极参加者，并任中文秘书。此会之创立标志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在对华文化上的合作。《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7年开始由中国益智会接办。《中国丛报》卷七转载“中国益智会”关于接办该刊的报告，其中并说：“郭施腊先生的中文《统纪传》共12号的1 000份重印本已托给本会在新加坡代办。”这“12号”就是1833年（癸巳）出的6期，1834（戊戌）年出的4期，1835年（乙未）出的2期。显然在1837年转交中国益智会时重印过。1837年后具体执行编辑是谁不清楚，但在上述报告中说：“而后，此中文《统纪传》的出版由本会主办。会中中文秘书，以及若干相当成员提供篇章……此刊与本会所有其他著作均在新加坡出版，所以宜在当地找一位编者。”但在复刊序中强调要继续介绍历史，郭施腊是主要供稿人。

根据上述报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7年后似乎是改在新加坡出版，实际应该说是烟幕。据当时情况推断，《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编纂地仍有可能在广州。有一个重要证据：在丁酉年（1837年）十二月，新闻栏有广州新闻，接着戊戌年正月、二月、三月、五月、六月、九月新闻栏也都有广州新闻，突出广州。戊戌年（1838年）2月号“新闻”中《广州府》文中

有“今省城之贸易渐盛”字样。说“省城”而不加省名，或证明在本省。

第二节　《江宁条约》后传教士的出版活动

一、中国有权保护领土

鸦片战争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城下之盟。有句“发明权”属于英国商人的话：“大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英国人说我国“闭关锁国”是支持它“侵略有理”。清廷为了攻灭南明，1655年下令禁海，台湾问题解决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设立江（沪）、浙（宁波）、闽（厦门）、粤4海关。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禁止中国商船往南洋贸易（但并不禁外国商船来华），10年后雍正五年再开海禁，直至1840年再没发生过海禁。仅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根据上谕，广州改为欧洲人被允许贸易的唯一口岸。所以这样，咎由英国自取。“1635年威忒指挥的船队在英国组织时，英王查理一世在颁给威忒的皇家委令中，就指令他在中国等处航行中，‘如果发现任何机会’，就要‘把他们可能发现的和认为对英国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这个图谋这次航行虽未得逞，但力谋在中国沿海占据一块地方作为扩大侵略的根据地，却是无时或忘的。”[1]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突然派出拥有大量武装的船只到他们多年未到的宁波，说是广州规礼重、货物买价高。当地官员第一年很欢迎；发现他们“留恋”舟山，第二年便深感疑虑，怕成澳门第二，所以经朝廷批准后，将宁波税额提高到倍于广州。但也没有使英国人重返广州，所以二十二年颁出禁令，英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不准入浙江海口”。[2]　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决定何处口岸可以通商，在他人窥伺时完全有权撤消江、浙、闽三关。决定仅限广州一地可以停泊，这与防务有关——因为原有四口，只有广州是驻防大臣所在地，有

【1】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112~1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9~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严中平:《中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前言、1~9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重兵。

二、炮舰借助传教士打开中国大门

《江宁条约》实现了查理一世“对英国有利益、有荣誉、值得据为己有的一切地方，占据下来”的希望。“五口通商”的五口开港，则离不开被白瑞德说“展示欧洲文明的优越性”的郭施腊。他在1833年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前，正被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聘为“北上沿海调查”的翻译。他侦查我沿海防务后，“力主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海口”。[1] 战时郭施腊是英军情报官，谈判时是翻译。《江宁条约》满足了英国商人通商要求，传教自由则没有同意。道光廿四年（1844年）十月初二《批答佛兰西求弛天主教禁谕》中说：“以天主教来自西洋，在中国并未指为邪教，亦未尝严申禁令。”[2] 所以又要允许、又不能在条约内解除禁教，既要允许、又不能解除中国人与外国接触。好在外交自有办法。《江宁条约》第二条：“恩准英国人民带同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于是，先前嘉庆十年（1805年）四月《申明例禁西洋人刻书传教上谕》中禁止国人信教、帮助刻书的禁令也就一风吹了。

（一）早期传教士的出版物概况

1843年10月8日《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签约后，马礼逊在马六甲等地的后继者马上移到香港和上海。《望厦条约》后，美国、法国传教士也蜂拥而至。他们都用文字辅助传教，就形成了在我国国土上的一种外族出版。这种出版物由于不被传统学者认同，而且大多在劳动民众中传播，没有一个保存系统，现在国内能见到的极少。只能在当时西方学者的著作中和国外图书馆藏品中了解大概。熊月之先生搜罗、还原有几个当时的书目，现整理数字如下：

【1】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1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6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843年至1860年六地在华教会和外国人的出版物分类表*

地区	总计	宗教书	历表	自用书	科学书	便民书	期刊	启蒙书
香港	59种	37种	11种	2种	3种	1种	1种	4种
广州	42种	29种	4种	0种	9种	0种	0种	0种
福州	42种	37种	1种	0种	4种	0种	0种	0种
厦门	13种	12种	0种	1种	0种	0种	0种	0种
宁波	105种	92种	0种	1种	10种	1种	1种	0种
上海	171种	138种	10种	2种	18种	0种	1种	2种
合计	432种	345种	26种	6种	44种	2种	3种	6种

*注：本表数字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148～213页的书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分类不尽同。

表中是品种数字，不能表现确切的信息量。譬如宗教书，几页的小册和几百页的《圣经》都算1种。宗教书实际有两类，大量是宣传基督教教义，小部分是批判我国的扫墓、寒食节、奉祀等不合基督教教义的风俗。历表是阴阳历对照表，显然是为宗教服务，——注明星期，便于信徒不忘礼拜。此外，还带有常识性的文字。所谓“自用书”，指介绍汉语知识、方言读法、汉语词汇读法等，显然是供外国人了解我国用的。44种科学书，包括一些经商知识。广州居民很长时间是排外的，所以“在广州的外国人只有冒着不断的挑战式的侮辱，才能越出商馆限定范围之外，只有冒着被殴打和可能受伤的危险，才能到甚至极短距离的乡村里去”。[1]

【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401页，三联书店，1957年。

当时新教的传道辅助手段有二：一是散发宗教宣传品，一是行医。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说：“惟我西医远涉重洋，于五港设立医局，专为华人送诊送药，联中西之好。”[2]最早合信就在广州设惠爱医院服务，亚罗号事件引起的排外浪潮中他撤到上海。他和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多有医书。此外还有讲简单天文和外国史地的。

【2】合信：《西医略论·序》。

（二）第一个外国印刷机构和成员

墨海书馆是英国伦敦播道会在上海成立的专门的印刷机构。

它的英文名称为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Mission Press, Shanghai。意译为“伦敦播道会上海印刷所”，中文名称“墨海书馆”。它的任务自然是印刷包括《圣经》在内的宗教宣传品。墨海书馆出版的世俗出版物虽然并不多，却开创了一个时代。

上海开埠是1843年11月17日，墨海是当年在上海成立的，而且还早于11月。能这样快是因为它的筹备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他从1822年就一直在巴达维亚等地从事中文书刊编写与印刷的工作。他自然是伦敦会管理中文印刷的行家里手，而且早在1835年他就非法潜入上海活动，让他筹建墨海书馆自然是最合适的。他著有50多种中文传教书，其中《天理要论》的前八章 (全书共二十四章) 曾被太平天国大量翻印。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的时间大致到1847年，此后由伟烈亚力接替管理。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1815—1887)，“1847年来华，任伦敦会印书局监督，1863年调往大英圣书公会任职。”[1] 从《王韬日记》中看，他就住在墨海书馆楼上。他为了推销《圣经》，走遍了大江南北。1877年因眼病回国。伟烈亚力自己除有众多有关我国的著作外，还使墨海做了很多世俗书的出版工作。

【1】《中华归主》，下册，10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墨海书馆出版世俗图书应该排除与麦都思的关系，他从1844年在上海出第一本书到1857年回英国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与世俗都没有关系。同时，有一点可以肯定，墨海书馆出版与伟烈亚力关系密切，——他自己和我国学者合译过几种重要的科学书。

在翻译科技书方面与墨海书馆有关系的外国人除伟烈亚力外，还有：

艾约瑟 (Joseph Edkins，1823—1905)，1848年来华担任伦敦播道会上海代表，墨海自然属他管辖。他直接参与墨海的译著并不多，但他是后来益智书会和广学会的重要撰稿人，曾经担任总税务署翻译，极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西学启蒙十六种》是他的译、著，由英国人掌管的中国海关出版。

韦廉臣和慕维廉也是从事世俗出版物的重要分子。他们虽然

在墨海的活动不多，但韦廉臣（Alexander Willamson，1829—1890）后来组织同文书会，同文不久发展为广学会，与我国的近代化进程关系极大。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1855年来华，在上海传教，他著译有很多中文书。

此外还有一位叫美魏茶（Charles William Milne，1815—1863），他就是著名的创办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米怜的儿子，生于米怜夫妇当年前往马六甲的航行途中。父亲病故后他回了美国，1839年来华从事《圣经》翻译工作，与王韬关系很好。

另一位叫艾迪谨，1850年后在墨海约有七年时间，从事中西合历的编纂工作。这是一种阴阳历对照年表，一年一本，供查对用，后来由同文馆出版。在墨海出版的时候，表中还用中文附一些现在可称为“小常识”的文字，其中没有宗教宣传。在1893年的《万国公报》上还查到有艾迪谨的文章，其他就不清楚了。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合信。他是伦敦播道会派来的传道医生，1839年来华，一面为传教士治病，一面利用给中国人治病的机会传道。他1839年来华后在广州西关外金利埠开设惠爱医院，行医余暇写了一本《全体新论》，由陈修堂笔述。这是一本生理卫生著作，名为十卷，其实篇幅不大。明末耶稣会士所著书里也有这类书，如邓玉函著《人身说概》两卷，但流传不广。而合信的《全体新论》完成后极受士大夫重视，1851年由墨海书馆刊印，次年又被广东番禺潘仕成收入他所辑刻的《海山仙馆丛书》中。两广总督叶名琛曾“取《全体新论》图，分列八幅刊于两广督署，并翻刻全书，广为传播。盖中土士大夫皆知为有用之书”。[1]

【1】合信：《西医略论·序》。

合信除宗教书籍外，有《博物新编》、《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五种世俗著作。1855年墨海又为合信出版了《博物新编》，连同《全体新论》共五种，版式一样，字体一样，称“合信医书五种”。合信自然也为外国人看病。1858年外国商人因为合信将回国，曾为酬谢他而新刻“合信

医书五种”。合信说：1858年“西人在沪贸易者取余前后所著各书汇印千本，广为流传”。[1] 见到过合信的三种医书，内封都印“上海仁济医院藏版”。王韬在他的日记中对合信著作评价极高。


图19
李善兰

（三）早期的中国合作者

当时翻译由外国人口译，还要中国人笔录修润。

墨海书馆世俗书刊的笔述合作人最重要的是李善兰（1811—1882）（图19）。他是浙江海宁人，字壬叔，自幼于数学有奇才，自己说：“于算学用心极深，其精到处自谓不让西人。”（同治六年自序）后来在江南制造局和他合作的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也说：“另设西国最深算题请教李君，亦无不冰解”。他1852年到上海，和伟烈亚力合译明末利玛窦和徐光启所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利、徐仅译了前六卷讲平面几何部分)。译了一半后又同时与艾约瑟合译《重学》，“于是朝译几何，暮译重学，阅二年（1857年)同卒业”。又与韦廉臣合译植物学，此外还译过《代微积拾级》、《代数学本》和《圆锥曲线论》。他最得意的除《几何原本》外就是约翰·侯失勒的《谈天》一书。在即将完成的时候，他对朋友们自诩：“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梅定九恐将瞠目乎后矣。”[2] 到19世纪末，梁启超在《最初应读之书·西学门》里共列了七种书，就有《谈天》一书，20世纪30年代《万有文库》里还收辑了这个译本。他在墨海书馆七年多，共译了七部书，都是很系统的著作。据记录，李善兰在1859年4月还译过《摄影术》一书，但笔者没有查到这本书；同年他还自著《火器真诀》一卷，以几何原理解决火器命中测算术。同治年间均有金陵刻本，当为曾国藩军中需用。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在书馆同译过《奈端数理》，即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刚译不久，书

【1】合信：《内科新说·序》。

【2】王韬咸丰九年三月十八日日记，《王韬日记》，109页，中华书局，1987年。

馆就结束了，后来两人都到江南制造局译书处，继续译；不久李善兰被调到北京同文馆执教，就停下未能译完，已译的稿件下落不明。

第二位当推王韬（1828—1897），他从1849年夏到1861年一直在墨海，连家眷都住在墨海。十多年他从事译述校对各事，大概属于宗教的居多。他当时对基督教并无信仰，因而对这类文字毫无感情，他说：这些书"支离曲学，非特复瓿糊窗，直可投诸溷厕"（致朱雪泉舅书）。大致到1857年《六合丛谈》创刊，他始参加世俗文字的翻译。后来印的《韬园西学辑存六种》，除《泰西著述考》外，其余《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西学图说》、《西学原始考》《华英通商事略》都是那时翻译秉笔，共八万多字。王韬在《西学辑存六种》跋文中说，他和艾约瑟译《格致新学提纲》附于中西合历之后，可见其内容属常识性小品。

管嗣复，字小异，金陵人，晚清古文家管同的哲嗣。约在1857年冬为艾约瑟游苏州邓尉山赏梅花时碰到，请到上海，和合信一起笔述医书三种。

活动时间不长的还有几位：

蒋敦复，字剑人，江苏宝山人，南汇慧南书院肄业。他精于词章，著有《芬陀利室词集》。词集的《前序》和所附《杂录》说，大约在1857年冬，他曾帮慕维廉翻译《大英国志》。

张福僖，浙江湖州府人。《光论·自叙》中说："咸丰癸丑（三年，1853年）艾君约瑟聘予在沪绎天算格致诸书，《光论》此其一种也。"有没有其他，不清楚。

陈萃亭，浙江嘉兴人。王韬日记1858年10月25日记："渠于咸丰二年（1852年）冬间至沪，在伟烈君处抄胥。"抄什么没有说。"伟烈君"可能是伟烈亚力。他所译各书，唯独出版于1853年的《数学启蒙》的合译者未见著录。徐维则《东西学书录》说该书"最便初学，但语太简洁"。简洁的文言必有人帮助修润，从时间看，有可能是他。

郭友松，事迹不详。《韬园老民自传》里提到他在墨海呆

过。邓文钦，字子明，金陵秀才；周白山，字双庚，都曾帮助慕维廉译书。周白山呆的时间不长。

墨海的书除几种医书外，大都属天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至今没见有存世的版本。如《几何原本》后九卷即由松江韩应陛出资刊刻，《重学》由江苏金山人钱熙辅出资刊刻。此外《光论》、《大英国志》和《圆锥曲线论》等书至今也没有发现墨海刻本，更无铅印本。

至今为止，墨海人翻译的世俗书刊除仅合信医书有1本墨海本外，所有的都是用雕版。这可能和这些书用西法凸版印制图版制版技术解决不了有关。墨海确有铅印。以前伯熙所著《老上海》一书里录有无名氏诗："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确证有用牛作动力的机器印书。读王韬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记，知道该诗系嘉兴诗人孙次公所作。当天他参观墨海后所作。最后一句是"不耕禾陇种书田"。"耕"字不重出。又，当时黄钧珊也著有《咏墨海馆》一绝："牍题墨海起高楼，供奉神仙李邺侯；多恐秘书人未见，文昌火焰借牵牛。"是说李善兰在墨海译书和墨海用牛作印书机动力。李善兰有一首诗记他自己在墨海的事："小谪尘寰二百秋，偶抛瓢钵梦封侯；而今托迹侏离馆，翻尽奇书又白头。"

（四）墨海书馆的期刊

墨海书馆在咸丰七年（1857—1858年）发刊《六合丛谈》月刊，除伟烈亚力发刊词外，则全用铅活字印刷。该刊的英文刊名为"*Shanhae Serial*"（见于每期英文目录页）。咸丰七年丁巳正月元旦创刊，逢阴历朔日出一期。丁巳闰五月，所以全年共出13期。毛边纸线装，幅面约书籍纸32开，每期约十余页。最少连封面13页，最多18页。全年188页，平均每期14.5页。每半页14行，行28字，铅字排印。该刊在每期封面署"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是极少见的在书上署墨海"印行"的书籍。

熊月之先生在牛津大学见到该刊咸丰八年出版的两期；最后一期有宣布"暂停出版"的告白。

（五）墨海消失之谜

到19世纪60年代，没了墨海书馆的影子。可能因为失火：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说李善兰所译《代数学本》共13卷，“上海墨海书局刊，不戒于火，仅存第一卷”。当时美华书馆已从宁波迁到上海，美华技术力量雄厚，伦敦会自无必要恢复自己的印刷所。这是孤证。还有相反的另一则孤证值得注意和考释：1891年《万国公报》由广学会接办并成为月刊后，在它的内封阴面，常有欢迎投稿，欢迎订阅的广告。前后所见，关于订阅的有：

“如欲阅报，请至虹口墨海书局韦廉臣先生处商定可也。”但1891年2月至1892年7月，则写“如欲阅报，即请函致麦家圈墨海书馆慕维廉先生可也。”18期刊物上这么写着，而墨海书馆地址在上海山东路福州路，那一带因为当年麦都思在那儿买地，群众称该地为“麦家圈”。但谁也没有提过1860年后墨海书馆出版的书或印件是什么。有待智者释疑。

墨海书馆的材料已经散逸，只有一些图书的序跋和书目中存有一些记录。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王韬1858—1863年断续四本日记，才为墨海勾勒出一个粗轮廓。王韬另有对了解墨海更重要的1849—1855年日记六本在台湾，如果能见到那六本，墨海的情况就更清楚了。

第三节　外国人的常识书籍出版活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的译书相对寂静。

到1877年在华各基督教会鉴于各自有一些学校，而无力各自完成需要的课本，决定成立一个协调组织。它的英文名称叫“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中文称“益智书会”。这个委员会由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丁韪良、黎力基、傅兰雅组成；主席是丁韪良。委员会决定由傅兰雅负责编选一套初级，林乐知编选一套高级，两套课本。课本内容包括初中级数学、天文、博物、理化、历史、地理等普通知识。编写方针是结合中国

习俗，兼顾教师能教、学生能学，兼顾非教会所办学校能采用；要科学和基督教义相结合。但傅兰雅反对在科学书籍中掺杂宗教。

益智书会是个委员会，没有常设机构。它的活动之一是在各基督教组织已出版书籍中选择可作课本各书印刷。另外是请相应人员翻译、编写，力图整合成体系。但首先它不能确定学校学制和课程设置，其次参与委员会的人员不多，愿意而又有能力编写的更少，所以到1890年为止，被认可的虽有近百种书，却并不成体系。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采录益智书会本计34种，其中列入“西学诸书”30种，“西政诸书”4种。“西学”者，数理化和医药；“西政”者，历史和其他。

益智书会各书，大多属初级。除几本国别史外，并没有其他可称高级的书。并不是林乐知失职，而是客观上并没有相应的学生需要；传教士中又不一定有能写各科各级课本的行家。光绪二十八年清廷颁布壬寅学制，次年主管新式教育的京师大学堂发布《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门。在算学门、博物门、理化门、地质矿产门中入选的有狄考文的《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傅兰雅的《动物须知》、《植物须知》、《全球须知》、《重学须知》、《力学须知》、《电学须知》、《声学须知》、《光学须知》、《气学须知》、《水学须知》、《热学须知》、《金石略辨》和不具名的《地学指略》等16种益智学会的书。但京师大学堂这个“学堂应用书目”完全是为了应付差事，它所推荐的各书，并不符合壬寅发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列有的各级学校的各科课程。如“声、光、化、电”课程，在大学和京师大学堂才有，而傅兰雅的各种“须知”是很浅显的书，只能供读完蒙学堂水平的读者使用。

当时还有美国长老会办的美华书馆。美华书馆出过一些书。但它对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影响，集中在铅印中文铜模和组织中文铅字字盘的贡献上。

第四节　广学会政治书刊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历史自鸦片战争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甲午战争的失败才形成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形成，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其中之一是西方思想的冲击。在甲午前，除王韬、郑观应外，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也已提出改变政体的主张。如陈炽，在甲午前陆续发表、后来结集为《庸言》的系列文章中已提出设“乡官”，“仿外洋议院之制”；认为议院“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官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1] 说明传教士的工作在读书人中的影响日益增大。其中广学会的影响不能低估。

【1】陈炽：《庸书》，《戊戌变法》(一)，234、2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

一、同文书会和广学会

传教士的工作从介绍科学知识转入政治常识，应该说开始于1884年在上海成立的“同文书会”。上海同文书会英文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意思是“在华人中传播基督教和普通知识协会”。1892年中文改称“广学会”。1905年，它的英文名称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意思是“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表示他们的活动和政治脱钩。同文书会和后来广学会的成员构成成分不像益智书会那么单一，包括有在华外交官、商人、传教士。

同文书会是来华外人对华宣传的联合体，它的工作对象和出版物内容和以往外人做法很不同：出版物不再注重于普及常识，而是政治书刊。读者已不再是一般民众，而是“供应比较高级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更有才智的阶层”当然指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灵魂，并实际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处着手”。他们

已了解，我们国家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一踏上他们的国土就会感觉到这些，并且导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定要利用出版物”。[1] 书会总干事是韦廉臣，1890年他病故，同年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接任。李接任后在年底有个题为《我们工作的必要和范围》的内部报告。将原来提的“更有才智的阶层”具体化为县及县以上包括学政在内的官员和秀才、举人、进士44 036人，将他们作为工作对象。[2] 他有七条“计划采取的方法”，因而书会的出版物进一步政治化。方法第一条是“举办高级期刊”，所以按韦廉臣生前计划，将原来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变为他们的会报，并增加其政治成分。《万国公报》1892年集中发了《广学会序》（2月）、《分设广学会章程》（4月）和《广学会问答》（7月）3篇文章。其中《分设广学会章程》的中心意图是吸引中国读书人参加他们的活动。

【1】韦廉臣等起草：《同文书会发起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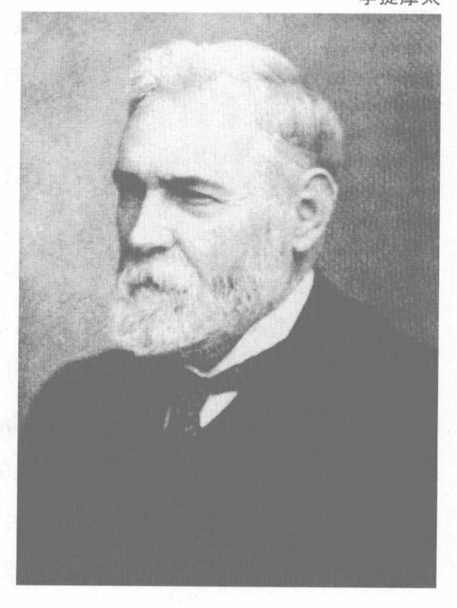
【2】李提摩太：《我们工作的必要和范围》，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20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二、李提摩太和他的《万国公报》

广学会成立后，成为西方在华宣传重镇。李提摩太（图20）担任总干事后，一则由于他的思想和能量，二则由于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复兴任务更加尖锐，广学会出版物对我国的影响为以往所有外国人宣传所难比拟。它将《万国公报》（图21）作为前哨。如《泰西新史揽要》，开始在《万国公报》刊载，受到李鸿章、张之洞的注意，张之洞还捐银1 000两给刊物，[3] 使该书翻译速度加快，并很快出版单行本。

【3】《万国公报》1896年11月号，内封页阴面广告说：“是以楚督张公特属译录华文，以公诸世。”

图20
李提摩太



《万国公报》的最前身是创刊于1868年9月的《中国教会新报》。主要宣传基督教，有些世俗事的杂录，偶尔有些科学知识。1872年第201卷起改名《教会新报》，减少宗教内容，增加世俗内容。从1874年9月第301期起改名《万国公报》，仍是周刊。1883年7月出至750期，林乐知因为中西书院



图21
《万国公报》内封

的事务而将它停办。6年后光绪十五年正月（1889年2月）同文书会将之复刊。《万国公报》的复刊，韦廉臣有篇《公报列于书会缘起》，讲该刊有益读者，总的目的"既将万国所报播传中国"。具体有十大益处：广见闻、增衣食、利财用、便商贾、育人才、明格致、增王法以守本分、溯本末以延生命、展伦常以联疏远、明天德以启愚蒙。[1] 并且再次表示传教士来华别无他图，云云。很明白，"从他们处着手"，为的是"要影响整个中国"。这是观察《万国公报》、观察广学会、观察当时运用文字的外国人的基点。

三、《万国公报》中影响大的文章

《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较有分量的文章都结集单行本，可从它的单行本了解。它自己说："今年以来，各省岁科考场、各处书院兼考时务策论，视制艺诗赋为尤重，广学会新译《泰西新史览要》、《中东战纪本末》、《时事新论》、《文学兴国策》，场中如考新学，舍此无以运典。"[2] 这点并没有夸大，舍此别无他书。另外，德国人花之安的《自西徂东》，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也是很有影响的。

（一）《自西徂东》

《中西关系略论》批评我国的"今不如三代"的尊祖法古认识传统。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只有法古思想动摇了，才有接收外来制度的可能。花之安的《自西徂东》英文名"*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直译为《文明，中国与基督教》。在1868—1883年林乐知个人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共72个小题，分隶"仁、义、礼、智、信"5个大题，每题1卷。这5个字就是董仲舒所说："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读者很容易接受。一般每

【1】《万国公报》第14号，1890年3月。

【2】《万国公报》1896年11月号内封页阴面广告。

小题先说明该事的重要，然后说我国在这些问题上的不足，再介绍西方做得好，进而建议仿行。

他批评我们的不足，和其他传教士一样，很多是很好的意见。但他用的其参照系有些是可以商量的。抨击汉族痼疾当然应该有参照系。但任何作为参照系的异质文化都不能越俎代庖、充当衡量汉族文化的唯一标准。世界各民族间的交往是互相影响、促进的重要途径。这种交流都是遵循择善而从的规律，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适合自身发展的部分是唯一可接受的原则。文化交流中不能用置换的办法，如果置换成功，意味着那个接受民族已经死亡。西方传教士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个误区：唠叨他们的读者守旧顽固，拒绝先进文化。看不到中华民族从来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但绝对拒绝“置换”。元代、清代几百年统治不能改变国人。佛教在我国的流传和利玛窦的成功，就在于承认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合理性和吸收新元素的必要。我国人相信礼俗可以不同：“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越王句践，劗法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由是观之，则趣行各异，何以相非也！”[1] 可见新教传教士著作用基督教教义作批评的唯一尺度是不妥的。如花之安在“礼卷”第39“齐家在修身”小题，讲夫妇之道。我国当时的婚姻制度有很多不合现代规范，可以批评，但他的批评不是从平等、自主等人文观念出发，而是从基督教教义出发。类此，不能不说是败笔。所以，他们的著作不仅没有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引发反感。1843年第一宗教案“青浦教案”就是麦都思散发书籍引起的。

安之花在“义卷”第27、28“明正道权”和“臣道总论”，讲为君和为臣所应遵循，会有很多话值得他们说。但花之安讲为君为臣之道，实在无法望李提摩太项背。李提摩太在戊戌二月至六月间，发表了一本《帝皇初学》。虽然只有光绪帝一人有资格

[1] 刘安：《淮南子·齐俗训》，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74~175、185页。

读，发行数却达四千！这本小书太重要，后面将详谈。

（二）《泰西新史揽要》

《泰西新史揽要》是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的麦肯西的《19世纪史》（Robert Macknzie: *His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在连载时称《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当时中文只有有限几本国别史，没有近代世界史的译本。梁启超当年在《西学书目表》中在该书书名上加3个圈，认为非常好，并在附注栏说“书极佳，译笔略冗”。在《读西学书法》中他说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书中最佳之书也。惜译笔太繁，易眩耳目。苟得能文者删润之，可去其半。”[1] 后来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小楼编译的《读新学书法》中该书著录的是“《新史揽要节本》，李提摩太译，周庆云节本”。有节本，或见梁启超所说之合理。该书有35万字，共24卷，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书。第一卷名为“欧洲百年前情形”，实际讲18世纪法国。第二、三卷讲拿破仑事迹。四至十三卷讲英国和它的殖民地。十四、十五卷讲法国大革命。此后各卷讲欧洲各国和美国。最后3卷讲罗马教廷和欧洲近世新政和教育。

该书之吸引人处在讲明了国家强盛之道在弃旧图新，吸收他人经验。第九卷“郅治之隆”，讲英国的富强，在于向他国学习和发展交通。这些对当时中国有很大现实意义。或许正因为这点该书才引起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赞赏。

（三）影响多年的《中东战纪本末》

甲午战争，使《万国公报》的声誉更高。当时国内报纸的信息来源不广，因而发行不广。而《万国公报》的消息来源广，并且没人能干涉它的言论，有教会帮助它在各地发行。该刊最受国人信赖，发行量大增，从4 000升至近万。如此大的发行量在我国是破天荒的。中日甲午战争时，《万国公报》发表有大量文字，为读者所推重。战争结束，林乐知将这些文字收集编纂，结集成《中东战纪本末》8卷8册出版。该书收集从战争发生，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有关中日战争的文字。次年二月，又

[1]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皇朝蓄艾文编》,卷72,27页,上海官书局。

出续编4卷4册。

《中东战纪本末》文集所收不仅是战争的记录，而且包含很多言论，所以能有如此篇幅。它的编辑方法很特别，第一卷收战争发生前中日往来公牍。第二卷收录战时上谕。战时并没有几道上谕，它还收录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疏、陶模培养人才勉图补救疏等大臣们亡羊补牢式的建议，所以能凑一卷。第三卷收日本的宣战书等日本官方文件。第四卷是朝警记，前段战争时18篇战讯，和停战后割台等文件。第五卷为议和。第六卷“议源”，议论甲午战争及战败的原因。第七卷称“蔡子新语”，是广学会最重要的中文译述、撰述者蔡尔康环绕战争前后的文章。第八卷是西方报刊议论文字。续编4卷4册文字也是按这内容编纂的。

这部书受读者欢迎，还在于它收录了大量“善后宏纲”，也就是正集第二卷收录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疏、陶模培养人才勉图补救疏等等类似文字。这类文字是大量的，当时也仅仅《万国公报》收录这些文字，并结集流传，发生影响。在《时务报》创刊之前它实际是传播变法图强思想的重要地盘。它不仅刊载各种变法建议，也对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加以驳正。譬如公车上书有一条建议迁都西安。在续编卷四有普定姚大荣《迁都平议》，针对迁都说提出批评。在分析各种条件后说：“长安亦兴亡迭见之地，非立国不倾之都也。”蔡尔康在该文后有跋语：“不特坐而言者，断难起而行也。至于妄议迁都，尤为狂瞽。”对公车上书，蔡尔康在“蔡子新语”中就有一篇批评文章。这类批评文字正是时代需要而后来《时务报》等刊物所缺少的。

《中东战纪本末》受到极佳的好评。礼部大臣孙家鼐对他的亲戚说：“浏览一过。其于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牧师皆剀切指陈。在国家可谓忠荩之臣，在朋侪可谓直谅之友。能不钦之，敬之，爱之，重之哉。”[1] 王韬说：“林君之作此书，盖欲中国之自强而发也……其命意所在，实欲以行新法，学西学，克自振拔为自强，而借日本以自镜，其所以期望者深矣。呜呼！近地之人不言而远方之人言之，东方之人不言而西洲

【1】《〔孙家鼐〕致龚心铭书》，《万国公报》1896年8月号。

[1]《王韬序》,《中东战纪本末》,卷端,4页。

[2]《字林西报跋中东战纪初编》,《中东战纪本末续编》,卷4,34页。

之人言之。中国何幸而得之哉。"[1]《字林西报》曾有文字对该书读者说:"林君曾论之曰,华人用古法,诚不以治今世。若再因循不改,以前代之人之事,指为尽善尽美。德行也,智慧也,前人之外,一似无有能逾之者。究其德与学不一进,且不竭力以求。而勤学好问之心,亦复固守不变,是皆谓之自画。安望其日进无疆……深望自今以后,撇去成见,他国高强之术,各项载成之道,留心习学。知无不可为者,岂多让他国者。"[2]

由这两段文字可概见《万国公报》当时的主张与我国先进读书人的救国思想是相一致的,影响了他们,也影响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康有为和梁启超当时在北京办报,开始时报纸亦名"万国公报",就很能说明问题。

(四)不能忘掉英国推荐给我们的"新政策"

然而,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万国公报》,或者说广学会在获得相当读者后,不失时机地发表《新政策》和《印度隶英十二益说》,兜售其殖民主义思想。

《新政策》和《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英国对华"新政策"!前者完成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二十五日,是李提摩太给光绪帝的革新政治意见书。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序,1896年4月号《万国公报》发表。《新政策》《序》的基点是要中国接受外国的并吞,他说:鸦片战争后局势一直很好,"癸未甲申(1883—1884年)以后,忽有人持主战之议,广征船炮,增置甲兵。冀以一战张威,复嘉道以前旧制。遂有好战之法国乘之,复有习战之日本继之"。把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说成是中国挑起的。文章中他告诉我国人:"欲永免乎战争,必将使中外一家。一合而在不再分也。"又具体说明如何"中外一家"的9条办法:一,"聘西人两位速与天下大国重订章程。"二,"立新政部,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英美两国最宜襄助。某某者,英之杰也,某某者,美人之英也。新政应办各事,选订各国专家,分任其职。"三,"铁路实富强本原,应调西人某某到京考较。"四,"某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

借款各事。”五，“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应请英人某某总管报纸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八，“战阵之事素未深谙，应请专精之人保荐。”九，“以上各事请发谕旨剀切宣示，令天下读书明理之士乐于从事。”这“中外一家”的办法，仅仅缺了一条，没有讲哪天派“鬼子六”奕䜣到伦敦当英国外交大臣！

顺便说一句：李提摩太反复建议我们向印度“学习”，我们“耳熟能详”。还有现在大家不太清楚的另一版本：日本“朋友”早在1894年前就提出了日、中、韩“同文同种”的“大联合”。1894年前日本有个叫森本丹芳的，著有《大东合邦论》。这本书15章，分议13点：1. 什么是合邦；2. 人世间的大势；3. 世界态势的变化；4. 各国状况；5. 俄国状况；6. 中国状况；7. 朝鲜状况；8. 日本状况；9. 日韩交往历史；10. 政治的基本原则；11. 合成一国的好处；12. 联合的方法；13. 中国应该与日本结盟。全书“倾肝吐胆”，一是怂恿朝鲜脱离中国而“自立”，一是说中国满族汉族间互不相安，因而无法抵御白种人侵略。最终的良法是日、韩、中合成一帮，抵御欧洲人。是个“大东亚共圈”的样本版。这样一本书，梁启超让他的学生陈高第、霞謇翻译，他自己修润作序，由康梁办的大同译书局出版，书名改为《大东合邦新义》，前后不少于两版。梁启超在《序》里说：我国“欲策富强，非变法不可；欲卫种类，非联盟不可”。[1] 把那时的局势描写为“黄种人抵抗白种人”，正是那个时候日本人所谓的“中日同文同种”的宣传的力量，连梁启超都如此相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甲午战争赔款割地，老百姓还没有缴清甲午2亿3千万白银“赔款”的加征，中日“同文同种”的宣传竟然还有如此力量！

【1】梁启超：《大东合邦新义序》，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怕“天下读书明理之士”不“乐于从事”，同年10月《万国公报》又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宣示殖民地样板。这篇“雄文”的题目已经很明白地揭示了内容，就不再介绍了。

(五) 给光绪皇帝编初级三字经

李提摩太的《新政策》“没有被光绪帝立刻接受，但至少影

响了光绪帝，使他觉得维新变法可能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壮了他的胆，使他敢于违背西太后的意旨，引用维新派人物。而他的大臣如翁同龢、孙家鼐、文廷式等也受到鼓励，倾向变法”。[1] 戊戌年年初三，传康有为到总理衙门问话，次日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呈进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变政考》等书。[2] 李提摩太紧紧抓住时机，匆匆写好《帝皇初学》课本660字的序，次月就发表。接着写课文。共17课，5个月读完。分别是保民、任地、国帑、学校、通商、民产、语言文字、种族、教法（宗教）、国体（实为政体）、富国、公法、转运（运输）、产业、民食、兵制。每课课文40字左右；外加参考材料100多字。功课不算太重。点睛之笔在最后“各国兴衰”说：“强弱之原，考其关系，厥有四事：一曰养民、二曰教民、三曰安民、四曰新民。”又说“四者，兴衰之大关键也。四者缺一，则如良马去其一足，国必弱。”而要紧在“新民”，即“令百姓视天为父”——信基督。“帝皇既知国势盛衰之故，则当上体天心，思所以顺天自强之道”。说到底，他的意思是：中国要有救，最可靠的办法是变成殖民地！

[1] 宋云彬:《康有为》,66页，三联书店,1955年。

[2] 《光绪朝东华录》,4017~4024页,中华书局,1958年。

第七章　新出版的开始

第一节　出版关注现实

一、社会需要新的出版形态

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百日”表示了它的短命。但它酝酿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对后来影响的深远，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变革中少见的。戊戌变法在政治层面是失败的，但是在思想领域中，它是为近世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添加重大砝码的一场活动。这场活动漫长的酝酿，时时有出版的身影。说戊戌变法运动及其以后的变革，是多年思想家所做的书报建构成的成果，并不为过。

古代出版技术简单，只要请几个刻工就可以成书。这就是古代家刻兴盛的原因。但古代著作人虽然可以很方便地将文字变成书，但他没有能力将书散发到真正需要、能起作用的人的手里，只能送给亲戚朋友。当地有书店的话，托他们代卖，充其量只能在一隅流传。古代书版刻好后，由于发行困难，不是大批刷印，而是等人来要再刷。古籍内封右边，往往刻有“版藏某处”的一行字，这就是书的广告：你在朋友处看到一本书而想要，就到那藏版的地方刷一本。这就是古代出版：虽然是传播思想，速度却

是很慢的。所以它不能很好地适应紧急状态下的思想传播任务；由于出版传播速度慢，无法及时收到反馈，更难胜任同好间的思想整合，形成合力。

只要书籍的复制用型版，型版的成本分摊原则，书的发行量越小，书价就越昂贵，发行就更困难。出版的唯一意义是传播，印出书后没能很好发行，等于没有实现出版目的。由于不能将一定量的书以读者能接受的价格卖出去，又将成本收回，就不可能再继续刻新的书，就无法进行新一轮交流，交流链就断了，也无法整合他人思想。

较快的思想传播也不能求诸于书坊。古代书坊，以盈利为目的。因为型版的成本分摊，书坊都热衷于一次制版能多年销售的书，对当代人的作品不感兴趣。所以书坊不进入社会前端书籍的出版，更难要求利用它整合人们的思想。

随着中华民族日益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社会觉醒的人士日益增多，民族存亡逐渐成为读书人的自觉关注。台湾学者王尔敏统计，自1844—1902年有文字惊呼中国面临“大变局”的就有81位。[1] 其中1899—1902年则只有聂缉椝1位。戊戌后所以少，原因在于“变局”已是公认，不再需要呼吁，需要的是答案了。其余80位，如果按他们提出这一言论的时间看，这种关注以几何级数增长：1844—1860年17年，有黄均宰、徐继畬2位；1861—1882年23年，有冯桂芬、王韬、李鸿章、奕䜣等23位；1883—1894年12年，有黎庶昌、郭嵩焘、钟天纬、康有为等25位；1895—1898年4年间，有严复、陈炽、盛宣怀、张之洞等25位。从人员的社会地位讲，亲王3位，巡抚以上大员9位，此外除著名文人还有普通文人。他们对时局的感知，除了切身体验，就是采择自出版物。1840年前后开始有些摘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译书增加，王尔敏先生说：“这些书必然在士绅间流传。”如魏源《海国图志》两个新版采录当时书刊“数量在20种左右。又如赵烈文收藏西洋传教士在香港发行的《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6年5月，共刊33号）月刊全部，为官绅友人辗转借阅（翰林

【1】王尔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26~33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吴嘉善、道员邓随帆均曾先后阅读）。又如1874年江南制造局译印的《防海新论》，在同一年，就有4位督抚分别在其奏折中引用该书的文词。这4人是李鸿章、李宗羲、刘坤一、丁宝桢。”这是译著。又有到外国去的人员的记述。王尔敏又说：“自1866年至1900年，撰著外国记事之人物有61位，撰著记录达151种。而此类日记、诗稿，往往因其出版而广泛流传，影响官绅文士最大。”[1]

【1】王尔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这些书籍的思想影响于阅读者，阅读者产生共鸣，有着“一吐为快”的欲望。这时，需要迅速传播的思想日益增多。同时，关注民族命运的人增加，想要类似作品阅读。对新思想读物的提供者和需要者都增加。面对这种思想传播的矛盾状态，陆续就有文化人自办，或者与有志于为社会贡献的经商者合办新型的出版机构。这些机构有些接近原来的家刻，但讲究收回成本，便于继续。从收回成本上，似乎同于书坊，但它不追求利润而看重能陆续供应新书，以满足社会需要。这就产生了新形态的出版。

二、新出版的诞生

时代需要新形态的出版，毫无疑问，这种出版形态的出版者，或者开创者，必然是关注社会变革者。

新出版的第一人应该是王韬。他是苏州昆山甫里人，那儿现在叫周庄。1848年他到上海看望他父亲王昌桂，接触了墨海书馆。[2] 次年他父亲病故，他受邀接替，在墨海书馆做笔述，帮助麦都思翻译宗教宣传品。1861年因为清政府要抓他，逃到香港。到香港后受雇于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帮助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后来随理雅各到英国，在英国呆了两年多，回港途间又到埃及、法国等国家，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他是我国近代第一位以私人身份去欧洲的知识分子。后来又去过日本。前后两次，“经历数十国，往来七万里”。[3] 加以原在上海、后在香港和西方人多年接触，他完成了从一个旧式读书人到一个有新思想的人的转变。

【2】王昌桂的名字，据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264页，台北自印，2001年。

【3】王韬：《漫游随录·自序》。

同治十二年（1873年）理雅各受牛津大学聘请回英国。王韬和黄胜等集资接盘，组成了中华印务总局，从事新闻出版，“癸

西（1873年），香海诸同人醵赀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1] 即《循环日报》创刊。又利用中华印务总局的印刷器材办出版。王韬的欧洲之行使他接触了西方的实际，见识大增，对国家落后挨打的原因比其他人认识深刻；也懂得了报纸和舆论的作用。《循环日报》开创了中国报纸言论，这些言论“多出于王氏手笔，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2] 光绪九年（1883年）王韬曾辑录自己文字成《韬园文录外编》12卷（图22），其中大半是《循环日报》的论说。他谈论国是，臧否人物，主张变法。他对国是的议论，实在是变法维新的先声。在他之前，有很多人提出要变，譬如龚自珍。但如何变，除了古代传说制度，他们缺少实际可借鉴的思想资源。王韬则不然。他除了接触西方和西方人外，还帮助理雅各翻译五经，说明他对我国典籍的了解水平。对外来文化的接触、理解程度，与掌握民族文化的深浅，至关重要。

【1】王韬：《韬园老民自传》，《韬园文录外编》，329页，中华书局，1958年。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22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

【3】1872年5月8日《申报》《本馆自述》：“粤东旧有新闻纸馆之设……其主笔黄平甫先生及王君紫铨”，紫铨即王韬。

图22
《韬园文录外编》内封



同治九年（1870年）春，王韬回香港后不久，曾担任香港《中外新报》主笔。[3] 当时正值普法战争，他主持战事文字。这些文字后汇辑增补成《普法战纪》14卷。在此前，对西方了解的外国人是介绍西方文化的主动方。即使同文馆译书、江南制造局译书，真正的主动方还是外国人。中国人自己主动了解外国，是从王韬的《普法战纪》开始。他比魏源《海国图志》利用材料要主动得多。《韬园文录外编》标志着国人开始了从观念形态上对西方世界的了解。

正由于《普法战纪》是中国人自己主动编写的，该书极受日本知识分子推崇，评价极高：“或序先生之文，谓为今日之魏默深。默深所著《海国图志》等书，仆亦尝试一再读之。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

生也。”[1] 因而1879年日本知识界邀请王韬游览日本。他在日本时认识了黄遵宪，并读到他的《日本杂事诗》诗稿。《日本杂事诗》共154首短诗，从日本历史以及风俗到当时维新，每首诵一事。中日交通虽有千多年历史，但日本了解中国的多，中国了解日本极少。黄遵宪是第一个对日本有研究的人，《日本杂事诗》是他第一本书。王韬读未终篇，击节者再，请求带回香港出版。

[1] 重野安绎：《扶桑游记序》。

王韬自己主持《循环日报》言论，他的变法自强言论有识之士多受影响，声誉日上。郑观应受他影响，著有政论短文，汇辑名《易言》，“未敢出以示人”。1879年春托友人请王韬批评，“不料竟为付梓”。郑观应后来又有所增补，即《盛世危言》。

这些正是以往古代家刻所没有，坊刻也不能的。《日本杂事诗》和《易言》，包括《盛世危言》，出版后被人所认识，广泛翻印，1895年后成为最受人欢迎的读物，为维新变法作了很重要的思想准备，或说提供了思想资料。

三、刊物：思想交流的催化剂

如果思想文化交流仅仅局限在一些学者和绅士间，它的交流也就局限在社会的一隅。即使是社会改革思想，也大大减低了其作用和进程。古代书籍传播手段的缓慢，使有价值的思想缺少及时性的读者；当借助于口头时，传到后来发生歧义。古代思想传播手段的单一和缓慢，是和缓慢的社会节奏相一致的。在社会面临激烈变革的前夜，必然会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后的改良思潮，和稍后的改良运动，带来了传播的变化。这变化，表现在产生一种新的出版组织形式：既有古代家刻成分，也有坊刻成分，但不是家刻主要刻自己文字，也不是坊刻为牟利只刻常销书，而是和社会变化紧密结合。

王韬后来得到当局谅解，允许他回上海。他回上海后办“韬园木刻书局”和“淞隐庐”出书，虽然仍出版他人著作，但已不像在香港那样的风格，而更接近旧文化人的刻书了。

王韬虽然沉寂了，但随着时局日益糟糕，觉醒的人与日俱增，


图23
康有为

相应的也会有人出来做出版的事。最根本是甲午战败，人们奋起。最早是康梁。康有为（图23）在《南海先生自编年谱》1895年中说："变法本源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乃与送京报人商，每日刊送千分于朝士大夫。纸墨银二两，自捐此款，令卓如、孺博日属文。"就是北京强学会所办《中外纪闻》（开始时刊名《万国公报》，后李提摩太干涉，改名《中外纪闻》）。

康有为鼓动张之洞办上海强学会和办机关报《强学报》。《强学报》为5日刊，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月12日）创刊，第1期就刊发了半年前闰五月二十七日的"蠲除积习，力行实政"的上谕，[1] 并配发"附论"，赞扬是"三百年之特诏"，"中国自强之基，臣民讲求时事之本"。但因为康有为提倡"孔子改制"，《强学报》上孔子纪年和光绪纪年并列：报头右行写"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左行写"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而且发《孔子纪年说》和《毁淫祠以尊孔子议》等文章。用孔子纪年，这事太大。自古"自改正朔"，下句就是"必有异志"，张之洞当然不能容许这一做法。"1896年1月26日《申报》刊登强学报馆的《同人公启》称，昨晚七点钟，南京来电到本馆云：'自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同人公启。'"[2]《强学报》出了3期只发行2期。这"南京来电"是张之洞命他的幕僚梁鼎芬所发。

【1】《光绪朝东华录》，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552页，下方注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四、《时务报》

北京强学会被封和上海强学会自行解散后，黄公度、吴季清、邹殿书、汪康年、梁启超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和黄遵宪首捐千金开办《时务报》（图24）。"丙申（1896年）七月，创设时务报

馆。是年吾国尚止有日报无杂志，有之，则为广学会月出一册之《万国公报》。时承中日战役之后，钱塘汪穰卿进士与任公议，谓非创一杂志，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俾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于是有《时务报》之设。汪君经理馆务，任公则主撰述。”[1] 梁启超在年初复汪康年信中说：“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唯命所从。”[2] 开始时他们二位合作得很好。



图24
《时务报》内封

《时务报》因为它观点非常鲜明的文章，讲人们所没有想到的，言人们想到而不敢讲的，加以梁启超满含激情的文笔，深深打动读者。梁启超自己后来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3]

《时务报》最初是获得张之洞支持的，他命令下属订阅。但不久又禁止传阅，原因是刊载了严复的《辟韩》一文。严复在1895年2月4日至5月31日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4篇文章和《原强续篇》，在甲午战争惊心动魄的年代第一个提出深刻的振聋发聩的诤言。还在战争期间他就指出战争必败，并认为其原因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在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4] 文章的爱国激情感人至深，为人所称道。对当时政治的臧否可以说前无古人。对于造成政治弊病的科举的批评，无可辩驳。以西方政治科学作对比，批评执古不化者，指出必须改革。[5] 在《原强》

【1】汪诒年：《任公事略》，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18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张元济致汪康年》，《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23、62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梁启超全集》，第1册，477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3】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梁启超全集》，第1册，477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4】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1页，中华书局，1986年。

【5】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1~4页，中华书局，1986年。

中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他不是徒呼物竞天择，而是指出了西洋之所以强，在于民主和科学。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1] 他在《辟韩》中尖锐地驳斥韩愈《原道》推崇君主专制，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2] 当时清廷正焦头烂额，对这种言论无暇顾及，但他还在前面加上过一句“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直报》影响不大，两年后，1897年4月12日《时务报》把该文转载在第23册上。张之洞看到后下令禁发和追究。叶瀚有短信专门传达给汪康年：“顷念劬来，传南皮帅意云：《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属布告。合行奉闻。”[3]

【1】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11页,中华书局,1986年。

【2】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35页,中华书局,1986年。

【3】《叶瀚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清政府后来命令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汪康年趁具体规定还没有下来前，迅速将《时务报》停刊，而按原宗旨、原版式创刊《昌言报》，发行给《时务报》的订户；该刊戊戌政变后自动停刊。

五、必须把发行办好

《时务报》能起作用，不仅因报编得好，还在发行好。仅黄遵宪给汪康年的信里就多处提到发行：“同舟张弼士言助洋五百元。伊云南洋可派百余分，俟十月回去再办。”“并见王菀生言，津郡可派至四百分。”[4] “津郡能派至四百分，王菀生、孙慕韩之力也。”[5] “昨见沈子梅观察，托其于各通商口岸凡招商局船能至之地，均由局船代带。渠欣然允诺。”“局中各船已托其带，可送予一分，非特酬劳，兼以招徕，盖舟中阅看者多，必销售更广也。”[6] “凡藩臬有驿递之责者，辗转相托，照鄂善后局意分发各州县，裨益不少，馆中派报处所总须设法增加。各省大书院必须分送一二分。此亦如卖药者送药招牌，好销路自广也。”[7] “然今

【4】《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897年。

【5】《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897年。

【6】《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日之报推行至十数省，刊印至八九千。”[1] “各书院各学堂分送一分甚好。”[2] “李孟符言及今年乡试，士子云集省会，似可每省酌寄一二百分，以期拓充。陕西一省孟符即可代办，可即寄百余分托渠。如他省照行，又可增印二三千分也。”[3] 这仅仅是黄遵宪一人的努力。其他同志也都在做。如杨锐信中说：“接奉函电，敬悉一是。弟处分送之《时务》、《实学》……已遵命移交总报馆经理。”[4] 张元济的信里也谈到代销事。邹代均说：“沪上以后寄报多少开呈，祈遍告照行：《时务报》七百册，近来销数稍减。《知新报》一百册。《农学报》五十册。《萃报》五十册。《求是报》、《妇孺报》祈属暂停寄，缘无人购阅耳。”[5]

廖梅博士利用《汪康年师友书札》和《时务报》整理出了《时务报》扩展发行的活动及其成果：一种方法是利用朋友直接或托人游说，活动17位总督、巡抚、学政等官员命令下属订阅。这些饬札不仅增加了发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时务报》获得了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利用关系设立代销处，使得《时务报》的派报处遍及全国十八行省和港澳75个城镇，及槟榔屿、新加坡、日本国外五个城市，共202个销售点。[6] 这正是古代家刻、坊刻所从来没有想到，更不能做到的。

六、新出版整合同志

新出版不仅仅是传播思想，更有着古代出版所没有的整合同志的功能。

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生前几十年如一日，特别是在日寇侵华期间，搜集、保存近代史料，很多珍贵材料赖以留存，改革开放后，上海图书馆善本部诸位在原来供阅览的抄件的基础上，又经整理出版，使异地读者得以利用。从《汪康年师友书札》所收3 000余封中，随便翻翻，就可以看到很多通过新型出版整合维新同志的材料。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张元济回复汪康年十九日信中，有“力顾大局数策”。其中最易办的一条，张元济回答说：“吾兄

【1】《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4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5】《黄遵宪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7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6】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66~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办事，从报入手，最为中肯，今天未尝无有心人，苦于隔而不通，散而不聚耳。今渐通矣，聚矣。凡有同志，或至馆相访，或以文字相赠者，吾兄宜加以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1]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语言，挑明刊物的目的不仅仅是宣传。出版史上有名的高梦旦，鄙视科举，抛弃科举道路而研究"西学"，愿把自己前途托付给唤醒民众的事业。早期他看到《时务报》后如遇知音，十分兴奋地寄信寄稿给报社，现在存留有54封信，从中可以见到他关心民族前途，为之尽自己力量的意愿与方法。从这54封信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有封信说："弟于足下虽未觌面，然历读惠书，知足下非无意于弟者。"[2] 最后他成为这圈子里的一员。在54封信里，有两处提醒汪康年刊物上文字要讲究策略：《时务报》第九期有《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他说："民权一篇……用意至为深远。惟风气初开，民智未出，且中国以愚黔首为常，一旦骤闻此事，或生忌惮之心；而守旧之徒更得所藉口，以惑上听。大之将强遏民权，束缚驰骤而不敢稍纵，小之亦足为报馆之累。"[3] 前面曾提到《时务报》转载严复《辟韩》招致张之洞干涉一事；而高梦旦早就去信汪康年提醒他："《辟韩》一篇，鄙意大不以为然。所论君臣一节，尤不宜说破。……贵报风行至广，关系至大，举措不可不慎也。"[4] 这都超出一般读者对报刊的关心。

同志之间把刊物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如翻译译名统一，在当时还摸不着头绪。张元济就对汪康年说："贵报所译地名，每无一定之字，能熟外国地理者能有几人。似宜留意。"[5] 高梦旦有个如何统一译名的十分中肯的意见。梁启超后来写《论译书》，关于专有名词和事物名词两者，就直接引用高梦旦提的意见。[6]《时务报》汪康年还与罗振玉、徐树兰等合办"务农会"，并准备出版《农会报》，梁启超的《农会报序》已经写好。读者卢靖看到后致信汪康年说："'会'字古今中外皆属极美之称，独中国则有会匪、会党之禁。'农会报'可否即名为'农学报'。"[7] 后来创刊就称《农学》，第15期起改称《农学报》。这种刊物和读者的关

【1】《张元济致汪康年》，《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28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2】《高凤谦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高凤谦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高凤谦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6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张元济致汪康年》，《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2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6】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8~49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7】《卢靖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9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系已经成为同志关系。

更有甚者，卢靖还说："前闻贵报已派至七千余分之多，近数月来当更加推广。曷嘱派报诸君将阅报衔姓里居各录一册送贵报，或分省，或分姓记录，以备不测时号召勤王之用。如何？"[1] 这已经离开文化，变为要杀头的政治了。

【1】《卢靖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9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七、初次出版高潮

光绪二十三年，又有《国闻汇编》、《知新报》、《湘学报》、《湘报》创办。七月《经世报》创刊于杭州，八月有《实学报》创刊于上海。这些刊物，宗旨虽同，观点不一，结局相似，除《知新报》在澳门，不受北京政治变化影响外，其余在戊戌政变后都结束了。

（一）《知新报》

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创刊。开始是五日刊，43期开始改为旬刊，出版至132期（1900年11月）才停刊。它由康有为商请澳门入葡籍的富商何廷光等在经济上支持，由梁启超去规划，开始由康广仁主持。因为《知新报》的发行可最有效地利用《时务报》的网络，所以在内容上必须有所分工。梁启超到澳门规划后，曾有信谈到两者的分工：《知新报》"一、多译格致各书各报，以续《格致汇编》。二、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其格式一依《时务报》。惟派往广东各埠者，则五日一本十五叶，派往外省者，则两本合订一本。去其上谕辕报各条。"[2] 就组织者、开始的活动者和刊物的某种分工讲，《知新报》在一定意义上是《时务报》的姐妹刊。

【2】《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由前引邹代均信知道，在那儿《时务报》销七百册，《知新报》销一百册，后者并不显。到戊戌政变，《知新报》就显出它的地理优势。慈禧在八月乙巳（二十四日）"谕：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3] 命令所到各地报刊纷纷关

【3】《光绪朝东华录》，4221页，中华书局，1958年。

闭，唯独奈何不了《知新报》。政变消息到达澳门后，第68期除照常刊登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初五的“上谕恭录”外，又加“上谕电传”，报道慈禧重新训政。此后，即取消“上谕恭录”栏目，即不承认朝廷所发是光绪的命令。而且“通过译述外文报刊的新闻资料来报道与政变有关的消息，揭露事实真相。自第69期起，连续刊登《北京要事汇闻》，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揭示政变性质和大致经过的报道……该刊向后党发起正面攻击，是从1898年12月4日出版的第73期开始的。这一期刊有《气节说》、《读庆元党案书后》、《书今上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语后》等文章，热烈歌颂为变法维新而死难的烈士，锋芒直指政变的策划者。”[1]《知新报》的出版地点在清廷力所不及的地方，在戊戌政变后不仅发表了很多批判政变的文章，并且维持了相当时间。但它不能在内地广大地区发行，实际不能起很大作用。《知新报》的作用差于《时务报》，可见发行对于出版的重要。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582~5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二）湖南的两派出版活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梁启超接着说到他后来到长沙时务学堂，“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每日在堂讲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昌革命……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先是嗣同、才常等，设‘南学会’聚讲，又设《湘报》、《湘学报》，所言虽不如学堂中激烈，实阴相策应。又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叶德辉著《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著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2]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卷,3100页,北京出版社。

当时湖南的情况是全国的缩影，对维新言论的分歧很多。即使同是主张变革，由于不能很好整合，意见也不一样。譬如杭州的《经世报》也是要变革，但认为儒学嫡传在浙，讲求实学，不必完全学西洋。张元济给汪康年信中说："闻香帅拟设《鄂学报》，杭州出《经世报》，均与贵报为敌。"[1]后来给梁启超信也说："近见《实学报》、《经世报》皆有显与《时务报》为敌之意，此皆例有之阻力，执事幸勿为所动也。《经世报》言多粗鲁，姑勿论，而《实学报》则最足以动守旧者之听，且足以夺貌新者之心。济料其声势必将日大。然一二十年后民智大开，又必不辩而自屈，则又何必沾沾于目前之是非也。其以天地日月例夫妇，仍不过八股之学。"[2]

【1】《张元济致汪康年》，《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3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2】《张元济致梁启超》，《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1022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1.《湘学报》

湖南一地，封建保守势力很强，但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倾向维新，总督张之洞也愿意在能控制的范围内作若干改革。所以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江标任学政到戊戌变法前，湖南很有一番新气象。推动的关键人物是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三年宣布徐仁铸接任湖南学政时，他有《与徐仁铸书》，讲了三年来湖南的变化和《湘学报》的地位："溯自三十年来，湘人以守旧闭化名天下。迄于前此三年犹弗瘳，此莫大之耻也。愚尝引为深痛而思有以变之，则苦力莫能逮。会江建霞学政莅湘，遂以改本县书院请，欣然嘉许。而他州县亦即相继以起。未几，义宁陈抚部持节来，一意振兴新学。两贤交资提挈，煦翼湘人。果始丕变矣。"又说："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主笔者为同县唐绂丞拔贡才常。"[3]《湘学报》所以"权力最大"，因为是奏准的。光绪二十二年秋，江标"请旨每年拨学租余银500两为常年经费，在校经书院筹备方言、算学、舆地学会和学报。《湘学新报》即有长沙校经书院名义发行"。[4]《湘学报》开始名《湘学新报》，旬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二十一日创刊，至第二

【3】谭嗣同：《与徐仁铸书》，《谭嗣同全集》，269~270页，中华书局，1998年。

【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5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十期改名，以“长沙校经堂实学会”名称出版。因为是请旨后办的，所以江标、徐仁铸前后两位学政为刊物监督。

《湘学报》是“校经堂实学会”编印。校经书院正是江标接受谭嗣同建议改变了教学内容。谭嗣同说：江标“命题喜牵涉洋务，所取之文，又专尚世俗所谓怪诞者拔为前茅，士论益哗。至横造蜚语，钳构震撼。而江学政持之愈力，非周至四国之士，屏斥弗录；苟周至四国，或能算学、方言一技矣，文即至不通，亦褎然首举之。士知终莫能恫喝，而己之得失切也，乃相率尽弃其俗学，虚其心以勉为精实，冀投学政之所好。不知不觉，轩然簇然，变为一新”。[1] 江标对学生不仅不卡，还给予条件研究新学。他在光绪二十三年离任前，于二月二十四日有《推广书院章程折》给皇帝，说：“臣到任之后，先自推广季课，捐廉给奖，并于书院隙地建造书楼，广购经籍，并添置天文、舆地、测量诸仪，光、化、矿、电试验各器，俾诸生于考古之外，兼可知今。且拟添设算学、舆地、方言、学绘。”[2] 经过几年的调整，长沙校经书院就不再校经而在讲新学，所以到办《湘学报》时，就有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写家。撰稿人有唐才常、易鼐、杨毓麟、李固松、李钧鼐、杨概、邹代钧等，唐才常并主编务。

【1】谭嗣同：《与徐仁铸书》，《谭嗣同全集》，270页，中华书局，1998年。

【2】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1995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2.《湘报》

《湘学报》为学政主办，巡抚陈宝箴有《饬各州县订购湘学新报札》，总督张之洞又《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故传布广泛。[3] 报中曾有“素王改制”一语，引起绅士大哗，经过江标解释是“编纂者一时讹误”，张之洞还说“此报均属平正无弊”。所以撰稿人就忘乎所以，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到时务学堂开办，熊希龄任提调，梁启超任总教习。时务学堂讲变法之议，倡民权之说，并且成立南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十五日南学会的“机关报”《湘报》创刊。《湘学报》和《湘报》两个刊物都是唐才常主编，互相呼应，宣传文字越来越激烈。当时，以“退辽”和德国侵占胶州湾为开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一个强占我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光绪二十三年

【3】两札全文见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1997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二月，总理衙门被法国所迫，声明海南岛不割让与他国。三月，东清铁路公司成立。五月，总理衙门允许法国自南宁至百色、河口至蒙自铺设铁路，并云南、广东、广西之矿山开采权。十月，德国借口派兵占据胶州湾。二十四年正月总理衙门为英所迫，宣布扬子江流域各地永不割让与他国。二月，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俄国强租旅顺口、大连湾25年。宣布以后总税务司皆委英人，总邮务司皆委法人。三月，法国强租广州湾99年，并迫总理衙门答应云南及两广等省不割让与他国。英德间达成山东势力范围。日本迫总理衙门宣布福建不割让与他国。四月，英国强租九龙及附近港湾99年。这张“清单”在国内产生了激烈反应，而在湖南最大。

3. 对立面的攻击

湖南的守旧人士一开始就反对《湘学报》、《湘报》和时务学堂，大规模的进攻，始于张之洞的表态。张之洞从光绪十年到光绪三十三年历任两广、湖广、两江三地四任总督，经济、文化、新政建树颇多，对革新思想能接受；但处处“设防”，唯恐失控。前面提到过他对《时务报》的批评。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中午他先在给陈宝箴、黄遵宪电中说：“《湘学报》中可议之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亟宜谕导阻止……切嘱公度随时留心救正。”[1]午夜又给徐仁铸电报说：“乃近日由长沙寄来《湘学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此间士林，见者啧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另将《湘学报》不妥之处签出，寄呈察阅。”[2]并且告诉陈宝箴，他“撰有《劝学篇》一卷，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内送呈，并祈赐教”。

徐仁铸知道张之洞不再支持《湘学报》后，自第37期起连载《劝学篇》，到同年6月，出到第43期就停刊了。《湘报》与《湘学报》不同，不是官报，继续办。但到八月初六政变后，二十六

[1]《张之洞致陈宝箴黄遵宪》,《戊戌变法》，第2册，6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2]《张之洞致陈宝箴黄遵宪》,《戊戌变法》，第2册，6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日内阁奉懿旨查禁结社，[1] 张之洞汇报："湘省前年设立南学会，刊布学报《湘报》。初则不过讲论时务，后则渐染邪派，煽惑浮薄之徒。幸正绅端士群相诟病，未致蔓延。迨湖广督臣张之洞遵奉电传谕旨，转电到湘，即将学会报馆一律停罢。"[2]

4.《劝学篇》

张之洞深感国家的危急状态需要以变求生存。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上呈《吁请修备储才折》，呼吁改变旧法，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及预备等9条建议。[3] 这是他提出的中国自救自强之路。以鲁之弱国为比拟，提出以孔子智、仁、勇三达德为手段："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4] 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努力推行。作为一个长期担任方面重任的大员，他懂得社会安定的极端重要和难以轻易获得。《劝学篇》正是他面对现实中的不同观念苦心孤诣的规陈，主张在一定轨道上的有序变革。因为书里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常被认为是洋务派守旧理论集大成者。有论者指出，张之洞在《劝学篇》(图25）中对"中体西用""这一思潮的贡献在于，他把洋务派的理论大门张大到了最大限度。前期洋务派之'西用'止于西方技艺，即枪炮兵船、天文历算、声光化电、工程技术之类，而张之洞则把'西用'扩大到了'西方政艺'。这是《劝学篇》外篇重点阐述的思想。"[5] 他提出了"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进步与落后的观念是外来的。我国传统的政治观是"治"，即安定。孟子谈到伯夷和伊尹的从政不同处时说："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6] 安定才是古代官员所追求的。《劝学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代表了张之洞等一批既

【1】《光绪朝东华录》，4221页，中华书局，1958年。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573页，中华书局，1996年。

【3】黎仁凯：《张之洞与清末革命和改良》，河北省社科院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307页，中华书局，1999年。

【4】张之洞：《劝学篇》，序2页，上海书店，2002年。

【5】周育民：《重评劝学篇》，河北省社科院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54页，中华书局，1999年。

【6】《孟子·公孙丑上》。



图25
《劝学篇》内封

要社会进步，又想保持社会安定的官员的想法，所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同时也是正面说明：千余年被奉为圭臬的儒家学说已不能应付全部事务，而需要其他学说来补充。当时读书人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种是"陋儒俗吏有新学为垢病，相戒不学，故译书不广，学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学，故成材亦不多"。而另一面，"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著，海滨人士稍稍阅《万国公报》，读沪局译书，接西国教士，渐有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者"。[1] 张之洞以为两者都不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因而提出中西两方面的位置。他的意见也符合光绪帝改革的想法。所以《劝学篇》发表后，在六月初七日，光绪帝谕："翰林院奏，侍讲黄绍箕呈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正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2] 充分肯定了张的思想。

【1】张之洞：《劝学篇》，36~37页，上海书店，2002年。

【2】《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4142页，中华书局，1958年。

张之洞说："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一是。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3] 他是赞成变法的，但坚持要在一定轨道上行进，这也是他著作此书的原因。《劝学篇》共分24个小篇，其中"内篇"9篇，"外篇"15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4]

【3】张之洞：《劝学篇》，序1页，上海书店，2002年。

【4】张之洞：《劝学篇》，序1页，上海书店，2002年。

15篇外篇之首是"益智"，可以说是外篇的纲领。他提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又指出"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欧洲人"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学有畏友，不劳而多益"。西方各行各业都有学问。这些学问是"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我国所以弱，在"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

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矣”。他不仅主张学，而且他把“士=仕”的千年公式改成“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行也”。给读书人以改变社会面貌的重任。

梁启超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臣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 20世纪30年代陶孟和则谈到：“甲午以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种种的衰颓与失败，使士大夫渐渐认识自己旧文化的不足，感觉孜求西学……这时张之洞的《劝学篇》已经出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鼓舞了许多士大夫攻求西学的兴趣。”[2] 他充分肯定了《劝学篇》对推动西学的作用。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册，3104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2】陶孟和：《华学澜辛丑日记序》，华学澜：《辛丑日记》，卷端，3~6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5.《翼教丛编》

张之洞《劝学篇》著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他同时有批评徐仁铸电，这给了湖南守旧人士很大鼓舞。他们原来有很多批评康梁的文字，四月（中间有闰三月）就将这些文字由王先谦的得意门生苏舆编集出版，书名《翼教丛编》，共六卷，约有15万字。有两个版本：四月本有苏舆的小记。四月正是光绪宣布变法时期，这本书传播可能受到影响；八月政变后，苏舆非常兴奋，认为证明自己编的书是对的，马上作序重印。他在小记中说：“义乌（朱一新）论性，义精词赅。辨言虽拄，正理自申。录弁卷首。”次年春，上海有黄梦畹的“增订石印本”。

《翼教丛编》列入卷一的是朱一新答康有为的五封信和洪良品答梁启超一封信。都是驳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卷二是五件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的奏折。苏舆在后来的《序》中说：“世岂有学术不正，而足与言经世者乎？”“翼教”者，是借《国语·楚语》中“求贤良以翼之”的意思。卷三收录张之洞《劝学篇》的内篇四篇和外篇《非弭兵》一篇。

从苏舆选《劝学篇》的选法，可以看出他与他的同志的出发

点与张之洞不同：仅仅注意于禁锢人思想的所谓“正人心”。《劝学篇》第一篇是“同心”。本“皮之不存，毛将安傅”的意思，提出当时局面只有君臣同心，四民同力才能谋事。苏不选该篇而选最没说服力的第二篇“教忠”。“教忠”第一句就说：“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接着举嘉庆前百余年仁政16件。其中很多仅对官吏有利。即便与民有利的，由于吏治腐败，年深日久也已成虐政。如“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永不加赋。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由此反映了苏舆的保守立场。

第二节　新式出版机构的诞生

新式出版机构的诞生与译书活动密切相关。《时务报》时代，必须译书已成普遍认识。自从被封的强学会改办官书局后，人们一度有所希望，但很快就又失望。张元济在《时务报》创刊前夕给汪康年信中说：“[中央官]书局之开是吾华一大喜事。浮云蔽日，旋即消散。寿州（孙家鼐）闻尚有心。弟曾有书上之，后屡谒而不得一见。观其行事，亦终难扫除朝贵习气。所刊局报，多系芜词，阁抄、格言，最为可笑。洋报偶有微词，译署原文咨送，均被删削。其人如此，概可知矣。”他认识到译书的要求不能依靠“中央官书局”，转而寄希望于民间。张元济接着说：“昨晤伯唐，谓尊处报局粗有章程，并云译印在即，必能出此间万万倍也。鄙意新出紧要图籍，尤宜从速译印。质之尊意，以为何如？”[1] 不久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中就有一个题目论译书。高梦旦也撰有论译书的文章。光绪二十三年年底，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开头第一句就说：“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又说：“故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由此开始了民间组织机构译书。

[1]《张元济致汪康年》，《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6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一、大同译书局

光绪二十三年秋冬间，康梁一派开办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说明创办原由：说以往官译，“垂三十年，而译成之书不过百种。近且悉辍业矣。然则以此事望之官局，再自今以往，越三十年，得书可二百种。一切所谓学书、农书、工书、商书、兵书、宪法书、章程书者，犹是万不备一。”这事显然不能指望官办，《叙例》中接着说：“而大事之去，固已久矣。是以愤懑，联合同志，创为此局。”大同译书局的译书宗旨是：“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具体计划“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种。”[1]

[1]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132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虽然计划很大，但一则康梁手中没有人手，二则大同译书局甚至不能利用《时务报》刊登广告，发行渠道不畅，就有资金周转问题。大同译书局开办时，梁启超已离开上海。“当康广仁要求在《时务报》上刊登出书广告时，汪康年兄弟却种种借口，一味推宕，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第五十一册，才附送《大同译书局书目》，不是列在刊物的广告中。”[2] 汪氏兄弟这么做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同译书局译书甚少，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他学生的《伪经考答问》都是被禁的书，《时务报》列入广告风险太大。大同译书局翻译书仅《意大利侠士传》、《俄土战记》两种薄本。

[2] 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240页，中华书局，1984年。

不久，清政府命令将大同译书局改为官办，不久戊戌政变，就此完结。梁启超为大同译书局所拟订的宗旨、计划，大同书局虽然没有做，但后来梁启超游澳洲的时候与当地维新同志认为在国内有创办文化事业的必要，由冯镜如出面办的广智书局，正是按那个计划活动的。

二、其他译书机构

(一) 译书公会

虽然翻译西学书已有年头，但不借助外人，由我国人自己组织选题、翻译，则可能始于光绪二十三年的上海译书公会。译书公会由董康、赵元益、恽积勋、恽毓麟、陶湘等集资组成。赵元益是江南制造局的重要译员，江苏昆山人，举人出身，懂中医，所以笔述西医书有五种之多，也译过数理化。董康、陶湘后来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家。译书公会的活动，现在知道的是仅仅编印了20期《译书公会报》周刊，前后140天（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至次年二月十五日，即1897.9.30—1898.2.15）。

译书公会时间虽然短，但它开创了一个时代，前后约有10年时间，在上海陆续有蒯光典的金粟斋译书处、叶浩吾的启秀编译局、蒋观云的珠树园译书处，到上世纪初，还有江苏常州年轻读书人办的人演译社。还有个译过很多书的“留日学生译书处”，译书处代人译书的经纪人是谁，尚不清楚。

值得介绍一下《译书公会报》采用的，后来曾经流行过的“期刊”编排装订方式。它“每一星期将译成之书汇钉成册，以30叶为率，用三号铅字精印，俾各自为卷，以便拆钉”。[1] 它虽是期刊，其实是书的连载。它每期30叶，编页码不是从1—30。而是以其中的著作单独编页码。如第一期，有《泰西志林》5叶，编1—5；《西事纪原》有6叶，编1—6。第二期接着的《泰西志林》有4叶，编6—9；《西事纪原》有5叶，编7—11。到一定时期，读者可以将全部拆散，将各书汇总，钉成若干本书。这种方法民元前后流行过一阵。30年代郑振铎为生活书店编的《世界文库》也使用这种方法。

(二) 金粟斋译书处

金粟斋是合肥人蒯光典室名。他因为借给严复3 000元钱，严复用半部《穆勒名学》的译稿顶债。又有一位留日学生叶浩吾，译有若干书，译稿没钱出版，又卖不掉，借了蒯光典700元钱，

【1】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587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

也用一部分稿件抵债。稿件只有变成书才能收回成本，所以他在上海办了个译书处，进行稿件加工、排印、发行等。它从1901年开始至1906年上半年，除出版严复《穆勒名学》外，据历史地理学博士邹振怀教授说，较有影响的还有1901年王国维译中村的《日本地理志》和萨端译志贺的《地理学讲义》；1902年有樋田保熙等译的《世界地理志》和叶瀚译《西洋教育史》、王国维等译《法学通论》等等。他说："1903年出版的王景沂的《科学书目提要初编》一书对金粟斋版的《世界地理志》和《地理学讲义》给予高度评价：'中村氏书，首括名义，博稽六洲，郎若列螺；志贺讲义，指画重要，挈领振纲，盖取径与自然学，而注意与政治学者。二籍相辅，可云并美。'金粟斋后由于经费匮乏而关闭。该社虽出书不多，但在20世纪初期大量质量低劣的日文译本充塞书肆的环境里，金粟斋可谓特立独行，出版了一批具有相当质量的译本。"[1] 当时担任江楚译书局编辑的柳诒徵，后来谈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翻译，大可以衬映1903年王景沂对金粟斋的评价："甲午以后，学者多学日语，以译日本所译著之书。其浅劣殆更甚与官局及教会之译籍。"[2]

【1】邹振环：《译林旧踪》，10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798页，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三）算学书局

出版难办，很多出版主体转瞬即逝。一个世纪过去了，唯一能找到一些信息的，是报纸广告。"算学书局，以刊印数理方面书籍为主，从［《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算学书局告白》］'广告'看来，曾出《古今算学丛书》、《象数一门》、《曲线余》等，卷帙较多；还有《古今算学书录》、《几何原本》等。"[3]

【3】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238页，中华书局，1984年。

（四）旧瓶新酒

仁人志士在历史关键时刻改变了古代出版徘徊在社会生活边缘的状态，出版进入社会生活，甚至走在了社会前列，并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潮流，成为主流出版。一方面，这类阅读潮流推动了社会进步；由于出版制版成本分摊原则，这类书籍会有一定利润，变成另一面：对原有的一些书坊产生刺激，甚至也有思想上和仁人志士风马牛不相及而为利润而加入这队伍的。在一定时间

内，“新出版”的概念就会产生混淆。这无关紧要：当他的出版符合潮流对社会进步有好处的书，读者会获益；他出版另类书籍，看不见的手会给予惩罚。当然，出版是风险行业，淘汰率始终极高：虽然真诚想为读者贡献，当缺少经验，或经营一不小心，或时局骤然变化应对不及，就会形成亏损而出局，金粟斋就是。所以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以成败论出版之新旧。

1. 经济书局

经济书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 欧阳寿山总纂，在《经济通考》的《招股启》（即收售预约，——引者）中说：“本局主人蒿目时艰，扶舆后学，特先筹赀本纹银三千两，延聘中西书院掌教、《万国公报》主笔沈寿康先生，暨各省宏儒主持辑政，成《经济通考》一书，合中西为一贯，综古今而无遗，博采旁搜，刻期竣役。仿特科初例，以内政、理财、经武、格物、考工为六总纲，以《廿四史》、《九通》为经，新译各国时务诸书为纬，并兼取时人文集、杂著及中外旬日报，以期支干本末，互为发明。上以副国家抡才之旷典，下以导儒生汲古之先程。”[2] 从这个广告就可以看到这部以“新译各国时务诸书为纬”实际符合科举加试“时务”，和原来的兔园册子，实在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与推广新思想是两码事。

【1】光绪二十四年《申报》经济书局广告。

【2】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238页，中华书局，1984年。

2. 慎记书庄

光绪二十二年秋冬间，梁启超回广东时，有封给《时务报》诸位的信，其中说：“延耀欲印之‘西政丛书’，请借书与彼，抄后请作序。可与彼言，令彼印成，赂我二百本，当为辑之。”信中又说：“延耀云，欲印康先生之《四上书记》，乞书封面。今寄上，请交彼。”信中有“《书目表》，如再付印，请颂兄有暇为再校一过。因讹字尚多也”。[3] 次年《西政丛书》由上海的慎记书庄出版，收入汪凤藻在同文馆时所译《富国策》等32种，可见这是在梁的《西学书目表》出版后的社会反应使然。

【3】《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2~18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南洋公学译书院

南洋公学译书院是晚清公立译书机构时间不长而档案保存最完整的一家。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中，从《光绪东华录》、《朱批奏折》、《愚斋存稿》、批退原折等各方面辑校收录原件六件。但即使加上西安交大编《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的有关段落，它仍然是模模糊糊的。大致在光绪二十三年，南洋公学先设师范院，并附设外院（小学），师院学生编写课本教授小学。这些课本是南洋最早的出版物，现在只剩留两篇课文。次年南洋公学督办盛宣怀奏请设立译书院。当时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兵书，所以请日本驻上海领事介绍两位军官做翻译。译书自然以兵书为主。

戊戌政变张元济被革职回南方，李鸿章让盛宣怀安置，盛请他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张在1899年4月3日回复同意。[1]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二十三日张元济有长信给严复，一是要出版已有传抄流传的严复所译宓克《支那教案论》，请求同意；一是询问南洋公学翻译如何选书。表明张元济改变了原来盛宣怀的翻译想法。张元济信中问严复："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虽然请教严复，严复卖关子，说了一通他人如何不懂，所译"非徒无益，且有害矣。选书固无难事，公如访我，尚能开列一单也"。[2] 言下之意，必须登门求教，"书面请教不受理"！后来出书的选题谁出的主意不清楚。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647—649页，有一份《南洋公学译书院译书全目》，是一本书后附印的由苏松太兵备道1903年6月18日给示保护版权各书书目。共计列书53种，其中日本兵书17种，美国兵书1种。其余各书相当杂，从《原富》到《习字范本》。53种里有11种是课本，并不是译书院出版物。还有三部外国史：《欧洲全史》、《英国文明史》、《日本近代史》；这三本书就当时讲是一组了解外部世界的简明史。

【1】《张元济致盛宣怀》，《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100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2】《严复致张元济》，《严复集》，第3册，528页，中华书局，1986年。

南洋公学总理是何嗣锟，1901年春天病故，遗缺由张元济兼理。在严复同年四月二十五日给张元济信中说：“闻与同事洋友殊难得调，已向丞堂请退。”这“洋友”就是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辞职不知辞哪个职。信中还说：“此时外间欲办报馆译局者甚多……而昨得公来书，亦云拟于海上集巨股为此。”九月初二的信中说：“一昨见津报，言南洋公学译书局，丞堂以沈、费两公董其事，不知是否讹传。”[1] 沈者，沈曾植，从现存档案中同年九月五日裁撤监院福开森的照会，是“照会代理南洋公学总理刑部正郎沈”的；费，不知何人。张元济自己后来说：“于暑假前办理招考特班生及新生事件，即辞去兼摄之职，仍专办译书院事。”[2] 在南洋公学档案里有一份派送雷奋等三位到译书院的移文，此文就是给张元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3] 就是说在1902年夏张元济还在译书院。但光绪辛丑，即1901年，张元济或已经，或不久就投资于商务印书馆。就是说，有这么一年多，他既照料南洋公学译书院，还照料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在译书院从1899—1902年，前后四年。最重要是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既拿稿费，同时再拿版税的书。张无济在一封信中说到该书的印数：“今年（1903年）是书除某书肆租印三千外，由公学自行发售者仅及二千余部，其谁信之。”[4] 就是说一年中销数超过了5 000部。这样一部专门书一年卖了5 000册，在当时数量是非常大的。

【1】《严复集》，第3册，545页，中华书局，1986年。

【2】张元济：《追溯四十九年前今日之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27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

【3】《派雷奋等移文》，《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72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

【4】《张元济致盛宣怀信》，《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101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四、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在历史最长、影响很大的出版社。（图26）

无论从文化上或纯粹经营上，商务都是旧中国少数最成功的企业之一。它的成功有各种因素，其中之一是它的股东结构和人员结构有利于当时的企业发展。它的早期更是发展的关键。

商务印书馆的发起人是夏瑞芳、鲍咸恩二人，投资者是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张桂华、郁厚坤、沈伯曾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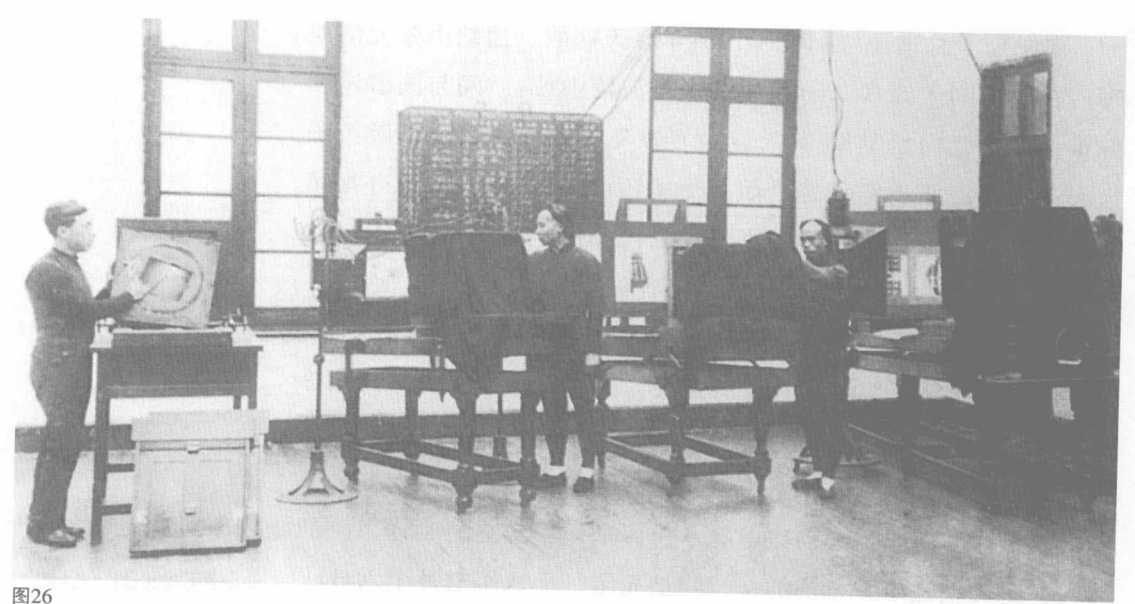


图26
商务印书馆照相制版间

集资3 750元。商务创业七位，除沈伯曾外，都是基督教长老会堂口的信徒。除了郁厚坤尚待查考外，都是长老会清心学堂学生；除了高凤池外，都是鲍牧师的子婿及姻亲，都兄弟相称。

光绪二十三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时，是个印刷厂。当时市场上翻印英国人为印度人学习英语编的初级课本Primer。商务次年也翻印，但在课本中夹注相应的汉字，使学生容易记忆英语单词和句子，书名《华英初阶》，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进而又以同样方式编印《华英进阶》1—5册。《华英亚洲课本》1—6册，《华英国学文编》1—5册。又出《英文初范》（简明英语语法）、《华英要语类编》、《增广英字指南》和《华英地理问答》（对照读物）。并将国人编的第一本英汉词典，邝其照编的收词二万的《华英字典》增扩至四万词，名《商务书馆华英字典》。这是在“庚子岁（1900年）巧秋之月”，商务出版物上的广告所见。

这些大都由谢洪赉所编纂。谢洪赉是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 1850—1924）在苏州传教时在东吴书院的得意学生。毕业后一直在潘慎文身边帮助翻译。1896年潘调任上海中西书院时随同到中西书院任教授。根据侨居美国的郁为瑾先生的信，我们知道商务原始股东和谢洪赉之间的宗教、世交和姻亲状况：美国北

美长老会差会传教士在宁波办有崇新书院。崇新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中（毕业于1860年后）有鲍哲才，他是宁波鲍家塔人；有郁忠恩，他是宁波石柱头人；有谢元芳，绍兴人。鲍哲才去上海南门外清心堂任牧师，清心堂办有清心学堂。他有3子（咸恩、咸昌、咸亨）3女（长适张桂华，次适夏瑞芳，三适郭秉文）都在清心求学。清心学生中有张桂华、夏瑞芳，后来成为他的女婿；有高凤池，先在美华书馆任华经理，后来投资商务；现在知道商务早期重要干部包文德也是清心学生。郁忠恩毕业后在宁波陈埠头设堂作牧师。他有2子4女。长子厚坤，娶谢氏；长女适鲍咸昌；二女适翁学雷；三女适陈家恩；四女适马君武；幼子厚培，生于陈埠头，娶余氏。谢元芳，毕业后任巡回牧师，在余姚一带传教。谢元芳有二子一女：长子谢洪赉；女，适鲍咸昌；幼子谢宾赉。[1]

前述可见：由于郁忠恩将女儿嫁与鲍家，并娶谢家女为儿媳，使鲍、郁、谢三家成为姻亲。他们的第二代相互有往来，其中有九人（鲍咸恩、鲍咸昌、鲍咸亨、张桂华、夏瑞芳、郭秉文，郁厚坤、郁厚培，谢宾赉）在商务工作或参与商务活动，谢洪赉之成为商务第一位著者，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如此集中在英语，是很自然的。

商务印书馆早期的核心人物是夏瑞芳。陈原同志在叙述张元济事业时提到有三位支持者，其中之一就是夏瑞芳。并说："近来有人对夏略有微词，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夏不得人心，不会有几千人为他送葬，蔡元培也决不会为他作传。蔡元培对夏的评价是把他同商务这个文化事业联在一起的，说他虽死了'而君所创设之事业，方兴未艾，及其于教育之影响则展转流布而不能穷其所届，虽谓君永永不死可也'。"[2] 陈原同志所说"略有微词"之一，是指求发展而言。作为企业负责人的夏瑞芳，谋求企业发展是极正常的，有人以流言说夏瑞芳为贪发财，买进数以百计粗制滥造的"新学"译稿，印后没人买，于是求南洋公学"代为改译，很久都未完成。他意识到，要搞好翻译书籍的出版，非自己

[1] 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创业诸君》，《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20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2] 陈原：《读张元济年谱》，《张元济年谱》，卷端，4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办编译所不可”，并请蔡元培当编译所长，张元济投资。云云。[1]办事极端认真的张元济会对如此鲁莽的夏瑞芳经营的小厂投资，是极站不住脚的说法。当时因为委托商务印书馆印书而和夏瑞芳交往的包天笑回忆说：夏瑞芳“极思自己出版几种书，但不知何种书可印，何种书不可印。不过他很虚心，人家委托他们所印的书，他常来问我是何种性质？可销行于何种人方面？当然他是为他的营业着想，要扩展着他的生意眼，忠实于他的事业。他又常常询问我：‘近来有许多人在办理编译所，这个编译所应如何办法？’我说：‘要扩展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译部不可。应当请有学问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则专心于营业。’夏君摇头太息道：‘可惜我们的资本太少了，慢慢地来。’”[2] 这是符合商务印书馆当时的资金实际和夏瑞芳的办事作风的。和上面讲南洋公学译书院时，引严复信里提到，张元济“亦云拟于海上集巨股为此”是相符的。当时的社会习惯，只能是张元济找夏瑞芳。“略有微词”之二，更是莫名其妙，说夏瑞芳在1910年动用公司公款去炒股票，亏蚀巨款导致变卖公司资产，又使流动资金短缺，云云。《张元济年谱》编者将之列入一条，这是不考核材料的结果。此说本是无聊文人“报屁股”文字。其实，所谓1910年“股票”事，是“陈逸卿事件”导致的上海金融危机，夏瑞芳当时的股票买卖不仅没有亏蚀，而且赚了相当大一笔：40多万元。

1901年夏季，商务印书馆的资本从3 750元变成5万元，新增张元济、殷有模两位股东。商务印书馆的出书开始变化。在1903年农历九月出版的《版权考》一书后面所附的可供书目中，有《帝国丛书》（1902年）、《政学丛书》（1902年）、《财政丛书》（1902年）、《历史丛书》（1902年）、《地理丛书》（1903年）《商业丛书》（1903年）、《传记丛书》（1903年）、《战史丛书》（1903年）《说部丛书》（1903年）等10种丛书。计90余种社科和文学书。除《说部丛书》外，其余和当年间严复的“政治、法律、理财、商务”基本一致。而1903年九月后，不再有类似书籍或丛书出版。直到1908年12月才有《少年丛书》出版。我们知

【1】贾平安：《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54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236~237页，香港大华，1971年。

道，1902年夏天清廷公布《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农历十月初一商务印书馆吸收日本民间资本。或许可以说，1902年至1903年9月这类书的出版，和张元济的加入有关系；而1903年10月后不再出版类似著作，与兴学上谕和中日合资有关。张元济参加股本后新出的十种丛书，除《说部丛书》外，中日合资后均不再在可供书目中出现。这种变化，反映了当时读者的真实需要并不和张元济的想法相一致。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次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八月初命令兴学。兴学令中，有“并多设蒙养学堂”，蒙学堂相当于初小。但是清廷并没有规定学制和课程。庚子事变促使张元济兴学思想有了重要的变化。以往，他致力于俊秀教育，办理通艺学堂，组织年轻京官和子弟学习英算等学。庚子事变，给东南读书人启迪颇多。次年，1901年，张元济和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蔡元培和教习赵从藩合办《外交报》。宗旨就是提倡“文明排外”。显然义和团的教训，足够使关心国家前途者认识全民素质的重要。张元济1901年底为《教育世界》著文，题为《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其中提出，办学首先不要有培养人才的思想。因为注重人才教育，所操必狭，所得必少。在还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这思想是很先进的。接着谈到课程和课本。说切忌以“讲求西学”和以英语为重要课程。“勿沿用洋人课本。童子于入学之始，脑质空灵，先入一误，始终难拔。勿论洋文读本，宜自编纂，即华文教科书。各教会学堂所刊者，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愚意均不可用。最上速自译编，其次则集通儒，取旧有各本详加改订。虽未必佳，而流弊要较少矣”。[1] 在这宗旨下，商务印书馆请曾在绍兴中西书院任教，因为宣讲新事物被见忌而到上海办私立书院的杜亚泉编纂供三年用、名《文学初阶》的蒙学读本，于次年夏天出版。

《文学初阶》出版后不久，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为四年，有八门课程。蔡元培提议，由爱国公学教师担任分课。但只有两位教师任担三门课程课本。不久商务中日合资，资

[1]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170~17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本增加；聘请多位既有国学底子，又有新学基础，而且有过教授蒙童经验的青年学者；日方派三位有编纂课本经验的编辑出版人员指导。这三者是当时所有编辑教科书的机构、人员都无法企及的。这将在第八章详细记述，此处不赘。

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成功，使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高，有资金在各地开设担任发行的分支馆，进而使发行量和外地销售户的欠款回收率大幅度提高。另外，它有充裕的编辑人员，能从事与有关课程教科书配套的教授书和教育学书籍的编纂，并且举办免费的师范函授教育。当时新式教育初兴，学校教员多由原有塾师转来，或即无力参加乡试的读书人，他们对新式教育并不熟悉。这些函授教育的措施和书籍，有助于他们教学水平的提高，也必然获得学生家长的好评，对商务印书馆自然产生一种亲近感。这种亲近感又反馈于课本的销售。商务编写教科书不仅选择适当人才，而且不惜工本，又每册编写教授书，办师范函授，编写教育学书籍，将教学用书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多元架构，其总体水平没有哪家出版社能望其项背，对社会的贡献颇大。蔡元培当时亲眼所见，所以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我国旧时“村塾课本，则大抵粗率不求精也。……清之季世，立学校，始有教科书之名。为教习者，以授课之暇编纂之，限于时日，不能邃密；书肆诎于资而亟于利，以廉值购而印之，慰情胜无而已。近始有资本较富之书肆，特设编辑所，延热心教育之士专任其事。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他说商务印书馆“而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为小学教科书。其事在我国为至新，虽积学能文之士，非其所习，则未易中程式。往往一课之题额，数人各试为之，而择其较善者，又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遗憾焉而后写定。其预拟而为目，综合而成编。审慎周详，无不如是。编辑者之日力，缘是而虚糜者颇巨，不敢吝也。教科书以外，又有教授法参考书，非学生所需，售数远逊，然亦尽心力以为之。是以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糙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

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1]

在经济实力、编辑队伍、销售渠道、信誉培植到达一定水准后，商务印书馆又组织出版竞争力更强的书籍。

五、中国图书公司

光绪三十年（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获得成功后，就遇到废科举。先是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张之洞有长篇会奏，请递减科举名额，以鼓励学校。“得旨：政务处会同礼部妥议具奏。”[2]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拟订章程的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上奏该章程的同时，提出因为学校与科举并举，学生有观望而学校难以发展。提出年初会奏被命政务处议奏而始终没见结果，他们提出，“乡会试中额，请自下届丙午（光绪三十一年）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会试］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试。”[3] 这要10年时间。该项办法没有理由反对，但军机处有个别大臣反对。所以最后拖一条尾巴：说“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有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4]

不到半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三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督抚联名上奏：“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年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直截了当地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5] 这六位督抚管辖全国最重要地区；当时7位军机大臣中有3位在辛丑时也是军机大臣，正是他们在辛丑“新政”中提出兴办学校，还有头年建议废科举的荣庆。所以军机处代拟的上谕说：“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6] 科举停止，学校教科书的需求大大提高。当时唯一有完整中小学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销路大增：“本年共销货约八十七万元。溯近年书业之发达，未有甚于此者。较之上年生意四十三万元，既加一倍，与前年之销数三十万远约增二倍。想下年之兴象正无

【1】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228~229页，中华书局，1984年。

【2】《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4997~5000页，中华书局，1958年。

【3】《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5128页，中华书局，1958年。

【4】《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5129页，中华书局，1958年。

【5】《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5390~5392页，中华书局，1958年。

【6】《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5392页，中华书局，1958年。

[1]《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结彩清册·卷端董事叙》。

可限量。"[1] 当年扣除了沉积资本和折旧备抵（depreciation reserve）后的净利润竟达资本额的73%。

这样大的净利润，不免引起他人眼红。在商务印书馆的《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结彩清册》发出后三个月，《申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有一则《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招股缘起（代论）》。

这篇"招股缘起"而名"代论"。"代论"提出四点：(1) 教育是国民基础，教科书规定了教育水准［和方向］；废科举兴学校，但没人注意于教科书。(2) 教科书是靠编辑、印刷、发行而流传。所以谁掌握编辑、印刷、发行，谁就掌握了教育权。现在爱国人士常说保国权保教育权，但没人注意教科书。(3) 不是没有人关注教科书，而是资本最大的教科书书店是外国人（直指商务印书馆的中日合资）；听说这外国人还要以更大资本经营我国的书籍业。(4) 大可以兼小，强可以并弱。教育之权要维护，教科书的权不能旁落，我们要努力集合力量设立统合编辑、印刷、发行教科书的机构，上保国权，下免侵略。这就是中国图书公司所以发起的原因。

十天后，四月十二日，《申报》刊出《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章程》。"章程"除简述缘起外，提出计划招股100万元，先招50万元。这个章程署名的有张謇、曾铸、马良、刘树屏、席裕成、席裕福等二十四人。他们都是上海一带各界名人。

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年底股本是30万元。光绪三十二年年底股本是403 500元，加光绪三十一年公积金808元，光绪三十二年资金最高时为404 308元，低于中国图书公司的50万。张元济的声望低于张謇。中国图书公司编译部长是沈恩孚，他是各省教育会中势力最大的江苏教育会的会长，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实际执行人高梦旦的声望也高很多。从资金数和人员声望，中国图书公司都比商务印书馆强，但最后，中国图书公司没有能把商务印书馆挤出局。经过8年较量，原有50万资本的中图公司在1913年被商务印书馆以118 641元收购了；而那年商务印书馆的股金

加上年公积是1 853 370元，当年净赢余是366 151元。

中国图书公司以雄厚实力而垮台，其教训值得探讨。同时代人蒋维乔说，中图公司的垮台是一开始就铺摊子，将流动资金全部冻僵，业务没钱运行。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恐怕不尽如此。

从它的“章程”看，失败的另一个原因，钱是股东的，花钱而创办人得利，必大手大脚。为了拉股东，中国图书公司规定“另设红股二厘半，以酬创办招股之劳”（这是干股）。“股本息官定常年八厘，红股利息特别酬劳，照常股加倍，常年一分六厘，”——即红股虽为2.5%，实为5%。50万股本，每年付8%的官利4万，加5%的红股利息为2 000元，实付4.2万元，不管赚钱亏本都得付。这红股利息基本是创办人得。生意又不好，每年4.2万股息，50万股本能支撑几年！

六、贵阳文通书局

文化和出版虽然能推动社会发展，但需要社会经济水平来扶植。晚清出版业集中在上海，东南中等城市则有小规模印刷厂，依托交通方便，文化、出版需要尚可满足。边远省份则比较困难，如果当地没有报纸，往往仅有一些不成规模的印刷所。然而贵州贵阳有个文通书局，从光绪晚年创办，直到1952年；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后方的文化作出一定贡献。

贵阳文通书局由华之鸿创办，先是印刷厂，后来向发行，再向出版发展。华之鸿在当地可以说是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家。创办时间有两说：华之鸿哲嗣、后来接办文通书局的华问渠说，筹备于1898年，到日本买设备和培训工人，“于1900年正式开张营业”。[1] 但他就开办原因说，他父亲“拟为地方谋一福利。适清朝停止科举，举办学校，同时提倡兴办工业”，[2] 则当在1905年下半年之后。何长凤的《贵阳文通书局（1909—1952年）》，在书名上就认为是1909年。此又一说。

贵阳文通书局开始时的设备有相当规模，且均从日本采购新设备。贵阳地处边陲，又多山，交通闭塞，为就地解决纸张，先

【1】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39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2】华问渠:《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和经营》,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3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在附近组织生产，后开设机器造纸厂。此时已入民国。

第三节　新一轮翻译的开始

“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这是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所说。[1] 梁启超说“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最能发挥”意思是后来没有像吸收佛教那么宽容。其实，从唐代《开元释教录》记载，共有178位主译，译经968部，4 507卷。数量很大。但这是从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唐开元十八年（730年）664年的成绩，平均每年仅一种半，六卷多。而到共和国建国前夕，北京图书馆所藏和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版本室所藏翻译著作实物，共有6 686种。从同治六年（1867年）至1949年83年计，平均每年有80种。[2] “五四”以前翻译图书北京所藏寥寥。1958年台北“中央图书馆”编纂的《近百年来中译西书目录》，收录从目录汇录得译自西文的图书计5 047种。它以极大的政治偏见收录，又不收译自日文的书，会有很多漏收。实藤惠秀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从明治1868—1979年110年间，共收录译著5 765种(次)。实藤目录5 765种是和台北目录5 047种完全不重复的，合计10 812种，平均每年100种。出版总署编译局目录收录有相当大量是上述两目录所不收录的。如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流派、俄国民主主义、苏联著作。而上述3个目录，都不包含《东西学书录》和《译书经眼录》。应该说，近代100余年翻译外国著作的数量远远超过佛教翻译。

【1】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7册，3805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

【2】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编:《全国翻译图书总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951年。

季羡林说：我国文化是有变化的：“汉唐时代，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当时长安是世界上文化的中心。其他朝代则不行。到了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我们则努力‘西化’，恢复汉唐之光辉灿烂了。但是不管经过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道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回答是：倘若拿河水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

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用大矣哉！”[1] 翻译在近代社会、文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1】季羡林：《中国翻译词典序》，《中国翻译词典》，卷端，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季先生所说“从西方来的水”，可以从明末利玛窦开始。但直到清末甲午战败，翻译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有三个内容。一是国人成为翻译的主体，不再是外国传教士的事。从选题到具体翻译，都是国人。其二，翻译数量大增。第三，所译书与社会进步发生密切关系，因而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可以说，自严复开始，打破了传教士对西学介绍的垄断和仅仅局限于格致、史地等的肤浅介绍，而从一个新水平上引入西学。而我国学术突破了经史子集分类的传统，进入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逻辑等等现代学术范畴。

一、介绍近世思想第一人——严复的翻译

近代翻译介绍西学，严复（图27）自然不是最早，但从理论层面介绍西方学术，他是第一人。严复所译以《天演论》最为著名，《天演论》的原书叫《进化与伦理》，作者赫胥黎是庸俗进化论者，用研究生物界进化的理论推演人类社会的变化。而人类社会到一定阶段是需要用强力革命的，这是生物界所没有的。中国在当时，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制度和为这两者服务的政府，需要革命，才能谋得民族解放和民众翻身，而不是等漫长的演化。但是严复就当时民众还没有觉醒，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惊醒民众，却发生了很重大意义。

图27(a)
严复像





图27(b)
《天演论》(光绪二十七年富文书局本)

胡适说："自从《天演论》出版（1898年）以后，中国学者方渐渐知道西洋除了枪炮兵船之外，还有精到的哲学思想可以供我们的采用。"所以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1] 非常自大的康有为，为唐才常自立军之役被杀戮和追捕者去信责备张之洞，说严复是"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2] 鲁迅则"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3] 感觉锐敏，有针对性地译书，是严复翻译的一大贡献。

严复翻译的另一贡献是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第一句话："译事三难：信、达、雅。"[4] 虽然他的《天演论》译文大家都认为并没有做到"信达雅"三字。《名学浅说》他甚至将自己的看法混在译文中。但在需要大规模翻译的前夜，他第一个提出了翻译标准，使人们明确对翻译质量要有一个探求，其功绩和他的翻译实践是不相上下的。他之以"信"列首位，与当时翻译状态有关：他说："闻友人言，已译之书，如《谭天》、如《万国公法》、如《富国策》，皆纰谬层出，开卷即见。夫若是，则读译书者，非读西书，乃读中士所以意自撰之书而已。敝精神为之，不亦可笑耶？往吾不信其说，近见《昌言报》第一册译斯宾塞尔《说进》数段，再四读，不能通其意。因托友人取原书试译首段，以资互发。乃二译舛驰若不可以道里计者，乃悟非过当也。"[5] 他还附了第一段两个译文的对照：《昌言报》计27字符，而他请人译的有590字符。可见提倡译文的"信"，在当时的意义。

严复翻译著作共10种190万字，其中按语19万字；在他逝世后，商务印书馆汇集重要的8种成《严译名著丛刊》。严复是把翻译和民族危亡紧紧相连系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光绪二十

【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107页，中华书局，1993年。

【2】《康有为与张之洞书》，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二)，5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3】鲁迅：《热风》，《鲁迅全集》，第1卷，2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4】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1321页，中华书局，1986年。

【5】严复：《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90~92页，中华书局，1986年。

五年三月左右严复给张元济信中说："复自客秋以来，仰视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仰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1] 变法失败后在悲愤中见到的唯一前途就是了解西方。不几天信中又说："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2] "于新理过于蒙昧"，直指以往所有译著并不适合国情，所以要"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必须选择合理。他的译著连按语今天已经陈旧了，但他有关译书选题必须贴合国情的意识和主张，却是留给出版工作者的宝贵遗产。

[1]《严复致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525页,中华书局,1986年。

[2]《严复致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527页,中华书局,1986年。

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在1899年前，译毕已经是20世纪了。斯密的著作是18世纪的。100多年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有极大变化；而且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严复翻译这样一本旧书似有针对性。斯密的书以历史事实指出，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国家对经济生活采取不干涉政策，即自由经济政策。而当时，清政府对新兴的制造业采取干涉、"专利"政策。

严复译介的西学著作还有《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名学就是今天的逻辑学，是严复在《穆勒名学》第一条按语中开始用的。[3] 逻辑作为治学的门径，我国古代就有，先秦诸子中墨、荀就有很多论述思维的形式和本质。由于历史环境，两千年来以儒学思想占统治，墨学中绝，逻辑学发展缓慢。以至形成传统思维方式缺乏严密逻辑系统。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因为很繁琐，也反响不大。严复早在戊戌政变前夕在北京通艺学堂演讲时，就向通艺学生讲"西学门径功用"，其中一段就谈到推理。[4] 严复介绍西方逻辑，是他介绍国人学习西学的必然之义，惜乎前者没有译完。

[3] 严复:《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1027页,中华书局,1986年。

[4] 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1册,94页,中华书局,1986年。

严复按时代需要选择选题，自然以他的认识为根据。另外，他常以按语"指点江山"。如他1903年翻译穆勒的《论自由》(J.

S.Mill：*On Liberty*），改名《群己权界论》。其用意在使人正确地理解自由的全部涵义。因为他觉得自从自由、平等等词流传后，有些人认为个人不再需约束。所以，他将书名注重在“己”权的界限上。但他后来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看法又大大后退。他于1914年在梁启超编的《庸言报》上发表《〈民约〉平议》一文，对卢梭《民约论》表达他的异议：“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自不佞言，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甚至说：“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又说：“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险压制，更甚于独夫，而亦未必遂为专制之利。”又举舰船在遇风险时，必不能集全舰人员表决行动方向，而宜由舰长。[1] 可见，要想使出版能有利于国家，出版人的思想必须符合社会进程。

【1】严复：《民约平议》，《严复集》，第2册，337页，中华书局，1986年。

二、严复同时代人译书

说严复是“近世介绍西学第一人”，还在于他的翻译水平。翻译绝不是把一个外国词变成一个汉字，——照猫画虎。译者面前是一本外文书，它讲一件事或一种学问。只有译者不仅能读这种外文，而且懂得这门学问。有了这两个条件，再仔细研究，领会一本书的独到处，然后用中文很好地全面表达出来。但是，我们祖宗历来看不起翻译，称为“舌人”。舌人仅仅能懂一些日常用语，担任普通交往而已。所以读书人概不学外文。这本不成问题。但到了甲午后，就成了大事。我们的前辈知道日本学了西方，兴旺起来。要学它，根本就是学西洋。而原来传教士曾介绍过一些。现在他们不再做这些事。这时我们才开始接触留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底清政府派唐宝锷等13人留学日本。接着去得更多。

在国内，最早1897年初罗振玉等在上海办“农会”，农会的宗旨一为垦沙滩，一为办《农学报》。《农学报》为旬刊，当年4

月创刊。它实际是定期出版的农学小册子丛刊，请日本人翻译农学小书。间有国人著的国内地区农业调查。它在戊戌政变时，因为是宣传农学，不受慈禧禁止办报的约束，一直办到1905年底，共出版农学小册315种。1898年二月，罗振玉等成立东文学社。请《农学报》社日本翻译教授日文和英文。到“庚子之变，［东文］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又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1] 东文学社是国内第一所有成绩而是民办的外语学校，虽然规模小。从《农学报》小册的译者看，开始全是日本人，不久就有国人的译品。罗振玉办东文学社是从培养翻译人才出发。在章程中就规定：“社中学生学习至数月后，令其学习翻译。所译之书，由社中印行。”[2] 当然很可能经过日本教师的修润。1901年，罗振玉等又办《教育世界》，和《农学报》有相同处，即是有翻译的小册，其中国人翻译的很多。王国维（《教育学教科书》、《西洋伦理学史要》等等）和沈纮（《家庭教育法》、《简便国民教育法》、《小学教育法》、《欧美教育观》等等）以及钱单（《女子教育论》），都是东文学社学生。

在日本，留学生是一支重要力量。冯自由说：“庚子年戢元丞等办《译书汇编》。留学界出版之月刊，以此为最早。所译卢骚《民约论》、孟德诗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名著，促进吾国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3] 梁启超也谈到留日学生办译述：“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能输入文明思想，为我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4]

甲午战败使译述成为救世良策。译书成为出版的主流。它的数量之大，门类之全，变化之快，体现了如饥如渴的求变思潮。从当时的目录看就很惊人。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所收录几乎全部是基督教昔日所译。1899年徐维则辑《东西学书录》，印成3册。而仅隔2年，顾燮光为之增补，成6册，1902年出版。顾燮光后来又接续《增版东西学书录》，以他在1902年至1904年间所见新出各译本，成《译书经眼录》8卷。共533种。这

【1】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王国维遗书》（五），19页阴面，上海古籍书店。

【2】《东文学社社章》，雷绍锋：《王国维读书生涯》，1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3】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143~144页，中华书局，1981年。

【4】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7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个数字在当时是非常大的。1946年8月，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了杨寿清著的《中国出版界简史》。他在“日本书的翻译”一题里，将《译书经眼录》按内容类别和原著版本统计成表，给我们一个较为具体的影像。[1] 杨著现在很难找，张静庐把这个表收入他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在99—101页上，可以见到细目。从细目看，533种书里，译自日文321种，占全部的60.23%；其次英国55种，占10.32%；美国为32种，占6%。按原目录25类内容统计，各国历史书125种，地理46种，史地两类共171种，占全部的30.08%；法政70种，占13.13%；教育48种，占9%。

【1】杨寿清说："兹根据《译书经眼录》所收目录，统计光绪末年的译书。"而《译书经眼录》在"略述"中说明，所录仅是1902年至1904年间的译书。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到，当时读书人关心的是了解外国一般历史，以资借鉴。其次是法政和教育。但是顾燮光所“经眼”的很不全。如教育类，《顾目》为48种。而仅以宣统三年《涵芬楼普通书目》“教育类”中光绪二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年出版物计，《顾目》没收录的教育书就有66种。《顾目》虽然不全，无损于它所表述的一般状态。

译自日文的特别多，这是历史实际和认识造成的。要大规模引进西方学说，已经到了必须国人自己译的时候，必须派大量学生留学。在欧美的生活费用，从一份1906年的《为划一洋员薪水》的意见书中在提出了聘用日本人，按学历分为100、200、300元三挡，如果聘用“欧美人则照前例改元为两。”[2] 银元重量为0.723两，它不是纯银，一般说一银元所值是一两银的70%左右。推而算之，留学西方仅生活费用就要比留学日本多1/3。此外船费、学费也不同。这是从经济实际考虑。而主要是认识。日本书面文字开始采用汉字，后来有平假名片假名等表音符号。当时高深著作满篇汉字，仅仅需将语序和虚词转换，就变汉文。梁启超1896年在《变法通议·论译书》中说：“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捍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3] 他到日本

【2】张元济：《为划一洋员薪水致学部堂官书》，《张元济诗文》，126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3】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50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后，次年又发表《论学日本文之益》。张之洞在戊戌年《劝学篇》中有《广译》一篇，在说论各种外语的用处、利害时说："至各种西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1] 顾燮光后来在《译书经眼录》的《自序》中说："壬寅（1902）以还，世尚游学。扶桑三岛，一苇能航。和文移译，点窜便易成书。然瞬息已成故纸。"[2] 译自日文的书"瞬息已成故纸。"一方面说明译书数量多，另外也得承认"点窜便易成书"的译文质量不高。但就是这些译文质量不高的书，对于国人大规模了解外部世界起了很大作用。

【1】张之洞：《劝学篇》，46页，上海书店，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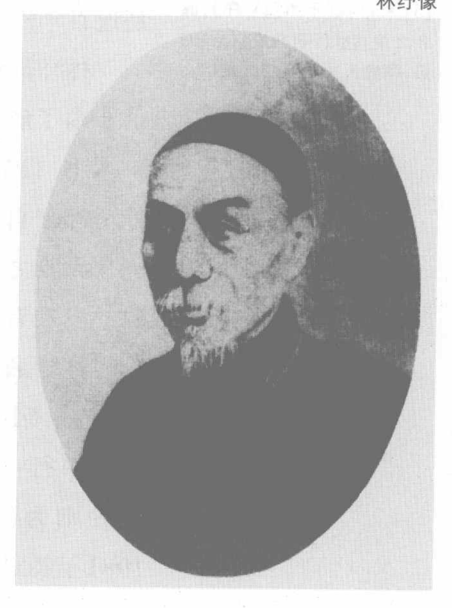
【2】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王韬等：《近代译书目》，40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三、不识外文的翻译家——林纾

康有为有句诗，夸严复、林纾，结果得罪了这二位。诗句是："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与林纾（图28）虽是朋友，有诗句互赠，但当以译才并列，严复就大不满意。而林纾以二人翻译数量计，列在严后而大发牢骚。其实林纾并不能与严复比肩。严复翻译时代，虽然人们已经认为"坚甲利兵"之类是首要，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正如日中天。而且所说西学，实在是鸡零狗碎、"中士所以意自撰之书"的片言只语而已。严复开始系统地，有目的地选择译作，而且译笔好。

【3】林纾：《〈不如归〉序》，薛绥之编：《林纾研究资料》，10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图28
林纾像



林纾虽不懂西文，但由于他与口述者的关系，他并不是以前传教士翻译时那种简单的"笔受"者。在他的多种译书的序、跋中可以看出他的主动活动。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的文学倾向而否定他前期的翻译活动。

林纾的文字中，最能见他热血的是美国排华时译《黑奴吁天录》的序跋。他在《不如归》的序中说："余译书近六十种，其最悲者，则《吁天录》，又次，则《茶花女》。"[3] 当是两种不同的悲：前者是悲愤，后者则是情悲。他是在美国严禁华工，而清廷对此毫无作为时翻译了《黑奴吁天

录》。和译《茶花女》不同："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1] 书"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2] 并且在跋中指出，美国因检疫而辱及日本人，日本人与美国抗争。而美国对华人检疫百般刁难，美国私拆中国人信件，而清廷从不抗争。他希望"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3]

【1】林纾：《〈黑奴吁天录〉跋》，薛绥之编：《林纾研究资料》，10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2】林纾：《〈黑奴吁天录〉序》，薛绥之编：《林纾研究资料》，10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3】林纾：《〈黑奴吁天录〉跋》，薛绥之编：《林纾研究资料》，10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他推广"勤求西学"。当时守旧的人对外国人总有一种排斥心理，所以不愿读西学书。其理由之一是"欧洲人常不孝养父母"。有人据此而不尊敬父母，他说："于是，吾国父兄疾首痛心于西学，谓吾子弟宁不学，不可令其不子。"他指出这种想法没有根据，而据小说中为报母仇而宁愿放弃巨额财产而冒生命危险的故事，指出西方也有伦理观念。说："忠孝之道一也，知行孝而复母仇，则比知矢忠以报国耻。……盖愿世士图雪国耻，一如孝子汤麦司之图报亲仇者，则吾中国人无有志矣！"[4] 这些序跋的文字，在当时社会能不能起作用是一回事，但他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5] 这拳拳之心，正是近百年间涉及出版的文化人的基本思想，是今天出版人的榜样。

【4】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薛绥之编：《林纾研究资料》，10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林纾：《〈不如归〉序》，薛绥之编：《林纾研究资料》，10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是继科技、政治学说之后，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人生活的文艺窗口。其实还有一件：林纾译的第一本书《巴黎茶花女遗事》，他署笔名"冷红生"。第二本开始，他全部署自己姓名。由于他是著名古文家，他这样做，使历来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为士人所接受。这件事对后来我国小说、戏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林纾翻译的总数至今不太清楚。郑振铎在1925年林纾逝世后不久在《小说月报》上说他共译156种，其中132种已经出版（当指已单行——引注），有10种散见于6—11卷《小说月报》，尚有14种则为《小说月报》改版后的未发稿。台湾马泰来收集后，1981年经过商务印书馆一位专家补充，共179种。樽本照雄编辑

的知见书目《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著录林纾译著为1 085版次。他的译文被认为好的不少于40余种。

林纾翻译有一个原书的版本问题。林纾所译，当年绝大多数书名不是直译。最早是郑振铎，此后又有几位国内外学者对林纾所译的原书作了研究。至少台湾马泰来的《林纾翻译作品全目》和日本樽本照雄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是尽量查清了原书名。但有一个用什么版本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林纾大多数译本，与原著在分量上有很大压缩。郑振铎说沈雁冰对他说过，司各脱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1] 沈雁冰是在停编《小说月报》后编辑《中学国文补充读物》时接触林译该书的。但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确实仅及原书1/4，不是原文用西方删节本，很难做到既删节又“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而且除《茶花女》等极少数外，中文本篇幅都大大小于原书。林纾的合译者有几位，外文水平和文学水平不很整齐，由林纾的合译者删节是不可能的，不是林纾所有的合译者都能胜任的。估计当时采用英国麦克米伦这些书店供学生阅读的文学节本为翻译母本。合译者中没有懂俄文者，托尔斯泰的作品也只能用转译本。茅盾的印象只能说明林纾他们确实使用了一定量的英美出版社供儿童用的删节本。

[1] 郑振铎：《林琴南先生》，薛绥之编：《林纾研究资料》，16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有一点要注意：林纾是晚清翻译小说起重要作用者，并不是最早翻译小说者。刊于1994年4月《中国文学报》第48册李国庆的《“林译小说”前的翻译小说》对此有专门叙述。

第四节　利润是出版的双刃剑

一、没有利润出版办不长

可以说，从宋代到共和国建国前，从古到今，从外国教会到中国寺院，出版靠拨款是办不长的。

远的不说，清代中央官刻规模之大，品种之多，刻品之精，真是无与伦比。但到嘉庆，国力衰弱，武英殿就无力刻书。如《大清一统志》，记录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户口、学校、田赋、职官等等资料。清代第一次由康熙帝命令修纂，至乾隆九年方始完成刻版。计356卷。乾隆二十九年重修，至五十五年成，习称“二刻”，426卷。到嘉庆又重修，是为“第三修一统志”，材料断至嘉庆二十五年，较二刻更详，计562卷，是我国疆土最完整时的记录。道光二十二年进呈后，因为没法调拨经费，直到清室已屋，始终没能刻。[1]《一统志》的重要，两千年前萧何就懂，[2]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4朝君臣70年居然没有去印。

外国教会受母会差遣，获得母会的经济支持。他们为了宣教，从1815年马礼逊开始就在马六甲等地办刊物。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进入。据1910年开始组织，1918年开始进行的调查，名为《中华归主》的大规模调查，在华“差会”达167个之多，[3]而该书正文第99页讲，1917年讲，当时共有173个差会团体，4 456位传教士。如此众多差会和传教士都有“文字事业”。该调查的第二章《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与进步》有一节名为《基督教文字事业》，讲：“1900—1921年间，大英圣书公会印行的《圣经》和各种单行本增长了四倍。但是，传教士的著作活动却出现了停滞。评论中国的英文书籍和评论基督教的中文书籍都出现了停顿。这表明传教士的著作活动不能适应中国教会或宣教师团体的发展。”[4]《圣经》和单行本印数增加，原因在于，1890年开始翻译的“和合本” (Union Version)《圣经》在1919年译毕的，当会大量印制推广。至于一般书“出现了停顿”，在该书的另一处，提到：“在这期间，有些重要杂志停刊了。这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财政紧张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5]但是，当宗教机构将宗教读物和世俗读物作卖品发行，就可能收回一定量成本，甚至一定利润。成本回收和利润使新品种有赖以产生的可能。李提摩太办广学会就用卖书送书兼有的办法。卖约90%，送

【1】张元济:《跋嘉庆一统志》，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131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2】司马迁:《萧相国世家》，《史记》，中华书局，卷53，第2014页:“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彊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3】《中华归主》，上册，卷端，27~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4】《中华归主》，上册，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5】《中华归主》，下册，10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约10%。使广学会维持的时间比其他机构大大延长。有一份1900年前的《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收书296种，刊物3种。奇怪没有记《万国公报》，算它就是300种。这个数字正是自西方在华机构译书以来从没有单个机构达到的数字。

我国传统有句话叫“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出自《孟子》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它影响于我国古代读书人，而对古代的出版危害大矣！因为这个“何必曰利”，必然不考虑收回成本，更不会有利润。所以，官刻必然在遇到财政匮乏时难以为继。大家言之甚多。实质等同官刻的书院刻书，除元代奉命刊刻外，一则，也受经济制约。二则，要碰到有学问而愿意做些事的山长。三则，所刻基本是高才生的课艺，很难说刻书成就。即使阮元指导的学海堂书院，课艺《丛刻》也仅收12人13篇25卷。至于从他之后到俞樾，前后主持的诂经精舍，嘉庆六年（1801年），阮元首刻《诂经精舍文集》14卷6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刻8卷4册；到同治九年（1870年）三刻11卷5册。同治九年所刻，最后有山长俞樾序。他说：“先是，每岁之终，录课艺之佳者而刻之。其后生徒日众，经费绌焉。庚午以后遂不复刻。”[1] 可见，从1801年到1870年，在鱼米之乡杭州的诂经精舍，70年间学生的优良课卷只刻了3次，共33卷。平均每年不足半卷，即10叶左右。俞樾所说“先是，每岁之终，录课艺之佳者而刻之”。实际是句假话，——每岁之终，并不能都刻佳课艺。所以书院刻书也不能成为一个能继续的事业。自宋迄清，无一例外。

个人刻书，主要是刻自己，或家人、师友的著作。因为古代个人缺少信息交流，没有图书流通的手段，个人刻书行之不远，主要用来赠与亲戚师友。所以在图书馆里，个人刻文集都是印刷清朗，可以说没有印版刓敝而致模糊的字迹出现。到明代，藏书家有把家藏罕见明元版汇集刻印丛书。到清代，爱国思想的曲折反映，流行刻郡邑丛书。凡是丛书，都是要设法流通的，而且书坊愿意代销。但是，一般说明清人刻丛书，很难刻多：善本丛书，刻一部就把家藏刻全了。刻郡邑，一次就搜罗全了。所以都

【1】俞樾：《诂经精舍文集序》，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料》，中册，187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很难把他当成一件事继续做下去。

作为复制社会热销书的坊刻，它的出版活动有利润。所以有能维持400年的字号，像扫叶山房。除了明末清中晚期有刻通俗小说外，坊刻它不增添社会信息资源。所以，它在运转，却是“长不大的”，在那个时代始终没有成为出版的主流。

二、利润回报社会出版才能壮大

出版而有利润，而且能壮大，两者得兼，并成为出版主流，开始于新出版。有维持百余年的，像商务印书馆。

“新出版”这个概念是沈雁冰晚年在回忆录里提出的。他没有具体讲新与旧之间的区别。他只是提到“张元济是新出版的辟草莱者。”没有其他内容。[1]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前面约略谈到，近代新内容、新形式的出版，有一个极值得思考的现象。先是马礼逊、麦都思、伟烈亚力等英国的及后来其他各国传教士，带来了新内容的出版物，并带来了近代印刷技术。不久，到19世纪60年代，丁韪良、徐寿等从事官办的新出版活动。他们的活动靠教会或政府拨款，没有后顾之忧。但这个优越条件都停止在一旦经费断绝，就成为致命的根源。所以教会系统和官办的出版活动都没有成为近代出版的大气候。近代出版事业的主流却是天天为钱发愁的民营新出版业。他们此起彼伏，汇成渊远流长的主流，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直负担着帮助进步、革命的任务，直到新中国的建立。他们能成为近代出版的主流，基本条件是社会需要他们，另外他们做得好，——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都成功。

新出版有不同于书坊之处。他们有分散在各处的同好，都在当地义务担任书刊的发行。如果有条件找到《时务报》、《外交报》等等刊物登载的各地发售处，从公馆到西药店都有。[2] 还有航船“当班带回”。它的发行远远超过古代家刻和坊刻的等客上门，发行量就大。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由于出版物发行量印数的扩大，出版物成本降低，意味少赔，或有了利润，或利润增加。

【2】廖梅统计，《时务报》在国内18个省有75座城镇，国外有5城市共202个代售点，其中主要是公馆、药房，书坊仅有11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70~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办这些出版的文化人，目的是宣传，有赢利不拿回家，将其投入再生产。出版的再生产，只要增加新品种，就是扩大再生产。以《中外日报》为例。他们就出版其他书籍，如《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是马尾福建船政局船政总稽查魏瀚在马尾作家刻。有影响，但流传不广。经过高梦旦介绍，将书版送给《中外日报》，即素隐书屋本，利用《中外日报》发行网，不仅发行了很多，也有盈利。汪康年陆续以赢余出版书。

因为文化是循着“马太效应”[1] 发展的，商务印书馆获得利润后增加设备、书稿、分销机构，形成良性循环，贡献是很大的。中国第一本近代学术著作，应该说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图29)。它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在1898年冬出版的。张元济1901年投资商务，1902年参加商务编辑活动后，商务的出版活动就更加丰富。

【1】《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3章第12节说：“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商务印书馆是股份公司，出版教科书成功后，随着经营规模扩大和利润的增加，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矛盾就日益显现：利润多分还是少分。利润分配，投资者希望马上拿回家，主张多分；经营者希望有力量扩大再生产，利润尽可能少分。往常，一般投资的固定年最低回报率是8%，称做“股息”。盈利多，则有红利。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矛盾就在这儿。商务印书馆经过几年后，提出了建立“股息公积”项目。一般所说的“公积”，是指盈余转入资本项目作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一般是盈余的10%。商务印书馆的经营者借用公积的概念，将应该分派给股东的红利，规定超过2%的部分，转入“股息公积”项目，留待红利不足2%时补足2%。这样，商务股东每年现得的股息比较稳定。规定股息公积积有成数，再转入资



图29
《马氏文通》

本。转入资本，必须有一个大数才能记入各股东名下。在没转入资本前，经营者实际有一大笔额外的资金可以运作。少分多留，就使商务印书馆在超过资本额承受力的情况下，资金上有力量办大投入的书。

大投入只有具有开创性的选题和高水平的操作，出版物才能获得成功，获得长远的回报。有了开创选题时，当资金不够、没有最合适的操作者的时候，是不能贸然从事的。商务印书馆著名的工具书《辞源》的编纂，就贯彻了这个原则。在当时，学旧学的遇到新的词完全不懂，[1] 学新学的碰到古汉语一窍不通。而且古代辞书都以字为对象，并且只是罗列用例，不加解释。这时独霸读书人书桌的《康熙字典》已陈旧了，需要融中西于一炉，以词汇为主干，并加以解释的辞书，以适应社会变化。高梦旦正是因为想编一部这样的辞书才在癸卯（1903年）年冬进入商务的。1905年宣布废科举，两年间商务在教科书上获得巨额回报，这些利润没有完全给股东，1908年用来开始编纂《辞源》。

【1】高凤谦:《新字典缘起》，陆尔奎:《新字典》，卷端，商务印书馆，1912年。

如果一心想利润，出版是做不好的。只求投资回报，而不回报社会，供应品种必然难以增加，而原有品种的淘汰，就使出版没法做下去。

一心想利润，就很难会去研究读者的需要，而是“跟市场”，也就是所谓“跟风”。跟市场是很难跟出名堂的。旧时出版主体，仅民国期间，就有8 200家，绝大多数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过分追求利润。

第八章　教科书的进展

胡锦涛主席指出："教育对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1] 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中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决定了我国漫长艰辛的近代进程中，普及教育以提高全民素质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是互为因果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教育是近代进程众多环节中最不可或缺的，因为国家落后，也是最必要而最艰巨的一环。

【1】胡锦涛：《2004年9月10日在第20个教师节接见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的讲话》。

第一节　对教育的艰苦认识

鸦片战争，特别中法战争后，人们由对吏治腐败的思索，开始检讨科举制度。虽然早在19世纪70年代王韬在《原才》、《原士》、《变法》等文章中提出废除科举是变法中第一要事，但和稍后提倡变法诸人一样，都没能提出废科举后如何得到知识分子，和现有读书人的出路问题。触及教育，谋求教育变化，成为风气，则是在甲午后。

最早是甲午战败后严复在光绪二十一年新正，在天津和夏曾佑等合办《直报》，连续发表5篇救亡文章。1895年5月1日至8日的《救亡决论》上指出"救之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2] 指出文化为少数人垄断："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

【2】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3页，中华书局，1986年。

而西国与东洋则所谓四民之众，降而至妇女走卒之伦，原无不识字知书之人类。”[1] 又介绍斯宾塞的理论：社会已经到了知识决定的年代，而且“各国皆知此理，故民不读书，罪其父母。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2] 应该说在甲午战败后读书人痛定思痛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最早的言论。

【1】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2页，中华书局，1986年。

【2】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8~49页，中华书局，1986年。

接着，黄遵宪在年底将早已刻好的《日本国志》发表，[3] 他在书里说，到明治九年，日本全国人口34 338 404人，[4] 学龄儿童为5 251 807人，其中就学的就达2 094 298人，内女生567 392人。[5] 政府筹措财政，每年拨付教育经费5 363 870元，另有公费学校公积基金752万每年子金82万7千，补助金545 004元；[6] 并且指出，日本还规定“取士官人之法，则不系乎此”。[7] 这种介绍日本普及教育后国力强盛，明治九年后18年，甲午就将我国打败的经历，显然有极大冲击力，成为读书人关注的题目。

【3】刘雨珍在《〈日本国志〉前言》中讲：“《日本国志》的正式出版大约在光绪二十一年底。”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4】黄遵宪：《日本国志》，第15卷，4页户籍表一、1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黄遵宪：《日本国志》，第33卷10页七大学区学事统计表，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6】黄遵宪：《日本国志》，第33卷，9页、3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7】黄遵宪：《日本国志》，第33卷，9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京条约》规定了英、法语在外交文书上的新地位，1862年据而开办同文馆。到光绪末年，清廷开设的与传统教育方式不同的、单科训练班性质的外语学堂8所、水师学堂7所、武备学堂18所，兵工学堂2所，路矿学8所，共42所。人们一直误认为这就是“西式教育”，并寄希望于这类机构的发展。上述42所学校相当于现在中等专业学校，培养清廷新的政治、军事的初级官员。在《清史稿》中，记述这些学校的文字列入《选举志》，正确切地说明了它们的性质。这些学生入学为做官；学校相当于培训班，没有上下衔接学校，生源缺乏科学知识，因而成就有限。这些学校的腐败等同衙门，与社会隔离，所以办学几十年，对社会发展没起影响。所以甲午后，其办学成绩成为人们考虑的中心：为什么这些教育机构没有出人才。梁启超说“其不能得异才何也”。[8] 人们慢慢感觉到关键在没有与之配套的次一级教育。

【8】梁启超：《变法通议》，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20页，北京出版社，2001年。

黄遵宪《日本国志》所叙日本义务教育制，学制以及经费保障；文中所述日本学校数和在校人数，以及女教员数和女学生数

等等，[1] 都是我国读书人闻所未闻。正值甲午战败之后，中国被视为蕞尔小国打败，黄遵宪的书受到大家重视。梁启超读后半喜半责说，读了该书才“知日本之所以强”，又责备书出版太晚：“乃今知中国知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2]《日本国志》经过《时务报》的宣传和代销，加以梁启超在发行万余份的《时务报》连载的《变法通义》中提出兴学校，普及教育的意义被更多人士所接受。此时民间已知仅仅办理同文馆之类不足以强国，开始看重基础教育。这时“开民智”已成为先进人士的共识。

戊戌变法时学校也成为议论的题目，政变后民间仍然在办“洋学堂”。严复在戊戌政变后说的极具代表性：“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仰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3] ——强国理想寄希望于民众素质的提高。

进入20世纪，对教育的关怀进入另一层次，即研究。1901年4月，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半月刊（图30），连续达7年之久。这是我国历史上对教育最早的系统研究。该刊以介绍东西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为主，并发表有见地的国人的意见。这时人们开始觉得不可依赖人才教育：1902年1月张元济在该刊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其中一条说：办学“勿存培养人才之见。非谓学堂不足以育人，然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4] 20世纪初开始的研究得

【1】参见该书第33卷7~13页，广东富文斋本，署光绪十六年。

【2】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时务报》，第21册。

【3】《严复集》，第3卷，525页，中华书局，1986年。

【4】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张元济诗文》，17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图30
《教育世界》

到的结论，实质是确立了普通教育的观念。

一个正常的国家，教育处在正常状态的国家是能理解的。对一个有强大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联合统治的国家，需要的是解放斗争，教育应该处在什么地位？中国人民面对的是强大和根深蒂固的反动统治，不是一朝一夕能推翻的。同时，首先考虑自己的千年来的小农思想民众思想还需提高，需要长期斗争才能获得解放；在解放斗争中，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民众素质的提高是斗争获胜的重要条件之一。教育直接影响全民素质。[1]

我国近代进程中各阶级和各派别对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主张和做法尽管有很大差异，但运用教育、普及教育这点是完全相同的，这就形成合力。即使资产阶级激进派，也不例外。邹容在《革命军》中论述必须推翻清廷后又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虽然，欲行破坏，必先有以建设之。善夫！意大利建国豪杰玛志尼之言曰：'革命与教育并行'。吾于是鸣于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译之曰：'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2]

陈天华也说：非洲原住民"全不讲求学问，欧洲各国，逐渐把他的地方瓜分了"。[3] 又说："第五要兴学堂，教育普及。各国的教育，前已讲明过了，中国此时尚不广兴学堂，真是无从救了。"[4]

他们二位是革命派中的激进者，提出了及时兴办教育的主张。陈天华说非洲原住民缺乏文化而被瓜分，邹容说："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接着说他钦佩华盛顿等的推翻母国的壮举，"吾崇拜之，吾倾慕之，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要不外乎教育耳……然一华盛顿，一拿破仑倡之，而无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和之，一华盛顿何如？一拿破仑何如？今日之中国，固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其事也，然必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乎有济。"[5] 在一个世纪前将革命理解为一个艰巨进程，认为需要广泛

【1】2004年9月10日胡锦涛主席在第20个教师节接见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指出："教育对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中具有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决定了我国漫长艰辛的近代进程中，普及教育以提高全民素质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是互为因果，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中，教育是近现代进程众多环节中最不可或缺，也是最艰巨的一环。

【2】邹容：《革命军》，35~36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3】陈天华：《猛回头》，26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4】陈天华：《猛回头》，36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5】邹容：《革命军》，36~37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有素质的群众参加，有这样的群众观是值得崇敬的。

蔡元培也认为民众素质的重要，办中国教育会，将提高教育的希望寄托于大众："韩婴有言，'磐石千里，不为有地，愚民百万，不为有民'。……比年以来，前知之士，固尝发教育改良之议矣。盖我民诚智，彼虽欲役，固有不能者。我民诚愚，彼虽欲事，亦有得者。此固强弱之总因，抑亦盛衰之枢纽也。而政府亦尝仿行一二，以塞众望。顾斯事艰巨，生死存亡，系于绵绵若存之一线。乃微观深察，则见其大谬不然。盖往往以形骸聋盲，当此巨任，是无异望近死者以复阳也！乌呼，海外同胞热心侠力，日日望宗国兴学校出人才者，而讵知宗趣若彼，孤我同胞之望者，至如此极耶！。"[1]

【1】《中国教育会为爱国学社募捐经费致海外侨胞书》，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6~117页，中华书局，1981年。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指出革命前教育所起的作用："盖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我国当革命以前，专制严酷，人无自由之权。然能提倡革命，一倡百和，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数十年来，奔走运动，都系一般学界同志之热心苦业，始得有今日之共和。今破坏已完，建议伊始，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2]

【2】孙中山：《民国教育家之任务》，《孙中山全集》，第2卷，423页，中华书局，1982年。

民间出版业者也说教育之重要："顾兴亚之原因不一，而兴学育才，实乃兴亚之一大原因。凡开矿、造币、筑路诸端，犹其后焉。"[3]

【3】商务印书馆：《亚洲课本·肆册序》，1901年。

从王韬开始，经30多年，人们对普及教育才逐渐成为共识。

第二节　对教科书的认识

我国自古重视学校，20世纪初关于教育的变革，根本不在形式，重要是用什么给学生，即教科书问题。教育关系国家命运，甲午后教育必须变化已成定局。关心它的多元化力量表现在争取掌握教科书，作为掌握教育方向的重要手段，都要在这领域有所表现。

以守旧力量为代表的清政府，虽也说要强国，庚子后甚至命令办新式学校，但本质害怕新式学校，与日本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对基础教育经济上不加支持，高级学校毕业则与功名联系，从根本上妨碍教育普及。早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刚命令办京师大学堂，刚任命主管全国学校的管学大臣孙家鼐二十九日就上《奏请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折》，说："学堂教育人才，首以书籍为要。而书籍考订尤不可不精，若使书中义理稍有偏歧，其关乎学术人心者，甚非浅鲜……履霜坚冰，臣实惧之，一旦犯上作乱之人起于学堂之中，臣何能当此重咎。……［教学用书］总宜由管学大臣阅过，进呈御览，钦定发下，然后颁行。"[1] 害怕学堂里成为"犯上作乱之人起于学堂"的根源，说明他懂得普及教育是与专制政体对立的现代化的基础。所以办新式学堂还没开始，统制课本实行"国定"的宗旨已经确立。也说明他懂得课本是教育方向的关键，学校形式是次要的。

"泰西国势之强，由于人材之盛，人材之盛，实源于教法之良，彼新书日出，民智日开。顾为中土植人材，首在书之有善本，次在教之有善术。"[2] 虽然是出版业广告，也道出了重教育，需要好课本的真理。教科书的重要，陆费逵有句简明话："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3]

虽然孙家鼐在1898年就想统制教科书，也几次成立机构，成立专门的编译书局，但实在不争气，一直拿不出来。直到8年后，宣布所谓"预备立宪"，各衙门订立12年步骤，1906年才勉强拿出几本连抄袭带胡编的书。品种既不全，质量又太次，推出之初就被书界批评得体无完肤，只能继续容许使用民间课本。

从1901年清廷重新宣布实行新式教育，到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抗战时外汇和纸张统制，强迫实行"国定本"，整整40年，教育界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完全依靠出版界编纂提供。近代教育的发展，出版在其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我国普通教育真正能符合教学原理的普及课本，起始于接触西方，得力于民间，完成于出版界的志士。

【1】《光绪朝东华录》，4136页，中华书局，1958年。

【2】《亚洲课本·首册序》，商务印书馆，1901年。

【3】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近代部分》，第3卷，15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第三节　非学制教育读本

一、非学制教育读本

教科书，或课本，是特指与国家规定学制相适应的课本。我国最早的国家学制称“壬寅学制”，又称“钦定学堂章程”，颁布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二，是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的。这个学制的中心规定了从初小开始就为升入京师大学堂做准备，是培养官员的单轨制。所以命张之洞协助修订，于次年十一月二十六颁布，名为“奏定学堂章程”，因为光绪二十九年为癸卯年，所以又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规定了师范、农工商、艺徒学堂等非直升学制，较为接近现代。在此前，不存在学制教科书或课本。但是在学制颁布前各种供教学的读本，为学制公布后编纂教科书提供了经验，减少了摸索。

二、教会低级学校读本

在学制公布前有别于传统培养知识分子的学校教育，以前称之为西式教育。在我们国土上，西方教会办学在1873年前，都为初级，主要在教堂内，招收贫困儿童，不仅免收学费，还供应膳食。最早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漕宝路，是为读经班。[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新教以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社在宁波办的女校为最早。次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2] 1873年后，学级渐高，至1900年外国教会在华已办有各类教育单位2 000所。[3] 这些单位从“主日学校”，即星期天的宗教班到少数大学各种水平都有，修业年限五花八门，且毕业后都没有上级学校衔接，是其特点。相当多以培养它需要的宗教人才为目的。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在宁波办的崇信书院。[4] 上海等大城市有较为正规的，1879在上海建立的约翰书院，后来成为圣约翰大学。1881年林乐知办中西书院，就是后来

【1】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247~24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2】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19页，上海书店翻印，1984年。

【3】刘秀生等:《中国清代教育史》，18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汪家熔:《谢洪赉和商务创办人的关系》，《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20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的东吴大学。毕业水平以适应英美学校为衔接。

有些出版史说1877年来华基督教组织“教科书委员会”，为国人编纂课本，从而有了“教科书”的名词。这是颠倒了因果。这个组织，原名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直译只是“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他自己的中文名叫“益智书会”。中国人将textbook译成“教科书”，因为我国传统女学有“教科”一词，book是书，正是我们的名称。到1890年，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

益智书会13年“共出版59种，大部分是宗教教材。主持人狄考文说：‘委员会出版的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是什么学校教科书，而只不过是宗教传单。’”[1] 益智书会出版的教科书，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上卷，计自然科学30种，中卷，计史地2种，另《幼学操身》，共纪录33种。因为传教士各以熟悉编书，书与书之间没有联系可言，没有划一程度可循。如《眼科指蒙》、《天文揭要》、《百鸟图说》、《百兽图说》、《幼童卫生论》、《治心免病法》、《西国乐法启蒙》，等等，都是普通随便看看的书，谈不上学校教科书，即使他们自己办的学校也不用。

益智书会负责人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办有一个学校。在办初级时，“请一位刚刚入教的穷书生张干臣教识字启蒙，读《三字经》等。”[2] 后来升格，称学院，课程“宗教教育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经典，再其次是西学”。[3] “西学”里有《笔算数学》是由狄考文和邹立文合著，3本学3年。

【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2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三、拒绝教会读本

益智书会的书虽然教会学校自己不用，但还有销路。“该‘委员会’自成立时起到1890年的13年时间，一共出版了大约3万册教科书和图表，尚有库存1万5千册。”[4] 1万5千册不算少数。除掉一般买来阅读，也确有办学，不懂此道，盲目购买来做课本的。当然不仅仅用益智书会的书，其他教会学校编的书也被采用。教会读本贯彻宣传基督教的宗旨。益智书会的编辑方针说：

【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最重要的是，不但课本要非常科学，而且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拯救的伟大事实。'书会的重要成员韦廉臣明确提出：'科学和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如果实行分离，学生'既不信仰上帝，又不相信魔鬼、圣贤和祖宗'，将使中国陷于崩溃，只有把'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拯救中国'。"[1]

针对有人采用教会读本作课本，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抵制。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中提出："勿沿用洋人课本……速自译编。"[2] 陆费逵针对人们使用教会课本，在1906年指出："西谚有言曰：'良书之可信，逾于良友；恶书之害，甚于盗贼'呜呼！何其言深而切也……夫教育者，国民之根本。著作者，教育之津逮。而宗旨者，又教育之标准，著作之的也。……至若教会、殖民二主义，愈为我国之隐忧，而我国民愈宜注意者也。夫国与国有相睦之势，无相亲之理。……即使其相亲，亦为自谋其幸福耳，岂真博爱为怀，慈航普渡耶？吾见教会教育蔑视祖国，外人译著祖其所托矣。"[3]

蔡元培也谈及教会课本问题："请为同胞重一言之：专制之毒痡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可夷我族姓矣。况丰祸之交乘而迭至者乎！同胞同胞，吾侪不自振拔，偷懦惮事，失今不图，必无幸免之希望矣。"并以编辑适合我国教科书自任："我国今日学界最缺乏者为教科书，[中国]教育会发兴之始，即欲以此自任。"[4] 蔡元培在此间也提出一要排除专制，二要排除外国人在教育中的影响，即自编课本的重要性。

【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238~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张元济诗文》，17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3】伯鸿：《著作家之宗旨》，《陆费逵教育论著选》，10~1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4】《中国教育会为爱国学社募捐经费致海外侨胞书》，转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7页，中华书局，1981年。

四、仁人志士的事业

我国旧时学塾读书，只用一本书，读完再读第二本，——单科教育。从识字、认数开始、多科齐进的新式教育，始于光绪四年（1878年）上海张焕纶和沈成浩、徐基德等创办，名正蒙书院，

后名梅溪书院，收学生40名。教育科目为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诗歌，经费由姚天来捐助。[1] 他们的分级和所用的课本已不可考。

此时已有破除传统观念、舍弃仕途而热心普及教育作贡献社会义务的志士。他们，有直接从事教育；有从事出版，以供应教育所须。张元济就是后者中佼佼者。他说："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2] 他一再拒绝要他出任官职。他曾复信汪康年，请其代为婉拒军机大臣瞿鸿机要他到学部任职："善化师拳拳于弟，至为可感，……来书'吾辈既为国民'云云，诚然诚然。然亦只能尽其力所能为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3] 这些人士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达的江浙最多，也是合乎情理之事。这是种适合当地经济变化的人生价值取向的伟大变化。就全国讲，是超前的。

"西人有言：不良之法律，犹愈于无法律；吾亦谓不完备之教育，犹愈于无教育。及今不图，后悔无及，邦人君子以教育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事，其毋忘今日之贫困可矣。"[4] 我国的普及教育，由先进分子本着因陋就简的原则，摸索着进行，逐渐完备。读本也遵循这一原则发展。

（一）《字义教科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一，上海江南制造局华亭人钟天纬说："窃维学校之设，在上但能开其端，不能竟其绪，必须闾阎自为之谋，方能垂之久远。自西学大行，国家已设同文馆……等尤为林立，而收效则鲜者，皆因国家提倡于上，而百姓不响应于下也。欲期国富兵强，人才辈出，则莫如令民间广设小学堂，使闾阎家自为学，人自读书。子弟胜衣，即勒令入学，则于自强之道思过半矣。"[5] 他又说："德国比户读书，日本通国设学。"[6] 他受到盛宣怀资助，于同年"创办上海三等公学，用新法教授。1898年与朱问渔、戴调侯、徐伟仁、朱葆元，立学会于沪北格致书院，谋改良教育；又设四小学于高昌乡，名棠荫、董威、湖海、平心小学，皆以新法教授，曾编《字义教科书》（又

【1】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395页，上海书店翻印，1984年。

【2】张元济：《东方图书馆缘起》，《张元济诗文》，24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3】《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7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张元济：《贫困之教育》，刊于浙江省教育会编辑发行的《教育周报》1914年4月1日出版第37期《言论》栏。

【5】钟天纬：《公塾原启》，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29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6】《小学堂总章程》，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29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名《蒙学镜》)、《教授心法》，上海一新书局刻本。[1] 三等公学收8岁儿童入学，前3年称"蒙馆"，后3年称"经馆"。蒙馆有识字、读书、讲书、写字、算法、体操。经馆有英文、华文、讲书、作文、算法、体操。13岁毕业，"或送入南、北洋大学堂肄业，或径送出洋肄习专门之学"。[2]

所称用新法教授，是不同于冬烘仅仅教识字而不讲解字义。钟天纬编的《字义教科书》是 《蒙学镜》全套中的一册。《蒙学镜》共12册，分别为：字义、歌谣、喻言、故事、智慧、格言、女鉴、经余、格致、史略、文粹、词章。它虽称"字义"，实际以"词"的语言功能分字类教字。他将字按语法功能分实字、形容字、称谓字、动作字、发语字、帮助字、接连字、语助字、呼声字9大类。区分词类，是对汉语认识的一大进步。各类所含词数自然相差极大。实词最多，又分天文、时令、地理、山水、国姓、宫室、人伦、文事、武器，等等31类为31课。这种分类，显受传统类书的影响。每类成一课，各类词数不等，即各课字数不等；因而教授时不以课本的"课"作功课标准，以每天教20字为准。如此"识一千余字，即可讲解文义浅近之书。已识二千余字，即可学做句子"。[3] 这或能称"集中识字"，也可说带有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烙印。但他和传统有很大不同，一是以词教字，二是讲解字义。——课文中每个字都教学生组成词。如"天"，用小字注"天地"；"辰"，用小字注"时辰"。不能组词的，则作简要解释。如"娣"，用小字注"女弟"；"妣"，用小字注"母死曰妣"，等等。兹录片段，以见一斑：

第一章　实字　第一课　天文　(课文)

天 天地 穹 穹，苍天也 旻 旻天 昊 昊天 宇 上天下地曰宇 宙 往古来今曰宙 乾 天也 坤 地也 阴 阴气 阳 阳气 星 星宿 宿 星宿 日 太阳 月 月亮 霄 九霄云 辰 时辰 霜 落霜 雪 落雪 雹 冰雹

[1] 陈学询：《上海三等学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3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2] 《上海三等公学经学馆课程表》，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59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3] 《上海三等公学功课章程》，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第一辑下册，58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电　电气　雨　落雨　露　露水　风　风吹　云　白云　虹　萤也，长虹　霓　红霓　霞　云霞　雾　迷雾　霹　霹雳　雳　霹雳　雷　雷响　霆　雷霆　霾　阴霾　霰　积雪　晴　天青　霁　晴霁　霈　大雨　霖　甘霖　奎　文奎星　昴　昴星　彗　扫帚星　孛　彗星　魁　魁首　娄　娄门　觜　觜星　参　参商　曦　晴曦　晖　晴晖　朗　明朗　曜　明曜　罡　天罡星　震　雷震　氤　氤氲，气也　氲　氤氲　旱　乾旱　冰　冰冻　冻　冰冻　氛　祥氛　晕　月晕　灾　灾患　朦　朦胧　胧　朦胧　炅　日炅　飓　大风[1]

这种教法，学童不仅理解字义，还增加兴趣容易记。关键在“用新法教授”，即讲解。钟天纬说，他旧时跟塾师读书，到14岁读《孟子》，碰见“谟盖都君咸我绩”句[2]，每个字都认识，但这7个字连起来说了些什么完全不懂。后来逐字细查朱熹注，才懂得意义；并将过去读而不懂的也用这办法研究，都弄清楚了。回顾过去读书，塾师仅让背诵，不解字义，浪费了光阴；从此懂得教学童认字，必须讲解字义。他用这体会教授徐建寅的两个孩子读书，成绩出色。后来徐建寅任驻德公使参赞，同公使李丹崖谈起，李咨调他到德国教他孩子，成绩也很好。后来又教自己7岁儿子，一年后就能写简单问候信件。前后教4个孩子均收实效，他决心推广办学。[3] 就近代教育和教科书出版历史讲，《字义教科书》是从旧式启蒙读物迈向现代教材的重要一步。

（二）《南洋公学课本》

当时有些接触时务的官员，对学校教育也很重视。影响较大的是盛宣怀。光绪二十一年他任天津海关道时就“倡捐集资，不动公款，奏明立案”开办“天津中西学堂”。称头、二等学堂，是大学、中学。他从中学办起，所“招选学徒，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柢；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咕哔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学者亦难精择。窃喟然于事半功倍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不得其基，则构不可到而固也”。[4] 后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第一辑下册，59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页。

【2】“谟盖都君咸我绩”句，是《孟子·万章》引舜的弟弟象的一句话。其中连用两个假借字，又有一个典故，所以不容易懂：“谟盖”是“谋害”的假借；“都君”是说舜受民众爱戴，能聚民，《史记·五帝本纪》说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所以人称舜“都君”。全句意思是“谋害哥哥都是我的功劳”。此处解释参考杨伯峻：《孟子译注》，209页，中华书局，1960年。

【3】钟天纬：《学堂宜用新法教授》，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第一辑下册，582~58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4】盛宣怀：《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疏》，《光绪朝东华录》，4131页，中华书局，1958年。

来他任上海海关道和招商局总办，筹款办南洋公学，吸取天津教训，着力解决师资，从办师院起；并按国外师范习惯，设附小，目的为中院解决合格生源。南洋公学也是“头、二等学堂”，所以附小称“外院”。师范生教外院生，并编纂课本。这就是光绪二十三年出版的《蒙学课本》初、二、三编。同时还有《笔算教科书》、《物算教科书》(董瑞椿译)、《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张相文编)。后3种是我国最早的分科课本；但四者中《蒙学课本》名声最大。(图31)

蒋维乔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曾批评《蒙学课本》，说该书：“如第一编第一课，‘燕、雀、鸡、鹅之属曰禽。牛、羊、犬、豕之属曰兽。禽善飞，兽善走。禽有两翼，故善飞。兽有四足，故善走。’决非初入学儿童所能了解。”[1] 其实，南洋公学外院是“考选八九岁以外、十七八岁以内学生一百二十名”，分为3班。[2] 要“考选”后分班，说明所收学生不仅年岁大，而且都曾上过学。这是他不了解、前面引的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在《呈外院章程文》里说的，当时外院学生是十七八岁以内的学生。该《蒙学课本》的第二编更深：第二编第一课题目叫《四季

【1】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39页。

【2】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呈外院章程文》，《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51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



图31
《蒙学课本》、《物算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

及二分二至说》，讲四季的时段，每季的气候特点，与植物生长的关系；讲春分秋分时当天白昼黑夜平分，以及逐渐至昼最长至夜最长而夏至冬至。还讲公历与农历之不同。该课课文计451字。第二编（册）如果给后来正常二年级学生，也完全无法接受。这批学生既然已有一定文化，还要再教以“蒙学”，是盛宣怀所谓“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要按新式学堂“规格”，陶冶这批学生，以便升入中学。《蒙学读本》则是后来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纂的，共三编。程度便不是后来一般通常初小一、二、三年级学生所能接受的。

南洋公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纂的《蒙学课本》已极难找到。现在能见到的是另一版本，即实为朱树人编，很多人误认为是陈懋治等编的重印本。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清廷命令办理“新政”，次年八月初二命办学，社会广泛需要课本。冬天，宁波人在上海办的会文堂出版了由南洋公学师院朱树人编纂、署南洋公学师范院编的、适合正常学生水平的、称“南洋公学第二次印”的《新订蒙学课本》初、二、三编。它的初编第一课为：“天、地、日、月、山、水”6个字；最后一课为：“有物曰留声器，器中能发人笑语声、小儿啼哭声……”38字，与光绪二十三年本迥异。那时南洋公学已经没有小学。[1] 所以《新订蒙学课本》并不是给南洋公学外院，而是供社会上用的。次年，朱树人还为文明书局编写名叫《国民读本》的语文课本上、下册。

(3) 无锡三等公学课本

在光绪二十四年，吴稚晖等人在无锡办“俟实三等公学”，课本“随编随教”，当时仅抄写而没有印刷。光绪二十八年汇集后由文明书局出版，名《蒙学读本全书》。详情见“第四节 壬寅学制后新式基础教育的课本”。

【1】“光绪二十五年冬，[南阳公学]外院停办”，(《交通大学校史》，2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 南洋公学后来办有附属小学，仅有高小。

第四节　壬寅学制后新式基础教育的课本

一、辛丑“新政”和壬寅学制

戊戌前民间小小的办学活动，因政变而发展受阻。然而在1900年5月以载勋、刚毅为义和团总统，会同官军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时，物极必反，人们已看到变革之时已到：“今团匪肇祸，国事纷纭，已兆维新之象，正当大用之时。”[1]

清军八国联军之役战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慈禧在内外压力下以光绪帝名义下谕，开始实行所谓“新政”，重提改革。经慈禧同意的上谕，一改“祖制不能动”，而说“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又命令各大臣“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2] 次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条约最后签字，7天后，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清廷命令中说：“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所有礼延师长，妥定教规，及学生毕业应如何选举鼓励，一切详细章程，著政务处咨行各省悉心酌议，会同礼部复核具奏。”[3] 这个上谕虽被称作兴学上谕，内容比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的兴学上谕[4]还差些：是改书院为学校，其他学校是为京师大学堂准备生源。仍然是读书为做官，所以章程要“礼部复核”。唯一进步是“多设蒙养学堂”，即多办初级小学。慈禧和光绪帝在西安还“召张百熙诣行在。百熙慷慨陈时事，力请兴学，遂被命为管学大臣”，[5] 管理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还兼管各地新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四命重新开办京师大学堂的次日，“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6] 1个月后，清廷批复张百熙草拟的京师大学章程，说：“所系一切条规，将来即以通行各省，必当斟酌尽善，损益得中。期

【1】商务印书馆:《华英国学文编卷四序》,1900年。

【2】《光绪朝东华录》,4602页,中华书局,1958年。

【3】《光绪朝东华录》,4719~4720页,中华书局,1958年。

【4】《光绪朝东华录》,4126页,中华书局,1958年。

【5】罗翽:《京师大学堂成立记》,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71页脚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6】〔日〕多贺秋五郎编撰:《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119页左上栏。

于一道同风，有实效而无流弊。张百熙责无旁贷，仍著细心筹划。”[1] 这就得以将学校章程扩展至中小学。经过半年研究，朝廷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批准颁布的上谕说：“张百熙奏筹议学堂章程开单呈览一折，披阅各项章程，尚属详备。即著照所拟办理；并颁行各省，著各该督抚按照规条，宽筹经费，实力奉行。”[2] 这就是《钦定学堂章程》，计共京师大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5个学堂章程。上谕最后还说：“如有未尽事宜，应行增改，仍着随时审酌，奏明办理。”不久张百熙为抵制荣庆掣肘，据此请派张之洞会同修订章程。至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所以习称前者为“壬寅学制”，后者为“癸卯学制”。

【1】〔日〕多贺秋五郎编撰：《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119页右下栏。

【2】《光绪朝东华录》，4903页，中华书局，1958年。

二、壬寅学制时的课本状况

全国办学要大堆银子，并且要设置各级管理学校的官员，清廷既未为此设官，也没拿出一个小钱。颁布两个学制的唯一效果是守旧人士不能再阻挠民间办学，于是士绅乐于办学，以示趋新，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了小小的办学潮，对新式课本和教育学书籍有了较前为多的需要。这时产生了不少出版教科书的单位。由于学生课本历来不被藏书家收藏，我国图书馆事业起步又晚，现在能见到的都是当时印数较多的；一部分仅能从广告、文献中获见踪迹；当然也有被时间湮没的。从现在京沪两地图书馆能找到的课本实物，和广告、文献上汇集，在壬寅学制公布（1902年8月）时至癸卯学制公布前（1904年1月），出版课本和教育学用书的就不下40多处。他们是：教育世界社、文明书局、广智书局、［前］开明书店、大同书局、作新社、商务印书馆、时敏书局、一新书局、时中书局、启文社、上海商学会、科学仪器馆、中国教育普及社、上海会文堂、文林石印书局、六艺书局、彪蒙书室、启明书局、昌明公司、普通学书室、鸿宝斋、会文编译社、明德译书局、同文社、复兴书馆、墨海书社、美华书馆、宁波新学会社、南昌普益书局、［京师］官书局、直隶学校

司、武昌翻译学塾、南洋公学译书院、东文学社、山西大学译书院、两广初级师范简易馆、澄衷蒙学堂、苏州小学堂、育材学堂、宁东蒙学馆、支那留学生会馆、国民丛书社。以上均光绪二十九年底有学校用书和教育学、心理学等书籍的出版单位。其中，绝大部分仅仅有相当于现在的语文课本和算术课本。有些出版物不属于中小学教科用书而标明“教科书”字样的著作的出版单位，均不计。有些仅出版属于单项课本，如习字、尺牍等的，不计。均以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1903年）为限。过早的，如乾隆年间以来，用“教科”命名的课本的出版单位不计在内。

以这些单位，出版的课本，涉及广泛学科，就启蒙最不可少的语文类讲，当时最多，计《文学初阶》6册，商务。《改良小学新读本》初高两种12册，广智。《高等小学读本》2册，教育世界。《初等小学读本》2册，文明。《订正蒙学课本》3册，会文堂。《蒙学读本全书》7册，文明。《国文教授进价》1册，育材学堂。《绘图字课新说读本初编》1册，宁东蒙学堂。共9种34册。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底前出版教育学书籍最多的是罗振玉的教育世界杂志社，其次是康梁的广智书局，翻译的占绝大多数。课本最多的是文明书局，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蒙学读本全书》。

当时品种数量其次的科目是修身。其他算术、历史、地理、化学等格致科，生理卫生、体操、游戏、唱歌、家政，等等都有些课本。而且还有小学地质、地矿学等课本。但很少见到重印本，意味销路有限。而且各自编写，杂乱无章；无论在科目、册数总共加起来，实际不够初小用的。

虽然壬寅学制规定有年级和教育科目，但壬寅后编的所有课本，完全不按学制、年级。原因之一，可能学制仅有科目设定，而科目没有具体进度要求，即没有公布课程标准。而且科目设定非常不合理。例如，规定初小一年级有历史课。初小一年级有“字课”，规定教“实字，凡天地人物诸类实字，皆绘图加注指示之”。二年级“教静字动字，兼教以动静字加于实字之上的方

法”。三年级教虚字，四年级教造句。我国以往就语言学概念，仅仅涉及实字、虚字，1898年冬《马氏文通》才问世，要按语法概念处理功课和编课本，太强人所难。又让把天、地、日、月等画图教，和私塾教字并无二致。两者加在一起，“新式学堂”如何新法，实在难以让人捉摸。第三，当时政府仅仅说办学，它不掏钱，民众困难，所说办学，开始时连所谓“改良私塾”的水平还谈不上。能有本“教科书”把《三字经》、《百家姓》挤掉，就非常像样了。

文明书局因为俟实三等公学的《蒙学读本全书》编得可以，又有七本之多，可以教几年，后来出版时还加有很多插图，大家都采用他，生意好利润多，接着编其他课程。后来的教科书巨擘商务印书馆，开始也赶不上他。商务印书馆1902年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次年初出版《国史初级教科书》、《中学堂教科书万国史纲》，《矿物学教科书》，《新撰植物学教科书》；秋天出版《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世界地理），等等问世后，由于并未根据学制，也不足以压倒文明书局。究其原因，商务印书馆当时知根知底能使用的作者队伍还窄：夏瑞芳方面的谢洪赉因为专注于办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而不再关注世俗出版物；张元济方面，夏曾佑除中国史外，编写其他学科也不多；杜亚泉从日文可以翻译些自然科学，而他自己还办个社。此外就没有什么人，显出不能互相配套成系统。商务印书馆能压倒文明书局，是次年吸收日资之后。

这些书起步于壬寅学制公布前，早期留学日本的少数已经回国，他们留意于政法；很多编书的人土生土长，没见过小学是啥模样，应该有些什么课程。他们无非忖度“洋学堂”教西学，外国人办的学堂教啥我们编啥不会错。文明书局出版秦瑞介编《蒙学东洋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出版南洋中学编《高等小学经济学教科书》；新社会社出版孙海环编《初等小学动物学教科书》（均在光绪二十九年）。专出以图解作主要手段的蒙童用书的彪蒙书室出版施崇恩的《绘图速通虚字法初编》、《绘图速通虚字法

续编》；虚字我们老祖宗有过研究，但用绘图表现虚字，给小学生，实属匪夷所思。举出这些，或足以窥前贤们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摸索的。

三、混合课本

在壬寅学制公布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署“亚泉学馆”，实为杜亚泉编的《文学初阶》首册。该套书6册，声明供蒙学，即初小3年之用。而壬寅学制规定蒙学为4年。该套课本的编写动议，当在辛丑兴学上谕公布之后、癸卯学制公布之前。

或许《蒙学读本全书》和《文学初阶》都是册数多、插图好而被采用最广的课本，也是这时期课本的代表。两者都是“混合读本”。课本讲述的是包含着算术以外的各科知识。这两种课本的编法，既有旧时因素的残存，如学塾每个学生一个时期只用一本书，和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又反映了当时外国人，如英国印度广学会、朗文、麦克米伦等编的供亚洲人用的英语课本的影响。两种课本课文具有文学因素，讲述的却不是文学而是广泛的知识。或用韵文：“天上有虹，其弯如弓”（《蒙学读本全书》卷1第45课）。注意对仗：“夏日之晨，最宜早起。日光初出，夜露未干”（《蒙学读本全书》卷2第23课）。“燕子呢南语，黄莺上下飞。青蛙鸣水畔，白鹭立江滨”（《文学初阶》卷2第51课）。或用散文，近似白话：“今晨自家至学堂，路经野中，见马匹。有立者，有卧者，有两相啮者”（《蒙学读本全书》卷2第9课）。“兄妹二人，妹甚聪明。兄自塾中，教之以书。至第二日，皆能记忆，一毫不差”（《文学初阶》卷4第29课）。或用排比：“蚓居土中，蛙居水中。新雨之后，蚓与蛙争鸣。蚓声似笛，蛙声似鼓”（《蒙学读本全书》卷1第54课）。“范铜以为钟，结绳以为网，削竹以为箭，垒石以为城，掘地以为池”（《文学初阶》卷2第55课）。或讲授知识：“一儿问雨自何来。父曰尔不见云乎？海水因热而变云，云因冷而变雨。雨乃云所化也”（《文学初阶》卷4第52课）”。或讲授历史，或讲授地理。

《文学初阶》不叫语文或国文，却是语文课本。比钟天纬的《字义教科书》仅在语句中学词和字，增加了知识，学生读时兴趣更浓。这和他们编写时政府还没有公布学校应设科目，没有束缚有关。他们摸索、创造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是以前的蒙童读物所没有的，是后来，直到今天的语文课本所遵循的。只是后来的结构不同，成为单纯的语文。

第五节　癸卯学制后新式基础教育的课本

壬寅学制虽称学制，实际是为京师大学堂的配套需要："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生升入专门正科之地"，[1] 蒙养、小学、中学、高等4级学堂，逐级向上输送学生。所以除蒙养学堂外毕业者都给"出身"。而癸卯学制，则是较完整的近代学制，培养的不再是官吏，也还有技术人员和工农。癸卯学制的总纲《学务纲要》，除取消"出身"，还一再强调："使学生他日成就，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均上知爱国，下足立身"；"初等小学堂，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高等小学堂、普通中学堂，意在使入此学者，通晓四民皆应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癸卯学制确立了包含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专门教育、高等教育的较完整结构。癸卯学制是张百熙为抵制荣庆掣肘而联合张之洞起草的，获得了汉族地方督抚的支持，而且当时社会发展，所以公布后各省纷纷办学，学校教育有了发展，对课本有了广泛需要。

[1]《钦定大学堂章程》第1章第5节。又，清廷同意办学堂，并不废除科举，为平衡两者，《钦定大学堂章程》第四章为《学生出身》，共11节；第1节讲高小毕业，可送中学考试，"合格由中学堂给予附生文凭，准其一体乡试"。即小学毕业可以获得秀才出身。其余各级学校也有相同的出身待遇。

癸卯后新增出版教科书的出版单位有以下各家：群学社、泰东同文局、新智社、小说林社、金粟斋、通社久记、环地福书局、中东书社、启新书局、湖南作民译社、河北译书社、南通翰墨林书局、南洋官书局、湖北官书局、直隶学务处、教科书编译社、蒋智由、尤宗龙。这些除群学社出版1种《初等小学女子国文读本》三册，蒋智由《中学修身教科书》二册外，所出都不是

主科课本。

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课本而这两年出书较多的，首推文明书局，其次是彪蒙书室，商务印书馆名列第三。虽然三家都做教科书，癸卯学制公布时适逢其会的只是商务印书馆。

癸卯学制改壬寅学制初小四年为五年。癸卯学制强调学校教育科目应按学制规定，所以以往各家出版课本都不合用，必须重编。但各店存货已将本钱压死。面对整个普通教育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学五年，各科庞大品种，各年级各册，都无力胜任。而商务印书馆适应原来壬寅学制的只有六册《文学初阶》，负担极小。

壬寅年南洋公学发生“墨水瓶事件”，由于校方以“师道尊严”压制，无理惩处学生，蔡元培率退学学生办理爱国学社。因为学社经费无着，所有教员均自谋生活来源，蔡元培则由张元济与夏瑞芳商议在编译所参谋业务。前引蔡元培《中国教育会为爱国学社募捐经费致海外侨胞书》中指出，中国教育会的组织，其公开的目的是为在教科书中抵制专制政府干预和排除外国人的影响，“我国今日学界最缺乏者为教科书，教育会发兴之始，即欲以此自任。”所以蔡元培建议由爱国学社教师编写小学教科书，既能解决商务书稿，又解决部分教员经济来源，而且完成中国教育会的宿愿。“蔡就学社教员中选择数人，分任编辑国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1] 蒋维乔日记还记录了：“癸卯五月二十七日记　余受商务印书馆编辑蒙小学教科书事，共一千五百六十课。约六月杪竣事。回里后一意从事编辑。”[2]

蒋维乔日记记录，他于癸卯五月（1903年7月）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农历十月初一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股和增加华股，正着手编适合壬寅学制的课本。而癸卯学制是十一月底公布。现在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按照新颁的癸卯学制的要求编。而且刚吸收十万元日资和添加五万元华股。当时课本每本实卖五分钱，这新增加的15万元是难以想象的一笔大钱。刚刚吸收了几位有旧学底子、熟悉西学、甘愿抛弃科举前途，又担任过教育活动

【1】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6页。

【2】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总第28期，46页。

的人员，已有蒋维乔、庄俞、严练如、徐富如、杨赤玉几位。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已有人员的友朋都是可以吸收的对象。蒋维乔就说：张元济“与余直接磋商，请余进编译所，并托余介绍能编算术、历史、理科者”。[1] 又有日本人长尾、小谷重顾问。高梦旦在日本考察年余回国，足以参谋。张元济统筹。资金、人员、组织者齐全，这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商务印书馆身上。经过几年，完成了有质量、成套的中小学课本，为新兴起的学校教育提供了最基本条件。

【1】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6页。

从蒋维乔日记所见，商务印书馆课本的成功，与高梦旦关系极大。蒋维乔日记中，十二月初三第一次见到高梦旦，十二月十四日商务编写人员看到“癸卯学制”。蒋维乔说“高梦旦来，始规定整个编辑计划，特别注重国文”。[2] 这句话对我们了解中小学课本的发展史至关重要。此时“始规定整个编辑计划”，说明在前商务印书馆也还没有完整计划。在前壬寅学制小学（称“蒙学”）也是规定分科讲授的，但整个出版界谁都没有全面按科编撰。我国多年呼唤破科举建学校，但适应新式教育的课本只有零碎的单本，不足以满足开展新式教育之需要，完备的新式教育难以真正进行。具有完整学科年级、学科间相互配合、构成系统、足以胜任新式教育的课本，这时才稍有端倪。而完成这个系统，要有适度资金、足够人才、一定经验和胜任的将帅。四者缺一不可。

【2】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6页。

第六节　废除科举后的学校课本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奏请公布癸卯学制奏折的最后，提出将二月间被礼部压住的袁世凯、张之洞等建议将科举分科分年递减奏折，[3] 重行研究。上谕：“著自丙午科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4] 几个月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三，袁世凯会同赵尔巽、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大臣上奏，即刻废止科举，否则学校无法开展。当天

【3】《光绪朝东华录》，4997~5000页，中华书局，1958年。

【4】《光绪朝东华录》，5127~5129页，中华书局，1958年。

有上谕："著即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1] 这个划时代的举措，影响重大。就出版业讲，依靠发卖科举考试用书的石印书店全军覆没，而发行教科书的，则生意兴隆。

[1]《光绪朝东华录》，5392页，中华书局，1958年。

一、中国图书公司的失败

第七章提到商务印书馆的巨额利润，引起了他人关注，产生了中国图书公司。由于废除科举，加以当时经济有所发展，学校教育有很大推进，对教科书和其他用书需求旺盛。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代开始有教育统计，学生数逐年增加，虽然政治腐败，政府统计数不足以信赖，但学校教育发展是可以肯定的。做大了的蛋糕，中国图书公司没能切一份而商务切了一大块。

中国图书公司以优势兵力而未能压倒商务印书馆，反被商务印书馆收购。商务印书馆有几种课本，最重要的是《最新教科书》。它是一个"死靶子"。只要有超过《最新教科书》的课本，商务印书馆就难招架。然而中国图书公司最终没能拿出像样的课本。为什么后来不能居上，这是个永远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出版社的成败，归根到底看它的出版物。就教科书讲，必须符合学制，并且要求各科配合。但中国图书公司没能做到。如它的课本自1907年开始出版，当时学制规定，初小为五年，各门课本都应该有十册。但它的初小各科课本都是八册。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每册都有教授书，深受教师欢迎。中国图书公司不能做到课本和教授书同时提供。如朱树人编《初等小学国文课本》，1907年1月出版，而《初等小学国文教授本》1907年6月才能提供。也有先出教授书的，如吴传绂编《高等小学格致教授本》1907年9月先出，《高等小学格致课本》次年9月才出版。学制规定初小有八门功课，中国图书公司只有国文、修身、算术三门，缺格致、地理、珠算。中学则只有缪文功编纂的《中学国文示范》，仅82页，根本不能作课本用；沈恩膏著《历史教科书本朝史》。教科书不能按学制编，教师不敢采用。蒋维乔说：中国图书公司"所编之国文教科书，要力避商务《最新国文》之典型，

别创一格，却又无从下手。又因急于出书，选材既未精审，文字又欠生动。问世以后，行销不广。其余唯历史、地理两教科书，稍见生色，然终不能与商务为敌。”[1]

[1] 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7页。

二、学部图书局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撤销原与科举有关的国子监、学正、教谕等机构和官员，成立学部，管理教育事宜。清廷不得已而同意办学，极怕动摇其根本，所以在“新政”第一个关于办学的上谕中，就一再强调：“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2] 因而对教科书的控制从未想放松过。在宣布戊戌变法明定国是的前一天，就又重申：“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设书局编译中外要书，颁发遵行。”[3] 此后所有关系学校的上谕，都有这么一句。然而“官设书局”一直编译不出教科书来。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奏准设立编书处，并订立章程；到三十一年十一月设学部，将其改称学部图书局，专司编辑教科书。

[2] 《光绪朝东华录》，4719页，中华书局，1958年。

[3] 《光绪朝东华录》，4094页，中华书局，1958年。

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基础教育教材内容必须统一。然而处在清末这历史转变关头的时候，由谁来统一，是关系到民族前途的大事。在一个吏治极端腐败的国家，由政府来统一，必然没有好结果。所以其目的在统一教科书的学部图书局刚一成立，就受到进步人士的反对。有人指出：“吾国人之心理，最信服政府。苟一国定，则无人敢言其非，而全国风行，虽有民间编辑之善本，亦必不用。国定而善也，吾人固受其福；设有不当，其贻害将何所底止哉。”说日本实行新式教育30年才实行国定制，所以“统一可渐而不可骤，可诱掖而不可勉强”。又指出，教科书编撰要有竞争，“有竞争而后有进步。教科书果为国定，绝人销售，又谁肯虚掷财力以经营之？以全国四万万人之教育而委之学部数十人之手，一成不变，其必无良果可想而知。”[4]

[4] 伯鸿：《论国定教科书》，《陆费逵教育论著选》，16~1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学部图书局成立后到光绪三十二年没有编出过一页书。光绪三十三年终算出版了第一本书《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

后又出修身第一册。1914年江梦梅书中说：出版后“《南方报》即著论攻之，为一时所传诵。是秋第二册出版时，报纸又起纠弹之。于是学部教科书恶劣之声不绝于教育社会。部编之书亦迟迟未出。宣统元年，变通初小课程，将部编各书注于科目之下，俨有采国定制之意。然其书目除第一年外，什九皆系‘已经编成’、‘正在编辑’之本”。宣统二年“因为筹备宪政清单所限，前此三四年所仅出一二册者，是时则以数日之力悉数出版，草率讹误，所不计也”。[1]

陆费逵说：“《南方报》曾登一篇专论学部国文的，是我的大作。”[2] 文章刊登于《南方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三日。摘引若干批评文字如下，极可见腐败的清廷实在是做不了什么事了。陆费逵指出：

“一、教材多不合儿童心理。如第五十三课：‘一唱忠君，再唱爱国。’六岁儿童其能解之而实践之乎？第七十八课：‘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此种文学虽老师宿儒亦不常用，何必以之课儿童也。

“二、词句多不合论理。如第五十五课：‘犬能逐兔，猫能捕鼠。’猫能捕鼠为其独擅之能力，且舍此而无用矣。犬之能力不在逐兔，其逐兔为偶然之事。今乃强引为对，则儿童必误认逐兔为犬之作用矣。再如第五十六课：‘取水煎茶，取柴煮饭。’二语分之，儿童易解；若合在一处，则水为茶之原料，柴为饭之原料。……如改作‘取水煎茶，取米煮饭’等语，则儿童易于明白而亦合于造句法矣。

“三、间有局于一隅之处不合普及之义。学部所编之书，既多全国之用，则不当有局于一隅之处以害普及。然原书有方言局于一隅者，有地名局于一隅者。

“四、图画恶劣，图与文词间有不符之处。如第二十三课‘水井　火炉’。火炉即在井旁草地上。不知谁家火炉如此位置也。第六十课‘牛羊下来’。图中一牧童骑牛吹笛，旁有之兽似羊非羊，似驼非驼，不知其为何物。

【1】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状况》，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10页，上海杂志公司，1953年。

【2】陆费逵：《论中国教科书史》，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13页，上海杂志公司，1953年。

“五、数字与算术不相联络。学校课程各科同时并进，故必互相联络，然后可免困难。第三星期算术已毕‘三’数，则‘一二三’三字必于此时见之《国文》以谋联络，乃偏迟迟不用，至二十二课［第］六星期方用‘一二’二字，三十六课［第］九星期方用‘三’字。

“六、时令节气不相应。时令节气与教科书相应，则观感深而实验易。本书《例言》固亦云‘本册所说景物，皆按时序排列，以期收实地教学之效。’然第九课，第三星期，约正月杪，已有‘桃杏’；第十四课，第四星期，约二月初十，已有‘夏雨’，第三十六课，第九星期，约三月二十日，已有‘桃实’。我国非处热带，未免过早矣。

“七、抄袭近出各书有碍私家编著。夫民间有翻刻盗印之事例有惩罚，试问学部将何以自处也？该册类似文明书局初等小学读本者五见，类似文明书局初等蒙学读本者一见，类似商务印书馆国文教科书者五见。此为粗略所见，若一一披阅而核校之，恐尚不止此也。”[1]

【1】黄守孚：《教科书批评·学部所编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上海嘉定学会编辑，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集成图书公司出版。

黄守孚将陆费逵这篇文章辑入《教科书批评》后，还在文后指出3点：1. 生字之增加太骤，2. 文字使用之不适当，3. 德育、体育之不注意。

就出版史讲，陆费逵对学部课本的批评，使我们在研究中华书局成功的原因时，恐怕不能再简单归结为“时势造英雄”和说他为钱而开创中华书局了。更何况商品社会，人人有权利创办事业。

学部课本的抄袭和草率在在皆是。笔者曾随便翻翻就发现毛病。抄袭不仅国文课本，在修身科本里也有。如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初版《学部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5册第16课，题曰“习劳”，文曰：“曾文正公寄子书曰，尔体甚弱，吾以为虑。然不必服药，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行之三月必有大效。”这和四年前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乐群书局庄俞编《高等蒙学修身教科书》下册第108课在“运动”德目内的文字完全

相同，仅最后两分句次序颠倒："曾文正公寄子书曰，尔体多病，甚以为虑。然不必服药，每日饭后走数千步，行之三月必有效验，是养生家第一诀也。"好像引用他人文字相同，不能算抄袭。其实事情并非如此。课本中从"尔体甚弱"到"必有大效"这37字并非曾国藩寄子书原文。原信是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给与曾纪泽的。从"尔体甚弱"到"必有大效"谈及曾纪泽身体原信共177字。原文如下："尔体甚弱，咳吐咸痰，吾尤以为虑，然总不宜服药。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乡医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可之方药。见理极明，故言之极切。尔其敬听而遵行之。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尔每餐食毕，可至唐家铺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归来大约可三千步。三个月后。必有大效矣。"[1] 将这段文字改成37字的是庄俞的著作权，所以是学部在抄袭。

然而还不止此。学部在宣统元年十一月出版的《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修身教科书》第5册也有上述概文，在第17课。一个编写单位在相同科目的不同本子里，有同一文字，本不奇怪。怪在同样文字同样在修身科本里，德目却不一样：元年的德目称"运动"，二年的德目称"习劳"。可见其随意性。该《修身教科书》第6册第17课讲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这本书是教育诚实，他们标的德目却叫"爱物"。他们连这个故事的意义都不懂，却在编纂课本！"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2] 误人子弟，岂非大罪！

学部图书局编的课本，不仅质量低，而且不配套：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图书局，到宣统元年颁布《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它仅出版小学一年级修身、国文、算术各两册，体操1册，共7册。而按《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初小有5年、4年、3年3种学制，共需必修科课本90册，随意科课本15册，两共105册。据其自称，它已出必修科仅7册，随意科10册。[3] 所缺甚多。采用

[1] 钟叔和编校：《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173~174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

[2]《孟子·尽心章句下》，331页，中华书局，1960年。

[3]《大清宣统新法令》，第五版第四册，35~39页，商务印书馆。

课本讲究衔接，所以学部课本难以与民营课本抗衡。为了推广，它用两项"让利于民"办法。一是减低定价。一般民间课本小学的每册定价均在1角1本，厚的1角2分。学部各书则不足5分：《学部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五册每本3分5厘，第四册每本4分5厘，《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修身教科书》各册是4分。二是任人翻印不收费。学部订有《学部允准翻印初等小学教科书教授书章程》5条。5条实际为两点："第三条 字、图、页数、开本大小、墨色'均须与本部样本一律'。"第四条 注明翻印者名称、地址、书价，书价只能低于学部价，不能高。先是免费翻印，规定在版权页注明"学部准印"；后来卖版税印花票，28:32毫米比邮票略大，红色，中为圆形（图32），每张据江梦梅说收5厘钱。



图 32
学部课本版税印花

三、学部审定课本情况

清廷学部图书局无法以自己编的课本统制学校用书，就实行审定制。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三，学部图书局发布第一次审定表。出版史在谈到这点时都辗转引用，说共审定103种，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有55种。这样说不能算错，却是不全面的。所说审定103种，其实只是初小用书，是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教科书表》。这表可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清光绪新法令》第五版第七类教育三76—79页上见到。而学部当时一起发表3个审定表，还有《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表》和《学部审定中学暂用书目表》，在上述法令集第80—105页上。3个表初小103种，高小75种，中学194种，共372种。[1] 被认可的前三位是商务、文明、舆地学会。见下表：

[1]《大清光绪新法令》，第五版·第七类·教育·三，76~105页，商务印书馆。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三清学部第一次审定暂用教科书表的数字分析表

学　级	合　计	商　务	文　明	舆地学会	其　他
初　小	103 种	54 种	32 种	0 种	17 种
高　小	75 种	30 种	21 种	0 种	24 种
中　学	194 种	32 种	9 种	76 种	77 种
共　计	372 种	116 种	62 种	76 种	118 种

中学 194 种中 76 种为地图，均舆地学会出版。

以上数字据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三学部《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暂用教科书表》、《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表》、《学部审定中学暂用书目表》（据《大清光绪新法令》第五版第七类教育三 76—105 页）。

彪蒙书室虽有多种课本，但表中没有它的书。或缘于它通俗化步子太快，不能作正规课本用。它的课本全部用白话，分两类，一类称《白话讲义蒙学丛书》，见到16种72册；一类称《绘图蒙学实在易》丛书，见到24种73册，包括白话四书和孝经5种29册。

学部审定教科书是自己拿不出东西而又要管理的权宜之计，成立图书局规定其专司教科书编纂后，就没有必要再审定非官方编写课本，所以没有再审定过。审定制度并未规定未经审定的书不能采用，但客观上有一种不好的影响。审定表榜上有名的，譬如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除了被认可的数量有所差异外，各自的发行力量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了。

第七节　结合国情的借鉴

文明书局出版的课本在当时最多，50余种。它的第一种是无锡俟实三等公学所编的《蒙学读本全书》1—7编，文明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在壬寅学制颁布之前。有人说该书在文明书局出版前曾由六艺书局出版过。该书的文明版《序》中讲：该校的“读书一科，随编随教，本不足存。近欲录副者颇多，爰图画写稿，付之石印。略加诠次，厘为七编”。

文明书局由于它的《蒙学读本全书》在壬寅学制公布前就在市场行销，它就有较为雄厚的实力。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它开办，

到十二月前已经在北京开设第一家专司发行的分局。[1] 此后两年间又在汉口、广州、南京开设分局。当时上海有外地分庄的书店不多。上海、汉口、南京、广州都是东南经济发达地区交通枢纽和本地经济繁荣的地方，它有这样一个发行网，它的课本就占据了全国很大份额。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全书》由1898年当地先进青年所办的"无锡俟实三等公学"所编。无锡靠近上海，工商业很发达，读书人中很多讲实学，又紧靠清季公羊派发源地常州，和常州读书人往来密切。文明书局的中心人物是廉泉，他是户部郎中；他的文化和地位使文明书局周围形成了一个有国学底子而又懂西学的新知识分子的无形作者团体。它既有经济实力又有作者群，是当时其他单位所不可企及的。

【1】见文明书局版丁福保著《蒙学卫生教科书》及其他文明版书后所刊"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文明书局在京师设局，运销文明课本，禁止他人翻印和招商局减免运费咨各省督抚的咨文。

文明书局的《蒙学读本全书》，蒋维乔说："民元前十四年戊戌，金匮俞仲还（复）、无锡丁芸轩（宝书）、杜孟兼（嗣程）、阳湖吴稚晖（朓，后名敬恒）在无锡开办三等学堂。诸人分任教职，每日编国文一课，令学生抄读。经过五年，共成七编，名曰《蒙学读本》。前三编，就眼前浅近事物，引起儿童之兴趣。四编专重德育。五编专重智育，采子部喻言。六编，注重作文修辞。七编，选史汉诸子及唐宋名家论说。民元前十年壬寅，俞复在上海创文明书局，印刷此书。楷书石印，附有图画，形式内容，均比较美观，故盛行一时，不及三年，已重印十余版；在小学教育界占势力者五六年。"[2]

【2】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39页，中华书局。

教科书作为社会近代进程极重要的一个推动力，作为维持近代出版的经济支柱，研究其从无到有，从粗拙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最足以了解近代出版人倾全力于此的拳拳爱国心。《蒙学读本全书》是教科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季教科书曾有过一个翻译和对他人借鉴的历史，极大地缩短从"三、百、千"演化到中国近代课本的摸索时间。这进程是研究近代出版史最不宜忽略的。

一、借鉴外国

甲午后我国思想界有个借鉴日本的高潮。宋恕（1862—

1910）在1891和1892年分别上书张之洞、李鸿章提出改革，有“三始一始说”。即：“欲化文武满汉之域，必自更改官制始；欲通君臣官民之气，必自设议院始；欲兴兵农礼乐之学，必自改试令始。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即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1] 这是学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从先学人家的衣着开始。我们虽未曾学日本从改穿西服开始，但维新及后来的变革都曾过分袭蹈外国。唯独编纂教科书，主要指小学教科书，出版界结合国情，弯路最少。这点我们比日本当年好很多。日本从“明治五年谕令全国一律兴学校。取法欧美，翻译西书教授，由文部省指定之。从［明治］五、六年至［明治］十四、五年统为翻译时代。旧时所教《论》、《孟》皆不用；伦理道德诸书，用箕作麟祥所译《劝善训蒙本》（明治四年成）。其中最谬者，国语读本亦用美国教美国人之书。且教法不善：每时授以百十字，并不先教字母及识汉字。故劳而少益（今教一年生，先教字母，一小时只告一字。）如教世界人种，则曰欧洲为何人种，亚洲为何人种。只令诵读，不为讲解，故难记忆。又或英文，不明其义，译其读音而已，读者毫为意义可求。算学用美国书，其度量衡与日本异，习而不知其数者，比比然也。所译之理科书，博物十本，物理三本，及初等人生穷理诸书，文理极深。名为小学化学书，实皆大学堂程度。儿童全无所得。唯历史及地理，仍用本国书”。[2]

日本明治维新时崇拜欧美，全盘西化，翻译欧美课本给小学生用，经10年方才觉悟：培育本国民众道德、语文课应该用本国编写的书。我国文化底蕴深厚，小学语文课本曾有借鉴而没有搬用。中学则不然，国粹派说：“我国近今学校林立，而中学教科书尚无善本。我国旧有之载籍，卷帙浩繁，编纂极难，故无一成书者。坊间所有，多译自东文。[3] 以本国者学术事实，而反求之译本，其疏略可知，其可耻孰甚。本报体例精审，择精语详原，以备海内中学教科者用。”[4]

南洋公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蒙学读本》就注意到借鉴

【1】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252页，中华书局，1982年。

【2】〔日〕棚桥源太郎：《教科书编纂法》，第1期2页，附于法贵庆次郎：《伦理学》，光绪三十一年二月，湖北学务处东京印一书的最后。

【3】引者按：仅现能找到的译自日文的文科教材就有：1883年5月东亚译书会出版日本富山房编辑、唐秋渠译《支那史教科书》2册，152页；1902年8月，杭州东文学社出版日本人猪狩幸之助著，王克昌译“教科适用”《汉文典》。（即汉语语法）112页，32开；文明书局于1903年9月出版日人秋山四郎著，董瑞椿译的《伦理教科书》；广智书局［1904年5月］出版日人元良勇次郎著，麦鼎华译《中等教育伦理教科书》。

【4】《国粹学报略例》第五条，该报创刊号，1905年1月，转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二，332页。

而中国化。试看它第二编第一课《四季及二分二至说》的课文：

第一课　四季及二分二至说

一岁十二月，平分四季，春夏秋冬是也。每季为三月，分为孟仲季，如正月为孟春，二月为仲春，三月为季春之类。春季风和日暖，鸟语花香，景物之佳，为四时之冠。夏季日光直射地面，溽暑逼人，以农夫为最苦。然非此则麦不能熟，即稻亦不能发生。秋季多风雨，草木黄落，气象愁惨，远逊春季，惟获稻则在此时，即葡萄苹果等果，亦以此时成熟。冬季冰雪凛冽，百虫蛰藏，气象尤为愁惨，然植物之以秋季下种者，其萌芽正在此时。且寒气之烈，可以杀害物之虫，而灭空气中流行之毒气，则冬季之益也。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为二分，二至四节，以日照地面之时刻长短而分。春分，恒在仲春之某一日。此日昼夜各十二小时，过此则昼渐长。至仲夏之某一日，昼十四小时三刻有奇，为极长日，即夏至也。过夏至则昼渐短，至仲秋之某一日为秋分，昼夜又改十二小时与春分日同。过秋分则昼又渐短。至仲冬之某一日，昼仅九小时有奇，物极短之日，即冬至也。过冬至则昼渐长，至春分而昼夜均平矣。

西国一岁，亦分四季，唯彼则以春分至夏至为春，夏至至秋分为夏，秋分至冬至为秋，冬至至春分为冬。此其异于中国者也。（以上课文——原注）

何为四季？每季有何种分法？四季有何好处？坏处？何谓二分二至并如何分法？二分二至常在何日？其日时刻若何？西国四季与中国异同若何？（以上三行为习问，向学生提问——原注）

每课后附刻习问，教习均可以意增损，惟以练习学生记性、悟性为主。（给教师辅导——原注）

值得注意的是课文最后“向学生提问”和“给教师辅导”两段，这是改变以往《三字经》等蒙学读本所没有，而导致死教书和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的开始。

上述课文，“多从英文读本译出”？“略仿外国课本”？还是自己编写？笔者在当时流行的外国课本里找到一些，现在把19世纪末英国麦克米伦的《新东方课本》（*New Orient First Reader*）第1册第12课课文翻译如下，以比较：

第12课　时间

一小时有60分，一分有60秒。一秒时间，可以用一计算；钟则滴答响一声。滴答、滴答、滴答，就是3秒。钟说“滴答滴答滴答，凡是你要做的事马上做。光阴无声无息飞快过去，我要作的事不留到明天”。

一天一夜有二十四个小时。有时白天比夜里长，有时夜里比白天长。每周有七天，第一天叫礼拜日，因为古人崇拜太阳；周末是礼拜六。

一个月大约有四周。有四个月每月三十天，有七个月每月三十一天，有一个月只有二十八天。一年有十二个月。第一个月是正月，最后一个月是腊月。

新年第一天叫元旦，腊月二十五日是圣诞日。

月的名称：January，February，……November，December.

这样，时间可以用六个词计算：秒数、分数、小时数、周数、月份和年份。一年，就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

二、结合国情

比较两个课文，可以看出我们的前辈比日本人聪明，借鉴而不是照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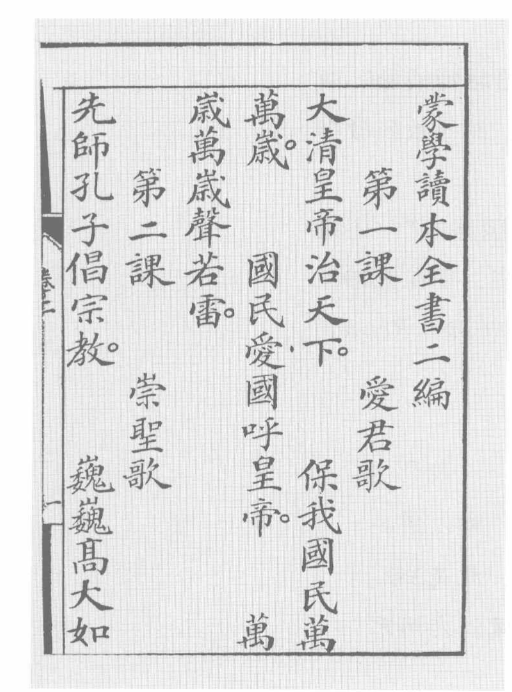

蒙學讀本全書二編
第一課　愛君歌
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國民萬
萬歲。國民愛國呼皇帝。萬
歲萬歲聲若雷。
第二课　崇聖歌
先師孔子倡宗教。巍巍髙大如

图 33
《蒙学读本全书二编》

《蒙学读本全书》是模仿日本课本编写的，他们的宗旨是“是编学级则务合日本，而所演游戏故事则尽属吾国惯习之事”。[1] 即参考日本课本的进度和所采取的题材形式，讲述我国类似事情。如日本崇敬天照大神，我国周代开始神的观念就淡化，孔子就不讲怪力乱神，而以人为中心。孔子是我国的精神领袖，所以《蒙学读本全书》里就崇敬孔子。(图33)

作为基础教育的初级课本，对国家国体、政体的应该有介绍。《蒙学读本全书》和《文学初阶》出版于20世纪初，就有对清廷如何表述的问题。《文学初阶》这样说：“我国……长阔均万余里，合成一国而奉大清朝为皇帝。”[2] 蒋维乔在1947年4月说《蒙学读本全书》：“其第一册第一课，是‘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万岁声若雷’其陈腐可笑如此。预编此书之陈颂平告我：‘此一课乃吴稚晖得意之笔。’微陈君言，谁敢信之。”[3] 该书编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如果真有此项文字这本不是问题。又说陈颂平所言“谁敢信之”而传播，已离开了题目。但是从该课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该课本对日本课本的借鉴。蒋维乔所引“声若雷”，并非第一册第一课，是该课本第二编第一课的课文。课文如下：

《蒙学读本全书二编》

第一课　爱君歌

大清皇帝治天下　保我国民万万岁

国民爱国呼万岁　万岁万岁声若雷

第一编第一课课文是：“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第一编第二课：“我拜孔子像，我从孔子教。”第一编第三课：“父母生

【1】《蒙学读本全书·二编·约旨》。

【2】《文学初阶》卷5，第13课《中国》。

【3】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396页。

我，父母养我。”第二编第一课才是上面引蒋维乔所说“万岁万岁声若雷。”第二课：“先师孔子倡宗教，巍巍高大如山斗。终身服教誓弗违。叩首叩首叩首。”第三课：“母命儿，去发蒙。儿勤读书母自喜。”值得注意的是《蒙学读本全书》第二编第四课的课文：“学生至学堂，先生曰：尔读毕第一编书，能尽解乎？能尽解，我今教尔读第二编书矣！”这是接续前册的课文，应该是开学第一课。现在在它前第一、二编都有的、和整个课本结构不发生结构联系这3课，是整本课文的前赘。这一、二编的前3课，即国统、学统、血统，是从日本的课本里学来的。我见到当时日本小学一、二年级用第1—4册语文课本首3课都重复这3个题目。不同处仅在它讲天照大神、天皇和父母，意在崇敬。而我国君权神授说早已破除，所以代之以孔子。

从《蒙学读本全书》每册有的“约旨”中可以看出，它第一至四册是模仿日本课本的结构，第五册则仿西方。但课文完全结合国情：“日本有通国所习之假名”，所以低年级课本用白话。中国言、文不同，如果“儿童惯习白话，后日试学作文，反多文俗夹杂之病”。所以“用浅近文言，不敢掺入白话”。[1] 如第一编十课：“我见一犬，见犬之足，见犬之尾。见犬有四足，见犬一尾。”“犬、足、尾”都属文言词，课文中有狗的图，学生看图就能知道犬即狗，足是脚，尾是尾巴。第一编共60课，有51幅图。《约旨》说：“书有图画，最易醒目，矧在儿童，尤性所喜。是编遇有情景可图者，罔不尽情点缀，务使儿童一展卷时，未解字义，已了然于画意所及。浏览循诵，断不至再有畏读之虑。”我国书籍有附图的习惯，所谓“上图下文”，《蒙学读本全书》课本插图则混排于课文中，学自外国。《蒙学读本全书》插图多和精美，也是使它在当时异军突起的原因之一。

他们不仅编写时注意国情，而且极有信心地说，更合乎国情的课本将会面世：“游东瀛学师范者指不胜屈，……学成归国，衡人心国势以定目的，本吾中土之资料，合东西教育理而陶冶之，成合格之课书，会有期也。”[2]

【1】《蒙学读本全书·一编·约旨》。

【2】《〈蒙学读本全书〉序》，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第一编《约旨》后，文明书局，1902年。

后来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资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顾问看了中国学者编的教科书稿本后提出意见，我国的编辑认为教科书应该以我们民族的思维习惯编写而没采纳："二月十三日 长尾君来辩论，教科书须每课次序互相联络，以便儿童记忆。余等与之讨论多时，决定相发明相印证，不可为形式上之联络。"[1] 而在前，《蒙学读本全书》就有照搬日本课本的痕迹：第一册第24课讲耳和目，25课讲鼻，26课讲口，27课讲眉、发、须，28课讲手。就是"集中记忆"作"形式上之联络"。但《蒙学读本全书》在课本内容上就是我们习惯的循环记忆。

[1] 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第28期，47页。

第八节 三套有影响的课本

晚清被广泛采用的课本有三套，他们前后逐步完善。

一、《蒙学读本全书》

由于南洋公学丁酉年课本并不是给正常学龄儿童用的，而且现在仅能见到它两篇课文，无从评价。《蒙学读本全书》虽然比南洋晚一年，却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并被社会广泛采用的国文课本。所以它对于研究教科书编撰者摸索的历史，较有价值。

在本章第五节"结合国情的借鉴"中，引了蒋维乔对《蒙学读本全书》的各编的简述。自从近年出版史逐渐被人注意，对于《蒙学读本全书》各编描述却仍是蒋维乔的寥寥数语，或略加变化。最可怕的是个别先生不去找原来的课本看看，却编造历史。蒋维乔说第"六编，注重作文修辞"。但是有一部"八五社科基金"的书将"作文修辞"4字演化成这么一段："第六编是记叙文，内容多半是新撰的，有一二十篇选自《资治通鉴》，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在编排上，前半部分课文重修辞，以奥衍富丽之文，写游戏习惯之事，为儿童读史汉巨篇之引。后半部分课文重达理，即以游戏习惯之事命题，演为议论之文，为学作论断文之引导。"[2] 洋洋洒洒这段文字，除"修辞、达理"4字外，多

[2]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101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为无中生有。他绝对回答不出他说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在第六编哪几课，《资治通鉴》在第六编中还有被选改写是哪些篇。

其实“全书”第六编也是“眼前浅近事物”，而且与第一至三编有很多题目相同，只是写得深些。有些先生敢“创造历史”，缘于大家不易见到这套书。现在将该书《序》中关于各编，特别是“第六编”内容的文字录如下：

“前三编多就儿童游戏细事，及眼前浅理指示之；附入启事短笺数首。四编则专重德育，补修身书之缺；五编则注重智育，为论理学之引，是二编者，采辑子史故事，均就原文略加删易，使浅显易明，足以发越儿童德性智慧而止。六编仍就儿童心裁所有，前半为修辞，后半为达理，较前三编（按：即第1–3编）为加深矣。七编于史汉通鉴，择其最有兴会者；于国策诸子，则取其理趣名隽者；复附以唐宋迄国朝名家古文，均系短段狭幅，间有节合成篇，以便诵习。次编次之大略也。”[1]

【1】《〈蒙学读本全书〉序》，1页，文明书局，1902年。

（一）两重循环教育法

现在见到的7编（为行文方便下面均改称册）《蒙学读本全书》，是1902年文明书局结集编辑而非原先的编次。它的第4册是修身书：“四编则专重德育，补修身书之缺。”似乎原来没有所以要补。或是与后来颁布的第一个兴学上谕里提到“教法当以……纲常大义为主”有关。《全书》以两遍循环法安排内容。他的第1至3册与第6册，构成一个两重循环，以儿童日常所见为题材。第5册、第7册，同样构成一个两重循环，选读古籍名段。第四册是修身，全册分前后两部，构成一个两重循环。如下：

第1—3、6册儿童日常所见题材，如：

第一遍　第1册32课无题目课文：“石板平，石笔尖。石板写字不用纸，石笔写字不用墨。”

第二遍　第6册43课题：“问：石笔中有方、圆、三角等式，究以何者为最使适于用？详析言之。（有课文200字，文略）”

第一遍　第1册38课无题目课文："天欲雨，先有云。云聚则成雨，云散则雨止。"

第二遍　第6册45课"说云"，（课文249字，文略）

第一遍　第1册53课无题目课文："瓦砾之中，有蟋蟀焉。儿童捉之，养于瓦盆中，以饭粒食之，以清水饮之。"

第二遍　第6册第7课题"斗蟋蟀"，第34课题"论斗蟋蟀（上)"，第35课题"论斗蟋蟀（下）（7、34、35课课文111字、224字、243字，文均略)"。

或可见编撰者序中所说1—3册讲"儿童游戏细事，及眼前浅理"，"六编仍就儿童心裁所有，较前三编为加深矣"的概况。

从第1—3和第6册间所涉题材分析，《蒙学读本全书》编撰者对教学内容不是用"由近及远"铺开的办法；而采取"由浅及深"，加深认识——就儿童身边琐事，逐步深入剖析，是其特点。兹以有关猫的课文为例：

第1册49课无题目课文："灯下读书，适来一猫。跃上书桌，四顾而见鼠。鼠骇而逃，猫逐之。鼠逃于前，猫逐于后。"第2册52课题"鼠斗猫"，讲有大鼠想聚众鼠合力斗猫，结果大鼠被擒。第3册18课题"说猫"，讲猫的形状、习性、与人关系。

第6册3课题"猫捕燕"，说猫作力不胜任事，几至堕毙。第32课题"论猫捕燕"，评论猫"溺于一燕之利，而忘其堕泥之危"。

就"儿童日常所见题材"的两重循环教育安排讲，《蒙学读本全书》采取由浅及深的教学方法，包含修辞、达理两方面的内容。

第5、7册选读古籍名段。编撰者认为，教育儿童要深浅适宜，说“是编字句之间，就原文点窜，务使儿童之分际而后已”，是指摘录涵义浅显的原文。第5册选子书著名寓言，摘诸子故事原文，而略掉寓意。或录寓意而不作提问。如第22课《庄周游雕陵之樊》，提问时仅问庄周逐层所见，而不问课文中“庄周怵然，捐弹而走，三月不出”的原因。第12课《歧路亡羊》提问不及“故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1]

【1】“丧生”一词，课本作“丧心”。

第5册每课后有提问，并且设答词。所选诸子寓言多讽“聪明人”。第5册本“以发越儿童德性智慧”。在提问中有时指出寓言中主人公的失策处。如刻舟求剑，有一问说：“问剑坠于水，当如何求之？答，当止舟求之。”但并非每课都点拨。

而第7册和第5册之间，则是情节和文字表述的加深。编撰者认为，儿童教育，课文应该注意引起学生阅读兴趣，缺乏兴趣的课文，不容易记忆。所以第7册选文注意于文笔曲折：一方面注意课文的可读性，另外注意到文辞的隽美。和第5册诸子寓言相比，古文的循环高了一个层次。

选文注意于记录机智和壮烈的故事：“咸阳送戍，哭震云霄，由怯弱之素积也。立五洲竞争之场，正宜露我头角。是编将吾国二千年战史，豪杰骏雄之方略，节取而汇录之。儿童读此，庶热血溢涌。共有爱国敌忾气象，以成完全之国民。”他们对国家未来主人寄托的拳拳之心，皇天可鉴。又“编辩论文十首，皆颖锋精锐，出入申韩”。[2]

【2】《蒙学读本全书七编约旨》，文明书局，1902年。

第5册因为是寓言，每篇短短课文都有七八个提问，还有答词。第7册课文每篇在140至300余字之间；文章虽曲折，但铺叙明白，学生年级又高了，就不设提问。

第4册讲修身分两个大段落，也是标准的循环：第二个段落完全重复第一大段落的内容。将在第八节该书时详细论述。

（二）单字处理的开创性

《蒙学读本全书》第一个册每面顶上有一厘米宽的行，用小字注明该页首次出现的生字。该册后面有《字类备温》，集合该

册所有生字。生字按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联字等7类。这些语言学名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马氏文通》出版于1898年冬天，在同年开始编纂的《蒙学读本全书》就采用这些概念，反映了当时读书人追求新文化的热情。但是以后各册不再注生字和《字类备温》。此后各家编纂的各语文和类似语文课本，将生字专门单独注明，则成为一个制度，应该是起源于此。

当时的词汇分类除名字、介字外，其余的概念并不和现在的语言学概念完全吻合。

虽然对词汇用“字”表达，实际已经以“词”处理。

生字表只在第一册，其余都没有。但开始于这本课本的做法，被后继各出版社的各种语文课本所遵循。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在第三册附有10课书信的范文。书信范文在坊间有专门书卖，称做“尺牍”。但这类书信范文对读了两三年书的孩子讲，难以作为自己写信的参考。这类范文主要是文人间的往来，文词不是一般民众书信往来所能参考的。当时一般民众让孩子读书的目的就是能写个便条记个账。当时还没有规定学制，前面提到无锡三等公学课本以两重循环法编撰，也是说他们将小学教育分为两个段落。7册课本，因为在第3册所附10课书信范文，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可作为语文的第1—3册，加作为修身的第4册前半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初级阶段。同样，作为语文教育的第5—7册，加作为修身的第4册后半部分，是一个完整高级阶段。虽然没有算学、自然科学、史地等科目，无损于初步摸索者的功绩。

第三册所附的10课书信，每课1封信。10课分别讲述给老师、父母、祖父母、伯父母、兄弟、姑父母、舅父母、姨母姨丈、表兄弟、同学10种亲朋关系。每课先讲对一定亲朋的书面称呼和称呼相应的自称。如“弟子称师曰夫子，自称受业”。“子称父母曰父亲母亲，自称曰男”。“称同学曰仁兄，自称弟”。还有信封的写法。这些正是一般学生课程所没有的。而在第三册最后添加

这10封信，可以体会到教科书编纂者对学生（阅读者）的关注。这个做法为后来各种教科书所接受。

《蒙学读本全书》第1—3册是供较低年级，所以有一定量插图，以引起学生兴趣。第4—7册全部没有图。

《蒙学读本全书》第1—3册每课有提问，4册后则偶尔有提问。第5册取子史故事，特别寓言，其故事内容不加指点学生很难理解意义。所以每课都有问答，通过问答解释意义。第六册取儿童喜闻故事，文字的虽较1—3册深，全部用当代语言，不必作注解。第七册选取《左传》、《史记》、前后《汉书》、《通鉴》、《国策》、《列子》故事，和韩晏吕文字50篇，中古文10篇，加以改写。因为是改写，还不能称范文。此时学生学业已很可观，所以都不必作解释和提问。

二、《文学初阶》

杜亚泉的《文学初阶》（图34）共6册，初版于1902年夏。我们现在能见到1905年的第8版。3年印8版，比《蒙学读本全书》印次多。应该考虑1905年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出版已经整1年，后来居上而《文学初阶》还有市场，可见其自有特点。但其总的发行时间不长。因为《文学初阶》编写时清廷还没公布学制，出版后《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蒙学为4年，而《文学初阶》仅能3年用。《最新教科书》是在1904年《奏定小学堂章程》公布之后，能按照学制规定的学制、年级编，符合学制，《文学初阶》就被替代了。

（一）《文学初阶》的特点

《文学初阶》在编写上，是我国第一部基本以儿童身边事物为主要内容(图35)，用词汇教学，不用范文的初小课本。并注意了生字在课文中的均衡出现和反复出现。在教学的分量上较为适中。它接近近代语文课本的基本模式。

两部书的语文量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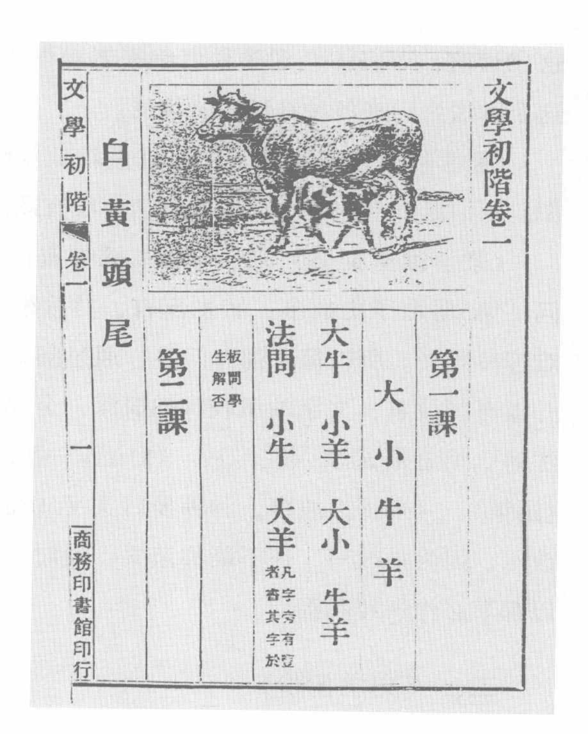


初等小學堂用

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　卷一

繪圖文學初階

上海商務印書館第八次校印



文學初階卷一

第一課

大小牛羊

大牛　小羊　大小　牛羊

法問　小牛　大羊

第二課

白黃頭尾

文學初階　卷一　一

商務印書館印行

图 34(左)
《绘图文学初阶》内封

图 35(右)
《文学初阶》第一课

《蒙学读本全书》和《文学初阶》语文量比较表

书　名	全书课文字数	生字字数	全书课数	每课课文字数	每课生字数
蒙学读本全书第一册	1367 个	410 个	60 课	22.8 个	6.8 个
文学初阶第一册	1224 个	564 个	120 课	10.2 个	4.7 个

语文教学，尤其初小一年级，课文量，特别是生字量很重要。过多，学生畏难而损伤积极性，过少，容易松懈。还要注意循序前进。这方面，无锡三等公学的《蒙学读本全书》草创，可能比后起的《文学初阶》稍有欠缺。现在把两种课本前10课课文和生字分别列表如下：

《蒙学读本全书》和《文学初阶》前 10 课语文量比较表

书　名	第 1 课	第 2 课	第 3 课	第 4 课	第 5 课	第 6 课	第 7 课	第 8 课	第 9 课	第 10 课
蒙学读本	10/7	10/6	8/3	10/5	11/8	12/7	20/9	24/9	16/6	22/5
文学初阶	8/4	8/4	8/4	8/4	8/6	8/4	8/4	8/4	8/4	8/4

注：表中数字：课文字数/生字字数。

《文学初阶》开头课业虽然不重，但在第80课以前，课文都是用生字组成关联的词。如以“石、泥、土、瓦”4字组成“白石、黄泥、泥土、瓦石”4词。以“官、民、士、农、工、商”6字组成“上官、平民、文士、老农、小工、大商”6词。这样教，似乎是变传统的集中识字教法为集中识词。集中识词同样不能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相比较，《蒙学读本全书》开始就教句，生字在句子里，容易记忆。

（二）内容突破传统

《文学初阶》在文字教学的技巧方面有所突破，那是第二位的。在社会历史转变过程中，对课本，审视其思想导向是首要的。

《文学初阶》是最早让学生直面社会的国民教育用教科书。它提出了人人读书，“读书识字之人愈多，国愈强”。指出：“不独男子宜读书，即妇女亦宜读书，然后能以所知教其儿女。不独士宜读书，即农工商亦必读书，然后能行新法以兴其业。”（第6册6课《读书》）普及教育这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社会进入近代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而这是在此前所有启蒙课本所没有接触的题目。

《文学初阶》不仅教学生知书识理，还引导人生。在最后第6册将学完时，第86课《为学之道》，说最要之学共4：当知养生之学，当知为人之道修身之学，当习一艺谋生之学，既为一国之民当知为民之责。第89课《戒惰》、第93课《择业》，告诫不要轻视农、工、商3业。这些内容以往各册陆续谈过，全书将结束时再重复，可说是临别赠言。可以说《文学初阶》是一本将学生引向社会生活，而不是引向科举的课本。如果说商务印书馆后来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一部成熟的教科书，那么《文学初阶》是在此之前的一个重要阶梯。所说成熟，就是将学生引向生活，是千余年来读书目的的大革命，值得大书特书。

《文学初阶》也关心社会的另一面，在第6册第8、9、10课分别论述了乞丐、流氓、盗贼。那时不可能从帝国主义侵略和专制

社会的本质来认识大批失业者、贫民沦为乞丐、流氓、盗贼的根源；但作者提出挽救之策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提出：“欲设法而挽回之，其要在兴工业始”（第9课）。可见他的前瞻。同时针对近代中国形成贫困层的另一原因鸦片，大张挞伐（第71课）。

在晚清，面对以“国家”自命、极度腐败的政府，处置爱国问题有个矛盾。《文学初阶》处理恰当，即分成中国和清廷两个层次：中国是指疆域：“中国者，自吾之祖宗，以至吾身，及吾之子孙，皆生于斯、老于斯，所谓父母之邦也。其可不敬不爱乎”（第6册29课）。就能提出“当思中国强，即吾等之荣，中国弱，即吾等之辱”和抵御外侮：“吾愿一家一国之人忘家内国内之小怨，而以受外人之侮为大耻，则家盛而国安矣”（第6册22课）。进而将雪耻大任托付学生：“近则日本取我台湾，德国踞我胶湾，俄踞我旅连。中国之地几何，而东西强国以数十计，呜呼危矣。夫中国之耻，即我辈之耻，思之能无愤狠。尔等年虽幼，皆他日为国雪耻之人也。”（第6册88课）将民族命运和儿童结合在一起，这是自有启蒙读物以来第一遭。

（三）《文学初阶》对后来教科书的影响

《文学初阶》因为和后来学制不符以及商务印书馆后来《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出版而发行时间仅几年，但它对后来各种国文或语文教科书的影响却不能抹杀。

低年级课本课文全部编写而不用范文，是自《文学初阶》开始的。这一做法和它的某些课文的选题一直被后来的课本沿用。例如：

第4册 第5课 让梨，第79课 灌水浮球，第80课 击缸救童，第87课 望梅止渴，第98课 大禹治水。

第5册 第56课 诚谎（狼来了），第57课 二友遇熊，第79课 二童争日，第85课 鹬蚌相争，第88课 螳螂捕蝉，第97课 西门豹治邺，第100课 曹冲称象。

第6册 第35课 华盛顿砍樱桃树。

这10多个课文选题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被各种小学语文课本

所沿用，现在六七十岁年纪的老人多少都读过。不仅这些首选自古代子书、寓言、外国故事的课文陆续被沿用，而且某些具有一定意义的文字也被移用。如第4册第65课课文：“冬月大雪，路有乞人呼饥寒。师告诸生曰：尔辈饱食暖衣，无忧无虑，非尔父之劳力得钱，尔母之关心家事，衣食何来乎？尔辈于此，当思父母矣。”后来1919年中华书局的《新式国文教科书·第1册附课》：“那一位给衣裳你穿？那一位给饭你吃？那一位很疼爱你？你仔细想，不是你的父亲吗？”两者课文的寓意和行文很相近。

三、全套的中小学《最新教科书》

教科书的历史虽然从1896年左右就开始，但到1904年初前，连最重要的语文课本都还仅仅只有几册。上海所有书商的书凑不齐初小四年各科所需要的。晚清唯一一套完整的，也或许因为只有它完整而始终成为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中小学教科书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

《最新教科书》由各年级、课程组成。如《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10册；《最新初等小学算术教科书》1—10册；《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1—10册。《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4册；《最新高等小学算术教科书》1—4册；《最新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1—4册等等。由于每种、每门、每册书上都有“最新××教科书”5个字，所以称“最新教科书”。它的核心是《最新国文教科书》，讲清楚了国文，全套书也清楚了。

(一) 明确教育原理

商务印书馆花全力编好《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动力是回顾了洋务派40年办学失败原因：“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几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以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所以行之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1] 在《东方杂志》创刊号刊登的课本插页广告中说：“欲谋教育普及，不可不于国文加之意矣。近岁广设学堂，稍稍有编蒙

【1】商务印书馆：《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1904年。

学读本者，然施诸实用，都未尽合。或程度过高，难于领会；或零举字义，不能贯穿；或貌袭西法，不合华文性质；或演为俗话，不能彼此通用。有志教育者时以为憾。”[1] 虽是说在它之前各书的毛病，却也是事实。我们的文、言分离，汉字又是表意而不表音的符号，就编好语文初始课本讲，比其他语言要难得多。他们在编写前，对已有各种课本进行研究。集中攻克第一册，即学童第一门槛。归纳出在此之前各家出版的课本有18条不足之处：“单字讲解索然无味；笔画太繁不易认识；连字介字助字等难于讲解；深僻之字不合目前之用；生字太多难于认识；语句太长难于上口；全用短句，不相连贯，则无意味；数语相连，不能分句解释，难于讲授；语太古雅不易领会；语太浅俗，有碍后来学文之初基；陈义太高，不能使儿童身体力行；墨守古义不能促社会之改良；外国之事物不合于本国习俗；春讲落叶，秋谈萌芽，不合时序；不常见闻之事物不易指示；文过恢谐有碍德育；文过庄严儿童苦闷；进步太快失渐进之理。”[2] 而他们根据这18条不足订出相应改善方法。

【1】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

【2】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卷端，商务印书馆，1904年。

由《缘起》、广告、《编辑大意》3件文字可见参与编撰的几位先生对薄薄一本启蒙书是从一个很高的角度和很广的层面来考虑的。就方法讲，既对以往课本查看其失处，必然也见到可以借鉴之处。失处可反其道而行之，得处可扩而大之，综合两者，已见必操左卷之端倪。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普及教育、小学立基、国文植本”这三者。以此出发，必达高峰。

（二）细致编写国文教科书

以往几种综合课本都是一个人编写，虽都会有所考虑，总不免“一心一得”而已。《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采取多人合议磋商，能更周到一些。编写采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学习心理，图文并茂以引起儿童兴趣的编写原则。当时编写者在日记中说：“东西各国教育家考定，教科书首数册必取笔划极简单者，使儿童脑力不伤。华文以音义相配，笔划甚繁，编辑时非常艰难。盖每一课既须意义贯串，生熟字相配，而又限于笔划也。”[3]

【3】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1992年2期，46页。

“第一册的选用字仅四百四十六字。此册接编短文，熟字不敷用，而生字又不能无限制。故束缚益甚，殊难下手。今日仅成十课，而绝少惬心贵当者。”[1] 编写者所以受束缚，缘由编写前不仅规定每课课文的递加数、生字数和生字笔划数，而且还规定全册的具体生字表，编写者只能在规定的最常用字表中选字。这就使功课进程的适量性和均衡性得到严格保障。

【1】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1992年2期,47页。

严格控制课文和生字适量性和均衡性。规定第一册学生每课接受4个生字，多则5个，平均每一上课天为3.8个。课文先每课4字到8字，第21课起从10字开始，每20课加2个字：至12字、14字、16字、18字、20字。字的笔划从每字4划开始，然后稍增加；全书过半，才可以有过12笔的字。为了增加儿童兴趣和理解，每课均有插图。全书60篇课文有100幅图，其中3幅彩图。每课的文字、插图安排在一个展开页上：书摊开，就是完整的一课。这样的版面安排，前所未有，而且成为此后低年级课本的制度，直到今天。

前面提到商务印书馆，蒋维乔说，当年高梦旦“特别注重国文”。不仅列入优先，而且当时“编辑之时，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修改，费时恒至一二日”。[2] 给刚入学儿童读的一二十字一课书，要“共同讨论”，研究怎样修改更好，以保证使书稿获得高质量。全书编辑于1903年12月，两个月后，次年“二月十五日　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已出来，未及五六日已销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3] 接着国文的后续各册和“其余算术、历史、地理等科，亦相继出版。商务教科书营业之盛，冠于全国。南洋［公学］之《蒙学课本》，文明书局发行之《蒙学读本全书》，渐渐淘汰”。[4] 自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商务印书馆按照癸卯学制编写课本，三十年二月初十左右《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出版。接着一面修身、算术等各科铺开，一面从第一册、第二册……延续下去。初小各年级后高小，然后中学，前后用了5年时间。这批课本是我国第一套基本完整的普通初小、高小、中学教科书。说“基本完整”是因为，有些体育等“自由课”商务

【2】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6~397页。

【3】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1992年2期,48页。

【4】蒋维乔:《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张静庐辑注:《现代出版史料丁编》,396~397页。

没有编课本。此外，还编撰出版有师范学校用课本，和教育学、课堂管理等等适合学校老师进修用的书籍。

（三）首创教授法参考书

值得注意的是，商务印书馆不仅为中小学编写出版了几近全部的学生用课本，还为每册编撰了相应的供教师用的教授法。现在小学的各科课本，还基本有相应的教授书，对文化欠发达地区还有很大作用；所以在100年前，教授法书的作用绝不能低估。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下令办学。各汉族督抚响应，也无非下令道、府、州、县办理而已；课本哪儿来，教师哪儿来，这类事没人管。当时政治腐败，各公立学校校长无非安置亲戚故旧充教师。陈嘉庚说，辛亥后他回家乡办学以回报家乡，调查了同安县小学和福建师范学校的情况，才知道1904年以来，县小学和省师范经费充裕，但小学10年没有毕业生。因为校长教员由官指派，学生由校长招来，若长官更换，校长、教员、学生也全部更换。师范生因为毕业后给予举人出身，被膏粱子弟视为终南捷径；入学全凭势力，毕业后更不作教师。[1] 所以当时教师大都从塾师转来，根本不懂新式教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八日袁世凯最先指出："直隶各属州县现均筹备小学堂，惟教习乏人，仍属虚应故事。"[2] 因而他办师范学校来解决。但一则远水不解近渴，二则杯水车薪。更何况并非各省都在办师范。所以教授法书对推进当时学校教育作用不小。

【1】陈嘉庚：《南侨回忆录》，4~5页，香港草原，1946年。

【2】《直隶总督袁世凯拟订师范学堂章程》，《钦定章程类纂》，58页，〔日〕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193页。

教授法"准教授学之阶段按课分列，预备教授运用之法，附以参考及习问。以便教师有所依据。内地塾师，苟应用此书，兼参考教育学管理法则，于小学师范过半矣"。[3]

【3】《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目》，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222页，上海书店，2005年。

各科教授法模式不一，目的相同：使学校教育远离旧时学塾教法，启发学生思维，使新式学校真正脱离旧式教学模式，有利学生素养提高。以国文教科书为例，教授法每课有"要旨、教授次序、参考、提问、作文"5项。其内容，试举与1905年《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配套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第二册第九课为例：

第九课　采菱歌

要旨　本课意义，引起兄弟姐妹亲爱之情，且合于七八月时令。文字为歌谣体。

教授次序　1. 预备　令学生看课文图。图中一家人，门前有菱池，一小儿坐盆中采菱者为兄；门前妇人为母，手携小孩为其弟。2. 教授　教员指“采”字问学生曾读过否。此字前曾教过，使更明白。3. 运用　［课文］首四句言菱之好，中四句言采菱，末二句言哥哥采菱后弟妹之喜欢。

参考　菱生水中，有红菱有青菱，皆有角。小儿坐盆入菱塘，采而食之。哥哥采菱必分给弟妹，故皆欢欣。歌谣最足感发儿童兴趣，游戏之时宜令唱之。

提问　青菱好乎红菱好乎？哥哥在做何事？在菱塘中坐船否？弟弟妹妹何以欢欣？

作文　甲：父□，　火□。乙：床上有□。(一年级“作文”实际是连词；作文或连词造举不以本课，都以前几课的内容命题。)

该课课文共50字。50字的一课课文，这样帮助教师，教学必能有声有色，比旧时学塾那样仅仅以反复死念、能背诵作为教和学的标准将生动有效。

旧时俗话“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学塾先生大都经济不宽余，也就在本乡本土学塾中读过几年书，家里不会有很多书供参考。编辑们编写时充分考虑到这点。教授法书中最能帮助教师的是“参考”一项。如同册第五课《孔融》，第十二课《司马温公》，都有简要文字告诉教师：“孔融，三国时人，幼敏慧，后为大儒，名闻于世”；“司马温公，宋朝人，名光，字君实，后为名宰相，封温公”。也对课文的意义作提示：“温公幼时，即能临为难而不乱，且有急智，救出其友。可知其为非常人物。”

他们的课本虽用单字组成，但以词解释。在1915年前，我国仅有字典而没有词典，于人极不方便，更何况穷乡僻野。所以国文、修身、历史、地理、格致，遇有需要解释的各词，在教授法书里都一一说明。有些采自古籍的，在教授法书里必交代出处。如1910年的《高等小学用女子修身教科书》第二册第三十课《爱国》，讲北宋末“泥马渡康王”——康王遇到李若水母亲受到帮助的事，在相应的《女子修身教科书详解》中，就告诉教师“本课采[自]《曲周县志》”。中华书局1923年7月出版、董文编写的《新学制适用新小学教科书公民课本》第8册第1—5页《爱国的妇人》，也是这内容，但有一处不同。中华书局本康王回答李若水母亲说：“我在磁相做生意，被金兵掳去”，而商务印书馆这课课文是：“吾为商磁、相间，为金兵劫虏”。两者地名不同。古来没有叫“磁相”的地方。“磁相间”，“间”则两地：唐代置磁州，在今河北邯郸；宋代置相州，今河南安阳。中华书局课本的编撰者或许没有查《曲周县志》。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因为该课课文讲李若水母亲爱国，1932年，日本侵略者禁止我国东北学生读中华书局课本的这课书。

图36
蔡元培



当时书面文字与口语不一致，为了儿童以后能和文言相适应，课本以浅近文言行文。为便于讲解，对课文中出现的虚字，必进行指点用法。如第七课出现“之”字，教授法书说：“本课之‘之’字，与第二课之‘之’字，同是白话中之‘的’字。而前课用在句末，此课用在句中，意义便不同。”第四课：“‘者’字亦为语言中之‘的’字，而用法与‘之’字异。”当时有些教师对一些必授功课可能懂，但对文字表现形式可能不懂，如算术演算式。教授法书做了详细说明。

《最新教科书》是蔡元培（图36）提议编纂的，所以非常关注这套课本。他对课本的教授法参考书尤其赞扬，说：

“庚子以后，学校渐兴，教授者苦不得适宜之教科书，君（夏瑞芳）乃为商务印书馆厚集资本，特立编译所，延张元济主其事……而尤所聚精会神以从事者，实惟小学教科书。其事在我国为至新，虽积学能文之士，非其所习，则未易中程式。往往一课之题数人各试为之，而择其较善者，又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遗憾焉，而后写定。其预拟而为目，综合而成编；审慎周详，无不如是。编辑者之日力，缘是而虚糜者颇巨，不敢吝也。

“教科书以外，又有教授法参考书，非学生所需，售数远逊，然亦尽力以为之。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糙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则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大矣。”[1]

蔡元培对《最新教科书》的评价应该说是恰当的。这套书精心编撰获得高质量，改变了当时出版界粗制滥造的作风，功莫大焉。

【1】蔡元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商务印书馆九十年》,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第九章　民主革命和宪政出版物

刚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显现了前所没有过的新的生机。清廷答应各帝国主义对我瓜剖豆分，使民众失掉了戊戌政变后对政府仅剩的一点容忍。保皇理论愈益苍白，他们的思想阵地日益缩小，社会上用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意识迅速增长。

第一节　除革命别无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后戊戌变法，朝野呼吁建议朝廷借助西方政治变化，进行改变，但毫无结果。张之洞在《劝学篇》强调“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后说：“林文忠尝译《四州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李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援。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祸机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骄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谓之何哉！”[1]

【1】张之洞:《益智篇》,《劝学篇》,36页,上海书店,2002年。

关于张之洞说“李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援”，有一封光绪三年六月初一李鸿章致郭嵩焘的信，谈到这种状况：“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究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设洋学格致书

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莲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恭亲王奕訢），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谓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绝口不谈矣。”[1] 这封信是从1905年金陵版全集引来，不全。《李文忠朋僚函稿》卷17中所收这信，紧接着还有以下文字：“而中国上下，果真倾国考求［西学］，未必遂无转机。但考求者仅执事与雨生、鸿章三数人，庸有济耶！”[2] 奕䜣是首席军机，文祥是军机，名列第二。当时是东西两太后合治，奕䜣扶佐，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还有谁在做主。“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外，还有个因循守旧的“祖宗之制不能变”。

上面引的张之洞话，是在戊戌变法开始时这样说，希望学习西学能有个转变。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梁，他们所希望的是在不触动基本制度的条件下的变革。也许可以称“体制内变革”，龚自珍最早在1835—1836年间就说：如果不改变，“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3] 但清廷一再坐失良机。谭嗣同等6人的鲜血使人相信，与贵胄商议改革，无异与虎谋皮，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到慈禧利用义和团，政府威信降到最低，甚至发生东南的方面大员不接受朝廷向各国宣战的命令，而和各国领事签约，即“东南互保”。梁启超都说：“其冬十二月，遂有议废君立伪储之事。本朝二百年来，内变之祸未有甚与此时者也。……遂乃积羞成怒，自弄兵戎，奖群盗为义民，尸邻使于朝市。庚子八月，十国联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举万乘，乘舆播荡，神京陆沈。天坛为刍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4] 堂堂“天朝上国”，英法联军之役，咸丰帝宁愿丢掉皇城和太庙，逃遁到热河。庚子年慈禧玩火，等八国联军靠近北京城，又丢下祖宗牌位和子民跑了。朝廷两次抛下子民不管，已经丧失了命令臣民的资格。于是，顺理成章的只有

【1】《李鸿章全集》，第6册，369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2】《李鸿章致郭嵩焘》，柳诒徵：《中国文化史》，777页，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3】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定庵全集类编》，68页，世界书局，1937年。

【4】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1册，47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进行体制外的变革才能挽救祖国和民族。蔡元培的变化可说是整个民心变化的缩影。

蔡元培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年，梁启超氏有‘公车上书’的运动，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励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及八月间，谭、杨、刘、林及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康、梁二氏被通缉，我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1] 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说：蔡“在北京数年的观察，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京都，南下从事教育”。[2] 他到家乡当了一年多学堂校长，终于经受不了守旧校董的欺负而离开。到上海不久，组织了名为教育、实为造反的中国教育会，不久又组织光复会。这位翰林院编修这时又学习制造炸弹，可见短短几年民心转变之大。

【1】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283页，中华书局，1989年。

【2】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11页，中华书局，1980年。

八国联军侵入，慈禧挟光绪帝西逃。在议和中，慈禧不得不接受各方压力，实行“新政”。新政使城乡士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庚子之役后，“赔款”给我国的沉重负担，最终全是农民拿出血汗钱。而且清廷规定，国家唯一交付赋税的农民的税额，须折银后交纳。增开口岸等造成的巨额赤字，使银贵铜贱。而农民的收入是铜钱，无形中又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雍正四年规定：丁银并入钱粮，赋出于田；品官士吏、百工闲民、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清朝特别强调“祖宗家法”，不能变更，不能增加税种。东南地区镇压太平天国需要的军饷，是靠“厘捐”维持。太平天国结束，厘金没有废除。甲午、庚子赔款清廷每年分摊给各省。各省“合理合法”地，以各种名目逐级往下摊。于是捐多如毛。光绪三十年《东方杂志》1卷11号就转载《中外日报》的《论近日民变之多》一文说：“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3] 各级官吏乘机浮收，从中中饱，民怨鼎沸。柳诒徵说：“庚子之乱，以满人利用拳民仇外，贻汉族无穷之祸。”[4]

【3】《东方杂志》该号论说栏，270页。

【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821页，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连梁启超1902年4月给康有为的抗辩信中也充满着除革命外别无他法的思想："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我党而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1]

【1】《梁启超致康有为》，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二节　民主思想的引入和传播

一、国民党执政后第一本禁书

国民党禁书是司空见惯的事。黄洛峰在1978年1月谈起建国前"出版工作的主流是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解放后［出版总署］曾叫张静庐整理出版史料，其中包括说明哪些书刊曾被查禁。下一代搞不清这些事。"[2] 我们从张静庐编的史料中查到这样一行："《武昌革命真史》，记载失实，讥评总理，十九年六月中央及国府通令查禁。"[3] 这本书的作者是曹亚伯。极罕见的是，这是一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政府联合查禁的书。在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有曹亚伯传，涉及该书：曹亚伯"谓国民党改组后，一般青年多数典忘祖，鄙视吾辈，皆由不知革命历史所致。遂发愤搜集其多年珍藏之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等，编辑成书，题曰《武昌革命真史》，凡数十万言。民十八特托中华书局旧友陆某代其发行。出版未久，在京鄂人吴某等谓曹著批评起义人物过于露骨，且抹杀起义之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失公道。遂联名呈请党部禁止发行，并没收之。"[4]

【2】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92页。

【3】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230页，中华书局。

【4】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67页，商务印书馆，1945年。

前引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说该书"记载失实，讥评总理"。其实曹伯亚一直追随孙中山，常侍左右。他的《武昌革命真史》

虽然当时是派军警到中华书局追缴监督切毁的，但还有流传，1981年上海书店曾经重印，我们因而还能见到，但看不出有讥评孙中山的文字。

我们知道同盟会时代，孙先生的规划是在“由南部起兵，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便输入武器，占领边省，再谋会师中原”。[1]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感到需要注意中部。酝酿后结集30人发起发表宣言，续有19人参加，闰六月着手组织，称“同盟会中部总机关”。是个小组织，总部在上海。宣言中批评同盟会的松懈和不做基本群众工作：“无切实之组织”、“朝秦暮楚，与夫轻举妄动，抛弃生命者，更不知凡几”；“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维挟金钱之义，临时召集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2] 而中部总机关发起诸人多湖北人，他们很早就打人湖北新军，在甲辰（1904年）四月就在军中发起组织“科学补习所”，暴露后，又组织“日知会”等对新军宣传的组织。武昌起义正是原先在新军中打好基础，由“同盟会中部总机关”诸人乘机发动的。这个事实即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编写的《总理简史》也承认：“于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起事，虽不幸复归失败，而死事壮烈，影响甚巨；未几即有十月十日之武昌起义，遂覆满清。”即承认武昌起义是受广州起义的影响，不是同盟会总部组织。后来都将辛亥革命与同盟会联系，而不提同盟会中部总机关这个小组织的作用。

[1]《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首义》，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209页，商务印书馆，1945年。

[2]《同盟会中部总会与武昌首义》，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210页，商务印书馆，1945年。

科学补习社、安郡公益社、日知会、文学社等小团体，都与新军接触，利用读书会形式宣传民主小册子。可见新书籍在辛亥时的作用。

二、留学日本高潮

而同盟会中部总机关的母组织日知会等，辛亥革命前其成员“日说士兵，散发《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革命军》等书”。[3] 这些书从何而来？从留日学生那儿。

[3]《科学补习所始末》，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55页，商务印书馆，1945年。

自戊戌变法失败，改革的思潮并没消失，而成为潜流。“新政”后，这一思潮日益发展，并成为几股。这时人们较戊戌时更成熟，知道清廷已不足与谋，需要寻找一种替代的制度，故倾注心力于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研究。时“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1]我国最早派日留学生是1896年3月，计13名。“此后中国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1899年增至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一千名；到了1906年，有说竟达一二万名之多。据笔者研究的结果，1906年留日学生实数约为八千名左右。”[2]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5册，310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页,三联书店,1983年。

三、翻译西书新纪元

最早的13名官派留日学生，其中韩筹南、李清澄、王某、赵某4人“因为频频受到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而退学回国”。[3] 日本孩子嘲弄留学生，是由于日本“明治以来蔑视中国的教育所造成的”。[4]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虽受尽屈辱，他们忍辱负重，期待学成之后能对挽救民族有所贡献。他们后来成为社会进步、改革的重要力量。就出版史的角度看，较为系统地介绍西方政治学说，是他们的首要贡献。严复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从时间看，晚于留日学生；严复翻译除《天演论》，其余7本只涉经济学、法学、政治学、逻辑4个门类。从选书看，严复是行家，如经济学，他选《原富》，切合纠正当时清廷错误的经济政策。留学生虽不是学问行家，他们在日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他们把感觉有用的都介绍给国人，就更切实际需要。卢梭的《民约论》国内在1900年就可以通过留学生的翻译而得览全文。如晚清非常流行、后来被称为“亡国史学”的《波兰衰亡战史》、《埃及亡国史》就是这时留学生介绍的。这些是《天演论》的极好补充。选题的自主性和强烈的目的性，是留日学生译书划时代的最大特点。

【3】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页，三联书店，1983年。

【4】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序),9页,三联书店,1983年。

梁启超1901年说：“客冬今春以来，日本留学生有《译书汇编》、《国民报》、《开智录》等之作。《译书汇编》至今尚存，

能输入文明思想，为吾国放一大光明，良好珍诵……《国民报》、《开智录》亦铮铮者也，而以经费不支，皆不满十号，而今已矣。”[1]

【1】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7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译书汇编》创刊最早，维持时间最长。它是最早的留学生团体“励志会”的机关报。励志会的章程无非联络感情，策励志节。章程虽不涉政治，但成员中倾向革命的不少。1900年7月汉口自立军之役殉难者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郑葆晟，和脱险的戢元丞、秦力山、吴贞禄等人都是该会成员。所以翻译的目的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冯自由说：“留学界出版之月刊，以《译书汇编》为最早。所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名著，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2] 该刊由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办理，月刊；创刊于1900年11月，至1903年3卷5期起改名《政法学报》。现在能见到最晚的是1905年4卷6期，刊上未署日期。

【2】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3集，143~144页，中华书局，1981年。

《译书汇编》每期刊登多篇译文，没有通期页码；每篇刊登完后就出版单行本。它前后刊登和拟译的书籍很多，既有名著，也有各国新书。作者国籍虽多，可以确定的都是从日文本翻译。留日学生本身都是学生，或仅懂日语。所译如果是转译，质量更无保证。但在知识饥荒的时候，当属雪中送炭。

四、20世纪初的译书概况

1900年可以说是日文译书的起始。20世纪初那几年，有几种书录出版：徐维则著、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由原3册增至6册，1902年；通雅斋《新学书目提要》4册，1903年。书录的接连编纂出版，反映了译书的增多和读者的兴趣。这时期翻译选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政治书和教育书、农业书多，一是译自日文多。顾燮光补《东西学书录》，看了很多译书，另有《译书经眼录》，录1900—1905年他所见译书533种。该书录1927年出版，1946年杨寿清著《中国出版界简史》时曾将它分类、分国别统计。按内容，史志最多125种，其次法政70种，再次学校48种、

地理46种。按“原本”，日文最多321种，“其它”81种，英文55种，美文32种，德文25种。从“其它”、“英文”、“美文”看，显然是原著作者的国籍，而不是翻译者所使用的文字。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收书533种，远远低于1900—1905年实际。如国内东文学社的《东文学社译书》丛书、《农学报》的《农学丛书》、《教育世界》的《教育丛书》，从1900—1907年，共约400余种，都是顾燮光所没有著录的。

梁启超后来说：“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1]

当时翻译除极个别外都从日文，既容易，就更易被替代：“壬寅以还，世尚游学，扶桑三岛，一苇能航。和文移译，点窜便易成书。然瞬息已成故纸。”[2] 当时目睹者、江楚编译书局分纂柳诒徵说：“甲午以后，学者多学日语，以译日本所译之书，其浅劣殆更甚于官局及教会之译籍焉。”[3] 杨寿清也说：“往往日本出一新书，译者动辄数家。惜乎当时的译述，选择既不精湛，译笔又多不佳，殊有重量轻质之弊。”[4] 虽然质量不高，但所译都是急要之书。当时的翻译，有句话可概括：“留东学界，颇有译书，……考其性质，皆藉译书别具会心，故所译以政治学为多。”[5]

五、呼喊革命

如果译书“别具会心”，写书就更直接。前面录梁启超说《译书汇编》外还提到“《国民报》、《开智录》亦铮铮者也”。

当时梁启超去檀香山，《清议报》由麦孟华代理。文字由秦力山、蔡松坡等人担任，郑贯一助理。因为康有为控制太严，郑贯一联合冯自由，冯自强办《开智录》半月刊，以倾吐自己救国心声。该刊1900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利用《清议报》设备和发行网点。“专发挥自由平等等真理，且创作歌谣谐谈等门，引人入胜。”“各地华侨以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多欢迎之。”[6] 美洲保皇会因而会务受影响，质问《清议报》经理冯紫珊；《开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册，3104~310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诸宗元：《译书经眼录序例》，北京图书馆编：《近代译书目》，402页，北京图书馆，2003年。

【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798页，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4】杨寿清：《中国出版界简史》，23页，永祥印书馆，1946年。

【5】诸宗元：《译书经眼录序例》，北京图书馆编：《近代译书目》，402页，北京图书馆，2003年。

【6】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95页，中华书局，1981年。

智报》由于《清议报》不再代印代发而被迫停刊。

《国民报》在东京，月刊。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办，1901年5月创刊，8月第4期后因资本告磬不再出版。“留日学界公然主张革命排满及反对康梁保皇邪说者，是报实为滥觞。”[1] 该刊大力宣传民权思想。创刊号就指出：“民权为致强之本”，“今日已20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革命。世界万国，以有民权而兴，无民权而亡者，踵相接、背相望。是故我今日即不念亡国为奴之惨，亦当外鉴当世，而蹶然兴起矣！”[2] 第二期上《中国灭亡论》一文指出，民权由斗争得来：“凡国之所以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者，必赖千百志士不畏艰难以肩巨任，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前仆后兴，死亡相继，始能扫荡专制之政治，恢复天赋之权利。此今日民权世界之所由来也。”[3]

【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44页，中华书局，1981年。

【2】国民报社：《原国》，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70页，三联书店，1960年。

【3】国民报社：《中国灭亡论》，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82页，三联书店，1960年。

六、小城镇也在用出版宣传

宣传推翻清廷的文字从海外、上海，逐步向经济发达的小城镇发展。1902年蔡元培创办中国教育会后，在苏州府吴江县的同里镇也成立同里支部，金天翮任会长。他还成立“自治学社”。柳亚子就是最早的学生。柳亚子等同学办了一分《复报》。1934年范烟桥的《茶烟歇》一书有《白话文》一篇，其中讲：“吾乡有自治学社，柳亚子即于此中着其种族革命之论，以誊写板印自治白话报（《复报》），比户投赠。其所论列，以白话文为主体。有小说曰《秦皇镜》，以暴专制之淫威。有歌词曰《吴三桂借清兵》，以着汉奸之罪。此外，鼓吹天足则有《缠足歌》，几于家弦户诵。以视今日见标语而掉首，视口号以掩耳者，其宣传之工拙何啻霄壤。尚有一说部，衍洪承畴事，已不复忆其名矣。余之识新小说面目始此。顾其体裁犹取章回，指写悉同演义，故入人至深。亚子每自挟报纸走街坊分配。余视之如饥渴之俟饮食。维幅小有如讲义。字迹漫漶，更费揣摩。大都散佚，不事保藏，示以是故。”柳亚子在《五十七年》一书中也谈到这刊物：“这刊物是

星期刊，主编是我，文章我写得最多。还要自己写蜡纸油印，这工作也由我担任，［陶］神州他们不过帮帮我忙吧。上半天出版，下半天会员们担任沿街分送的责任，居然搅得蛮起劲。”[1]

【1】两引文均见嘉尧：《金松岑柳亚子与复报》，《苏州杂志》2004(3)，72页。

第三节　辛亥革命第一书——《革命军》

20世纪一开始，中国的革命思想获得一个空前发展的机遇，是民众对各帝国主义和清廷联合镇压的反冲力。

一、清廷和帝国主义“培植”革命思想

常州陈范出任江西铅山知县，因为教案落职。他回到家乡，有人鼓动他接盘日本人在上海办不下去的《苏报》。开始由他妹夫主持。报上主张变法，颇受读者欢迎。后来跟随康有为进行保皇宣传。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帝国主义又一轮掠夺，《苏报》已跟不上形势，陈范改聘中国教育会担任报务。本卷第八章五节已谈及，那时南洋公学学生风潮，蔡元培召集退学学生自治办学组织爱国学社。[2] 爱国学社没有经费来源。学生因为退学，不能获得家长同情，经济断绝。学生伙食由蔡元培设法筹款，教师完全尽义务，各另谋生计。这就是陈范聘爱国学社诸君办报的因缘。

【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14~15页，中华书局，1980年；黄炎培：《八十年来》，35~3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爱国学社师生的活动时期，正是东南革命情绪高涨的时候。清政府和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11国签丧权辱国的《辛丑各国和约》，其第11条规定有“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就凭这条的“应行商改之处”，各个“文明国家”随时可以提出各种野蛮的要求。从1901年9月7日到1903年6月，签订的“国中之国”的租界条约就有13个；关于路矿和税率的条约27个。有条约甚至规定，各国可以在山海关至北京所有铁路车站派驻军事代表。清廷的丧权辱国，使国内反满革命浪潮汹涌。而上海作为反满革命的中心就更形活跃。1902年蔡元培不仅在此发起组织中国

教育会，两年后还组织目的更为明白的光复会。所以当爱国学社成立，接办《苏报》后，《苏报》就成为中国教育会的准机关报。《苏报》“延聘吴敬恒、章炳麟、章士钊、蒋维乔诸人分任撰述，措辞激昂，大为清吏所嫉视。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均假《苏报》为宣传机关，每周演说讲稿，恒在此发表。崇论横议，震撼一世”。[1]《苏报》毫无顾虑地鼓吹革命。

【1】冯自由：《陈梦坡事略》，《革命逸史》，初集，120页，中华书局，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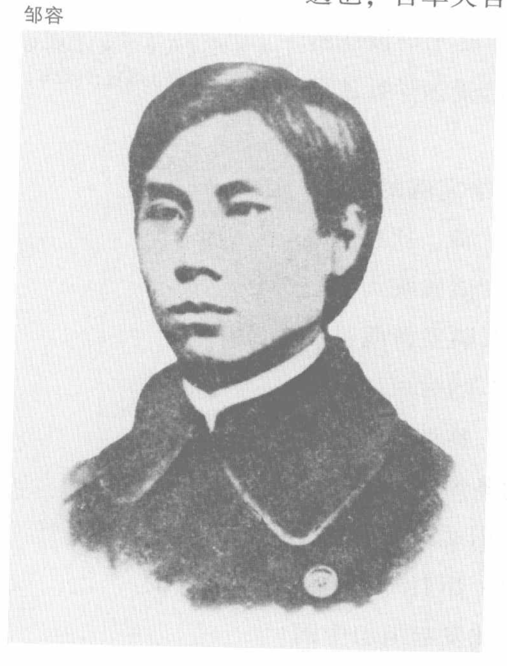
二、邹容的《革命军》

留日学生受欧洲思潮影响，“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诸伟人相期许”。[2] 可见通过出版物民众受西方思想影响之深刻。1902年春邹容（图37）留学日本。在戊戌前他小小年纪读《时务报》等，便对维新极为推崇。到日本后认真阅读西方思想家著作，转变而具革命思想。后来因为惩罚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而被迫回国。4月，他回到上海后完成《革命军》的写作。

【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卷上，54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

邹容谈到他的思想转变：“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又说：“夫卢骚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骚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木。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

图37
邹容



徘徊。此其时也。”[1]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稍前各家译书在邹容身上起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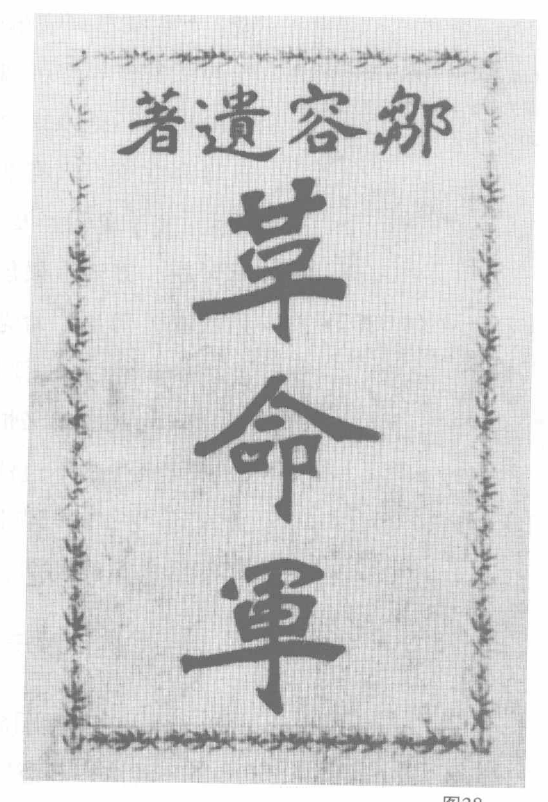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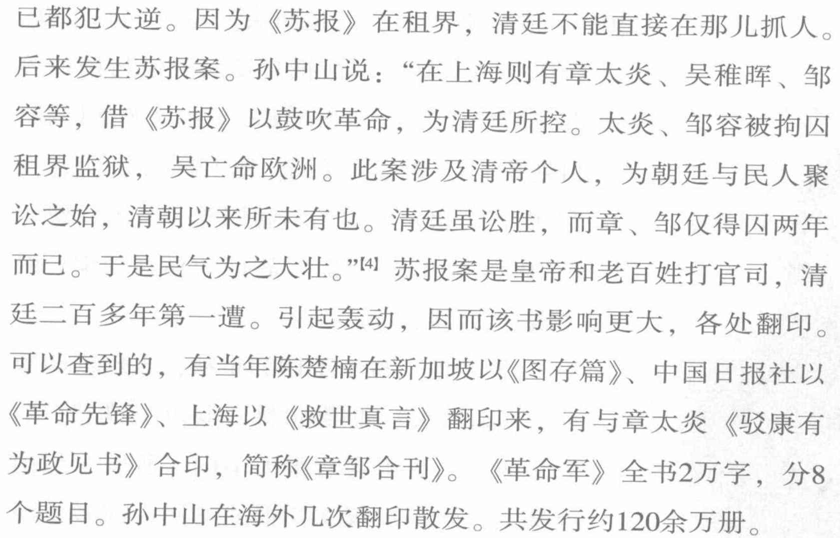


图38
《革命军》

1903年5月《革命军》由章炳麟作序后大同书局出版（图38）。下旬开始，《苏报》除发表邹容《自序》和章炳麟《序》外，还发表一系列推荐文章。章士钊的《读〈革命军〉》说了它的鼓动力：“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2] 6月12、13日《苏报》又刊登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声动海内外。《革命军》提出“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3] 公开要和皇族战，这书和报已都犯大逆。因为《苏报》在租界，清廷不能直接在那儿抓人。后来发生苏报案。孙中山说：“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民人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仅得囚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4] 苏报案是皇帝和老百姓打官司，清廷二百多年第一遭。引起轰动，因而该书影响更大，各处翻印。可以查到的，有当年陈楚楠在新加坡以《图存篇》、中国日报社以《革命先锋》、上海以《救世真言》翻印来，有与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合印，简称《章邹合刊》。《革命军》全书2万字，分8个题目。孙中山在海外几次翻印散发。共发行约120余万册。



“此书文辞不如太炎之驳康书，理论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5] 孙中山

【1】邹容：《革命军》，9~1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2】章士钊：《读革命军》，《苏报》，1903年6月9日，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685页，三联书店，1960年。

【3】邹容：《革命军》，59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4】孙中山：《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03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5】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集，49~50页，中华书局，1981年。

说："邹容着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1] 光绪三十一年舍身炸五大臣的吴樾，他原来"读《清议报》，深信康梁的主张可以救中国，日日言立宪。人有非康梁者，则斥之。又逾时，获读《中国白话报》、《孙逸仙》及《黄帝魂》、《革命军》等书刊，民族大义豁然开朗，方知康梁倡立宪，率国人为满奴，其欺世误国，自恨几为所误，乃与革命党人密相结。"[2] 鲁迅在谈清末大量反满出版物作用的时候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3]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为表彰邹容的革命功绩，临时政府赠予他"大将军"衔。

【1】孙中山：《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03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2】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2396页，中华书局。

【3】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册，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三、悲愤陈天华

由于悲愤而蹈海的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也是这个时候值得注意的两本书。

图39
陈天华

陈天华（图39）是湖南新化人，《猛回头》写于1903年夏，所以先在《湖南俗话报》发表。他与杨仁等办《游学译编》，1903年8月又在《游学译编》11期重刊。《游学译编》重刊时曾说明，在《湖南俗话报》发表的《猛回头》文本，曾印过5 000册，10多天就卖完了。《游学译编》的文本是增订删改过。

《警世钟》写作于1903年秋，直接刻印散发。《猛回头》和《警世钟》（图40）既然在前后完成，思想不会有很大不同。所以思想内容基本一致，仅仅文学形式不同：前者是演唱本子，说一段就有几句韵文。说的段落用"列位！"开头。可能就说唱讲，写作技巧不是很成功，所以接着用叙述文写《警世钟》。

两本书的内容都是痛斥俄国和日本。当时俄国正继续在原来《中俄密约》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企图实行“黄俄罗斯”计划。这计划和日本侵吞我东北的企图矛盾。当时蔡元培在上海和同志组织“对俄同志会”，办《俄事警闻》报。第二个内容同《革命军》一样，号召汉族起来推翻满族贵族的残暴统治。第三提出了驱逐外国帝国主义：“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1] “改条约”证明他不是盲目排外。他提出了学西方的长处：“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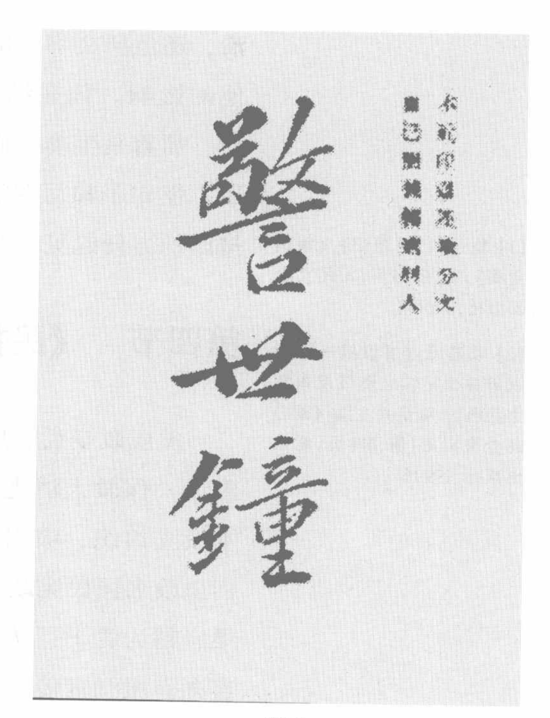


图40
《警世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刊本封面

四、变化的章炳麟

当时还有一位影响了很多人的章炳麟。鲁迅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3] 鲁迅还提到章太炎晚年刻全集时，说他“先前见于期刊的斗争文章，竟多被刊落”。[4] 那时和邹容、陈天华之作齐名的还有章炳麟的《訄书》。《訄书》初版于1899年，比他们二位早。

“訄”字，《说文》解释为“迫”。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说：“今俗逼迫人有所为曰訄。”《訄书》最早的版本据说是倾向于保皇，后来修订，转变为宣传革命。“1904年《訄书》重印本于日本出版……扉页云：‘章太炎先生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也。素雄于文，博洽经史百家，而尤注意于明季文史。深维汉族亡国之痛，力倡光复主义，作《訄书》以见志。’”[5] 但他喜欢用古字、古义，可能只在少数人中间流传。但仍然是影响了大众，尤其《民报》时期。我们看鲁迅早期文字，这种影响不仅是政

【1】陈天华:《猛回头》,50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2】陈天华:《猛回头》,40~43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

【3】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5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5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199页,中华书局,1979年。

治，还包括文字。翻开《鲁迅全集》的第一面，就看到章炳麟给他的影响。他在结集《坟》时说：早年“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若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古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些。”[1]

第四节　《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

戊戌政变后，康梁到海外。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倡设“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习称保皇会。在美洲、南洋、日本设立组织，吸引华侨。后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2月他们虽改名国民宪政会，人们仍称他们为保皇党或保皇派。他们以梁启超为骨干，从1898年12月23日《清议报》（图41）开始，一直办有报刊宣传。

图41
《清议报》(第一册)

《清议报》的宗旨，如他们最后一期上所说，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四件事。“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而“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2] 戊戌政变后，慈禧下令封闭一切报刊。一时万马齐喑，《清议报》是中文世界唯一一份言论刊物，而且开始讨伐慈禧、荣禄等人，能引起读者共鸣。虽在横滨出版，国内到处可见。其他内容，因为他的文笔，读者也有好感。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它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

【1】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册，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7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1]

《清议报》共出版100期。1901年12月22日，第100期出版后的第二天，报馆失火。就此停刊。

《新民丛报》（图42）是梁启超戊戌政变后办的第二份刊物。1902年2月8日至1907年冬，历时6年。但虽称半月刊，1904年后就不能按时出版，总共出版了96期，约当4年的刊量。该刊最受读者欢迎是第一年。后来他经美洲之游后，政治主张发生倒转，刊物销数远不如以前。


新民叢報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七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第參年第貳拾號

（原第六十八號）

本號要目

圖畫◎青島全景上
同◎青島全景下
時局◎讀『今後之滿洲』書後……中國之新民
歷史◎羅馬四論（完）……明夷
宗教◎佛教之無我輪迴論（續）……觀雲
地理◎地理教授略論……定一
教育◎音樂教育論（完）……志忞
雜評◎抵制禁約與中美國交之關係……飲冰
同◎評政府對於日俄和議之舉動……飲冰
同◎再評政府對於日俄和議之舉動……飲冰
小說◎美人手……鳳仙女史
文苑◎飲冰室詩話……飲冰
專件◎中國各省產物調查錄……高陽駿一郎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一日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四日

每月二回朔望日發行

图42
《新民丛报》（第叁年第贰拾号）

《新民丛报》的宗旨在于开民智，据梁启超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2]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说：“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3] 意思是上面自明其德，然后影响到民众。现在亏梁启超想得出，将国家的贫弱腐败归于国民：“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4] 此说虽然将国家腐败的责任归之与民众，但当时民智需要提高，也确属必要。他要“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对社会还是有益的。刊物介绍卢梭、孟德斯鸠等，在青年中起了广泛的启蒙作用，深受读者欢迎。吴玉章回忆说：“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他们。”邹韬奋说中学时，老师借给他《新民丛报》，“一时看入了迷，这也是鼓励我要做新闻记者的一个要素。”毛泽东与斯

【1】郭沫若：《少年时代》，112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

【2】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5页，中华书局，1983年。

【4】梁启超：《新民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65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诺谈他青年时代读书:“当时我正读表兄送给我的两本书，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1]

1903年梁启超游美洲，思想变为否定共和。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说:“伯氏博论政体，而归宿于以君主立宪为最良。”[2] 说:“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国中爱国踸踔之士之一部分，其与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体者，亦既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3] 他的美洲之游为他师徒二人思想转向找到了理论根据。

梁启超从君主立宪到大倡“开明专制”。1905年以后，同盟会办《民报》，两派展开了一场政治大论战。

《民报》(图43)是同盟会机关报，创刊于1905年11月26日，1910年2月终刊。同盟会的成立，表示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要求革命力量的组合。《民报》的创刊反映了这种形势。《民报》集合了各派写手，组成一个朝气蓬勃的班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抨击清廷压迫民众的暴政，驳斥改良派的谬论。只有驳斥改良派的谬论，才能使被蒙骗的人明白。《民报》宣传三民主义和《民报》六大主义。在读者，特别海外华侨中有极大影响。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指出:“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4] 提出了民主革命任务的紧迫。《民报》第3号胡汉民说《民报》“六大主义，得分之为二:曰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曰建设共和政体，曰土地国有，所以

【1】以上3则故实，均转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册，65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10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2册，10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4】孙文:《民报发刊词》，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2卷，32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图43
《民报》(第壹号)



民報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廿六日初版發行
日本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再版發行

號壹第

对内也……合为一大主义，则革命也。”[1] 半年左右，梁启超已经招架不住，他求助在上海的徐佛苏。徐佛苏写了《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梁启超拿到后刊登在1906年7月的《新民丛报》上。但是《民报》认为，两报的论战，实际是面对民族危亡的决策的斗争，决不能停止。辩论两年多，1907年8月《新民丛报》停刊，《民报》仍然就《新民丛报》所宣传的论说继续驳斥。《民报》对《新民丛报》的斗争，在华侨中的成绩很大。

【1】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2卷，33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第五节　清廷的立宪骗局

从1899—1911年，海内外的革命报刊，先有冯自由的统计，后有赖光临的统计。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报纸不少于150种，期刊不少于60种。辛亥革命报刊杂志公开刊登鼓舞民众对清廷的不满，起了宣传作用。“中华民国之创造，归功于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之实行及宣传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传之工作，尤较军事实行之工作有力而普遍。”[2] 然而，同盟会刊物，除极少数一度通过上海租界流入内地外，对国内影响不是很大。庚子后10年间，国内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立宪思潮。这是受到在海外的梁启超的影响。在国内，没有革命党的的报刊，没有研究政治理论的文字发表。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发育不全。

【2】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236页，中华书局，1981年。

一、君主立宪的提议者

梁启超虽然介绍新知识有贡献，但也出些不合潮流的主意。1900年他发表了《立宪法议》。他是最早提出订立宪法的人。宪法，首先要触及政体。他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3] 保皇党的政治抱负如被大用，君主立宪就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3】梁启超:《立宪法议》，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0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梁启超还向清廷就如何实行立宪提出6条建议，要紧的是下面3条：

第一条是"首请皇上涣降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

第二条是"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

第六条是"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1]

【1】梁启超：《立宪法议》，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07~40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所以要二十年时间预备，他说，在于老百姓太没有水平。他接着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里，就把中国积弱说成是我们的习俗使然：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根深蒂固，经历夫数千年"。官吏的腐败正是由此："彼官吏者，亦不过自民间来，……故官吏自民间出，犹果实从根干而出"。归结为百姓不好。[2] 梁启超是当时最早提出宪法要求的，他的《立宪法议》，实在为后来立宪的张本。

【2】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1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二、清廷不得已而预备立宪

海外留学生的宣传介绍，陆续传到国内。随着第一批留日学生回国，上海开始有宣传民主主义和革命的书报出版。开始是戢翼翚，他是早期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学说最重要的人之一。1899年他和其他12名同学随嘉纳治五郎到日本就读于亦乐书院和东京专门学校，"在求学期间，他创设专门翻译和出版日本书籍的译书汇编社（东京），回国后办'出洋学生编辑所'（上海），又与日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一同创办作新社，大量翻译及出版日文书籍。他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之役"。[3] 毕业后回上海，他的政治观有所变化。他在上海办的第一个刊物名《大陆报》，人们习惯称《大陆》。由1902年12月创刊，作新社出版。开始是月刊，第三年改为半月刊。作新社是出版社，由下田歌子出面。一开始《大陆报》发刊词给它的读者以历史责任承诺："凡我土著，食大陆之毛，践大陆之土，聚族而居于大陆者，数千年于兹矣，

【3】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0页，三联书店，1983年。

忍弃我大陆，作犹太人之漂泊乎？忍让我大陆，为他种人之安宅乎？吾愿居于大陆者，以欧洲大陆为师，以非洲大陆为戒，则他日支那之大陆，庶有豸乎！”[1] 同期另有《淘汰篇》，指出：以前君主的权力大，现在民要分他的一部分权力，“故昔者君主之权独盛，今则君民之权分。其所以然者，盖为民者由淘汰之后而其智日进、其力日强，故竭其智力以与之争。而君权神授、即君即国之说自有所不容于当世故也。昔者贵族之权特盛，今则贵贱之权等。其所以然者，盖为贱者由淘汰之后而其智日进、其力日强，故竭其智力以与之争。”[2] 这儿提出了君主立宪。

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东北而在我领土上打仗，清廷竟然不是轰他们出去，而是宣布中立。更奇怪的是，读书人竟然受到日本宣传，认为这是黄种人和白种人之战。[3] 在那时的报上（《中外日报》）居然可以见到登载代收读者捐输慰问日本伤兵钱物清单。次年俄国战败，我国舆论认为这不是俄国败于日本而是“专制政体败于立宪政体”。由此立宪之说大张。张謇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过大员要求立宪。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满足立宪派以扩大统治基础，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初考察回来，七月十三宣布“预备立宪”。规定未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以预储立宪国民资格。”[4] 完全按照梁启超几年前的主张。这是个骗局：载泽考察，次年正月有奏折汇报说：“立宪政体，利君利民独不便于庶官也。各国宪法，皆有君位尊严无对，君统万世不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诸语。而民间之利，则租税得平均……地方政事得参与补救。独官吏听上下之监督，或特简或公推，有一定责任，设贪墨疲容，非上罢斥，即下攻退，无少依违。”并提出“有万不可不举行者三事：一曰宣示宗旨，二曰布地方自治之制，三曰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5] 奏上后没有马上回音。

【1】《大陆发刊辞》，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264页，三联书店，1960年。

【2】《淘汰篇》，张枬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268页，三联书店，1960年。

【3】梁启超1900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说：“以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可以代表。

【4】《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5563~564页，中华书局，1958年。

【5】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2397页，中华书局。

外出考察的是载泽等皇族。他们的建议是一石三鸟：一、收回督抚的权力，二、皇权永固，三、可以按抚民众。中心是收回督抚权力。同治年间，慈禧和奕䜣依靠汉族大臣削平内乱，所以看重汉臣。朝廷支持汉族大臣的洋务活动，汉族地方势力大增。以咸丰十一年计，10名总督满汉各5；而到光绪三十、三十一年，8位总督满族仅2位。同以咸丰十一年计，15名巡抚满5汉10；到光绪三十、三十一年，满2汉13。不仅汉族督抚数量多，而且汉督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时特准的“厘捐”没有取消，手上有钱，创设军事工业，和洋人关系密切。庚子事变时南洋大臣、两湖督宪与各国领事订互保条约，不听北京与各国宣战诏书。当时与事后北京都奈何他们不得。满族贵胄心里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辛丑各国和约》附件中规定，清廷应把刚毅斩立决。而此时他已经病故，但他的“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1]十二字诀已深入满族贵胄：五大臣先后回国后汇报，“并论官制改革之切要，谓：‘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2]汇报后合议大臣诸多疑问，未决。载泽又有《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给慈禧，指出阻碍立宪的是大臣：“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故必有多为之说以荧惑圣听者：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除指出日本宪法对皇室永固的17条外，又指出可以灭杀民主革命：“曰内乱可弥。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其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再建议“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3]讲清了利害，慈禧决定马上宣布预备立宪；并且准备实行名为“地方自治”，实为牵制督抚的咨议局。决定实行宪政而要“预备十年”，因为百姓愚蠢，要慢慢学习才有接受宪政资格。但是改革官制要马上实行。

【1】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42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2397页，中华书局。

【3】载泽：《奏请宣布立宪折》，《宪政初纲·奏议》，4~7页，商务印书馆，1906年。

三、清廷规定只能“钦定宪法”

1906年七月十三日宣布预备立宪，当年绅民的立宪运动风起云涌。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湖北宪政准备会、湖南宪政分会、广东自治会先后成立。这些绅民组织中，成立最早、会员最多的是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包括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在沪士绅，约有300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由苏、浙、闽在沪从事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牵头，成立“宪政研究公会”。不久，即清廷宣布预备立宪3个半月，改名“预备立宪公会”，明言“本会向以开通智识，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为主义”。[1]

[1]《预备立宪公会报》，1908年第1期。

绅民立宪运动的风起云涌，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为了扩大他们的组织，和“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就要向人人提供有关的政治理论书籍。这时，他们成为出版的一支新力量。张謇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家乡南通办有纺织厂、垦殖场等企业，还办有师范学校，此时再办“翰墨林书局”。翰墨林书局最早翻译出版《日本宪法》。据说慈禧最早接触立宪是从这本书。工藤武重编的日本国会第1—7次会议记录，光绪三十年他命汪有龄翻译后由翰墨林书局以《日本议会史》出版。这部书竟厚达600多页，当时极罕见。次年翰墨林又出版英国比几斯渴脱的《英国议会史》。在南通出版这两部书，不算其他可能失散了的，也得算大手笔。

这时政法书籍翻译，已不再似前世纪头两三年，着重在欧洲启蒙思想家和资产阶级学者的政治学基本理论著作，而全部是宪法、议会、自治、警务等政治实务书，数量很惊人。日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学者实藤惠秀，1929年开始，陆续辑有《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和《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而没有能力出版。1968年香港谭汝谦先生接触这个题目，1978年在日本和香港5个基金会资助下谭先生开始做补充工作，1980年两部目录巨著出版。材料截止1978年。从“日译中”的杜威分类法第570政治类、第580法律类中挑出1911年前译书共197种。这些书的出版者，个

人出版的不计，计52家。有些书一再重译。如《日本议会史》，翰墨林后，三十四年群益书局、东京多文社均有出版，次年商务印书馆又以《日本议会记事全编》书名出版。谭编目录收书虽然很多，但和《涵芬楼藏书目录》抽样对比，还有相当量遗留。而我手头有本光绪三十三年版日本富冈康郎着吴兴让译的《[日本]宪法研究书》，上述两个书目均漏列。

从谭编目录看，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商务印书馆。商务所出书不仅多，而且有些是他社无力担任的，如81册的《日本法规大全》。使人注意的是在东京的“湖北法政编辑社”，显然是留学生组织；从1905年8月至1906年9月出版书籍24种，其中法学18种，极具系统；有罗马法、宪法、行政法、民刑各论、民刑诉、国际公私法等等。还有“丙午社”也是留日学生组织，也出版有相当数量的政法类书。从1903年开始，《译书汇编》大量刊登政法类实务书。凡此显示了留学生对国内的关心；或说他们的出版物推动了国内的民主思潮。这些书的出版地，除日本和上海外，还有武昌、长沙、北京、宁波、苏州、天津、东北等地。

众多的出版地、出版者，众多的立宪书籍，说明读者群是很大的。也说明国内赞成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者人数众多，预示了正在酝酿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失败。

上面所举谭汝谦先生书目中52个出版主体出版197种书，其中几个“大家”所出版占了相当数量，而绝大多数出版主体只是出一种两种而已。原因是想搞好出版，不仅要有兴趣，还得有发行渠道，以保证收回成本，源源出版。所以商务印书馆才能出版最多。

经过几年宣传，资产阶级力量续有增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颁《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资产阶级不满足于在各省做供巡抚咨询和监督的咨议局，上海预备立宪公会联合湘鄂粤宪政会和豫皖直鲁川黔等省同志，进京向都察院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这时正好宪政编查馆将《宪法大纲》、《议院法》及《议员选举法》要领编好，八月初一同时和“立宪九

年逐年筹备事宜”颁布。上谕中清廷“立宪”目的图穷匕现：“统治根本，在于朝廷。宜使议院由宪法而生，不宜使宪法由议院而出。中国国体，自必用钦定宪法。此一定不易之理。故欲开设议院，必以编纂宪法为预备之要图。必宪法之告成先行颁布，然后乃可召集议院。”[1]

【1】《光绪朝东华录》，第5卷，5977~5978页，中华书局，1958年。

四、出版界对九年预备各事态度

规定“自必用钦定宪法”这个上谕彻底拒绝了国内资产阶级“速开国会”的请求。这时国内主张立宪的人士虽然倒抽了口气，还是忍耐。当时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日本，八月初五写信给编译所，说：“知开设国会期限已定九年，议院法及选举法亦已宣布，皇上并于今日誓庙。在海外闻此消息，不觉欣喜。但不知其言果可恃否？报中又有‘钦定宪法’字样，此事恐为将来祸根。然能为祸与否，究视吾民之如何自待。平心而论，九年之说诚不为迟。但求上下一心，实力准备，庶免为各国所嘲笑耳。国内舆论若何？鄙见此时国民不必再与政府抗争，姑且反求诸己，将应办之事一一举行。二三年后稍有端绪，若得机会再行争辩未为失时。未知诸公以为如何？预备立宪公会现在定何方针？鄙见不宜随声附和，宜时时从高一层落想，以为国民之向导。此意乞梦翁为苏庵言之（梦翁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干高梦旦；苏庵即郑孝胥，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张元济是该会第四号人物）。政法书籍亟宜着手编译，为公为私均不可缓。《时事新报》载上谕胪列应办各事，可否即就所举各事选定编译，次第先行试办。鄙意尤重在编浅近诸书，层层解说。如何为议院，何为选举，每类一册，排列次第，专备内地绅士入门研究之用。文字宜稍优美而解释务宜明晰。”[2] 这段文字可见“为公为私均不可缓”的真谛：既宣传而可扩大同志，又增加经营，添加利润。

【2】《张元济致高梦旦等》，《张元济书札》，18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上述“立宪九年逐年筹备事宜”每年有9–15项，但是我们在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出版的可供书目《图书汇报》第1期看，商务印书馆没有出版过任何讲解书。这是因为光

绪三十二年宣布预备立宪时，还提出立宪“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1] 等等。九月廿日清廷命改变中央官制，改为“不分满汉”。其结果，军机大臣3人，满2汉1，各部尚书11人，宗室、满蒙9人，汉2人。[2] 清代入关后，尚有满汉平的共治形式，现在“不分满汉”，结果满人反多于汉人。侍讲学士恽毓鼎辛亥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孝钦当同治时，倚汉大臣削平大难，故特重汉臣，敬礼有加，而满臣则儿子蓄之，相亲也。恭忠亲王重汉人，醇贤亲王则反之。章皇（顺治）初入关，惩奇渥温氏以蒙古色目人压汉人之害，制为满汉双行之法，……辛丑回銮，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定新官制。少年新进，不深维祖宗朝立法本意，第觉满洲人士，以八旗区区一部分，与我二十一行省汉人对掌邦政，其事太不平，欲力破此局以均势。满汉之界既融，于是天潢贵胄、丰沛故家，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乃不得一席地以自暖。先是诸皇子读书之所曰上书房，选翰林官教之。其制较弘德、毓庆稍杀。光绪中叶师傅阙不补，书房遂无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跄清于景运间，暇则臂鹰驰马以为乐。一旦加诸百僚上，与谋天下事，祖制尽亡，中外侧目，于是革命排满之说兴矣。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尝语毓鼎曰：‘王室其遂微矣。’毓鼎请其故，侍郎曰：‘吾立朝近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其言至是而信……大势所趋，立宪之名以上。”[3] 清廷以“不分满汉”名义，排斥汉族官员，预示风暴来临。所以虽然要立宪，关于立宪的书籍，从此却消失在出版物新书目录中。但还有新的政法实用书出版，如《法院编制法讲义》、《法院编制法精义》、《巡警所组织》等与立宪与否无关、而推行新法所需的实用知识手册，依旧有新书出版。

不久立宪派第三次请愿受到镇压后，国内立宪派因对清廷的幻想破灭而觉醒，当清廷得意于成功排斥汉族官员时，它没有觉

【1】《光绪朝东华录》，第5卷，5563页，中华书局，1958年。

【2】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1册，325页，中华书局，1980年。

【3】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清光绪帝外传》，30~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

察到自己已经走到绝路。就出版讲，神州国光社，甚至商务印书馆也影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能唤起记忆的南明史志。历史迅速翻到另一页。原为欺骗民众的预备立宪以及为束缚督抚的咨议局，起了组织、训练各地士绅政治活动的作用，出版为这种活动提供了“教科书”。当时依靠新闻出版而加速了社会变化。正如胡道静说：“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1]

1909年颁布府州厅县自治章程。不久又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各地成立“自治研究所”。出版政法书的首先是商务印书馆，其次是会文堂。商务印书馆所出书，在一张“自治研究所必用之书”的书目广告单上，有29种书。[2] 在《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1910年第1号所列政法图书达88种。去除《大清会典》等传统书，新的政法书达85种之多。[3] 除一般宪政外，还有法律、警察、教育学制等。反映出在1906—1911年几年中，社会的若干部门在陆续接触近代制度。虽只是成长的初步，究竟是资产阶级的成长。清廷设咨议局、地方自治等活动，初衷在分总督、巡抚权力并加以监督。但清廷忘掉了官绅历来是结为一体的，咨议局、自治所成为结社，结果地方势力更强。辛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除满员督抚外，几乎都是督抚和咨议局联合宣告脱离满清。

由于同盟会一直以海外华侨为活动对象，放松国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响应的各省主脑很多是立宪人士，最后导致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民众又堕入黑暗。

[1] 胡道静：《中国出版通史序》，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通史》，各卷卷端。

[2] 商务印书馆附于各刊物上的第2045~2046号单张宣传单。

[3] 详细书目见《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1910年第1号，17~20页。

第六节　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出版物

庚子前后，清廷更加倒行逆施；吏治不纲，已完全失掉民心。孙中山1894年组织兴中会，决意推翻清廷。因为开始缺少写作宣传文字的同志，就以翻印明末清初的反满笔记为手段，以鼓动人们的革命思想。开始时“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篇末附以清摄政王多尔衮及明阁部史可法来复二书；二为黄梨州

《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均由余店代为印刷。余初读《原君》、《原臣》，不甚了解，至《扬州十日记》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衮、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1]后来又印《嘉定三屠》。[2]

[1]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自序3页，中华书局，1981年。

[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1页，中华书局，1981年。

兴中会人员增加，陆续增加文字宣传工作。孙中山曾命刘禺生翻译太平天国史16卷。刘先生晚年曾经回忆："太平天国战史之作，孙先生获得英、美、日本所著原刻及官书多种，授仆纂述。时仆年未三十，不足言着书，第杂凑英人*Tapine Rebellion*一书，凡七百页，英人呤唎着《太平天国》二巨册，书凡二千页，插图百余幅（书中尚有忠王题字。呤唎，太平军洋将也，徐家汇图书馆现藏此书）；日本海军大佐曾根俊虎著《满清记事》。曾根俊虎少年时曾助太平军。纂战史时，在东京，尚及接谈，乃孙先生至友也。其余官书，多不可据。《太平天国战史》书成，凡十六卷。十五、六两卷未印，一、二卷印与东京，孙先生叙，白浪滔天题词。四十年来，书籍荡然，仅中山纪念图书馆第一、二卷或可寻也。"[3]

[3]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28页，中华书局，1960年。

兴中会会员多热心于文字。黄世仲（1872—1912），在南洋谋生，常为鼓吹维新思想的《天南新报》撰稿。后来由尤列吸收进他创建的兴中会外围中和堂。1903年后由尤列介绍进香港《中国日报》，曾经撰写大量反对康有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的文章。1905年参加同盟会，负责香港分部的联络。他善于写小说，最著名的是1905—1908年间撰写的《洪秀全演义》。先后在香港《有所谓报》和《香港少年报》连载。《香港少年报》丙午（1906年）六月六日刊有"本社要告"，文曰："《洪秀全演义》一书，为本报社员所撰。前应《有所谓报》之请，排刊问世，久为社会欢迎。全书约六十回，乃仅刊之半数，而《有所谓》竟以无妄歇业。此书为近代民族上最有关系之纪念，且为太平天国一朝之历史，故不得不自行续刊，以竟全书。爰自六月初六日由三十回起，逐日随登于附张《学界现形记》之部位。其《学界现形记》一书，暂时抽起，俟他时再续。前经得阅《洪秀全演义》而

欲窥全豹者，想当争先快睹也。”[1] 或可见深受读者欢迎。

[1] 王俊年：《洪秀全演义·校点后记》，《洪秀全演义》，583~5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辛亥革命前革命报刊的主力在海外，在内地著述的宣传革命的书很少。那时中国没有著作权一说，而且宣传革命者，更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被广泛传播。上海的书商，集中在租界，清廷的政治力量不能进入，所以能广泛翻印革命派在日本、香港出版的书。上海周边的零售书贩，又能广为传播。上海石印书局对流行的著作任意翻印，在客观上为民主革命作了宣传；这些书籍的畅销，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民众的政治意向。就以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讲，前面提到王俊年，他点校时就收集到很多上海石印翻印本，印本之多，或可见一斑。

第七节　国粹派的出版活动

一、历史文化不能丢掉

中国原是农业文化国家，以“安足”为标的。现在被追求富强的西方侵入，不仅搅乱了安足，而且面临灭亡。中国人遇到了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尽早富强，以及如何在吸收、融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更加光大两个问题。显然，只翻印海外留学生著作是不够的。王国维说：“庚辛（1900—1901年）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其稍有一顾之价值者，则《浙江潮》中某氏之《续无鬼论》。作者忘其科学家之本分而闯入形而上学。”[2] 他指出，“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西方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3] 他认为，吸收、融合，应该从哲学、学术的层次。认为即使严复介绍《天演论》，“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起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绝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

[2]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学。其所最好者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1] 其他自郐以下，无论矣。他指出吸收融合西方文化必须结合我国固有文化。如果在求富强的过程中以舍弃一切原有历史文化、政教渊源为代价，完全仿效他国，即使富强了，实质仅仅成为他国的一个省或邦，仍然是亡国。在19世纪末，有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滋生，进入20世纪更有发展。鲁迅曾有《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两篇文章，批评这种思想。说这些人“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以动物学之定理，断神龙为必无。夫龙之为物，本吾古民神思所创造，例以动物学，则既自白其愚矣，而华土同人，贩此又何为者？”[2] “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3] 他指出，学习西方，“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4] 他和王国维一样，告诉要西化的人，不能抛掉固有文化。

【1】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二、国粹派的宗旨

比鲁迅早，主张不能丢掉固有文化的，还有被称作“国粹派”的一批人。他们因为机关报《国粹学报》而得名。章太炎就是其中之一。1906年他出狱抵达东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就谈到：“次说国粹。为什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

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1]

“1905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2月2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图44）邓实等在1902年创刊的《政艺通报》，还是种倾向于改良的报刊。“邓实等人转向革命，主要也是受中国教育会影响的结果。他们常到张园听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演讲革命。马叙伦回忆说：‘张园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的演说，……遇到章炳麟先生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政艺通报》同人于章太炎尤为崇敬……1906年章出狱东渡，邓实、黄节也曾‘置酒市楼劳之，并作诗送之东渡日本。’”[2]



图44
《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册)

【1】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213页，中华书局，1979年。

【2】本段引3段引文，均引自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9~1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国粹派产生的原因是：①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②适应排满革命的需要；③他们还想凭藉中国文化的智慧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国粹派“不仅感受的民族危机，更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汉族政权历史上曾亡于周边文化低于汉族的游牧民族，由于汉族文化高，最后或将入侵民族同化，或终能衰而复振；目前面临的是文化胜过中华民族的民族的侵略，不重振固有文化而盲目追求外来文化，必将永远沦于民族灭亡。当时有些人已见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弊病，“所以力图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中，汲取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和创造性建立中国共和新政制的智慧和经验，也是国粹派热衷探求国粹的一个重要动因”。[3] 为达

【3】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36~4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到①③两个目的，②的排满是必然之义。

他们还有一个借鉴："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这是他们在《拟设国粹学堂启》中说的。[1] 即以欧洲文艺复兴而发展，和日本明治维新后文化媚外的"鹿鸣馆"尘嚣甚上时，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发起提倡的"国粹保存"活动为理论根据。

【1】《国粹学报》总第26期。

三、《国粹学报》

章太炎1935年作《黄晦闻（黄节）墓志铭》，说黄节"与同学邓实等筹集'国学保存会'，搜集明清间禁书数十种作《国粹学报》，以辨夷夏之义"。[2]

【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962页，中华书局，1979年。

《国粹学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宣统三年底停刊（1905.1—1911.12），前后7年；阴历每月一期，月廿日出版；第2、5、7年遇闰为13期，共87期。但最后一年辛亥，武昌起义正值农历8月，很快，清廷覆没，《国粹学报》反满"功成名就"，自己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将第8至13期合为1册，就此结束。所以实际共82册。每册60筒子页。后人说："《国粹学报》博征群籍，以种族革命之大义昌告国人。……倡导改制之功以文字鼓吹者，《国粹学报》褒然居其一。"[3]

【3】佚名：《黄晦闻（节）先生事略》，钟碧容编：《民国人物碑传集》，75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该刊开始主要是黄节、邓实、刘师培（第一、二年用刘光汉名）的文章。后来撰稿人增多。由国学保存会发行，代理发行处遍布各地。最初有32个城市46个代销处，最后有24个城市41个代销处。该刊现在在各大学校很容易找到，意味着当年发行数量的可观。在第5期有一重印广告，说第1期"印3 000册已罄"，正在重印。

刊物的发刊词说："学术所以观会通也。前哲有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住（往）轨知未辙……无如近世以来，学鲜实用。自考据之风炽，学者祖述许郑，以汉学相高就。其善者确能推阐遗经，抉发阃奥，及陋者为之，则摭摭细微，剿袭成说，丛脞无用。而一二宋儒学者，又复空言心性，禅寂清谈；固陋寡

闻，闭聪塞明。学术湮没，谁之咎欤。通海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籍证明中学而徒炫晳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 [因办本报]，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是则下士区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也。”《国粹学报》的发刊词，遵循的正是章太炎的思想，虽然创刊时他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刘师培、邓实、黄节诸人都称章太炎为老师，《国粹学报》的宗旨深受章太炎的影响。在创刊号的《略例》中，有一条讲栏目："本报共分七门"，开始时具体是"社说、政论、史篇、学篇、文篇、丛谈、撰录"。这些正是章太炎所说：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

最值得注意的是"撰录"和"附录"。所谓"撰录"不是指该刊各执笔人的文字，主要是历代前贤的未刊稿。如1年第6期，刊《阮芸台京师慈善寺西新立顾亭林先生祠堂记》，那是一篇在《揅经室》各集辑集之后所作。在这些逸文后，再附编者跋语。仅举此一例就足见一斑。所谓"附录"，用现在刊物的名称，或可称"旧文重刊"。在"附录"中再有一固定栏目"正气集"，前后刊载过《文信国指南》、《郑所南所辑古今正统大论》等，发扬古人的正气文字。

在"史篇"中有黄节的《黄史》连载。分两个系列：一个是历史，除总叙外，有种族书、礼俗书、伦理书、物土书，等等。一个是人物系列，一开始就是左懋第传、张煌言传、李定国传。除这些抗击异族入侵者外，还有像王桢这样的人物，宣扬他注重技艺。

有《苏报》的前车之鉴，所以，他们有两个措施：有些字用空方格代替，另外，在第3期，有"本社广告"一则，其第二条曰："本报自出版，一切报务皆归日本中野武雄君一手经理担承责任，与他人一概无涉，特此声明。"

《国粹学报》开始时执笔人很少，后来陆续增多，陈去病、章太炎、田北湖、廖平、王国维、郑孝胥等陆续加入。读者也有响应。如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极力赞扬编者："痛乎哉，居今日而言国粹，其真举世所不为而特立独事之士乎。"[1] 在第7期上，他有一篇文章《论国粹无阻与欧化》，讲述西方学说只有与我国固有文化结合，才能有助于国家进步。

[1]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6期。

四、《国粹丛书》

章太炎说："国学保存会，搜集明清间禁书数十种作《国粹学报》，以辨夷夏之义。"这儿章太炎说的《国粹学报》当是《国粹丛书》之误。

他们搜集的禁书，以国学保存会名义出版。宗旨自然也同《国粹学报》。在1905—1907年间，《国粹丛书》陆续出版。有《国粹保存会国粹丛书广告》，言其宗旨："近顷东文翻译之书盛行，短书小册，充塞于市。其书每多东涂西抹，至无可观。学者购一书，不能得一书之益。其一时风潮所煽，致使吾国古籍，虽极重要、极通行者，任购一种，反不可得。近日西方学者，方谓20世纪之世，当以研求东洋二古学为急务（一中国学，一印度学），至设东方博学会，以搜求汉文典籍。本会有鉴于此，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志在搜罗遗籍，或版已久佚者，或未曾刊行者，皆择其至精至要，无愧国粹，切于时用者，审定印行。汇为《国粹丛书》一大部，分作三集。今先将征采所得者，陆续付印行世。有宝国学，好古敏求之君子，当亦乐乎此也。"

1905年农5月，《国粹丛书》开始出版，计5种书：顾亭林《肇域志》100卷、颜元《颜氏学记》10卷、戴震《孟子字义疏证》3卷、焦循《论语通释》1卷、包世慎《说储》。次月又出戴震《原善》3卷。有一专为戴氏二书而作的广告，或可见他们的思想和出版旨趣：

《孟子字义》、《原善》，"盖二书皆发明公理，确宗汉诂，尽扫去宋儒舍理论势，以势为理之谬见。我国自宋以来，盛倡名分

之说，以犯理即为犯名分。君主利用其说以制天下，祸中生民，盖数百年。自二书出，始决其藩篱，独申公理：舍名分而论是非，舍势而论理。其解理字也，以为理出于欲，情得其平，是为循理。与西国民主之制，公好恶于民，而倡人类平等之说相合……二书之价值，其排斥专制，立言共和，盖与卢骚之《民约论》、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并垂天壤者也。”可以看出，他们宣传国粹是有选择的，而且并不排斥西方学说。

戴震上述两书是批判朱熹理学的。朱熹理学，可归结为“存天理，灭人欲”6个字。戴震说：“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1] 1923年胡适在纪念戴震诞生200周年时，用现代语言述说了戴震的批判的合理性：“理学家把他们冥想出来的臆说，认为天理而强人服从。他们一面说存天理，一面又说去人欲。他们认人的情欲为仇敌，所以定下许多不近人情的礼教，用理来杀人吃人。譬如一个人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分明是一个人的私见，然而八百年来竟成为天理，竟害死了无数无数的妇人女子。又如一个人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分明又是一个人的偏见，然而八百年来竟成为天理，遂使无数无数的儿子媳妇负屈含冤，无处申诉！……八百年来，一个理字逐渐成为了父母压迫儿子、公婆压迫媳妇、男子压女子、君主压百姓的唯一武器，渐渐造成了一个不人道、不近人情、没有生气的中国。”[2] 出版戴震的两部书，就是反对三纲，正是解放亿万民众于腐败反动的君主制所必须的。

【1】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

【2】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转引自《东方文化》，2001.3，71页胡明文章。

《国粹丛书》全部为铅字排印，1905年开始出版1种5卷，次年稍后，它“分为三集”。它的分集，与一般丛书以出版先后分集不同。广告也和实际不同。它的广告第一集5种，第二集5种，第三集11种。现在能搜集到的可成下表（见下页）：

它的3集如何归类的原则不很清楚。第一集大致是近世国学，以颜元、李塨师徒和受他们影响的戴震为主，兼有王守仁、李贽等人的书。第二集第三集难以区分其标准，多收明末清初人记述南明史迹和清兵屠杀的笔记。表彰不忘种姓，有志经世者。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1905年	1种3卷	1种3卷		
1906年	19种45卷	2种7卷	5种11卷	12种27卷
1907年	8种15卷		6种12卷	2种3卷
1908年	13种53卷	7种31卷	2种9卷	4种13卷
1909年	1种9卷		1种9卷	
没标年份	7种175卷	1种5卷	4种28卷	2种142卷
合　计	49种300卷	11种46卷	18种69卷	20种185卷

五、《国粹丛编》

第三年（1909年）正月第26期又有《国粹丛编》广告：

“本会搜罗佚书遗籍，刊为《国粹丛书》，以发扬幽微。现在已出版二十九种。惟本会经费有限，故每遇重要大部之书，辄无力刊行，坐使珍要巨籍不能早日出版，以贡献于社会。同人每引为咎心。今自丁未（1907年）正月起，复位办法，凡大部重要之籍，皆分期出书，每月一册，每册八十页内容。书计十二种，颜曰《国粹丛编》，每年十二册［每种?］。其余小本密要之书，仍照旧刊为《国粹丛书》单行本随时出版发行。如此则巨编小帙皆可陆续刊成，而古人之幽光伟着无隐而勿彰者矣。”当年以分册出版的12种书是：李贽《焚书》、《张苍水全书》、刘继庄《广阳杂记》、顾亭林《肇域志》、《颜氏学记》、《颜习斋年谱》、《吕晚村文集》、《戴褐夫文集》、《李刚主年谱》、李刚主《瘳忘编》、王昆《绳平书》、全谢山［编］《续耆旧集》。除顾亭林《肇域志》有近百卷外，其余并非都是大书。

黄节谢世后，《黄晦闻先生事略》小册里说：黄节所著“《黄史》、《国粹丛编》，皆分期列入《国粹学报》中”。[1]

国粹派在当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奋斗多年，在西风东渐的形势下呼吁保存固有文化的长处，接受西方文化中有益于我国文化的内容。其拳拳于民族复兴之心可钦可佩，《国粹学报》艰苦维持7年之久，又重印旧籍，是大可致敬的。

【1】佚名：《黄晦闻（节）先生事略》，钟碧容编：《民国人物碑传集》，7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十章　新形态出版物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进步，与之相适应，近代出版物出现了很多原先没有的内容，反映了这种社会变化，服务于这种社会进步。其实，本卷前面具体各章节，大都是在以前的出版所没有的，都是新内容；本章所谈的是其他一些形态的较为零散的门类。这些出版物集中在文化方面。

第一节　名词术语的厘定

随着翻译，必然有很多新的名词产生。有些需要厘定统一的名称，方便于读者阅读。从国人开始翻译，有识之士从方便读者和提高阅读效率，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一、最早的化学译名

徐寿在江南制造局译书处时，就注意于译名的统一。当时国内还没有第二家、第二人在译书，译名统一的意义在于江南制造局译书处自己的译名能保持前后一致。自然只能随翻译进展积累材料：当一部书出版，或一类书出版有一定规模后，将译名刊印成册流传，就成为一个门类的统一译名。

1883年出版傅兰雅等编《金石中西名目录》，不分卷1册。是1871年出版的Dana著的矿物学著作《金石识别》的译名汇编。

1885年出版傅兰雅等编《化学材料中西名目录》不分卷1册。江南制造局就自然科学翻译讲，最全面的是化学。1871年就出版《化学鉴原》，1875年出版《化学鉴原续编》；1879出版《化学鉴原补编》，以及《化学分原》、《化学考质》、《化学求数》、《化学工艺》、《化学源流论》等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到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等完整的化学理论和实践的书籍。显然江南制造局自己有统一译名的需要和可能。

江南制造局译书处在译名统一中最重大的贡献是确定了化学元素的译名原则。徐寿和傅兰雅确定的元素的中文命名原则，到1933年被中央研究院发布的《化学命名原则》所确认。该原则采取“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之为固态者从石”。徐寿等当时确定的原则既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又充分重视中文的特点。所以他们当时给64种元素命名的名称，1933年有44个被保留下来并沿用至今；另外因读音变化而改写的10个；铍、铌两个元素因为拉丁名称后来改写而改写；被改写的共8个。由这个数字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学术水平。另外，1933年颁布的《化学命名原则》对无机化合物命名，还采用了徐寿创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

1887年出版傅兰雅等编纂的《药品中西名目表》不分卷1册。是1876年及以后出版的J. F. Royle和F. W. Headiland编纂的《西药大成》10卷本以及 J. Harley 编纂的《西药大成补编》。

1890年出版《汽机中西名目表》不分卷1册。

1906年清廷成立学部，不久学部设立编译书局。其中有一项工作是统一译名，由严复负责。可是最后没有拿出成果。但是产生了虞和钦提出的《有机化学命名草》和李景镐提出的《有机化学命名例》等，[1] 这是晚清最早的化学命名原则。到1915年后译名统一问题又提上议事日程。

【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下》,17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戊戌前后文化人对译名的关心

《时务报》开始，新的出版物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非专门

的译名问题也提到日程。所以被重视，首先，汉字读音结构与拼音文字的音节结构有很大出入。其次，当时“官话”并没有合法地位，方言繁多，第三，译者表达方法喜好不同，所以翻译时人、地名的表达极不一致，读者阅读如坠五里雾中。对此张元济就向《时务报》提过建议：“贵报所译地名，每无一定之字，能熟外国地理者能有几人，似宜留意。乞裁酌。”[1]

张元济1899年就任南洋公学译书院，就写信向严复请教办好翻译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与统一译名有关：“拟先译专门字典”。严复的回答颇为消极，但也透露了当时一般翻译者对此事的重视，“答：此事甚难，事烦而益寡。盖字典义取赅备，故其中多冷字，译之何益？鄙见不如随译随定，定后列一表，以后通用，以期一律。近闻横滨设一译会，有人牵复入社。谓此后正名定义，皆当大众熟商，定后公用，不得错杂歧异。此亦一良法也”。[2] 在当时翻译者分散，无法结集力量的情况下，只能出此下策，然而，这下策没有人牵头，也难实行。

不久，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交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南洋公学于1901年底先出版第一、二两册，次年1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2期上就撰文介绍，同时提出两点：“一、将所译之各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以便读者参看原书。二、撰述绪论，略述该学之沿革，以饷后学。”关于第二点，严复回信说：“台教所见要之两事，……若叙述派别源流，此在本学又为转科，功巨诸纷，非别为一书不能晰也。”[3] 而译名对照表，尤其外来语，我们在严复二月初二给张元济复信里，可以见到张元济在庚子正月已提出：“又全书翻音不译之字，须依来教，作一备检，方便来学。”[4] 严复在《译斯氏计学例言》，即《原富》的《例言》中讲：“又此译所附中西编年，及地名、人名、物义诸表，则张菊生比部、郑稚辛孝廉于编订之余，列为数种，以便学者考订者也。”[5] 此后，书后开始有本书译名对照表出现，聊代统一译名。

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南洋公学推广翻译政书折》中第三点奏报：“课学必以译本，译本要在同文。昔

【1】《张元济致汪康年第9信》,《张元济书札》,1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2】《严复致张元济第二信》,《严复集》,第3册，528页，中华书局，1986年。

【3】《严复致梁启超第二信》,《严复集》,第3册，517页，中华书局，1986年。

【4】《严复致张元济第八信》,《严复集》,第3册，537页，中华书局，1986年。

【5】严复：《译斯氏计学例言》,《严复集》,第1册，101页，中华书局，1986年。

时译署翻书，人地国名皆取准于《瀛寰志略》，与官文书一例，视而可识，鞮寄无歧。……臣今所译科学书夥多，不敢不致慎于斯。除随文勘整外，其人地国名品汇名物，仿古人《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之例，别为名义，附诸卷后。"[1]

【1】盛宣怀：《南洋公学推广翻译政书折》，《愚斋存稿·奏疏》，思补楼本，卷六。

第二节　农学书

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后魏（386—534年）贾思勰就有《齐民要术》10卷，元始祖还设立劝课农桑为职的大司农，并颁行《农桑辑要》，所谓重农贵粟，其道至大，其义至深。怎么在写晚清的"新形态出版物"里还有农学呢。说来祖宗丢脸，入明以后，政治腐败，农民困苦，清代亦无改变。《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至明代的农学书共9本，其中外国人1本，救荒2本，存目6本，其中仅耕织图、月令、救荒，他无别本。到嘉庆，包世臣始有《安吴四种》。晚清，孙宝瑄在他的读书日记中说："览包慎伯《齐民四术》。慎伯颇有救世之志。初七日，览包慎伯《齐民四术·农政篇》。中国士大夫留心此道者盖罕。慎伯之言曰：'近者农民之苦剧矣，为其上者，莫不以渔夺牟侵为务，则以不知稼穑之艰难，而各急子孙之计故也。仆深以为忧，故少小讲求农事，为郡县农政一书。'其用意深远矣。"[2] 包慎伯《齐民四术》，即包世臣著的《安吴四种》，他曾任江西新喻知县，《安吴四种》是他晚年隐于江宁时所作。

【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77~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一、新的重农

甲午后，虽改革政治、提倡工业的呼吁不断，但也有关注农业的有识之士。当时梁启超在《〈农会报〉序》中提出了发展农业面临的两个问题："秦汉以后，学术日趋无用。农工商之与士，划然分为两途。其方领矩步者，麦菽犹瞢，靡识树艺。其服襏襫，役南亩者，不论一字，与犁牛相去一间。安望读书创新法哉。"读书人麦黍不辨，穿蓑衣下田的一字不识，就永远创造不

出新的耕种方法。而时代已要求“兴荒涨之垦利，抉种产之所宜。肆化学以粪土疆，置机器以代劳力。”围垦和使用新方法。[1]

最早是张謇，有围垦南通州和海门海滩计划。当年曾与他共事的实业家刘厚生说：“张謇对于黄海垦荒之企图，早已发生在开办纺织公司之前，但款从何来，无法实现。等到光绪庚子纺织公司的营业逐渐发达，他即与是年之冬，开始有创办［南］通海［门］垦牧公司的计划。”[2] 张孝若著《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一书所附年谱记：1895年“七月，南皮留谈商务归，有筹辟海门滨海荒滩之议”。[3]

二、新的农书

当时另一关心农业的人就是罗振玉。王季烈说他：“乙未，中日和议成，战后国困民贫，公乃有意于用世，念食为民天，遂与我吴蒋伯斧部郎黻同至上海，立农学社，辑《农学报》，聘日本藤田学士丰八广译东文书，并设东文学社以沟通中日两邦之文化。”[4] 他办的《农学报》（图45），原拟集群力办农会，农会办机关报《农会报》。上面引的梁启超《〈农会报〉序》就是他请梁写的。1897年4月发刊《农学》半月刊；15期起接受卢靖建议，改名《农学报》，19期后改为旬刊；至1905年12月共办8年半，出刊物315期，这在当时是历时最长的刊物，而且是很少人关心的专门刊物。

农学会计划“思与海内同志，共讲此义，起点海上，求友四方”。以舆论做先导，“开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故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区其名目”。[5] 《农学报》7年多确实按《农桑辑要》的方法，着眼于广泛的方面。不仅涉及稻谷蚕桑山货种植，还涉及渔畜土壤、农具、虫害、农副产品加工贮存等等。《农学报》创刊

【1】梁启超：《〈农会报〉序》，《梁启超全集》，第1册，88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2】刘厚生：《张謇传记》，248页，龙门书局，1958年。

【3】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后附40页，中华书局，1930年。

【4】王季烈：《罗恭敏公家传》，《贞松老人遗稿》，附录1。

【5】梁启超：《〈农会报〉序》，《梁启超全集》，第1册，88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

图45
《农学报》



于1897年4月，至1905年12月停刊。14期前名《农学》；先为半月刊，19期后为旬刊。现在国内已凑不齐一份《农学报》，但当年他们还以单行本出书，借此尚可略见一斑。

《农学报》的单行本，以丛书出版，名《农学丛书》，现在见到实物和书目，共有7集，每集20目，每目10种书，共有1 400种。“集”是时间，先出先集；“目”是类；每目中收内容相近的书。如第6集第10目，收《盐城物产表》、《绍兴新昌县物产表》、《广东实业调查概略》、《徐闻县实业调查概略》、《广州府新宁县实业调查》、《潮州糖业调查概略》、《南海县西樵塘鱼调查报告》、《南海县蚕业调查报告》、《广东阳春县实业调查报告》、《青田土产表》等10种单行调查报告。

《农学丛书》各书所涉农业门类极广，大都属于介绍外国农业新技术。严格讲，有些并没有实用价值，仅仅是种情报。如造纸技术、罐头技术，远远不是一本1万字小册子能解决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有两类书，一是蚕桑类，《农学丛书》中见到的就有22种之多。此后其他团体、书店在光宣年间陆续出的蚕桑书也有20种。蚕丝虽然是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大宗，但品质在当时已呈现出颓势，所以值得注意。1898年江南制造局就翻译C.V.Dandolo的讲述蚕病的《意大利蚕书》(*The Art of Silk-worms*)。虽然在当时蚕桑还处在分散的家庭副业状态，新知识并不能推广，但农学会和后来各家大量翻译介绍此类书籍，折射出当时读书人利用出版的拳拳之心。再一类就是上面列举的各地调查书。除所举第6集第10目10种报道各地农业情况的书外，前后还有其他各集12种，共22种。这22种书，说明至少有22位人士受到农学会的影响，关心当地农业。

《农学报》并不仅仅是藤田丰八翻译，还有古城贞吉、川濑仪太郎、山本宪等多位。此外，很多是由留日归国学生所译。其中有罗振玉的弟弟罗振常，还有南洋公学送出留日的樊炳清，还有沈弘、陶昌善等人。此外，有位名“西师意”的，从1907—1909年在日本翻译出版了也叫《农学丛书》的农学书8种，是用

白报纸双面印“洋装”，每册有170页之多，每本内容远比《农学报》的扎实。他的《农业泛论》、《耕种原论》、《栽培各论》都重印5—6次之多。

应该是稍晚一些，直隶官报局出版有《农学初阶》、种粟、烟、棉、菌、桃等书籍13种。这些书的内容和《农学报》所出相同著作内容完全一样。因为两者都没有著录出版年月，分辨不出谁先出，谁后出。

第三节　科学刊物

科学不能离开实践发展，实践不能离开社会需要存在。实验科学在我国的传播，最早当推江南制造局译书，它的译书重在自己使用，所以以技术为主，兼有少数自然科学著作。这些书的实际作用，除了包括徐寿父子在内的“锡金四哲”外，在当时是应该存疑的。而徐寿等加入制造局时已经具有极高的科技水平。后来徐寿等组织格致书室，从遗留的月试卷看，学生的成绩也是有限的。甲午后读书人呼吁救亡，康有为、梁启超的年表里都有路过上海时购买江南制造局书的记录，但纵观他们二位的文字，阅读江南制造局译书的影响实在难找。

江南制造局印书着实有影响的似乎仅仅杜亚泉一位。再还有一位是丁福保，只是他还从日文医书中汲取营养。

一、《中西闻见录》

科学成果虽是没有国界的，但被融入另一个民族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只能是民族的、自己的事，他人无法代庖。

在早期教会刊物中，零散有些涉及科学常识，严格讲属于谈助的文字。到1872年8月才有由丁韪良主持的《中西闻见录》在北京出版。丁韪良是同文馆总教习，当时同文馆已上轨道，这个刊物有了能生存的条件。丁韪良可以在同文馆教习中找到刊物的撰稿人；其中也有李善兰等中国教习；学生翻译实习中



图46
《中西闻见录选编》

的有趣段落也可编入。它叫“闻见录”，表明是本综合性刊物，但科学知识占有相当比重，是在前外国人办的刊物所没有的。《中西闻见录》（图46）只办了3年，在1875年8月出满36期停刊。《中西闻见录》署“京都施医院编”，这是为了避免麻烦。

二、《格致汇编》

《中西闻见录》停刊半年后，1876年2月上海出现了《格致汇编》。《格致汇编》由傅兰雅编辑，格致书室发行。傅兰雅是江南制造局译书处的首席“客卿”，格致书室是他与徐寿等为推广科学知识所办的民办书院。“格致”是我们祖宗就追求的——格物致知，《格致汇编》是我国第一个打出“科学”名称的期刊。创刊于1876年2月，至1892年停刊，前后16年。但实际只有7年出刊，其余时间因傅兰雅回国而停刊。

《格致汇编》内容与《中西闻见录》不同，仅仅收录与科技有关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介绍西方科学新知和技术，以及科技新闻、人物简传等内容外，刊物还与读者互动，回答读者提出的科技疑问。徐寿在创刊序中告诉读者：刊物的宗旨是“欲将西方格致之学，广行于中华，令中土之人不无裨益。或须知某矿物物件为何物何用，均可寄信下问；如有所知，则必于后卷详细复明，不取刻资”。指出了刊物不仅主动向读者介绍常识，还接近读者，了解他们具体想知道什么。这是一种非常值得采用的办刊思想：编者和读者融为一体。《格致汇编》（图47）的做法，不久影响到《格致新报》。将这一做法推向极致的是邹韬奋，他办《生活》周刊时，开设《读者信箱》不久，平均每天总有四五十封以上的信，除了都分别函复，对其中具有

代表性的，还在刊物上答复，产生更积极的社会意义。并且从读者来信中更多地接触到读者的思想和要求，也有利于继续办好刊物。

三、《格致新报》

甲午以后，一部分先进读书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其中有人认为鸦片战争以来50余年，深痛巨创，愈陷愈深，“实误于务末而舍本。本何在？在格致”。又说：“已知旧习之不足振兴，而格致实该治国平天下之根柢也。”[1] 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科学救国”论。(图48)

这位朱开甲是江苏青浦人，他从天主教传教士那儿获得西学知识，所以想请法国传教士向爱莲帮助传播给他人。他说：“西学之盛，首在精格致。仆得教士之助，思即其生平所学，馈饷同人。遂于本年二月开设格致新报馆。”[2] 因为格致重要，仅靠几所

【1】朱开甲：《〈格致新报〉缘起》，《格致新报》，1898年3月13日该报第1册，1页。

【2】朱开甲：《本馆告白》，《格致新报》，1898年7月29日第15册，1页。



图47(左)
《格致汇编》内封



图48(右)
《格致新报》(第十六册)

学校，难以人人都懂得。而“报之值轻，稍有力者，均得购阅。且能日标新义，以饷学者”。他说西方报刊发达，“其中于格致最有益者，莫如《学问报》，常设答问一条，俾学者疑而问，问而启发之。法至美也，意至良也，人才蔚起，实肇于此”。[1] 所以《格致新报》每期都有答问栏。

[1] 朱开甲：《〈格致新报〉缘起》，《格致新报》，1898年3月13日该报第1册，1页。

值得注意的是，《格致新报》标志着国人已能独立翻译西方科技著作，而不再是“口述笔达”两人合译。《格致新报》共出16期，连载有法国白耳脱保罗的博物学，中文名《格致初桄》。这本书由临川人姜颛推荐，由宁波人王显理、定海人王幼庭、上海人朱维新分段合译。刊物有《格致新义》和《时事新闻》两个栏目，从英文和法文报刊选译文字，由张文彬、朱维新、陆悦理、朱飞选译。

四、《亚泉杂志》

《格致新报》出版16期后因为主持人难以照料，与《益闻报》合并，两刊合并后名《格致益闻汇编》继续出版。

《格致新报》是由国人主持，法国教会在经济上支持的。《格致新报》虽然在翻译上已经能“自立”，但很多还需要法国人向爱莲的帮助：刊物的答问栏始终是向爱莲写的。直到1900年《亚泉杂志》创刊，章锡琛说“吾国之有科学期刊，此其嚆矢也”。[2]

[2] 章锡琛：《杜亚泉传略》，许纪霖编：《一溪集》，16页，三联书店，1999年。

《亚泉杂志》是由浙江绍兴人杜亚泉（1873—1933）办的。他认为，政治的发达，社会的进步，必须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科学技术是立国的基础：“政治之发达，全根于理想，而理想之真际，非艺术（即科技）不能发现。自其外部观之，则艺术者固握政治之枢纽矣。航海之术兴，而内政外交之政一变；军械之学兴，而兵政一变；蒸汽电力之机兴，而工商之政一变；铅字石印之法兴，士风日辟，而学政亦不得不变。”[3] 他认国家要摆脱外国欺凌，根本在发展科学。他也是位科学救国论者。同郡蔡元培与他同事多年，说他：“效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

[3] 杜亚泉：《亚泉杂志序》，许纪霖编：《杜亚泉文存》，22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书。当暑夜，就庭中围帐挑灯以读；风雪冬日，掩北向书窗，仅留一线光以读。忘寝忘餐。”“乙未岁试，考经解，冠阖郡。嗣又谓是学无裨实用，改习畴人术，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氏书。时以习代数所得，与叔山佳之习天元者相印证。如是者二年。戊戌，任本郡中西学堂算学教员。值学使按临，君考算学，又冠阖郡。自是而后，兼习理化，兼习东文。购置江南制造局傅、徐两氏所译诸书。虽无师，能自觅门径，得理化之要领。与学堂同事研究东文文法，亦不久能直译东籍而无阻。”[1] 由蔡元培的介绍可知，他有两点是值得崇敬的：两次“科考”考得好成绩而没有参加乡试，奋力克服困难了解西学的情况。

【1】蔡元培：《杜君亚泉传》，田建业编：《杜亚泉文选》，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当时绍兴中西学堂校董不满意蔡元培等宣传新思想，蔡元培、杜亚泉等新派教师在1900年就离开，“来到上海，创亚泉学馆，编辑《亚泉杂志》。”当时“他希望他教授的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高深研究，或者作教员，或者从事需要数理化知识的生产。因为风气未开，来求学的学生既少，据杂志第七册的告白，每期只能销售一百一十几份，亏累不堪。当时社会科学新书销路很好，遂将亚泉学馆改组为普通学书室，决心专营出版，以出版手段推广新学，不再面授学生。一年多时间出版书籍七八种，有自己编著的，如《定性分析》，有买稿的，如《露漱格兰小传》。另外出版期刊《普通学报》一种”。[2]

【2】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亚泉杂志》创刊于1900年11月29日，月出两期，至1901年6月因读者太少至第10期后停刊。《亚泉杂志》虽然总共只出了10期，加起来仅仅160页，但在近代科学出版中具有很大意义。首先，它完全是国人所办，是国人出资、国人编写而有一定水平的刊物。之前几份外国人办或和国人合办的所谓“科学杂志”，介绍的是常识；而《亚泉杂志》是介绍学问。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其次，它是向国人介绍科学。1988年《科学》杂志40卷2期曾有谢振声先生一篇题为《杜亚泉与〈亚泉杂志〉》的文章，深入研究该刊后在论文中扼要地介绍了《亚泉杂志》四方面的贡

献：率先介绍元素周期律、反映［世界］化学领域新成就、首创［徐寿后发现的］化学元素中译名、介绍化学实验方法。[1]

[1] 谢振声:《杜亚泉与〈亚泉杂志〉》,许纪霖编:《杜亚泉文存》,227~23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杜亚泉以科学救国的意愿办科学刊物，推广科学振兴国家，思想虽先进，刊物办得也确有水平，但社会还没到这地步，无人响应，难以继续。有科学救国思想的人到辛亥后更多，但纵观自那时起一个世纪的历史，即知科学只能植根在有一定条件的土壤上。政治清明，社会安宁，民众温饱，才谈得上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与这些条件成正比的。杜亚泉和其他人的科学建国思想，在当时直到解放前，是不符合社会实际的，但他们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拳拳之心，是值得我们钦佩并永志的。

五、其他科学杂志

除《农学报》和上述几种外，进入20世纪，在辛亥革命前，国人办的科学杂志还有31种，主要由于各地中等专业学校和1906年农工商局成立，由学校和有些省的机关所办，影响不是很大。此外，医学杂志则是留日学生办的。

第四节　教育学书刊

我们是个注重教育的民族，教育历史之悠长，是世界公认的。但是有两个和现代社会不合拍的重大缺陷：一是受教育者的比例小，影响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步伐。二是缺少对教育方法的研究，灌入式是教育、教学的绝对方法，不仅教学效果差，而且不能培养受教育者的活跃思维，和西方教育有一段差距。

去过欧美的人往往会注意到这种差距，首先注意到学校，比如王韬。但王韬的议论没被人注意。自同治年间清廷开始派人出国，西洋的教育制度逐渐被官员注意。光绪八年，王之春在他的《蠡测危言》里谈到西方学校。光绪十七年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记录了西方的义务教育：“西洋各国教民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尤其感到其作用之大：

"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起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1] 此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胡燏棻的《变法自强疏》、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都谈到外国的教育。到戊戌前梁启超《变法通议》中用洋洋5万言谈兴办学校。社会上进步人士办新式教育的呼声很高，但新式教育如何办法，却不见人着手研究，直到庚子事变才开始有人实干。

[1]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一、教育民众认知世界开始注意普通教育

实干者都在上海。南洋公学蔡元培、张元济、赵仲蕃三位领头组织杜亚泉等集资创办《外交报》。他们认为，义和团民众不懂外事，盲目排外，致招外侮。他们的《外交报》并不是讲求外交学，而是提供"世界知识"，宗旨是"欲使内地人士周知四国，蠲除锁港之见，免除物竞之惨"。[2] 提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文明排外"方法。指出外国人欺侮我们，无非他强我弱，盲目排外不能真正排外。二是了解外国，知己知彼，找出办法与敢于欺侮我们的外国斗争。[3] 所以这刊物本来准备叫《尊闻》。

[2]《外交报》癸卯第三期《告白》。

[3]《外交报》创刊号《叙例》。

然而，真正要解决问题必须提高全民素质，要讲求普通教育。这时还是罗振玉出来，他办了一个刊物《教育世界》。这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第一份研究普通教育的刊物。不仅是半月刊，而且从1901年4月创刊，一直办到1907年11月，连续办了6年半没有停，出刊166期。刊物办得如此长，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罗振玉还和同志办《农学报》。从1897年4月到1905年12月办8年半。《教育世界》和《农学报》一个连续办6年半，一个办8年半。当时，除了李提摩太有教会和商人、官员支持的《万国公报》外，办刊时间没有超过这两个的。

《教育世界》实际一直由王国维在具体操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甲辰（初四），清廷明令即刻"立停科举，推广学校"。[4] 此时，京师大学堂不宜再代行学部职务，年底，成立学部。次年学部奏调罗振玉任学部参事，兼任视学。人在北京，已难照顾上海。而且王国维是罗振玉的"拐棍"，所以到

[4]《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5392页，中华书局，1958年。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国维］先生随罗氏入京，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历充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修、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1]《教育世界》1907年11月才停刊，正是由王国维“坚持到最后”的。

[1] 徐仲舒：《王国维》，钟碧容编：《民国人物碑传集》，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二、最早的教育学研究者

王国维后来担任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他的农学底子是编《农学报》得到的。《农学报》是罗振玉办的。罗还编撰了《农学私议》、《种印度粟法》、《植美棉简法》、《种兰略法》等几本农学书。后来他被张之洞召到湖北督办湖北农务学堂。不久他又被张之洞派到日本调查教育。[2] 王国维原在时务报社任校对等杂务，利用到农学报社办事，兼学日文。1901年盛宣怀为南洋公学设立日语学堂，有《请专设东文学堂奏片》。[3] 八国联军战事稍定，王国维受罗振玉资助去日本学习。“留东京四五月，而脚气病作，遂以是夏归国。时盛宣怀氏为南洋公学监督，设分校于虹口之谦吉里，罗氏为校长，先生亦为校之执事。暇即从藤田君习英文，兼为罗氏编译《农学报》、《教育世界》杂志，并为社论者数年。”[4]《教育世界》有论说，不署名。《农学报》基本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小册子定期的丛刊，所以刊物刊出后可以用单行本出书。而《教育世界》则是较为标准的杂志：大小文章都有，基本不能成书。但开始还是用老办法，将杂志上的文章重新编集成册，名《教育世界文编》和《教育世界译编》，当年集了4辑，后来又有12辑，都署“罗振玉编”。罗振玉自己研究的成果，有《教育私议》、《学制私议》、《教育五要》、《各省设立寻常小学堂议》、《各省十年间教育之计划》、《设师范急就科议》、《论中国急宜兴实业教育》等规划性的意见。罗振玉还发表了《拟定寻常小学堂课程表》、《拟定高等小学堂课程表》、《拟定寻常中学堂课程表》。由此可以看出《教育世界》所关注的是当时亟需的普通教育。

[2] 王季烈：《罗振玉家传》，钟碧容编：《民国人物碑传集》，5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交通大学校史》，4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

[4] 徐仲舒：《王国维》，钟碧容编：《民国人物碑传集》，6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癸卯学制是张之洞所直接制定的。王国维曾有《奏定经学科

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刊于《教育世界》1906年3月第118、119两期。他除了批评“其小学中学诸章程中，亦有不合于教育之理法者”外，还尖锐地批评张之洞对中小学与大学本末倒置，对中小学不加注意。说：“尚书素以硕学名海内，又于政事之暇，不废稽古，观此［经学、文学］二科之章程内，详定教授之细目及其研究法，肫肫焉不惜数千言，为国家名誉最高学问最深之大学教授言之，而于中学小学，国家所宜详定教授之范围及其细目者，反无问焉。”[1] 他认识到中小学教育较之大学教育更重要。这在那时实在难能可贵。王国维还有很多不同于世人眼光的犀利文章，批评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措施。在《教育偶感四则》中的《寺院与学校》一则，指出“仁、义”是社会的根本，同时亦是教育的目的。针对“废寺院办学校”的政策说：寺院果然是社会所建，但数百年僧众经营，其财产性质已有所变化。“以官力兼并而有之，僧狼狈迁他所……夫使生徒入如此之讲室，居如此之寄宿舍而欲涵养其正义之德性，岂非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哉。”《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一则中指出：“真正之哲学不存于大学，哲学惟恃独立之研究始得发达。”对分科大学不设哲学系表示了赞同。但对优级师范不设哲学科目则大表诧异。他指出师范是养成教育家，哲学对教育家而言，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故其视哲学也不以为一目的而以为一手段何则：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及与教育学相关系之学故也。且夫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固哲学之事业也。”[2]

【1】王国维：《〈奏定经学科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王国维：《教育偶感四则》，《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104~1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庚子后，社会人士对教育认识有个大变化。以往认为办了高级教育，国家就有救；庚子后因为办了几年高等教育并未给国家带来效果，改为注重初等教育。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说：当时“流行之平凡教育主义。彼等之言曰：‘不立小学不能立中学，不立中学不能立大学。故今日当务之急在多立小学，而中学、大学图之小学尽立之后，未为晚也。’”他指出，“此其言固常识之所易知，而亦苟安之政治家之所乐闻”，是非常害人的说法。因为按这种说法，新式教育只要从关心七八岁孩子着手，省力得

多；而十岁左右的少年不在教育视线之内。按说，小学→中学→大学是常规，但我国在废旧立新之际，因为旧式教育不足以应对世界潮流而办新式教育。如果仅仅从小学办起，那么就要等一二十年后现在的一二年级才能为社会做事。此其一。其次，现在十岁左右的少年怎么办！新教育应该全面展开，对稍长的儿童，“智力已熟者，则加以二三年之补习，而授以专门之学。微论足济国家需才之亟；亦对今日少年之教育”。[1]

[1] 王国维：《论平凡之教育》，《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107~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国维还撰写了一本《教育学》，一本《教授法》。

我们的教育有着丰富历史。但把教育当成学问来研究，《教育世界》和王国维却是最早。

《教育世界》所刊登的文章对新式教育的诞生，在宣传、介绍教育知识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一开始就翻译日本教育制度、法规和教科书介绍。还有日本的教育学著作。

晚清至民元，我国最早的两个普通教育学学制：清廷癸卯学制和民元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都是在出版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教育世界》所刊登的日本教育制度和罗振玉在刊物上发表的中小学课程表，对癸卯学制起草者都是先入为主的学制思想。具体起草者陈毅就是《教育世界》的撰稿者。

四、王国维之后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七月清廷公布壬寅《钦定学堂章程》，别次年癸卯十一月公布《奏定学堂章程》，新式教育在中国大地上萌芽。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袁世凯会同赵尔巽等上奏，即刻废止科举。当天允准后，教育面貌即刻变化，学校大兴。社会兴学，学校增加，教育学书籍也就有了出版的可能。下面的数字可以简要描写：

《涵芬楼藏书目录》中记载有商务印书馆当时所购藏的教育类书籍，除掉教科书，清代出版的共163种。除3种未署出版时间不计外，从最早光绪十九年（1893年）昌明公司出版江宁人李家珍著的《泰西教育史》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13年半共有教育书

籍72种，即在废科举前每年出版5.33种。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到宣统三年，6年半共有88种，即废科举后每年出版13.5种。这些书分别由昌明公司、文明书局、时中书局、新学会社、教育世界社、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等等30多家出版。不仅在上海，在南通，谷记书庄也有出版。

五、陆费逵与《教育杂志》

1907年11月《教育世界》因为罗振玉要王国维进京协助他而停刊了。1909年1月商务印书馆创刊《教育杂志》。(图49)


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教育雜誌

第一年 第三期

本期之目錄

社說· 記事· 文藝· 雜纂· 附錄

教授管理· 教授資料· 教育法令

質疑問答· 名家著述· 介紹批評

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校舍撮影○上海時化小學堂全體撮影

地方自治與教育

論小學校以上教授國文

不良少年論

最優等生及劣等生之待

說閂

學部咨各省學生考試表

程文○學部奏出洋學習

本國之部○外國之部○

小教育 嬰兒就學記

唱歌二則

教育瑣談

美國毀煙小學生之現象

蒙養鏡序

答沈君友鵬論採用俗字

貧民教育談

六種

青島較射震旦公學之報

图49
《教育杂志》封面(局部)

陆费逵以出版家著名，他的时代从1912年开始，即中华书局成立、打破商务印书馆的垄断。但他的社会贡献决不仅此，而且时间还要早。人们注意他用出版手段推动教育，不大注意他对社会贡献更大处在教育，他的时代要从1906年开始。笔者认为他早期所说的三句话可以概括他毕生贡献社会的认识和服务宗旨："国家之成立，必有一种人为其中坚。我国昔时之中坚在士，昔圣先贤所立之言，皆为士而发……他日国家社会，将以中等学生为之中坚，可断言也。"[1] "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2] 又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3] 这两句话十分精辟地凸现了出版的社会责任和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说明了他从事出版的原因。

陆费逵早年参加革命组织日知会，1905年任《楚报》主笔，因言论忤当局逃亡上海。在上海他先后在昌明公司、文明书局任编辑，从此与出版结下不解缘。

【1】陆费逵:《敬告中等学生》,《陆费逵教育论著选》,15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2】陆费逵:《论今日学堂之通弊》,《陆费逵教育论著选》,4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3】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陆费逵与中华书局》,440页,中华书局,2002年。

陆费逵在昌明公司，发起组织新书业商会，任评议员兼书记，编辑《图书月报》。他在《图书月报》1906年第1期上根据日本统计数，发表有《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认为我国要达到日本的读者购书水平，按人口推算，每年应有2.8亿元营业额，而当时实际还不足千分之四，书业有着广泛的发展前途。当时书业规模较大者有外资，中等则使用外来物资。他提出“若一举而授之外人，姑不问其书籍、器具不适我用也，即使适用，而漏滋厄甚”。当时有一个抵制“利权外溢”观念。他痛心“以堂堂大中国，竟无一完全自立之书籍商”。[1] 在《图书月报》第3期上，他的《同业注意》一文，提出抵制学部即将实行的国定教科书，抵制外资侵入出版，抵制洋纸输入。认为这三者对我国出版构成了威胁，“利源所在，主权所在”。[2] 这些都是研究陆费逵所不可忽略的。

【1】陆费逵：《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陆费逵教育论著选》，8~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2】陆费逵：《同业注意》，《陆费逵教育论著选》，14~1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文明书局成立于1902年，当年出版的《蒙学读本全书》为当时唯一适合学校用书，大江南北和北京、天津风行一时。1904年商务印书馆的符合新颁学制的分科课本出版，文明书局营业一落千丈。1906年陆费逵到文明书局，力谋重振，“与俞［复］、丁［宝书］诸君编初小国文读本、修身、算术等，仅出三四册，颇觉一新耳目……然文明书局资本仅十万元，不能发展，书亦未出齐”。[3]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进入了商务印书馆。

【3】陆费逵：《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陆费逵教育论著选》，35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陆费逵1908年进商务印书馆，陆续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其中创刊、主持《教育杂志》极具社会意义。

《教育杂志》较之《教育世界》大不一样。《教育世界》着眼于介绍外国教育，有开创之功，但因为它没有广泛、专业的发行网点，不能发行到教育工作者手里，对我国的教育影响不大。

而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因商务印书馆有广泛而专业的发行网点，又和教科书的发行密切相连，所以发行广泛，起的作用也就大些。按照1961年编、收集全国50个资深图书馆馆藏所编期刊联合目录统计，收藏有《教育世界》1907年最后1年刊物的，有3个图书馆，而收藏有《教育杂志》1909年开始1年刊

物的，有25个图书馆。间隔一年而现存差8倍，说明了两个刊物当时的发行情况。《教育杂志》着眼于教育工作者实际经验的交流，问题的探讨，以及国外新理论的介绍。它是和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相适应的。

《教育杂志》的执笔人，相当一段时间是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人员。陆费逵、蒋维乔都是。他们多年从事教科书编写，或在尚公小学兼课，或研究教育学，应该说都是专家。他们根据从各地学校获得的信息，有针对性地介绍教育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普通教育的提高。而陆费逵更注意于教育方针的研究。1901年1月，他发表有《缩短在学年限》。癸卯学制规定，初小5年，高小4年，中学5年，高等（大学预科）学校3年，分科大学3年或4年。这样，从小学到大学，在校时间达20年或21年。当时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年龄不大，一个人在校20年，与能服务社会的年份相比，服务时间就太少了。他主张缩短学生在校年限："七岁入学，二十一二岁可卒业于大学"。普通教育，初小高小各3年。他说："初等小学三年，未有不疑其过浅者，是又不然。盖与其年限长而不能普及，不若年限短而普及。与其中途辍业，紧要之知识未完，不如短期卒业，所获虽浅，而为人必须之知识，尚可粗具也。""况所谓三年者，言此三年之教育，以为国民均当受之，本能少于此也。非三年之外不准再入学校，禁其深造也。"他提出了国民教育，即普通教育。他指出，他日国力稍长，自可延长。指出当时"惟争此五年之名，并三年之实亦不克举"。[1] 此后不久，清廷学部奏请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除原有初小5年不变外，添设初小4年和3年的简易科。此举实际采纳了陆费逵的建议。

【1】陆费逵：《缩短在学年限》，《陆费逵教育论著选》，23~2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陆费逵对教育制度最重要的建议是废除读经讲经。清廷学部的变通章程，仍规定初小三至五年级每周有12学时读经讲经课；每周增加至30—36学时，星期日温课半日。他提出《减少授课时间》和《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建议初小4年，每周24—27学时，课程分修身、国文、算术、体操4门，去除读经讲经。[2]

【2】陆费逵：《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陆费逵教育论著选》，33~4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他1909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缩短在学年限》、《减

少授课时间》、《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和《改用阳历》等有关教育的建议，到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几乎完全被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所接受。教育部在民元元月十九日发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的规定，完全是以这四个建议，和他在1912年元月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上的《敬告民国教育总长》（该件还提出了男女生同校，特别有利于女童就读）和《民国普通学制议》为根据起草的。我国相当长时间一直在使用民元元月十九日发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及课程标准》规定的教育基本框架。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还有《改用阳历》的建议，提出阳历不仅便利学期划分，而且于农时更便记忆（农事受节气影响，节气是按阳历）。一位普通公民的多项建议能被国家采纳，或者与不久后的基本制度相符，体现了他对教育的关心和对国家的贡献。

第五节　新型工具书

古代读书人需要皓首穷经。做学问不需要工具书。或许没有工具书，没有帮助。至多也仅有韵书和辞藻型类书，供骚人墨客方便。没有工具书，做学问就少慢差费，实在不适应社会的进步。所以近代出版刚露芽，就有人着手编纂工具书；待到初具规模，编纂工具书就成为出版的重要内容。现在常用的双语词典，当时已很发展。但它不是新类型出版物，不在本章讨论范围之内。

一、百科全书的尝试

工具书中除双语词典外，最早出现的是尝试编纂百科全书。旧中国曾经有过几次编译百科全书的尝试。当时客观社会环境自然还不具备。辛亥前，“新学”著述力量以留日学生为主干。顾燮光在《译书经眼录序例》中说：“壬寅以还，世尚游学，扶桑三岛，一苇能航；和文移译，点窜便易成书。然瞬息已成故

纸。"[1] 为了求得读者能珍藏，上海会文学社请范迪吉等译各类书100种，总名为《普通百科全书》。果然，这方法还真使读者珍藏，较之同时期的日译书，它的书现在要好找得多，也不失为选题策划的一种思路。这100种书，其中26种是日本富山房的高中史地、理化、师范教科书，再配上适当的缺书，程度还算整齐。它分哲学、文学、教育、政法、史地、自然科学、实业各项，出版于1903年。它本是一部收书100种的翻译的综合性丛书，被称为"百科全书"，说明"百科"的观念已经进入读者的视线。

[1]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序例》，北京图书馆编:《近代译书目》,402页，北京图书馆，2003年。

要编纂"百科全书"，不仅在晚清，就是在民国时期，也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因为仅仅读者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社会上有供稿的条件。整个民国时期，政治不清明，社会不安定。执政当局关注的是抢夺地盘和巩固已得的地盘，民众的生活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文化科学就更难说了。不要说编纂，就是翻译外国百科全书，商务印书馆忙了半天也没成功。

二、现代辞书的诞生

用处最大的工具书当数辞书。我们古代没有"词"的概念，只认"字"，只有字书。最有名的当推《康熙字典》，它是汇辑前人的字书而成，由张玉书、陈廷敬担任总阅官，因他们同时还有繁重的政务，不可能"字字"亲躬。根本还在于命令修纂时，康熙帝交代的做法仅仅是："增《字汇》之阙，删《正字通》之繁冗，勒为成书。"[2] 所以《正字通》有误，不能更正。尤其读音方面《唐韵》久已无书，而注它的音，纂修诸人中没有音韵专家，无法辩正。释义方面，由于《康熙字典》是汇总《字汇》、《正字通》，而该二书本是按照传统，滚存以前字书释义；当时都是个人著述，不懂得、也无力系统地收录语料，不知道编词书必须有语料才能归纳出义项。所以不仅收集例句不够，释义也不全。《中华大字典》批评它的释义是"一义之释，类引连篇，重要之义反多阙漏"，[3] 确实深中肯綮。

[2]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上谕。

[3] 中华书局:《〈中华大字典〉序》,《中华大字典》,卷端，中华书局,1916年。

《康熙字典》虽有很多可以商量处，但因为皇上说它好，并

且“命曰《字典》”就是好。不久有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编纂《字贯》，相当于现在的“同义词词典”，“被他怨家王泷南所首告。江西巡抚海成报告后，雍正以大不敬罪，株连并及雕版工匠。巡抚海成、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皆以失察治重罪”。[1] 虽然康熙帝说过“字学并关切要”，而且在康熙之后，清代学术是以讲究训诂著称，成绩斐然。但因为康熙帝命令整理的“命曰《字典》”，又加王锡侯《字贯》一案，终有清一代，一个训诂发达的国家，再也没有人敢编字典，将几代人的训诂成果结集。

【1】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合订本，151页，商务印书馆，1921年。

一个国家200年而没有新词典，决非正常。到上世纪初，有位不计个人名利的读书人担当了组织编纂新的辞书的重任，他就是高梦旦。他在家乡求学时，读新学书籍，“恒以一二术语之不可通，应用材料因而废置。欲求适当字书足以兼赅今古，藉资探讨，竟不可得”。后来学习“和文汉读法”，“始得窥所谓教科书者，所谓辞书者。平日与二三同志论议，谋从事编辑，各以事牵，因循者又有年”。他担任浙江求是大学堂学监，后自愿任留日学生监督去日本。经一年多考察，他认识到：“彼都人士，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具备，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就辞职到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教科书。随着教育革新，凸现出辞书的需要，高梦旦说：“普通学校科目既繁，专门学校分析尤微。承学之子，以余力治文词，殆不及往昔之十一，常见聪颖儿童，入学三数年，执笔成文，朗朗可诵，及授以稍典雅之书翰，与夫报章论说，则满纸荆棘，不能卒读，以古来相传之成语故事，多非素习故耳。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此浩博也，学术如是其繁赜也，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2] 讲到了辞书的必要。在这种认识下，加上他的性格，他必然要将这件事竭力做好。

【2】高梦旦：《〈新字典〉缘起》，《新字典》，卷端，商务印书馆，1912年。

编纂一部好的辞书，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一个有志于此而能互相切磋的班子，更要有位略懂此道的“班长”；二是不

急于就成，因而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支持。高梦旦1903年进商务时虽然与张元济谈到教科书与辞书的重要，但当时商务实力不厚，先要做教科书。四五年过去，不能算蹉砣，1908年高梦旦到广州，遇见教育家陆尔奎，谈起辞书于教育之重要。归与张元济商量，张同意邀请陆尔奎主持辞书编辑。

陆尔奎，江苏武进人，“自少见重于乡里。彼之审察时变，善治名物之学，超于其侪辈”。“先生重视字典，议论已有素。向时每剧谈，辄谓非有一适当之新字典。学校儿童及普通国民，皆受困殊甚，为阻于教育之前途者隐且深”。“先生留心于教育者，日益笃。且旋弃所谓大学者，专从事于中小学之普及教育……乃五六年前忽闻先生弃学校、辞徵辟，挈全家居上海，编辑字典”。[1]

【1】吴敬恒：《〈新字典〉书后》，《新字典》，卷端，商务印书馆，1912年。

商务印书馆自《最新教科书》1904年成功后，次年又遇宣布即刻废除科举，学校兴起，教科书赢利无算。1904年盈利为股本的28.9%，1905年废科举后盈利为股本的50.7%，1906年为73.9%。这样大的盈利有3大害处。首先，让他人看了眼红；其次当盈利不能维持高水平时，投资者将有怨言；第三，盈利高分红多，企业实力相对减弱，不利于扩大再生产。当1905年盈利为股本50.7%的消息传出不久，报上就刊登募股50万元成立中国图书公司做教科书的广告。该公司成立后给予商务一种压力。所以从1907年开始，商务就将账面盈利减小到20—30%。这就可以少给股东分红，留下实力，以便投资于编辑辞书。

该项辞书编纂，原计划五六人花两年功夫，不久增到常年二三十人，历时8年才出版。前后参加者近50人，使用的资料10万多卷，耗资13万元。该书后来称做《辞源》。在编纂过程中有过两次大返工。词书编纂都从收集词汇开始，按其首字汇总，编写者按字头包干，分别释义。《辞源》是部百科性语词词典，古今中外、数理、技术、历史、地理、人物无所不包，释义者不能门门都通，所以写出词条质量不高。于是第一次决定进行返工，将词条按类交熟悉该学科的编辑校订或重写。至辛亥下半年，全书基本完稿，各类词目再按首字汇总，并请有关熟悉该科目的编辑

审查。如在《蒋维乔日记》中可见到下列记录："辛亥年，七月初五，阅词典部初篇普通词典样本。""七月初八日，陆炜翁（陆尔奎）以词典样本中关于动植物字，嘱为修改。余允之。"[1]"十月十一日，是日校词典。""十月十四日，是日上午会议词典事。午后编词典。"此后自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二日，蒋维乔这段时间都在编词典。[2] 将稿件印出来让大家仔细提意见，将词条按专业汇总请精于此道的编辑修改，在90年前哪家出版社能做到。这些措施保证了书稿质量。

【1】这是辛亥武昌起义前，以后是武昌起义后。

【2】以上记录均见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1992年第2期，61~62页。

《辞源》除内容质量好，它还是部具有丰富开创性的辞书。它的开创性有三：①冶中西学识于一炉，接近当时社会生活；②接受"词汇"的概念，以"词"而不仅以"字"为释义单位；③按近代科学水平解释字、词，有时代性。这些都是自《说文解字》以来字书所没有过的。

古代词书一直辑录字的训诂，到《辞源》才开始以词为单位解释，并以科学知识释字、词。如"水"字，自《说文》开始说"准也"；经过800年，到《康熙字典》还仍是"准也"。直到1000年后，《辞源》才说"水：氢气氧气化合之液体，无色无臭，在摄氏表百度而沸，冷至零度，则凝为冰"。又如"火"字，《说文解字》开始说"毁也"；经过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到康熙时还说，火，"毁也"，仍然从事物的现象解释。《辞源》才解释说："火：物在空气中，与氧气化合而燃烧，所生光与热之现象。"

前引蒋维乔辛亥年日记载："七月初五，阅词典部初篇普通词典样本"，"关于动植物字，嘱为修改"。那是对专业词汇、术语请懂行的人审查。各行家审查后发现有各类问题，不宜付排。蒋维乔日记农十月十一日记"是日校词典"，十四日记"是日编词典"。那已是清廷下"罪己诏"之后，清廷的专制已经完蛋，编纂字典，已经不再触犯皇法了。商务印书馆决定由陆尔奎、蔡文森、方毅、沈秉钧、张元济、傅运森、高梦旦将所编辞书，即后来《辞源》稿件中的单字，先抽出编成字书，名《新字典》

（图50），于1912年出版。《新字典》是《康熙字典》问世200年后最早的一本划时代的字典。

本来字书是没有固定名称的，康熙时命名时人编的字书为“典范”，所以叫《字典》。后来被翻印后称《康熙字典》，是专指。从商务印书馆的《新字典》开始，“字典”一词成为泛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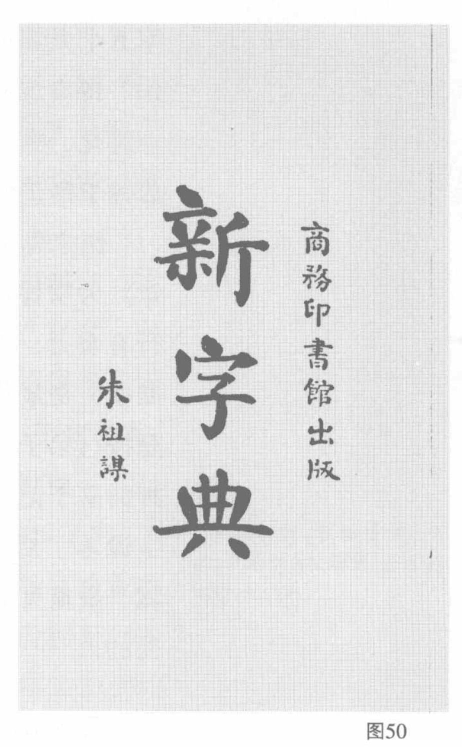


图50
《新字典》

第六节　儿童读物

一、教育循规蹈矩的儿童的读物

我国传统社会，有身份人的后代才能识字，识单字。汉代开始，除继承《仓颉篇》、《百家姓》、《千字文》等集中识字的书外，兼具知识启蒙的识字书有《三字经》、《童蒙训》等等。这类书当以朱熹的《小学》最重要。该书辑集古人嘉言懿行的格言故事和诗歌，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6部分。中心在“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1] 朱熹的《小学》问世后，学者非常推崇，纷纷为它笺注。后来又陆续模仿体例，编纂类似语录。这当然是重视和推崇朱熹《小学》，但也说明它并不适合启蒙。《小学》实质是《大学》的另一摹本，这类书的中心思想是将儿童变成循规蹈矩的人。

【1】朱熹：《小学·序》。

另外一个特点是作者设定的对象是小辈，而不论年龄对象。譬如明末清初张履祥的《训子语》，虽然叫“训子”，并不是给儿童读，而是告诉儿子如何教育孙子：“子弟七八岁，无论敏钝，俱宜就塾读书，使粗知义理。至十五六岁，然后观其质之所近与其志尚，为农为士，始分其业。则自幼不习游闲，入于非慝，易以为善。虽肄诗书，不可不令知稼穑之事。虽秉耒耜，不可不知诗书之义。”

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儿童教育读物，当推《管子》卷十九

第五十九篇的《弟子职》。该篇以师道尊严为中心，讲“夜寐蚤作”侍奉老师的规范。虽然因为《管子·弟子职》文字古奥和社会进化，早没有人以此教训学生，但直到建国前，工匠学艺和小店铺学徒仍然遵循。

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后，儿童读物以《论语·学而篇·弟子章》为宗旨：“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第一句“入则孝”最受重视，因而《二十四孝》是最普遍的读物。广泛流传的清代李毓修的《弟子规》就是按《弟子章》提纲挈领逐一安排。这种读物编纂时除注意合辙押韵易于记诵，还注意尽可能不重复用字，容易被塾师采用做识字课本。后来又产生《女儿经》一类。这些读物的基本点是训诫，最显见的作用是窒息儿童的个性，使他们成为封建社会能接受的人。

二、出现活泼的童话

到清末，开始有“新式”儿童读物出现。沈雁冰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当他奉命和孙毓修合作时，“我并不认识孙毓修，当我童年时，孙毓修编的童话尚未出版。这些童话大部分是从英文童话意译来的，用白话，第一本名为《无猫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1] 《童话》以丛书形式出版，由孙毓修主持。现在找不到这丛书第一本的第一版，开始出版的时间只能推算，约为1908年稍后。查张元济1909年9月30日信，其中有“昨邝君询问爱畜会请编译慈爱动物书，后商定编入童话译稿，已经呈阅。昨前途又来催询，望即修订发印为荷”。[2] 足见那时已有“童话译稿”。另，商务印书馆在1910年7月开始出版可供书目《图书汇报》第一期。该书目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总目录》第15页，有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初集9种，二集4种。而后来在1912年8月，即两年后出的第14期《图书汇报》书目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总目录》第13页，有不著编辑者姓名的《童话》丛书初集13种，其中4种是两年间新增的；二集4种，虽然与两年前数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张元济致孙毓修》,《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中册,473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字一样，但其中1种是新增的，也就是说已有一种不再重印了。

沈雁冰说："孙［毓修］是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他的童话大都编译外国童话。"[1]"这两集《童话》丛书中，除了茅盾等人写了《大槐国》（图51）和《狮骡访猪》等外，大部分由孙毓修执笔。取材于英文《泰西五十轶事》的《无猫国》，是最早出的一本，浅显易解，趣味盎然，深得小读者的欢迎……老作家赵景深先生1983年5月10日致笔者的信中指出：'我幼年第一种书就是孙毓修编的《童话》第一集，第一本就是《无猫国》，由祖母念给我听，后来我自己看。'"[2]



图51
《大槐国》

《童话》的编译者除孙毓修外，就是沈雁冰。他在回忆录里说："孙毓修要我帮他编写儿童读物，也就是从外国的童话和中国的传奇中选一些故事，用白话改写。因而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陆续编写了《大槐国》、《狮骡访猪》、《书呆子》等二十七篇童话，分编为十七册，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第一集》。这《童话第一集》共有一百多分册。"[3]

《童话》丛书分一、二两集。这"一、二"不是先后，而是定价多少的区分：文字少的薄本，卖5分，入一集，文字多的厚本卖一角，入二集。每册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童话做少年儿童的课余读物，明显地有助于少年儿童的思想解放，让他们有一个可以幻想的世界。而幻想对一个儿童是十分重要的，它能激发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的激情，促进心智的开发成长。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陈江：《古籍整理家与中国童话的创始人——孙毓修》，《出版史料》，第5辑，1986年，99页。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三、激励少年的读物

190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少年丛书》第一种《哥伦

布》。该书是由林万里编纂的。在1910年7月开始出版可供书目《图书汇报》第一期15页上，《少年丛书》署林万里编。但是在第14期书目上不再署丛书编者。可能林万里不再编。

《少年丛书》是一部传记丛书。现在能找见30种。早期由林万里编纂《哥伦布》、《毕斯麦》、《纳尔逊》、《华盛顿》、《大彼得》、《加里波的》等6种。这些题目，在当时的翻译作品中也很多，《少年丛书》则以浅显的文笔向孩子们介绍这些伟人、名人。可能1911年后林万里不再从事，1913年由孙毓修继续，编纂有《诸葛亮》、《班超》、《岳飞》、《文天祥》等等。沈雁冰曾说到孙毓修稍后编纂的《玄奘》一书："此时（1919年前后）他仍偶而为之，例如他当时编写的《玄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许多读过《西游记》的人不知道历史上的'唐僧'是怎样一个人，不知道他曾为中国和印度古代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 稍后名编辑钱智修也编纂了《林肯》、《达尔文》，还有《苏格拉底》。俞颂华回忆钱先生说："记得他进了商务以后，曾编译过数本欧美名人传，列入《少年丛书》，内容极充实。"[2] 这部丛书因为选题稳妥，写作认真，从1908年开始，直到1947年还在重印。其中孙毓修的《诸葛亮》一书，印了不少于22次。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俞颂华：《忆钱经宇先生》，《商务印书馆九十年》，98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四、开始有少年期刊

童话做少年儿童的课余读物，明显地有助于少年儿童的思想开拓和知识的增长。

在《童话》、《少年丛书》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辛亥年正月，商务印书馆创办了《少年杂志》。办一个少年儿童刊物，能补救少年儿童书籍的不足。《童话》和《少年丛书》作为书，一个题目必须够一定份量才能成一本。有些值得同孩子谈谈的事，如果用书籍形式，就要一、二、三、四，一本正经地摆出教训面孔。杂志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三言两语讲一件事写一篇，非常灵活。杂志还能培养少年儿童的阅读习惯。杂志连续出版，看完了

到下月又惦着，慢慢就养成习惯。

《少年杂志》是月刊。开始时由谁主持不清楚，1917年前后由朱元善编。沈雁冰在回忆录里在朱元善姓名前加了一串头衔："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编辑《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的朱元善，已经向高梦旦提出，要我转到他那个部门作他的助手。"[1] 《少年杂志》创刊时，是全国第一份少年儿童刊物。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商务印书馆的《童话》、《少年丛书》、《少年杂志》等，开创了儿童读物。儿童有了自己的读物，便有了自己的天地，从而获得开阔的视野，可以有更多样的想象和理想。

到1914年6月中华书局创办《中华童子界》，7月又有《中华儿童画报》月刊创刊。陆费逵当时说："除教科书外，希望大者为字书及杂志……前岁归自日本，即以尽力杂志为怀，《教育界》、《小说界》、《童子界》、《儿童画报》，均已出版，销路尚佳，评论颇好。"[2]

【2】《陆费逵1914年底向股东会报告》，钱炳寰编:《中华书局大事纪要》,17页，中华书局,2002年。

第十一章　小说与文学期刊

第一节　依然故我的1880年前

自《儒林外史》、《红楼梦》后，晚清小说沉静多年。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841—1880年共有新出版小说63种，其中1880年由美华书馆出版的12页的不提撰人的《张远两友相论》，系《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一篇宗教宣传短文，并非小说，实为62种。这62部小说，自鸦片战争至1880年已有40年。40年间，《南京条约》标志一个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革命和后续的捻军起义相继失败，这些社会变动只在文人的文学形式中得到过一些反映，在作为传播最广泛的文学形式的小说中，看不到任何社会变动的痕迹。当时小说仍然与旧时小说一样脱离社会，以正统伦理说教为主要内容。

一、人情小说

这62种作品中被小说史重点提到的，有文康41回的《儿女英雄传》，叙述侠女报仇，才子艳遇，一夫双妻。

《红楼梦》之后续作极多，都是续貂。鲁迅说："大概是补其缺陷，结以团圆。直到道光年中，《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

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这有《品花宝鉴》（1849年出版，60回，陈森著——引注），《青楼梦》（64回，俞达写，1878年申报馆出版——引注）可作代表。”[1]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二、侠义公案小说

1879年北京聚珍堂出版了120回石玉昆的侠义小说《三侠五义》，开创了武侠小说。石玉昆是位说唱艺人，《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鲁迅说：“当时底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很觉得很厌气了，而《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2] 1886年泰山堂出版石玉昆22卷本124回的《续小五义》。1890年北京文光楼出版石玉昆124回的《小五义》。同年文光楼出版不著撰者124回《续小五义》一名《忠烈续小五义传、三续忠烈小五义传》和《忠烈小五义传》一名《续忠烈侠义传》，亦不著姓氏。[3] 以上各书各版均在北京。又有1890年上海公兴书局伯寅氏序本《续小五义》，1892重庆善成堂本《续小五义》，1892年上海书局、上海珍艺书局，1898年上海三槐书屋本，[4] 可见其盛。鲁迅还说：“当潘祖荫由北京回吴的时候，以此书示俞曲园，曲园很赞许，但嫌其太背于历史，乃为之改正第一回；又因为书中的北侠，南侠，双侠，实际已经四人。三不能包，遂加上艾虎和沈仲元，索性改名为《七侠五义》。”[5] 俞樾除为该书改写第一回，还作有序。序中说：“余携［三侠五义］归阅之，笑曰：‘此《龙图公案》耳，何足辱郑庵[6]之一盼乎？’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豪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间中著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乃叹郑庵尚书欣赏之不虚也。”[7] 潘祖荫和俞樾都是大学问家，他们的赞许，说明该书实在具有非常大的魅力。所以在当时，尤其在印刷工艺还落后的北京，这样一本书，或一类书的大量流传和得到

【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以上各书著录,均录自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清末小说研究会,1999年。

【4】以上各书著录,均录自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2002年。

【5】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6】“郑庵”,潘祖荫号。潘祖荫,苏州人,字伯寅,号郑庵。博学,咸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

【7】俞樾:《七侠五义序》,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文人的赞许，是值得研究其原因的。自从改名《七侠五义》后，书商续书，改为续《七侠五义》了。“治逸”续《七侠五义》续至“十六续”，“半痴”续至“二十续”。[1]

【1】此处据《西谛书目》。

俞樾改写《三侠五义》第一回和改名《七侠五义》后，原本不再流行。胡适说：“其实，《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胜于改本。”[2] 所以1925年亚东版标点本据光绪八年原本、原名，也是使即将湮灭的原本与改本并存。这当然是汪原放接受胡适建议的结果。

【2】胡适：《〈三侠五义〉序》，《胡适文集》，第4册，3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小五义》和《续小五义》都是《三侠五义》的续篇。对这些书籍的产生和读者接受的社会背景，鲁迅有异于一般的分析。鲁迅分析清代中期，汉族反抗异族统治活动已经消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办，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3] 所以，《三侠五义》等清季侠义小说又成颂扬清官为民除害的公案小说。大众阅读文学作品，除消遣外，更望能得到心理的满足。能流行的，大都能符合读者的白日梦，即他现实中得不到的想望。侠义小说而掺杂公案，正是因为仅仅靠侠客个人的武斗已不能伸张正义，需要清官出场；而清官也势单力薄，需要好汉来帮忙。

【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278~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三侠五义》现在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北京聚珍堂1879年本子。它本是说唱艺人石玉昆的脚本，出现必更早。在当时，仅《申报》登载的大冤案，至少有1874年10月2日开始刊登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1874年5月27日开始刊登的杨月楼“拐人”案的酷刑逼供，反映封建统治吏治的腐败达于极点。人们在现实中不能获得伸张的正义，在小说的虚拟世界中获得宣泄，所以这类书持续热销。一个说唱本子被印刷出版后，不受地点、时间限制，远胜于一个艺人演唱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民众对吏治腐败开始用其他方法宣泄，此类书也就不再畅销。

这类书还有《永庆升平》97回，《圣朝鼎盛万年青》76回，《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

侠》等等模仿书。这类书到甲午前就绝迹，或说明当时政治的腐败已不可救药，民众不再梦想能出现清官了。

三、狭邪小说

鲁迅说："《红楼梦》方板行，续作者及翻案者即奋起，各竭智巧，使之团圆。久之，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1] 《品花宝鉴》、《青楼梦》，《九尾龟》，《海上花列传》等等，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第二节 "三琐记"：最早的文学期刊

"小说"一词现在的内涵与古代的不一样。晚清，是它内涵变化的过渡期，我们了解晚清的小说必须回到那时，而不能以现在的观念讨论。晚清，"'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式式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2] 鲁迅说："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不同。"[3] 按照这个说法，我国第一代文学小说期刊或者杂志当是"三琐记"。

使用中文的期刊始于1815年。在中国国土上的期刊始于1833年。中国人在中国国土上创办的反映中国文化的中文期刊是在1872年。它就是《瀛寰琐记》，出版28期后改名《四溟琐记》，又改名《寰宇琐记》，从1872年11月到1878年初，前后4年多。因为后来留存不多，除邹振环教授对其中唯一一篇连载25期的翻译小说《昕夕闲谈》做过介绍外，[4] 只见过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有8行，[5] 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有21行，[6]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有3行，[7] 一般出版史、期刊史、书史都没有

【2】李欧梵：《文学的趋势I》，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508~509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66~70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329~33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6】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217页，华文出版社，2002年。

【7】陈申玉：《晚清报业史》，4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谈及。

一、“三琐记”概况

（一）《瀛寰琐记》

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72年11月11日）申报馆发行《瀛寰琐记》第1本（它自称“第1卷”）。每月一次，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共出28次（自称28卷）。

申报馆准备该刊出版是在同年九月初十日，在报上有《刊行〈瀛寰琐记〉自叙》：“新闻纸之流布于寰区也，香港则间日呈奇峙佳名于三秀，沪渎则每晨抽秘斗彩笔于两家，或著录应来复之期教堂握椠，或成帙在合朔之候京国传书。凡此纪事而纂言，莫不标新而领异。分乡校□，愿考见夫济世之经猷；源讨楹书，愿采辑夫证今之学问。下至方言俚语，足备谈谐；杂笔小诗，亦供嘔噱。奈日力之有限，致篇幅之无多。花类折枝，仅悦一时之目；玉非全璧，谁知千古之心，断烂之朝报堪嗤，闻见之羼录难遍。用特勤加搜讨，遍访知交，积三十日之断锦零缣，居然成幅；合四大洲之隋珠和璧，用示奇珍。拟为《瀛寰琐记》一书。”说明了它刊发的缘由是为补充报纸的篇幅。

发表《刊行〈瀛寰琐记〉自叙》后20天，壬申九月三十日，《申报》又有关于《瀛寰琐记》的“请画友告白”，文字如下：“本馆近拟出《瀛寰琐记》一书，其中山川、人物、器具等皆当绘有图象，使人豁目醒心。特欲延请精通画学之人，以襄厥事。凡挟绝艺者，不妨屈驾来馆面订一是，是所盼切。本馆主人启。”但后来刊物并没有图，不知什么原因。

《瀛寰琐记》每本24页，书的尺寸是22.7×14.5 cm。筒子页线装，每半面15行，行36字，每本合25 920字。那时申报馆仅有一套四号字，所以该书标题、正文全用四号字，版框用双粗线。封面除书名、卷次，还有计划的出版年月。

（二）《四溟琐记》

光绪元年三月初五日《申报》上有《新印〈四溟琐记〉出

售》的广告：

“启者，本馆所刻《瀛寰琐记》逐月出书，已至二十八卷。[唯] 版式稍大，页数较少。今自本年正月分起，改为袖珍版式，增添页数，庶舟车携览更形简便，改名《四溟琐记》。其第一卷正月分者，业已装订成编，于礼拜二，即三月初八日可以出书矣。每本工料价钱八十文。倘蒙诸君子赐顾，请来本馆购买。”讲清了前后两个“琐记”的连续关系。

《四溟琐记》每本32页，书的尺寸是16.5×11.5 cm。筒子页线装，每半面15行，行28字，每本合26 880字，比《瀛寰琐记》25 920字多960字，多3.7%。标题、正文仍用四号字，版框用文武线。《四溟琐记》的封面上有书名、卷次和计划的出版年月。《四溟琐记》共出版12本，从光绪元年正月到十二月，每月1本。

（三）《寰宇琐记》

在光绪二年二月十三报上《寰宇琐记》（图52）有广告说明大概：

“《新印〈寰宇琐记〉出售》 启者，本馆现今新排《寰宇琐记》，按月出书一本。俱选鸿篇大著，诗词歌赋无一不备，诚乃雅俗共赏者也。所有正月分第一卷，刻已排印齐全，发工装订，准于今［农历］二月十四日，即礼拜四可以出书。每本收回纸工钱八十文，倘蒙诸君子赐顾，仍请来本馆购阅。”

图52
《寰宇琐记》



《寰宇琐记》每本32页，书的尺寸是16×11 cm。筒子页线装，每半面15行，行27字，每本合25 920字。标题、正文全用四号字，版框用文武线。封面上有书名、卷次，不署出版年月。《寰宇琐记》共出版12本，从光绪二年正月到十二月，每月1本。

3个“琐记”虽都预定每月初一出书，但从《申报》上每次的出书广告看，都得延期1个半月左右。

另外，《四溟琐记》的第1本（它称第1卷）有王韬14首词，总名《眉珠庵词》，附有后记："余少好倚声，妄欲出入于玉田草窗间。中更忧患，遂不复作。近搜敝簏，得旧所存词数阙，不足以附集末，因邮呈尊闻阁主人刊入琐记中，亦号寒虫自惜其片羽也。乙亥正月十四日紫衲侍者识。"说明"琐记"是《瀛寰琐记》和《四溟琐记》以及后来的《寰宇琐记》共有的"大名"——"乃谓琐屑之言"。

二、"三琐记"是中国期刊的开始

申报馆是英国人查美所办，他以赢利为目的，必须注意发行量，所以他一开始就将文字工作交给中国文人，以求贴近读者。因而，《申报》以及其他诸如"三琐记"等都以我国文人的理念来处理。

《申报》的前后三个"琐记"，都是以定期期刊的原则处理的。所谓"积三十日之断锦零缣，居然成幅"，凑满两万五六千字，就发一集；就是定期。每集把性质相同的文章排列在一起，前后52本都按同一原则排列，这就有一定的栏目性质。每本前面都是"经世致用"文章，然后是一定符合当时伦理的文章，再次是短什长篇，结尾往往是极无聊的描写妓女的文章。篇幅长的文章都连载，使每本尽可能多发不同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很标准的现代期刊。

三、"三琐记"的内容和稿源

见到有两部报刊史、出版史说，"三琐记""除登诗词、骈文、散文、小说等文艺稿外，也发表天文、地理等知识小品和时事论文"，又说其"内容有论说、天文、地理、海外见闻、翻译、小说、时人诗文和笔记、人物传记等"。他们的这个说法，和笔者见到的刊物实际有一定距离。

他们可能是用以前传教士的期刊相推测，所以说有天文知识、地理知识、知识小品。这3个"琐记"和传教士的刊物有个

基本不同：一、没有一个写作班子。二、回到130年前，那时我们没有写知识小品的人才。

从《申报》和“三琐记”刊登的言论和文艺，我们知道不是靠两三位编辑所能胜任的。他们的稿源，都不花一文钱来自读者。《申报》创刊号第一版，右边是《本馆告白》，左边是《本馆条例》。“条例”第二条说：“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第二版有它的第三条，说：“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酬。”（这两条经常登）“概不取酬”4字，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是了解《申报》和3个“琐记”稿源情况，也是了解当时社会，以及新兴文字载体与旧时文人习惯如何逐渐磨合情况的一把钥匙。

以往读书人如果要发表自己的文字，唯一的办法就是掏钱刻书，而刻书总要积累有一定数量才可以，而且传播不远。这种状态限制了信息的及时交流。而报纸和杂志的刊期短，“短什长篇”随时可以发表，而且“概不取值”、“概不取酬”，这对骚人墨客有很大吸引力。征文对报社更是天大好事：有免费稿件提供，任意选择，而且骚人墨客为了要知道自己的文字有没有被采用，天天买报是必要的，看到自己姓名赫然在目，于是引《申报》为知己也是必然的。可谓一石二鸟。

“三琐记”当时的版面文字和《申报》是相同的：“名言谠论”排在前面，接着“短什长篇”——“非道术所在”，即文学，排在后面。

《瀛寰琐记》第1期有署“蠡勺居士”的长文《〈瀛寰琐记〉叙》，说办刊宗旨：“不拘拘于寻常宇宙古今之变，而欲穷夫溟渤俶诡蛮触寓言之妙者乎……其体例大约仿《中西闻见录》，而更扩充之。”就当时讲，开拓读者视野是非常积极的。以此标准，三者之间相较，却呈每况愈下之势：

（一）《瀛寰琐记》注意于开拓眼界

《瀛寰琐记》开始还有从香港报刊上摘取的文字。如第1期在《海外见闻杂志》题下，“录香港新报”16条文字；第2期《中外见闻杂志》“录香港新报”10条文字；第3期起连载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香港文字摘得少了（第9期摘3条，第12期4条，13期摘2条），《昕夕闲谈》是“三琐记”唯一的翻译小说，该小说的内容邹振环教授有过详细摘录，可参阅。[1] 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说：“前申报馆印有《昕夕闲谈》，亦名英国小说。乃彼中说部之书，读之可见西俗，惜仅译成上半部耳。”[2] 美国Patrick Hanan在《论第一部汉译小说》中说“这部译著是一部长篇小说《夜与晨》的上半部，为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所作，1841年首次出版”。[3] 刊物将这部译文按章回体处理章节。先仅刊登52回；后来又添3回出书，即梁所指仍仅半部。

【1】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66~72页，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2】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皇朝蓄艾文编》，卷72，学术四，32页，上海官书局。

【3】韩南：《论第一部汉译小说》，《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10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除摘登香港报刊，还有介绍水族馆的《鱼乐国记》，转述合信《全体新论》的《人身生机灵机论》，《胎产新法序》、《格物疑问》等。但是，当时这类文字决不是依靠读者投寄，似乎是主编自撰。第1、2期以“苕溪包叔子”“小吉罗庵主”笔名登了6篇，第3期起又以“蠡勺居士”笔名连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

（二）“四溟”仅限在近地

“四溟”本指四海，《四溟琐记》却仅仅是国内传统诗词。开见闻的仅仅《西藏风俗考》和《西藏兵政考》两篇而已。

（三）《寰宇琐记》更加差劲

《瀛寰琐记》到后来出现描写女伶的诗词（第28期），到《四溟琐记》出现《品花宝鉴楹帖》（第2期）之类，《寰宇琐记》则有较多《赠女校书爱珠序》（第3期）《马小素王兰君传》（第4期）《致翠娥翠菱两校书书》（第9期）之类的文字，就每况愈下了。

（四）“名言说论”

“名言说论”是“三琐记”很重要的内容，置于卷端。报社征求文稿与投稿人各有打算。旧时一些失意文人受“三不朽”思

想影响，喜欢发表旧稿。如“金坡废吏”在《瀛寰琐记》上发表的，有在第10期的《论互市事宜》，是个没有时间性的问题；第8期的《淮南北善后论》、《中兴善后策》，第14期的《致冯林一宫詹论开垦江浙荒田书》，是在太平天国结束后的策论文字，七八年后拿来发表，已毫无意义。议论与时局脱节，就缺乏价值。

“三琐记”还刊登一些当时人士和以往人物的文字，理应是编辑部挑选。最早是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卒，当年末《瀛寰琐记》第三期刊登了《曾中堂祭文》。《寰宇琐记》第10期刊登曾国藩札和批复下属的相关文件5件。《四溟琐记》第10期刊发了曾国藩的《孙文凤殉节记》。这是时人。也还有王韬、蒋敦复的文字。稍早的有明代王筑夫、清中期纪昀的短文。

（五）忠和节烈是永恒话题

“三琐记”每期必有大量属于忠、节的伦理文字。这类文字都是读者提供。当时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已10多年，战乱地区必有战死将领和民团首领，或有守城记，或有殉难记，陆续有《江南军营文武死事略》（瀛23），在诗词中亦有配合。如《金三卫城三忠烈祠诗》、《吊殉难许烈姬南北合套曲》（瀛10）。清代官方褒奖节烈远较明代为少，但读书人脑子里的节烈观就在“三琐记”得到发挥。烈女几乎每期都有，《许烈姬传》（《瀛》7）、《汪烈妇传》（瀛9）等等，不胜枚举。如果这位女子略有才华，则事略外还有她昔日诗词，他人序、跋，成为一组，如黄淑华(瀛25)。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

四、“三琐记”的主编

今人陈玉申说：《申报》的早期执笔人，“第一位主笔蒋芷湘，是个举人，襄理笔政的何桂笙、钱昕伯都是秀才”。[1] 陈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根据。习惯上“芷湘”是“字”，何许人，不详。美国韩南先生（Patrick Hanan）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根据《中国丛书综录》上《文苑菁华》的题名考据出芷湘名“其章”，——蒋其章。他说：“蒋芷湘的本名叫蒋其章……1870年中举，

[1]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4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1877年，他在会试中中举（会试当是成进士——引注），随后被任命为敦煌县县令。1876至1889年间只有一个姓蒋的浙江人在会试中胜出，名为蒋其章。"[1] 按：蒋其章，钱塘人，光绪三年三甲赐同进士出生第49名。[2] 韩南先生又说：蒋其章的朋友"葛其龙以'龙湫旧隐'为笔名写过一首诗，在诗题中用他的表字子相称呼他"。[3] 就是说蒋其章的"字"葛其龙称他"子相"。"芷湘"和"子相"韵母相同，芷、子声母略有差别，朋友间是习惯的。

"三琐记"的停刊，或和蒋其章离开有关。蔡尔康在《申报馆书目序》中说："岁丁丑，余假馆于尊闻阁。"[4] "尊闻阁"是申报馆主对该报馆的雅称。丁丑即光绪三年（1877年），也就是蒋其章中进士那年。清代会试是农历三月六日宣布主考官，八日考首场，上海应试者年初必须动身。如果没考中，四月下旬可以动身回程；赶考，来回至少半年时间，在报社而去参加会试，是必须辞职的。

蔡尔康接替蒋其章的时候，刊物已很难办了：《瀛寰琐记》每期脱一个月。《四冥琐记》第一期标明"正月出版"，从《申报》上广告看，实际为三月初八；第12期标明十二月，实际在次年二月初六日，均脱两个月。《寰宇琐记》干脆就不标出版年月了。有个材料，即蔡尔康接办，可以推算，按月算，后来不少于脱四个月。一直以读者来稿维持的《寰宇琐记》，蔡尔康接办第9—12期，每期都有"缕馨仙史手编"的《尊闻阁同人诗选》近百首，说明《寰宇琐记》第9—12期大量用了非读者投稿填补版面。

重要一点，在《寰宇琐记》第12期的《尊闻阁同人诗选》结尾，有查美的《〈尊闻阁同人诗选〉后跋》："敝馆《寰宇琐记》自第九卷后，特延缕馨仙史选刻诸同人诗。此四卷中已印行数百首，尚有余稿，容续印时选入。"接着对投稿者说："惟诸君子每以排印稍迟为责，且有拟（疑？）其遗失者。要知殷洪乔今世不复生，断无浮沉之理。若屡烦抄录惠寄，则选时每以重复为虞。后有惠投者，幸勿为再三之渎也。"[5] 他谢绝了读者的投稿，"琐记"停了。

【1】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106~10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2】《明清进士题名录》，2837页，上海古籍排印本，1980年；又：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2718页。

【3】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107页，注文16，倒数16~15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4】蔡尔康：《申报馆书目序》，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85页，中华书局，1957年。

【5】查美：《尊闻阁同人诗选后跋》，《寰宇琐记》第12期，32页。

第三节　甲午后小说开始改变

文学只是和剩米余钱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陆续发展。鸦片战争后，进出口贸易发展，大量失地农民入城，城市有了明显发展。在甲午前，安徽古文派、福建同光体诗派成为文学上的主流。甲午后，随着城市经济和救亡思想的发展，桐城派、同光体云云，实在成了微小一角，市民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甲午后市民文学的规模，远不是以前多少年积累所能企及的；内容也和生活有所结合。关键是，当时兴起的报纸杂志培养出一批写家，成为小说创作的主力军。

一、社会变化的最早反映

1895年，读书人就紧紧抓住甲午之战的题材。高太痴在《新闻报》连载《梦平倭奴记》。上海书局出版伴佳逸史（易金唐）著的《新编绣像台湾巾帼全传初集》上下两册。有不题撰人的《绣像台战实纪》2册12回，当年就有3个本子，戊戌又有一个本子。这种直接描写现实，是以前小说所没有的。他们不是客观地描写，用后来王先生的话，叫“语语在人意中”，即是写读者心中所想。甲午战争，我国打了败仗，高太痴写“梦平”。正因为写了读者所想，当时该文就被《时事新编》转载。

《梦平倭奴记》的作者高太痴名翀，字莹玉，苏州人。20岁前后入江苏按察幕，因为喜欢在上海报上发表诗词，1889年到上海，在《申报》当编辑。后来在《字林沪报》，创办该报的文艺副刊《消闲报》。1900年《字林沪报》易主，接任《同文沪报》总编纂。1906年《同文沪报》及其副刊《同文消闲录》停刊后转入商界。[1]

【1】据姚福申:《高太痴遗事拾零》,《学海泛舟二十年》,185~190页，香港语丝,2001年。

二、第一批市民文学作家

（一）才子型作家

与高太痴同时期活动的还有几位写家，他们都以报纸做创作平台。他们在进入市民文学写作前，都有传统诗词、新闻文字的写作历史，市民文学仅仅是他们每个人写作的一部分而已。他们大都县学名列前茅而省试屡试不举；负才不羁，怀才不遇，摒弃科举而进入十里洋场上海。报社活动接触社会面广而深，和必须"马上交卷"的写作锻炼，使他们能较好地进入市民文学角色。市民文学的消费特点是供人消遣，读者对作者的关注点仅仅集中在这里，而不去关心作者的非消遣文字。这就使他们的市民文学成就掩盖了他们的报人历史。

1. 韩庆邦（1856—1894），江苏松江人。字子云，别号太仙。自幼随父宦游京师，成年后回乡，入县学，次年补廪生；屡应乡试不售，遂淡泊功名。常年居住上海，和《申报》总主笔钱忻伯、何桂笙交往，后在《申报》任编辑。[1] 在上海，他生活在花丛中，极熟悉妓女生活，他创作《海上花列传》以她们的生活为题材是当然的事。《海上花列传》在他创办的《海上奇书》上连载，先是半月，后来月出一本。

《海上奇书》，似乎只有郑振铎1925年在南京冷摊上淘到的一份，现藏国家图书馆。据孙楷第、阿英著录，共14期，每期才2回，共28回，未完。据近年9种工具书记载为15期30回。但都没有交代根据，故应该以前者为准。第一期除《海上花列传》外，还有太仙漫稿：《陶佃妖梦记》和《卧游集》，后者专收前人所记远方风物的小品。共3件文字。[2] 它较之"三琐记"更"文艺"些。

光绪十八年（1892年）《海上花列传》在《海上奇书》没有登完。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根据孙楷第、阿英著录，石印初刊本是光绪二十年，64回12册，称"海上奇书本"。后来上海书局不著年本改题《海上看花记》；理文轩书庄本改题"江陵渔隐著《最新海上繁华梦》"（孙玉声光绪二十四年在《采风报》、

【1】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集》，册4，394~3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集》，册4，4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笑林报》上连载的称《海上繁华梦》)；光绪三十四年日新书庄改题《海上百花趣乐演义》。[1] 至20世纪30年代，该书一直陆续翻印。这本书“开创”了以妓女为小说主体的写法。不久至少有《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又名《四大金刚奇书》、《海上秦楼楚冶游传》)、《金粉录》、《南朝金粉录》、《后海上花列传》，等等。在《梦平倭奴记》、《台湾巾帼英雄全传》只印了一版的同时，并列着这类畅销书！如果以往的人情小说以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为标准模式；晚清花粉小说则反映了城市的不成熟和最彻底的“商品经济”。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的是以色欲为兴奋点的书：才子们永远与状元无缘，迷恋的无一例外都是妓女。这些书都由当时的旧书坊推出。书坊经营追逐利润，出书媚俗并不奇怪。

[1] 樽本照雄编：《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22~223页，齐鲁书社，2002年。

进入晚清，出版的一大变化是，一部分与出版商业紧密联系的写作者成为职业写手。这种职业，首先在市民文学领域崭露头角，从事为报酬、利欲引诱的写作，不以一吐为快的时代使命感作为写作的动力。所以花粉小说的情节和文笔都较为粗糙、不加锤炼，极少传流较久的作品。

2.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晚清最重要的谴责小说家。据吴趼人、周桂笙、张乙庐、孙玉声等与他一起活动和交往的人分别为他写的小传，孙伯元是江苏常州人，年轻时擅长制艺和诗词，考秀才得第一，而乡试累举不第。(按：“累试”不确切。据他族弟李锡奇说，他在山东出生，3岁丧父，由在山东任道员的伯父抚养，光绪十八年随伯父回乡，二十二年赴上海。期间乡试仅开癸巳、甲午两科。他到家乡后首先要取得生员资格，再经科考，癸巳科是赶不上的。）1896年到上海任职《指南报》。《指南报》没有任何特色，难以与当时《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角逐，于是他自己“仿照西方消闲性报纸的模式，另办一份报纸。并自我宽慰说：‘假游戏之说，也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基于这样想法，1897年6月24日在上海尝试性地办起了我国第一张文艺小报《游戏报》”。所谓“隐寓

劝惩”，实际是遁词，报纸上大量报道低俗色情，津津乐道因果报应之类的文字。它迎合低俗，发行得好，很快出现一批模仿者。李伯元喟然长叹：“何善步趋而不知变哉！”他不屑于与这批模仿者为伍，1900年将《游戏报》卖掉，办《世界繁华报》。所著小说极多，最著名的是《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庚子国变弹词》等。因为他用笔名，难以考查的或还多。他的长篇，除《文明小史》外，都没写完。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报》虽以玩世为宗旨，但在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时，《游戏报》在11月30日刊出了《本报论前增添逐日路透电音及东省要电告白》，说：“乃今海陬告警，宵旰焦劳，凡我臣民，同怀义愤。本馆亦不得不略更旧例以示变通，除将逐日路透电音摘译登报外，复在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各要隘添请访事，遇有紧要事务随时电告。”[1]

李伯元将他的玩世与揭露清廷腐败相结合，他在《游戏报》举行“花榜”活动，评选“上海最佳妓女”，即妓女中的“状元、探花、榜眼”，与科举相同，还有“二甲”、“三甲”各若干名。1901年清廷举行“经济特科”，他又为妓女开“经济特科”，也评出“一等”、“二等”。[2] 这些既是对科举不满的发泄，也是对已经没有生命力的科举制度的调侃。

书籍在读者中有远胜于报刊的传播能力，真正使李伯元在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期刊上发表的大胆泼辣的《官场显形记》等讽刺小说。

3. 欧阳淦（1880—1907）江苏苏州人。字钜源，有“惜秋生”笔名。早慧，15岁即成秀才，1889年向《游戏报》投稿，得李伯元赏识，到《游戏报》工作，成为李伯元的重要助手，李伯元的很多未完稿、未了事都由他代理。《绣像小说》创刊伊始，他和李伯元就同时有长篇连载。

4. 吴沃尧（1866—1910?），广东佛山人，名趼人，有别号“我佛山人”。先在《汉口日报》任主笔，1903年辞去主笔职务，到上海，成为迁到上海的《新小说》的重要作者。后来与周桂笙

[1] 姚福申:《李伯元的办报生涯》,《学海泛舟二十年》,167~171页，香港语丝,2001年。

[2] 姚福申:《李伯元的办报生涯》,《学海泛舟二十年》,171~172页，香港语丝,2001年。

合力主持《月月小说》。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为著名。他几乎是后来梁启超《新小说》的台柱。从《新小说》第8期起，每期都有三至四个长篇连载。

5. 周桂笙（1873—1936），上海南汇人，字树奎，号新庵。他幼年进上海广方言馆学法文。

“周桂笙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在我国最早翻译介绍《一千零一夜》，后来专事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介工作，被目为清末侦探小说的翻译大家。他于1899年27岁时与吴趼人订交。”[1] 他和吴沃尧两人在小说翻译和创作中一直合作。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译本是周桂笙的《新庵谐译初编》，署“上海周树奎桂笙戏译，南海吴沃尧趼人编次”，由上海清华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孟夏出版。上下两卷，上卷是《一千零一夜》的《渔者》1篇；下卷是《猫鼠成亲》等15个小篇。周桂笙的译文集要吴趼人编次，“编次”当是文字修润。接着两人一起为《新小说》供稿。后来一起主持《月月小说》。

（二）学者型作家

早期报人文学家游戏人间的文字，也反映出他们生活的放荡痼疾，似乎很少长寿。“1906年以后，李伯元、周病鸳、吴趼人相继下世”。[2] 1907年欧阳钜源也病逝。接替他们的是周桂笙、曾朴这批以出版社、杂志社为平台的学者型作家。

吴趼人、周桂笙前面已提过。

1. 徐炁乂（1875—1908），江苏常熟人。字念慈、彦士，号觉我，有“东海觉我”笔名和“朱积熙”化名，以字行。他懂英文和日文以及新学。曾在常熟从事学校教育；参加中国教育会。

2. 黄振元（1869—1913），江苏常熟人。字慕庵；后改称人，字摩西，以黄人和黄摩西行。他16岁成秀才后接触西学，有民主革命思想，他辑集康熙朝史实的《大狱记》和《私史狱》，已能说明他的政治态度。他是南社成员。在文字活动方面除了在《小说林》时的著述和翻译外，还和王文濡、沈知方经营国学扶轮社。国学扶轮社存在时间不长，主要出版他编纂和编辑的大部头

【1】郭浩帆：《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5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2】姚福申：《高太痴遗事拾零》，《学海泛舟二十年》，194页，香港语丝，2001年。

书，有《国朝（清）文汇》、《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和《文科大辞典》。[1]

[1] 该书内封题《文科大词典》。见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215~222页，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3. 曾朴（1872—1935），江苏常熟人。字孟朴，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他原在北京任职，甲午次年入同文馆学法文8个月，靠不断自修，能翻译法文。他是同文馆少数几位在文字上有成就者之一。他的文学活动受马尾船厂留法学生陈季同影响："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嚣然自足，该推广而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来。"所以1904年他在上海开设小说林社，次年开始翻译法国小说。前后翻译有雨果、大仲马等《吕克兰斯鲍夏》、《银瓶怨》、《九三年》、《马哥皇后逸事》、《血婚哀史》、《影之花》6部。进入"五四"后，更着意于翻译雨果全集。[2] 他的小说《孽海花》最著名。

[2] 曾朴：《论近代翻译》，宋原放等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卷二，27~3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第四节　小说的改革

一、甲午后小说的第一次改革浪潮

一般小说史都以梁启超的《新小说》为小说革新的起点，可能因为他的影响大。前面已提到1895年甲午战争当年产生的《梦平倭奴记》、《新编绣像台湾巾帼全传初集》和《绣像台战实纪》等小说。这些小说至少在题材的结合现实上是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另外，在写作技巧上也有变化。美国韩南（Patrick Hanan）先生可能没有见到这几本纪实著作，但他充分肯定了甲午激起的知识分子的激情，说另外4部小说："这四部小说写于1895年《马关条约》之后。与日本的这场战争，尤其是条约的缔结，在年轻

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改良主义思潮，使得1895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四部小说中，没有一部就其本身而言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但总体上他们可以被看作新小说的先身，出现在1902年梁启超呼唤新小说而起的巨浪之前。"[1] 在另一处他又说："对现代中国小说诞生更具决定意义的，与其说是在梁氏宣言发表的那一年，更不如说是1895年，也就是恰值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之后；随之出现的第一波创作浪潮可视作'小说界革命'的前奏。"[2]

韩南所说4部，是《花柳深情传》（1897年）、《海上尘天影》（有王韬1896年序）、《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1898年）和《南朝金粉录》（1899年）。4部小说之值得特别注意，我认为在于表现手法的革新。在以前，我们的故事类作品用说唱表达，后来进化为拟话本。即使是《红楼梦》，有如此众多人物和复杂曲折情节，每回开头还得用"话说"来引起新内容，保留了拟话本的写作特点。到晚清，资本主义、民族意识、民主意识这些内容，芸芸众生异彩纷呈的千姿百态，话本的方法已难以承载，需要新的写作方法。

韩南说："《花柳深情传》开创了对叙事者前所未有的新的用法。我使用'介入的叙事者'这一概念，不仅是指叙事者坦言自己就是作者，而且叙事的状态本身就是戏剧性的。"[3] "以上五部小说，在写于1896—1900年之间的小说中，其比重相当可观，而在通过将作者与叙事者统一并使叙述情境戏剧化这两个特点上，它们与以前的小说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将《熙朝快史》（香港1895年出版——引者）也加进去，这6部小说，毫不夸张地说，是小说创新的第一次浪潮。"[4] 韩南进一步指出，不仅在写作技巧上，在内容上，"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响应了随着对《马关条约》的广泛抗议而成熟的现代危机……为了警醒世人，这些作者都热衷于改革事业，并对中国的未来坚持执着乐观态度。"[5]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指出："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6] 我们前辈的小说，就题材和写作技

【1】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2】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3】韩南：《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4】韩南：《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3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5】韩南：《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者声口》，《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3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6】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册，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巧讲，在甲午后有了变化。

二、小说期刊第一波

我国古代的文学只限定诗词散文，做表述思想的形式。被西方人重视的小说戏曲，古代文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而不屑为，偶一为之，必不用真名。深知此害的陈季同1897年为陈衍编的《求是报》翻译《卓舒及马格利小说》，署“三乘槎客”译。林琴南1898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冷红生、晓斋主人”译，而到1901年译《英女士意色儿离鸾小记》，就用真名。林纾署名的改变，反映了社会上对小说戏曲看法的变化。这儿，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的呼吁之功不可磨灭；而对小说戏曲看法的更深的改变，当体现在《新小说》等几个小说期刊的推动和翻译小说的广泛介绍。

鸦片战争至1911年单行本小说分时段的增长数字如下：

1840—1894年55年，创作88，翻译17，共105种，年平均1.9种；

1895—1901年7年，创作122，翻译31，共153种，年平均21.9种；

1902—1911年10年，创作1 595，翻译988，共2 583种，年平均258.3种。[1]

1840年后至1911年的72年间，创作和翻译小说的增长得力于报刊提供的平台。

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55年平均每年只1.9种，而甲午后至1901年年平均较第一个年平均增加11倍多。这个增加动力是甲午提供的。而1902年至辛亥革命，较第一个年平均增加135倍，较第二个年平均增加11.8倍，这是杂志平台提供的条件。当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据郭浩帆博士的统计，自1892年《海上奇书》开始到1911年共有国人主持的小说期刊24种。[2] 加上1873年的《瀛环琐记》、(后来的两琐记不计）《游戏报》、《世界繁华报》、《消闲报》、

【1】樽本照雄：《中国近代小说发表数量一览表》，宋原放等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卷二，103~10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郭浩帆：《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7~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演义白话报》、《采风报》、《笑林报》、《寓言报》，当为32种。这32种小说杂志基本上存在时间都不长。但这些专门期刊的存在，带动了不少报刊刊登创作、翻译小说。如留日学生办的杂志如《浙江潮》、《大陆报》、《游学译编》、《江苏》、《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就刊载很多小说。国内非专门刊物，《苏州白话报》、《杭州白话报》、《通俗日报》等等，也都刊载小说。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就连载过卢骚的《爱弥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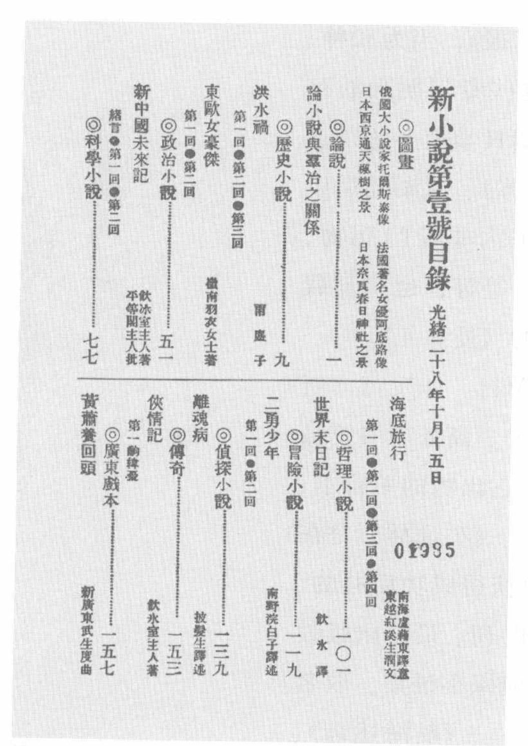
办小说期刊的出版社也还有大量翻译小说单行。如发行《新小说》的广智书局就有《加里波的传》等很多种。商务印书馆虽然《绣像小说》有3年72期，刊载作品甚多，但它出版的单行本，翻译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在《绣像小说》上的。《小说林》是在小说林宏文馆有限合资会社专门出版翻译小说获得成功后办的，刊物仅仅出版12期，单行翻译小说也超过刊物所刊。最早出版教科书获得成功的文明书局就出版过柯尔道南的侦探小说集，取名《续译华生包探案》；又有《汉民拔》（汉尼拔）、《航海述奇》、《迦因小传》、《狐狸梦》等等翻译小说。当时还有时中书局、开明书店等新书店出版翻译小说。形成一个庞大的章节小说出版群。旧有书坊则未见有染指翻译小说者。原来他们擅长的章回体小说，至1897年，已不见有新选题。章节小说与章回小说的替代，反映了读者阅读注意点的变化。

三、"四大小说期刊"

民元前32种小说期刊，阿英称其中《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4种为"四大小说期刊"。4刊首推梁启超的《新小说》，《绣像小说》与它的办刊思想接近；而后两种略有不同，偏重商业利益。

（一）开始有声势的《新小说》

戊戌前后以文笔撼动大众者，首推梁启超。梁启超是以带感情的笔写文章的，在他进入学术研究、从政坛退出以前，始终以文字鼓动群众。光绪二十二年，他在计划写的《说群》的序中



新小說第壹號目錄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圖畫
俄國大小說家托爾斯泰像　法國著名女優阿底路像
日本西京通天楓樹之景　日本奈良春日神社之景
◎論說………………………一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
◎歷史小說………………九
洪水禍　雨塵子
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
東歐女豪傑　嶺南羽衣女士著
第一回●第二回
◎政治小說………………五一
新中國未來記　飲冰室主人著　平等閣主人批
緒言●第一回●第二回
◎科學小說………………七七
海底旅行　南海盧藉東譯意　東越紅溪生潤文
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第四回
◎哲理小說………………一〇一
世界末日記　飲冰譯
◎冒險小說………………一一九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第一回●第二回
◎偵探小說………………一三九
離魂病　披髮生譯述
◎傳奇………………………一五三
俠情記　飲冰室主人著
第一齣緯憂
◎廣東戲本………………一五七
黃蕭養回頭　新廣東武生度曲

01335

图53
《新小说》(第壹号)目录

【1】梁启超:《说群·序》,《梁启超全集》,第1册,9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1]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和《变法通议》中的《论译书》都体现了“以变为体,以变为用”的思想。所以他也推广小说的作用,他所接触的期刊都有小说。《时务报》从创刊号到结束,几乎每期都有小说。奇怪的全是侦探小说。《时务报》开始时梁启超忙于撰稿,后来退出,选用侦探小说,或由汪康年。(图53)

当时严复与夏曾佑在《国闻报》的《附印说部缘起》,必然对梁启超有影响。我们在他的《说群》序中可以看到严复对他的影响,而他与夏曾佑的往来又极密切。所以当他真正能左右一个刊物时,马上就将小说和“以变为体,以变为用”的思想联系起来。当逃亡到日本1898年底办《清议报》,就刊发社论《译印政治小说序》,并从创刊号起连续35期连载他翻译的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表示他以身作则。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的宗旨还受到他老师的影响。康有为有《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24韵。前3韵说:“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历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2]而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也如此开头:“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嚎。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也。”接着顺理成章地说:“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也。”但是他说我国小说讲英雄,则步《水浒》,道男女,则学《红楼》,归之谓诲淫诲盗。而推崇外

【2】康有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康有为诗文选》,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国。说外国仁人志士常将胸中所怀、政治议论写成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

到1902年刊发《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一大变化。在《新民说》之前，先有《新民议》。"议"不是很成熟；"说"也没说完。梁启超的毛病是，当他找到一点时，就觉得找到了一把让一切迎刃而解的利剑。当时他正发表《新民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开头就说了一串"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的《新民说》从1902年1月第1期到1904年底第72期上，断断续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20个题目。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新小说》的发刊词，发表于1902年11月14日创刊的《新小说》上。从思想、时间上看，应该看作是《新民说》的一个题目，是推行《新民说》的工具。

他在《新民说》的《释新民之义》一题中说："新民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2] 他的《新民说》是他在流亡日本几年考察资产阶级政治后，对伦理和政治理想的系统而尚未完全表述的思想。

在《清议报》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时，梁启超给小说的任务是推动政治变革："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极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给小说的任务是改变民众缺乏公德的、没有合群而治的"群"的思想。1899年在他的《东籍月旦》伦理学一章中就日本中学伦理学教育大纲，谈到我们的伦理观念的狭窄："中国之所谓伦理者，其范围甚狭，未足以尽此学之蕴也。"[3] 而在《新民说》中，他直接批评《论语》、《孟子》、《皋陶谟》、《洪范》、《大学》《中

【1】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全集》，第1册，172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2册，65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3】梁启超：《东籍月旦》，《梁启超全集》，第1册，32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庸》等："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1] 他虽没有说，实际认为，仅仅关注个人伦理行为，不足以完成新政治。他要"新民"，借《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2] 主张使民振作，新政治才有可能实现。《新民说》里提出了一套适应"群治"的人伦和价值观。但他此时无权无势无钱，又处身海外，如何将之在国内推行及广？显然，他想到了他写《译印政治小说序》时，给小说的任务既是推动政治变革，必能进而推行新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使［人］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

[1] 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2册，660~661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2] 《礼记正义·大学第四十二》，《十三经注疏》，1673页，中华书局。

而且除此别无良法。他既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必需提出"必新小说"的缘故？他说："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极夸张地将小说说成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想当状元、宰相、才子佳人，当江湖盗贼等等的思想；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沈溺声色，多情多感，等等，他都归之于看了小说。并且归之于书坊和为书坊写书者："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与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3] 文章的必然结论就是：从国家前途，大雅君子必须从华士坊贾手里夺"一国之主权"。夺一国之主权，自然是革命，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2册，884~88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虽然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提出从华士坊贾手里夺著作之权，以推行新伦理。但实际并不能如梁启超所想。最早的《新小说》和紧接着的《绣像小说》这两个维新人士主持的刊物，只能请报界才子作主干，并加翻译小说。显然，仅仅有新思想而没有写作技巧是不能创作的。《新小说》第8期起，创作实际交

给了吴趼人；翻译交给了周桂笙。《绣像小说》一开始就是李宝嘉和他学生欧阳钜源的天下。没有一批具有新思想而能操笔作小说的作者，使梁启超和他的同志毫无办法。所以梁启超的以小说推动新伦理的想法最后是落空了。

上面已介绍了梁启超和《新小说》。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简言之，就是张弘小说中正面的道德元素，驱除反面的、败坏道德的成分。而梁启超自己的《新中国未来记》，却毫无道德元素和小说品质，而是政治演说。在第二回中载有"宪政党章程"九章二十五节里的八节内容，和"治事条略"总纲和八个子目。第四回又把金山《益三文拿报》上登载的《满洲归客谈》全文译出。第五回又将一篇海内同志的名单罗列出来。特别在第三回中，主人公黄克强与李去病就中国革命与改良问题反复辩驳达44次，差不多1.6万字。这显然与小说体裁不合。它作为"样板"，跟随其后的必然自郐以下了。

《新小说》在创刊号上刊登有《本社征文启》，表示最希望"章回体小说在十数回以上者"。内容要求是："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惊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这个征文广告的内容和同期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主张的重在道德元素的小说革命也是不同的。

章回体是很难写的，张静庐曾说："比较艰辛的写作，倒是被新文艺作家所瞧不起的'章回小说'。无论它的题材是一般社会的，或是娼妓生活，甚至恋爱故事，这其间都是作家日积月迭的经验阅历所汇。没有实际生活的体验，是写不出这洋洋四五十万言的东西的。"[1] 这就是梁启超自己也难拿出像样样板的原因。

由于写好小说对思想道德修养和文学技巧修养的高要求，《新小说》和在国内响应的《绣像小说》都很难找到合适的稿源。为了刊物能出版，就降格以求。报社文人成为主角，他们揭露现实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文明小史》等作品痛快淋漓，很受读者欢迎，然而只能触及读者眼球，而不能触

【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45页，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



图54
《绣像小说》(第壹期)

动读者灵魂，离培养道德元素的目标甚远。

（二） 持续时间最长的《绣像小说》

《新小说》月刊，共出24期，前12期在日本断断续续用了1902—1904年3年时间，第二个12期1905年在国内出版。《月月小说》也是24期；《小说林》仅出12期。因为销路，办刊物极易赔钱，所以出刊时间都不长。《绣像小说》（图54）在4种小说期刊中维持时间最长，出刊最多，达72期。《绣像小说》能出72期，表示了它的非商业因素。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刚出齐，商务印书馆就在上海排印他的书；《绣像小说》是在《新小说》创刊后6个月创刊的。如果我们略知张元济、夏曾佑与梁启超的交往，可以觉察商务印书馆办《绣像小说》是响应梁启超。

夏曾佑是进士，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在天津讲授新学，并和严复办《国闻报》。戊戌政变后他难以在天津立足，设法签分安徽，任实缺；1902年丁母忧。因他是汪康年表弟，便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非常倚重。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清廷重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伍光建、夏曾佑被派作随员离开商务印书馆。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元济给汪康年的信里提及此事："穗卿（夏曾佑）新正三日即东渡，昭扆（伍光建）已先行。馆中愈形寂寞，有事无人可与商榷，殊以为忧，吾兄有何良策，甚愿闻也。"[1] 夏曾佑是商务印书馆最关注小说的人，在天津《国闻报》曾与严复合写《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在商务印书馆曾用笔名"别士"在《绣像小说》第3期上发表有《小说原理》。商务印书馆还有吴梼等一批留日归国学生从事包括小说在内的翻译，所以《绣像小说》中翻译小说占有很大篇幅。

【1】《张元济致汪康年》，《张元济书札》，5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绣像小说》光绪癸卯五月初一创刊，至九月十五第12期后，不再标出版月日。因为前12期，一直被认为是半月刊。南京的张

纯先生在1985年发现，按半月刊，某期《绣像小说》的出版时间在它讲的时事故事发生前。接着樽本照雄先生按此“原理”翻阅报纸广告，发现了该刊“系统”地脱期。从张纯先生发现故事发生在后，说明脱期是从发稿开始。发稿脱期而不能在印刷上补救，说明是印刷所不感兴趣的短版活，销路不好。它的发行同当时期刊一样基本靠寄售。它有80多个寄售处；在1907年2月停刊结账，有浩浩荡荡的退货。刘德隆先生在2001年4月发现了1907年10月，推销这些存书的广告说：“月出两期，出版以来，颇蒙欢迎，销流至广。现已出七十二期。因存书无多，特行减价零售，每册二角。”因“存书无多”而“减价”，在商业广告中两者必有一假；甚至“减价零售，每册二角”也是瞎话，原来就只卖二角。仅仅下面一句是真的：“全部七十二册精装六函，实洋七元二角。”——每期76页1角1本还加赠函套，实属清仓大拍卖！这种销路并不仅仅《绣像小说》，是当时及以后期刊的致命处。而商务印书馆维持72期，只能说明办该刊的非商业性。

《绣像小说》1903年6月创刊，在编满3年72期后于1907年1月停刊。在此前，商务印书馆骨干编辑蒋维乔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1906—11—16）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与谈筱莲有5次接触，“商议改良《绣像小说》事”。[1] 十二月二十五接触的当天出版的《东方杂志》3年13号上有则《绣像小说》的广告，说“明年大改良”。反映了五次接触的内容。但到次年二月二十四日《东方杂志》4年2号的广告上出现180度大转弯，说：“现满三年七十二期；以后改良再行布告。”至此，正式停刊。商务印书馆同时还停止了“10集本”《说部丛书》的新书出版。

4大小说期刊惟独《绣像小说》不明确谁是主编。1922年有人说“编辑者李伯元”；到1936年阿英在《小说闲谈》中，最早将72期“归纳”“整理”成“半月刊”，“至丙午因伯元逝世休刊”。1983年郑逸梅以“目击者”身份说，张元济看到广智书局刊行的《新小说》，对此非常赞同，就请李伯元主编兼主撰。他硬将1903年就出版的《绣像小说》延期到1905年广智书局出《新

【1】汪家熔选注：《蒋维乔日记选》，《出版史料》，1992年，总第28期，50页。

小说》之后。到2001年有位“学者”“经过深入的探讨”，弄清楚是夏瑞芳为了谋求与日本合资，听取未来的合资者日本原亮三郎的策划，决定创刊《绣像小说》，并听取原亮三郎的建议请李伯元主编。2003年一位文学博士在他的学位论文中对此除了认为原亮三郎一说“目前还缺乏必要的证据”，却判定“这个论断符合事实”！

但是与李伯元交往甚密、作相同事业的吴趼人、周桂笙为李作的传都没有提到过李伯元编过《绣像小说》。根据李的继室庄夫人书信转述的赵孟轺、李祖杰，与李交往颇深、曾接受过他馈赠的孙玉声他们三位写的李传，也都只谈到《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祖杰，是胡适为写《〈官场现行记〉序》写李传，托蒋维乔找他面谈的。蒋维乔1903年至1912年初9年里始终在商务印书馆，而且最后关心过《绣像小说》的改良，如果李编过《绣像小说》，蒋必然告诉胡。这些都集中在魏绍昌编《李伯元资料》里，极易检得。

1984年在《光明日报》上有过一场争辩。主李说提出了在一份1905或1906年的邮政档案中有李伯元以“司事人”身份登记《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和《绣像小说》，即他是主编。但这份档案的可靠性在1990年第4期《出版史料》上已经被否定而未见有反驳。

前面提到2001年4月刘得隆先生发现1907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销存书的广告上有：“本馆前刊《绣像小说》特延南亭亭长李君伯元总司编著”。主李说重新提出。但以往所有商务印书馆铺天盖地的推销《绣像小说》的广告从来没有提过李，这只是一则孤证。更在于那则广告上，除了买整套每册1角是实实在在外，其余都是推销存货的浮夸话，且是在李伯元1906年3月病逝19个月后发的广告，并且登了一天第二天就撤了（从当时《申报》第一版看，商务印书馆刊登广告都是接连几天刊发同一广告）。

（三）《月月小说》（1906.11—1909.1）

4大小说期刊中，《月月小说》与《小说林》与《新小说》、

《绣像小说》不同，更多讲求经营。

《月月小说》开始由乐群书局老板汪庆祺主持，成立“月月小说社”，自任总理，吴趼人和周桂笙分别主持著述和翻译编辑。1907年5月出版8期后因故停办；5个月后，1907年10月由群学社老板沈继宣和许伏民接办后续出第9期，至24期终刊，均由群学社出版。该刊前期文字上由吴趼人和周桂笙主持，后期则由陈冷血、包天笑主持。虽然后期编撰主持人名单中还有吴趼人和周桂笙，但在第10期就声明停载吴趼人的《两晋演义》，而且吴、周两人的文字大大减少。所以，前后《月月小说》应该看作是两个出版主体组织的两个刊物。

4种小说杂志，唯独《月月小说》当时就没有留下被人称道的名篇。阿英在1936年批评它“成就殊不大……是清末小说与后来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个过渡的杂志”。[1] 可以理解成批评它引导民元的小说离开1902—1906年形成的道路走上了鸳鸯蝴蝶。但是它开始了短篇小说，也是应该肯定的。

【1】郭浩帆：《中国近代四大小说杂志研究》，20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

（四）《小说林》（1907.3—1908.10）

《小说林》是近代出版看似好做、其实难以经营的最好写照。小说林的主干是曾朴，前面已有介绍。曾朴这位六品京官，庚子后离开北京到上海，经营丝绸失败后，考虑到陈季同的意见，决心从事翻译介绍西方，尤其是他较为熟悉的法国文学。他从事文学出版，1903年开设“小说林社”，请同乡徐炁乂、徐念慈主管编辑。徐网罗周桂笙、黄振元、包天笑等，请他们译稿。当时社会上开始有侦探小说，小说林社第一套系列书《福尔摹斯再生案》的第一册在1904年2月出版。同年6月编纂《小说林》丛书而且很快重印。该丛书现在能见到的有64种。1年多后增资，丁芝孙、徐念慈等常熟同乡纷纷入股，加以前两年盈余，实力大增。于是招聘编辑，成立总编辑所，下设“小说林杂志社”和宏文馆两个部分。

曾朴办一个机构而有两块招牌，有一个历史背景：自从癸卯学制公布后，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一套《最新教科书》，深

受教育界欢迎。1905年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建议，宣布立即停止科举，新式学校教育获得大发展，商务印书馆适当其时，利市三倍。商务印书馆获利，小说林社的股东们也有意涉足教科书，并认为他们实力雄厚，可以从事。但招牌叫“小说林”而出版教科书，容易引起读者怀疑，决定叫“宏文馆”，出版《参考丛书》等书籍，另以“小说林杂志社”出版《小说林》。办《小说林》杂志堪称轻车熟路，但出版教育参考书却并没摸着头绪。他们1907年出版的《参考丛书》，有本丸井圭次郎和高岛米峰合著的《东洋史》，就不是癸卯学制里中小学规定的科目。还有《地质学》，它仅仅是大学堂“中外地理学门科目”中8个补助课，和“动植物学门科目”中6个补助课，即可称为选修之一。[1] 即使京师大学堂有人开设地质学，能有几个学生买它的书。加之当时新书业的出版比发行好像高尚些，文人办出版而不去办发行，如果在外地没有自己的分支，放出去的书，根本收不回款子。所以小说林社支撑1年后就盘给有正书局。小说林社的著作和翻译小说约有130种。

【1】《奏定学堂章程》，湖北学务处本，23、43页。

小说林社宏文馆的结束，《小说林》杂志也就停了。有正书局接盘后出版小说林社的小说书而没有继续《小说林》刊物的出版，或和徐念慈的故世有关。《小说林》1907年3月至1908年10月1年半出刊12期，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

第五节　小说理论的兴起

小说在我国既然不登大雅之堂，以往就没有小说理论，仅有文论。随着新小说的出现，小说理论也产生了。

一、蒋其章：“谁谓小说为小道哉!”

“小说界革命”是人们对梁启超《新小说》以后时代的称呼。其实，小说理论更早就产生了。早期小说理论当然很粗糙，议论中心在改变小说之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观念，强调小说应有的社

会地位。这从严复等的《国闻报》就开始了。再早有1873年蒋其章的《昕夕闲谈小序》。

前面提到蒋其章，光绪三年（1877年）前多年在《申报》任职。编辑期刊《瀛寰琐记》，他有《昕夕闲谈小序》，阐述了小说所以被读者欢迎的原因，和小说的功用。他认为裨史小说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娱乐读者耳目，二是使不关心世事者藉以了解大概："推原其意，本以取快人之耳目而已。本以存昔日之遗闻琐事，以附于稗官野史，使避世者亦可考见世事而已。"

他指出，经史百家虽然好和重要，但文笔"词义严重，无谈谑之趣也"，所以"中材则闻之而辄思卧"。而小说则曲折，因而能感人，收到效果："若夫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所以他说："谁谓小说为小道哉！"[1] 但他特地指出：诲淫、诲盗、写奸邪欺诈、记逞将帅用武之谋这四类是要不得的。"去此四蔽，而小说乃可传矣"！他的主张到今天仍是站得住的。

【1】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序》，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二、严复和夏曾佑：主张利用小说推动社会

早于梁启超的还有严复和夏曾佑。1897年他们在天津办《国闻报》，发表有1万字的长篇论文《本报附印说部缘起》。

他们一层一层说：使执路人而问，必知曹操、刘备、包公、宋江、武松，及其功绩性情。又列举中外史实。说人类数百万年，称"人"者为万、为亿兆、为恒河沙，为何身边左右人，可以不知姓名、秉性，而千古之后，万里之外，风靡六合，智愚贤不肖罔不习知而熟道，则亿兆中之一二人而已。他们说："有人以来二百万年，其事夥矣，其人多矣，而何以惟刘［备］、曹［操］、崔［莺莺］、张［生］等之独传，而且传之若是其博而大也？……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进而又说，同样记事之书，有传远传近之别。则有5项因素：1. 书的语言文字是否用读者的民族语；

2. 载于纸上的语言和读者的口语是否相同；3. 表达技巧能否一览便知曲折；4. 讲的器物风俗是否读者熟知；5. 人们的期望在现实往往不能实现，辛苦一生没世而无闻。如此人生，旁人不忍闻听。虚构为善则昌，不善则亡，“天下之快，莫乐于斯。人同此心，书行自远”。正经正史不具五要素里的优点，所以读的人少。“其具有五易传之故者，稗史小说是矣。……曹、刘、诸葛，传于罗贯中之《演义》，而不传于陈寿之《志》”。结论是：“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他们指出一般读者难以对精微之旨寄予言外的古典小说正确理解，“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因而“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1]

【1】国闻报社：《本报附印说部缘起》，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187~2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我们知道他们二位的良苦用心是利用小说“入人之深”，使“天下之人心风俗，为说部之所持”，接受西方的喜怒哀乐、生活百景，从侧面宣传西方政教。但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国闻报》“广为采辑，附纸分送”的小说是哪些。但是他们二位这篇主张利用小说推动社会的长文，应该说后来对梁启超是有影响的。

夏曾佑在《绣像小说》上发表有《小说原理》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小说作法，纯粹讲写作技巧，与当时其他的阐说小说地位、宣传小说作用的文章不同。

三、梁启超推广小说与政治挂钩

前面谈《新小说》那段文字里已谈到梁启超利用小说推动社会的论说，不赘。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在谈要更新小说时，指派给旧小说的罪名太大。

新陈代谢是规律。进入近代，小说应该更新，但不能凭空捏造罪名，将已步入末途的君主专制农耕社会的一切腐败归罪于小说，以作为改革小说的理由。梁启超数说的我国群治腐败，是指个人修养，即私德的缺损。他在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同

时，在《新民说》的《论私德》一节中指陈“私德堕落之原因”时列出五条：“由于专制政体之陶铸，由于近代霸者（指魏武以降君主）之摧锄，由于屡次（指鸦片战争以降）战败之挫沮，由于生计憔悴之逼迫，由于学术匡救之无力。”[1] 这样说社会私德败坏的根源完全对，但是，梁启超为提倡小说革命而将小说归之为社会私德败坏的总根源，就本末倒置，过分实用主义。当然，他提倡小说革命是非常积极和及时的。

【1】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2册，714~71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四、王旡生和其他人的补充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新小说》的发刊词。半年后商务印书馆响应，创刊《绣像小说》。接着陆续有些小说期刊。小说有所发展，与之适应，便产生了小说评论。这些评论一般提到了小说作用和存在等问题，后者对正在学步的适应经济变化的小说写作，特别重要。

王旡生1907年陆续在《月月小说》以“天僇生”笔名发表有几篇论文。他认同司马迁的悲愤著书说，这样说我国小说家的写作动机：“吾谓吾国之作小说者，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则姑婉笃诡谲以言之。即其言以求其意之所在，然后知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说者，盖有三因：一曰愤政治之压制……二曰痛社会之浑浊……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由是以言而后，吾国小说界之价值，与夫小说家之苦心，乃大白于天下。吾尝谓吾国小说，虽至鄙陋不足道，皆有深意存其间，特才力有不齐耳。近世翻译欧美之书甚行，然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事势既殊，体裁亦异。执他人药方，以治己之病，其合焉者寡矣！”[2] 他特别为《水浒》、《金瓶梅》、《红楼梦》几部著名的古代小说申辩：“著诸书者，其人皆深极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隐，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读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诲淫与盗目诸书，此不善读小说之过也。”[3]

【2】王旡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原刊《月月小说》11号，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227~2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3】王旡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原刊《月月小说》第9号，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王旡生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专门评述《水浒》、

《金瓶梅》、《红楼梦》三书，可以说是较早研究写作技法的专论。他称赞“小说至此三书，真有观止之叹矣。吾国小说，非无脍炙人口，在此三书外者。然如《三国演义》，非不竭力联贯也，而文词鄙陋不足称。如《野叟曝言》，如《西游记》，其篇幅非不富，其思想非不高也；然《野叟曝言》，事事在人意外，而此三书，则语语在人意中；至《西游记》之记事，更如于轮舟中观山水，顷刻即逝，更无复来之时。余子自郐，更不足道”。[1]

通过小说影响民众，是当时先进人的普遍言论，仅仅不如梁启超之看成绝对、唯一而已。一般理论文章，都不同意以往批评小说诲淫诲盗，而归之为读者思想不纯：“是岂独不善读书而已耶？毋亦道德缺乏之过耶？”“诲”是主动，作者主观虽无教唆之意，也应该防止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所以评论者要求小说作者“社会如是，捉笔为小说者，当如其慎之又慎也”。[2]

王旡生对《新小说》刊行后小说兴起中出现的问题——离梁启超所期望的甚远，有所担忧：“此风一开，而新小说之出现者，几于汗牛充栋，而效果仍莫可一睹。此不善作小说之过也。有此二因，而吾国小说界，遂无丝毫之价值。”他批评那些仅从投读者所好出发的作者和出版者：“彼其著一书也，不曰吾若何而后惊醒国民，若何而后裨益社会，而曰，吾若何可以投时好，若何可以得重赀。存心如是，其有效益与否，弗问矣。其既发行也，广登报章，张皇告白，施施然号于人曰：内容若何完备，材料若何丰腴，文笔若何雅赡。不惜欺千人之目，以逞一己之私，为个人囊橐计，而误人岁月，费人岁月不顾矣。夫以若斯之人格，而以小说界重任畀之，亦安冀有良效果哉！”[3] 此说实在可圈可点。

经过从蒋其章到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的提倡，“似乎小说的地位，全仗了梁先生的大力，增高了一点。翻译的小说，如《茶花女遗事》等，渐渐的出现了。那时，社会上一般的心理，轻蔑小说的态度确是减了。”[4] 这就为以后的新文学开辟了道路。

【1】王旡生：《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原刊《月月小说》第14号，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2】吴沃尧：《杂说》，《月月小说》原刊第8号，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2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3】王旡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月月小说》第9号，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4】曾孟朴：《答胡适书》，《胡适文集》，第4册，6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六节　清末小说知多少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虽然以1/3篇幅用了6.5万字写清代，但那时还没有一本晚清小说书目，要概括，就比较费力。因而，出版史谈晚清小说有个难点：无法从文学史得到借径。除俞樾曾经为《七侠五义》改写一段和为之作序，读书人认为市民文学不登大雅，不入藏书家眼里，没有系统收藏。没有系统收藏，就得不到系统书目，很难作系统描述。历来小说史家以阿英《晚清小说目》和孙楷第的书目为根据，前者有1 160种，孙著多一些。但是这个数字离实际差得非常远。

至今为止，汇编晚清小说书目最下功夫的是以樽本照雄教授为主体的日本的清末小说研究会。仅他编辑出版的，每册16开180页的《清末小说》年刊已经出版至第29集，他们编纂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已有3版。樽本照雄说，第一版开始“是在1985年5月6日中村忠行家里进行的。当时，由中村发起，召集了中岛利郎、山内一惠及我参加。［当时］关于清末小说的资料拟有两个计划。其一为《目录》，另一为《年表》。只有完成目录后，才容易编出年表。基于这样的考虑，决定先着手搞目录”。[1]他们开始整理的第一个材料是阿英的《晚清小说目》，那书目收录1 100多种，所以他们认为最后可能收录到的也就是3 000种左右，但最后竟然有1万种。第一个书目由清末小说研究会和中国文艺研究会联合出版。

后来樽本先生单枪匹马从事增补。他说：“十年以前，出版《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以来，我一直到现在继续着增补工作。现在我得到日本文部省的［经费］支持，发行《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新编》目录1997年10月出版，收录小说16 014种，其中著作11 010种，译作4 974种。中村忠行在1993年9月24日谢世；因为日本文部省“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的制度规定只支持个人成果，所以《新编》由樽本先生个人署名，虽然它是多人成

【1】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跋》，《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卷末，清末小说研究会，1988年。

【2】1997年11月20日樽本给作者的信。

果旧版的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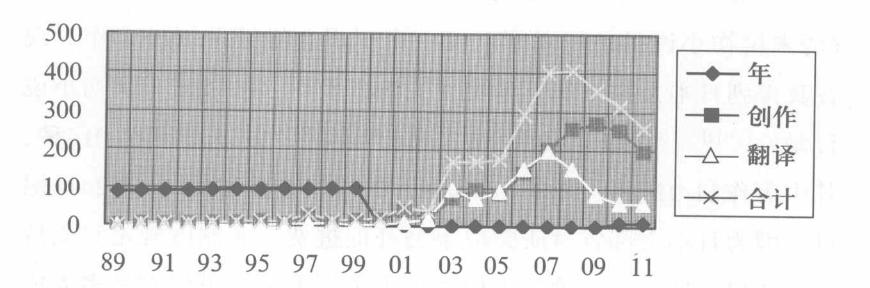
2002年山东齐鲁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称为《增补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增补新编》新增3 100条，收录从16 014增加到19 000条。这个数字较之阿英、孙楷第的数字多出许多，并且是近代小说研究者所陌生的。这个数字大，除了收录完全外，另一个原因是搜罗、记录了有些书的不同版本。

樽本先生的书目，目录学称作"知见书目"，一部分见到过书，另一部分则从他人材料中取得材料。截止到他的第三版书目，除他见到的实物外，又利用了260种他人编的书目、丛书、辞书，花20多年功夫搜集整理、去重，对其中的翻译作品还做了尽可能弄清原著的复原工作，实在是值得钦佩。另外，那260种书目、辞书，绝大部分是我国出版的。樽本先生的这个成果，对我们学术界、出版界实在是值得反思的。

樽本先生在1999年底还完成出版了《清末民初小说年表》，成为《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姐妹编。《年表》所收从1841年到1919年，分别列出著作的项目和翻译的项目。

《清末民初小说年表》对研究晚近小说出版是非常重要的数据，我在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时，考虑到樽本先生的数据库在不断变化，所以没有利用《年表》的材料而请他即时在数据库里提出最新的逐年数字。他不仅提供了逐年数字，还提供了曲线表。曲线表将能使我们明白小说与社会变化的关系。现在将两者列下：





第十二章　传统出版物的式微

第一节　日薄西山的宫廷出版

任何出版都服务于一定目的。宫廷出版服务于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必然和朝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状况相表里；更受经费制约。清廷所谓“康乾盛世”，在乾隆晚期已经外强中干，到嘉庆，正是由盛转衰的开始。历史学家认为嘉庆帝是位守成的平庸者，他25年中唯一的成绩是惩治了和珅。但没有进而清除和珅朋党、整肃吏治，致使腐败继续，民不聊生；民间的白莲教势力增加，屡次镇压屡次兵败，最后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甚至进入紫禁城内。“守成”是嘉庆帝平庸的标志。他在《恭和御制抚顺城元韵》中说“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1] 嘉庆守成，必无超越前人的旨趣，这点不仅在政治上，即使在刻书上也有反映，他在位25年只刻了36种，远低于他父亲的163种。而且主要是规章，如《钦定吏部则例》、《钦定户部续纂则例》、《钦定礼部则例》、《钦定中枢政考》、《大清律例》、《钦定宫中现行则例》等[2]，而不是文化著作。

继续嘉庆朝的衰落，道光的宫廷刻书更加少，仅仅13种，也都是则例等。最可代表的是，当时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没有力量刻书的地步。清代有《大清一统志》，记录疆域区划、沿革、山川

【1】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229页，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140、146、158、177等页，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关隘形势、户口田赋等等。康熙帝命纂修，因为编幅大，又是首次，工程浩大，经雍正至乾隆九年始完成刻版。计356卷。乾隆二十九年因原刻内容已陈旧，命重纂修，四十九年告成，五十五年刊成，计424卷，习称“乾隆重修本”。至嘉庆，又命再修，“材料断至嘉庆二十五年，视乾隆重修本加详，道光二十二年进呈后迄未刊布。”[1] 有疆域、户口等基本国情记录，辛苦修纂22年而不加印刷。而稍后民间需要，上海鸿宝斋书坊将乾隆重修本拆成500卷印行。与之相比较，朝廷财政窘相可以想象；从活动上看，出版依靠拨发经费是难以持久的，唯独作为商品经营才能持久。

【1】张元济：《跋〈大清一统志〉》，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131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但是无论如何穷，表示统治权力的《时宪书》，从道光至宣统三年的87年一本不缺！[2] 而且都按旧规矩一律雕版，虽然现代印刷已经很发达了。

【2】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507页，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康熙十九年，宫中刻书基本由武英殿承办。同治八年武英殿失火，宫中久已无力刻书，不再恢复刻书功能，遇有必须刊印各书，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初年由军机处分出专门办理外交事务，其首领大臣由军机处领班大臣兼任。随着洋务事务的增加，总理衙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管部。1870年香港华英书院结束印刷所，其设备一部分卖给了王韬、黄胜，他们办了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其余卖给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包括部分机器、铅字，总理衙门用这批设备成立了一个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替代了原武英殿的印刷任务。武英殿修书处原下设监造处和校对书籍翰林处。总理衙门印刷所替代的是监造处的任务，由于没有风雅皇帝，没有编纂，校对书籍翰林处大概也没有了。

一般认为宫里刻印的就是武英殿刻书，不是很贴切；武英殿仅仅是内府刻书的一部分而已。一般感觉内府刻书就是《十三经注疏》、《殿版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全唐诗》等等。其实清代内府刻书除这些与文化有关的外，更多是和行政有关的，如前面提到的《大清律例》等等。有清一代实行皇帝集权制度，

所以一切统治规章制度，都只能出诸皇帝，题目上必须冠以“钦定”，退而其次，也要用“奏定”二字，统一由朝廷全文公布。所以有清十二帝风雅者虽仅康熙、乾隆二帝，内府印书一直很忙。忙于规章制度的印刷发布。辛丑条约后，清廷被迫实行所谓“新政”，陆续有所改革。1903年设立商部开始，1905年后学部、邮传部、法部等等陆续成立，特别是“宪政编查馆”设立，待印件极多。这些都是总理衙门印刷所的活。这段时间，现有实物可查的宫中出版物有337种，[1]（《时宪书》83册算1种）和康雍乾三朝相埒。这些，除83册《时宪书》用雕版外，都是用铅印、石印等新印刷。

有清一代，逢有大的值得夸耀的军事行动，都辑集有所谓《方略》。收录有关上谕、奏折、战报、战纪、恩抚等等。如果皇帝有兴趣写了诗词，当然必收。这些是非常好的历史材料，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写的《圣武记》，就是根据历次《方略》。他写《圣武记》的目的是想将历次胜利战记鼓舞民众。同治初年，清廷依靠汉族将领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而321卷的“平捻”、422卷的“平粤”两“方略”早已编纂完毕，迟迟没有印刷。到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了印刷所，开始了搁置多年这743卷书的排印。光绪二十二年又排印了“平定陕甘”、“平定云贵”《方略》。4个《方略》共1 156卷，当然是大书。但总理衙门承印最大的是重印1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重印《古今图书集成》的档案现在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有31件。宋原放等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的《近代部分》从中选用足见全案端倪的4件。光绪在光绪十六年六月面谕总理衙门大臣，“著照殿版式样石印《图书集成》”，[2]总理衙门大臣命令上海道就近于印书商人估价。十月十四日，大臣向光绪帝回报，按光绪帝要印60部，每部银5 169两；如印100部，每部银3 513两。[3]他们认为印100部较好，多余部分可以卖掉，实际费用较少。又说，“所需印书百部价银三十五万一千余两，暂由出使经费内提用。”[4]这说明要总理衙门印书，费用是由衙门支付，不需宫内开

【1】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142~367页，477~510页，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2】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621页。

【3】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624页注②。

【4】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621页。

销。又提出，因为印书所用纸出于安徽，纸用楮树皮做原料，常年产量有限，印这本书用纸需3年产量才能够用，所以要3年才能印完。光绪帝批复“依议”。所以到光绪十九年才印好。

多余的40部书存放在上海海关，书出版近10年后，海关请示如何办。光绪帝说运宫里20部，其余的给每省一部发给学校。[1]也就是说近10年，多印的40部书最多卖掉了2部。

重印《古今图书集成》的目的不很清楚。有种说法，是送给外国的。但在1908年12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有篇《清国特使向美国赠送5 000册中华图书》的报道，说驻美公使唐绍仪因为美国“退回”庚款，“向美国政府赠送图书的仪式”。[2] 报道里虽然没有说明5 000册是什么书，但说了：“这套书涵盖了清国文化几乎所有分支，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或许就是《古今图书集成》。但成为疑问的是，如果石印出版时就送给外国，美国当然有，后来就应该赠送其他礼物。

【1】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623~624页。

【2】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19页，三联书店，2001年。

第二节　书院刻书

书院刻书是清代刻书的一种出版主体。清代书院刻书主要是刻自己书院生员的“作业”佳品。但刻书不仅要钱，还要书院主持者有兴趣。所以晚清书院刻书一般说既少，文化价值又不大。当然个别书院主持人亦有筹集资金刊刻非学生作品的。但这些都要有专门奏折向皇上请求同意。所以在晚清，值得一提的书院刻书并不多。大致有南菁、味泾2家。有说广雅书院也大量刻书，将有关材料附后，成为第三家。

一、味泾书院刻书

味泾书院开办时间不详，开设书院的奏疏是许振祎上的，陈韬编的奏议集里，原件未署日期；其中有“惟自军兴以来”，[3] 可判定在同治初年后。许振祎是同治元年选庶吉士，三年后从政，一般最高是正六品，没有上奏折资格。味泾书院设在陕西泾阳

【3】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420~421页。

县。书院的馆舍在同治元年陕西回民起义时被毁。[1]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陕西巡抚鹿传霖奏片中提到督学柯逢时在泾阳设立书局。这书局发端于光绪十一年，缘味泾书院院长刘古愚组织“求友斋”研究学术，“而苦无书，则集资以刻之”。到十四年柯逢时任陕西学政，见陕西无书，商得巡抚张煦同意，筹资请刘古愚利用书院师生力量校勘，在书院中成立书局：“以院长刘古愚总理其事，委监院周斯亿调肄业诸生通晓六书，留心古籍者加以膏火，分司校勘，不更另筹薪水，以期费不虚糜，可成善本。”[2] 味泾书院前后刻书20年，刻书300余种。除必需的经籍外，味经刻书中很多是属于“时务”：《天演论》、《强学会序》、《西洋通史》等等。最多的是中西数学书：如《九数通考》、《白芙堂算学》、《微积溯源》等等，所以如此，和刘古愚的观念有关。

二、汇刻儒家经籍和南菁书院刻书

佛家众多经籍赖刻“大藏”保存留传，始于宋代。从宋至清，官刻《大藏经》有6次之多，辛亥后又有两次，则是影印。儒家经籍众多，直到清代方始有汇刻。最早是清康熙时纳兰性德和徐乾学刻的《通志堂经解》，即《九经解》。

自从汉代尊孔开始，历代开始注意于儒家经典的注释，到宋代允许私家刻书，儒家经籍开始有释疏合刻本。儒家经籍最重要的是所谓“十三经”，宋代开始有十三经的经疏合刻本。但一直没有更好的本子。到清代，阮元说：“惟有汲古阁毛本，此本漫漶难于识读，近人修补更多讹舛。”[3] 他在找到宋版后校勘重印，即至今最流行的《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这是《十三经》经文的注疏，体现儒家学术发展的单经研究。说来奇怪，此类著作虽然对研究儒家经典有很大用处，却一直没有汇刻。直到康熙十九年正黄旗人纳兰性德，才汇刻自唐玄宗至明诸家单经解经著作139种1 845卷（其中《大易集义粹言》80卷、《礼记陈氏集说补正》38卷是性德自己的)，名《通志堂经解》。乾隆五十年武英殿调集该丛书版片修补重印时，弘历说：“《经解》刻时，成德尚年

【1】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432页注②第2行。

【2】宋伯鲁等编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498页。

【3】阮元：《重刻宋版注疏总目录》，《十三经注疏》，上册，2页，中华书局，1980年。

幼，不能淹通经术，实为徐乾学所辑，而令成德出名刊刻，藉此市名邀誉。"[1] 此说是可以成立的：徐乾学是性德乡试座师，后来性德正式成徐氏的弟子；徐乾学不仅有学问，而且富有藏书，他的藏书目录《传是楼书目》是传世目录，有编选丛书条件。这是儒家经籍第一次汇刻。

[1] 乾隆五十年版卷端上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32页，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清代读书人，尤其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读书人，因为怕政治上出问题，乾隆嘉庆年间不少人转入考据，其成果表现在经书单注出版很多。嘉庆二十二年阮元改任两广总督，为了改变两广学风，在道光四年八月，建立"学海堂"。学海堂是专门供端溪、粤秀、越华、羊城4书院生员经学、史学、词赋集中季考的场所；设学长8人，拟题阅卷。意思是有点怕各书院季考山长宽容学生。因而学海堂成为广东"最高学府"。

由于学海堂活动，广东学子深感《通志堂经解》仅收清代以前经解著作是不够的。夏修茹说：清代"经学倡明，轶于前代，有证注疏之能者，有发注疏之未发者，亦有与古人各执一说以待后人折中者。"又说："道光初，宫保总督阮公立学海堂于岭南以课士。士之愿学者苦不能备观各书。于是宫保尽出所藏，选其应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2] 这就是《皇清经解》。《皇清经解》收录清代经解，以继续《通志堂经解》；收录诸书，从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等开始到段玉裁、王念孙、焦循、冯登府等60人的经解和文字学著作173种，1 400卷。当时阮元哲嗣阮福随侍左右，他后来说："是书大人于道光五年在粤编辑开雕，六年夏移节来滇，乃属粮道夏观察接理其事，严厚民先生总司编集。"虽有托付，但"凡书之应刻与否，大半皆邮筒商酌所定"。[3]

[2] 夏修茹：《序皇清经解》，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140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阮福：《雷塘龛主弟子记》，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1402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到光绪初，王先谦任江苏学政，可以管南菁书院。王先谦也从事刻书。南菁书院刻书是经学著作非常重要的最后一次总结性汇刻。

南菁书院所刻正式名称叫《皇清经解续编》，收顾炎武等100位作者的209部1 430卷经学著作。它在光绪十二年开始。王夫之的著作曾国藩兄弟已经刻过《船山遗书》，所以《皇清经解续编》

王夫之名下只收4种。

徐乾学编纂的《经解》按易、书、诗、春秋、三礼、小经、论语、孟子、四书和总经解10类归类。阮元所刻，按作者活动前后排列。王先谦也循阮元，按作者先后。

清代3部经解丛书，汇集了自唐至清代晚期的521部4 675卷主要解经著作，避免了可能的散失。《通志堂经解》中137部1 727卷，自唐玄宗到明末，历时900余年。后两部经解384部2 948卷，从清初到光绪十二年，仅仅240年左右。清以前的重要经解基本被收罗了，清代后期的则还有遗留。

王先谦刻经解有两个奏片，在后面的奏折中我们知道，他获得批准后"即函知曾国荃、崧骏请转谕所属酌量筹措。赖督抚臣同力相助，饬属鸠赀，源源而来"。得到银19 303两，实用银16 303两。完成后，他在光绪十四年七月的汇报中说，"此项悉出官绅捐助，并未丝毫动用公款。仰恳天恩，准免造册报"。[1]

【1】王先谦：《南菁书院设局汇刻经解折》，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428页。

三、广雅书院刻书

书院的状况和当地督抚关系很大，督抚关心则好办，否则就困难，谈不上刻书。广雅书院与张之洞有关。他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书目答问》，完成于光绪元年四川学政任上。光绪十年，任两广总督，十二年吴大澂任广东巡抚，他感到可以托付，与他共同筹银4.3万两，发商生息，又有商人"报效"每年5 000两，年共有收益7 365两，创立广雅书局。次年十月二十五日汇奏。[2]同时，他又在广东设立广雅书院。据台湾学者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一书所收录的《广雅书院刻书表目》上，广雅书院刻书178种，5 746卷。[3] 广雅书局刻书据叶农统计为177种。[4] 没有找见广雅书局刻书目录。广雅书局光绪三十年结束，版片等归入广东图书馆；当时还将广东历来，如学海堂等公有版片归汇一起。1920年广东图书馆徐绍启将图书馆收藏版片整理后汇编刷印成《广雅堂丛书》发行，共158种。[5]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中的《广雅书院刻书表目》，没有

【2】张之洞：《开设书局刊刻书籍折》，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425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3】细目见陈谷嘉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2334~234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4】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463页，未见细目。

【5】细目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总目》，240~244页，中华书局，1959年。

说明资料来源。当年徐绍启汇编的《广雅堂丛书》，绝大部分是广雅书局的书。将徐、刘两个书目核对，经部54种是相同的，史部也有大量一样，其余参差不齐。就这54种经部书相同，和史部书很多相同，应该说这本是一个机构刻书在两个书目中出现。这是书目惹的事：刻五六千卷书要相当大一笔钱，不可能张之洞自己设立的两个机构同时各花巨款刻完全相同的书。

第三节　私家刻书一般

明代刻书，缪咏禾先生做过艰苦的统计，认为“如果我们把明代出版物的数字暂定为3.5万种，大概不会太离谱的”。[1] 他主要根据的是书目。私家刻书是历代刻书最多的。清代多藏书家目录，有《清史稿·艺文志》和两个《补志》，都是著述目录，不是出版目录，难以据之统计出版种数。

【1】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4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一、私家刻书难

前面提到王先谦刻《皇清经解续编》1 430卷，实用银16 303两。他“饬撙节动用”，还“饬苏州书局助刊多种”。苏州书局代刻，既然是“饬”，显然是不必给钱的；即使给钱，16 303两银子刻1 430卷，每卷合11.4两。这数字虽然并不算太大，但一卷书一般约30页，是不够订成1册送人的。所以，读书人刻书是件难事，我们在私家刻书上经常能见到是由后人刻祖上的著作。

这儿举俞樾和阮元两个有身份的学问家，看往昔私家刻书之难。

俞樾，道光三十年进士，入翰林，咸丰五年放河南学政，七年革职后一直在家做学问。成书《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5种80卷，但苦于没钱刻。后来应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邀，在天津主持《天津府志》编纂，有位张姓学者出资刻了36卷的《群经平议》中的《考工记重屋名堂考》1卷。同治四年，俞樾将这卷书送呈他会试时的读卷官祁寯藻。祁寯藻时以大学士衔任礼部尚书。俞

樾的信里列了他已完成而没有刻的5种80卷书稿的细目。显然把这卷寄京有意请老师注意。祁隽藻回信中问他还有什么，他回答说："此书已算粗成，惟家贫乏人抄写，止有稿本。"又说"今年宋雪帆来津，见其一二，颇加许可，小助刻资，现已将［其中］《仪礼平议》二卷寄京"。次年南返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时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知道俞樾有《诸经平议》未刻，愿意募银承担刊刻。而不久蒋益澧调离浙江，在俞樾给人的信里表现了他的烦恼。他付刻的写样，是由杭州知府刘汝璆从钱号借了40元银洋赠给俞樾请人抄写的。[1] 一个大学者一部极下功力的书，前后几年在3个地方得人帮助才陆续刻齐。

《十三经》被历代统治者作为最重要的经典，因为年代久远，汉代开始就有注、疏、音义出现。南宋时开始有人将原先单行的注、疏、音义等与正文合刻。成为《十三经注疏》。该书明末已没有好的版本了。清廷从乾隆四年调集38位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提调和编校，以明北监本为底本，至十二年陆续校刻完成，是为武英殿本。虽然它用的底本不好，校本不多，但再无佳本，出版后读者奉为至宝。到嘉庆阮元主持的《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出版后，武英殿本才无人问津；直到现在通用的影印本还是用阮刻作母本。阮刻的有名，一是用最早的宋10行本作底本，二是校本多，三是遇有宋本错误不改宋本而出校记。阮元先有《十三经校勘记》流传。流传后，人们据以判断他藏有善本而动员他重刻的。

在人们只能用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的时候，嘉庆十八年胡稷任江宁盐法道，公余与同好研究，准备刻印好的本子。不久调到江西，这事就作罢。次年二月阮元到江西任巡抚兼提督。胡稷读过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从而推测阮元必有《十三经注疏》的好本子。次年才从阮元处见到宋10行本11种经。胡稷也有10行本经11种，两人所藏，并向藏书家黄丕烈借到单疏本两种，可以凑配齐十三经，于是商议重刻。这个消息传出后，"一时贤士大夫乐观其成者，咸鼓舞而赞襄之，于官则有今江南苏松

[1] 此间所述俞樾《诸经平议》刻书之难，见华宁著：《俞樾"门下士""群经"二札考释》，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2期，113~124页。

督粮道、前九江府知府方体，今江西督粮道、前广信府知府王赓言，今南昌府知府张敦仁暨南昌县知县陈熙，新建县知县郑祖琛，署鄱阳县知县候补知州周澍，浮梁县知县刘丙，广丰县知县阿应麟，会昌县知县候补知州曾晖春，二品荫生仪征阮常生。于绅则有给事中黄中杰，御史卢浙，编修黄中模，员外郎黄中杙，检讨罗九叔，举人余成教，贡生赵仪吉、袁泰开、李桢，或输廉以助，或分经以校，续残补阙，证是存疑。”[1] 这19位，还有主持其事的卢宣旬以及阮元、胡稷共22位。他们刻的本子是《十三经》最好的本子，我们今天还在用。

[1] 胡稷:《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后记》,《十三经注疏》,上册,总页码3页,中华书局,1980年。

古代私家刻书难的根本是传播方式决定的刻书费用。古代私刻的动力就是《左传》里的“三不朽”。白居易有诗“生前富贵都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句。俗话有“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说法。那时没有那么多可以由私人发表的意见。诗文，特别从《诗经》开始，一直是古代民间文献的大宗。似乎除了唐代几位可以用单篇形式传播，其他人作品只能以集子的形式流传。集子要有一定分量。因为古代图书贸易与文化比较，相对很不发达，绝大多数个人文集是进入不了图书市场的。所以个人的集子只能是自己或家人刻印，分送给亲友。而在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中，刻书是种很可观的开支。

一种最常见的刻书难的表现是子孙刻先人遗著。试举一些有名人物。如在《清史稿》和《清儒学案小传》有传的方潜(1805—1869)，他的文字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由他的后人方敦吉在济南刊刻，成《毋不敬斋全书》。

方潜是安徽桐城人，无独有偶，在上年，光绪十四年，方昌翰汇刻了《桐城方氏七代遗书》。这《七代遗书》包括方以智的3种，所以并非全是初刻。另外有《丛书综录补编》记录有1933年《毕燕衎堂四世诗存》，毕发、毕纶、毕松、毕槐、毕心粹、毕云粹的文字。那是种印工便宜的石印本。这属于后世子孙刻隔代先人文字，还给原先已经有刻本的再重刻增寿。近人张元济所刻《涉园丛刻》，是祖上遗著，基本是有刻本的，汇刻

后可以再传。

子孙刻书是延续出版已久的书的生命的重要途径，即使大人物也只能依靠子嗣延续其著作的生命。如张廷玉，他立朝50年，雍正帝立军机处，他和鄂尔泰共掌军机，富贵寿考，为有清一代之最。他的著作生前乾隆十三年汇刻《澄怀园全集》，直到光绪十七年，由后嗣张绍文在官居云间时重刻其中《文集》15卷，次年由张绍棠在金陵刻其中《诗集》12卷。中间间隔145年。普通人更加如此。如河南卢氏县张越贵在乾隆二十四年至三十六年刻来莺斋诗、文和古文各2卷，也是到光绪十九年才有“卢氏来莺斋”重刻本。

个人文字获得传播生命的另一途径是靠“郡邑丛书”。我国从明代开始，有郡邑丛书，即辑集乡贤著作出版。这就使一部分著作获得重印的可能。到1962年止，有记录的郡邑丛书共75部，使相当多个人著作获得重印。最早的郡邑丛书是顾元庆的《梓吴》，收录吴人小说40种，继之者樊维城《盐邑志林》，即浙江海盐人的著作，都是明代人编，具体年份不详。清代在近代以前共有3部；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即晚清有25种；民国有44种；有2种难以判断。除民国有非个人外，其他都是个人出资或筹资编辑刊刻。在清代，郡邑丛书的发达，开始时和民族政策有关。清廷压制东南读书人，读书人不能明白反抗，而以刻书表达：“全祖望与杭［大宗］略同时，著（刻）书刻意收罗乡邦宋、明遗民。此其意态之有所郁结，极可想象得之。”[1]

【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二版，85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另外还有氏族丛书，也始于明代。有记录的氏族丛书有67种，其中晚清有32种。氏族丛书一般收书数量都不多，而且多刊刻稿本。

《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馆藏古书目录》中记录有温州永嘉的“永嘉乡著会”辑录的乡贤著作，是用手抄的。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清抄高都陈氏诗抄本》也是手抄。《丛书综录》收录的丁鹏耆编的《衡望堂丛书》是用油印的。前一种是乡邑丛书，后二种是氏族丛书，所以如此，无非是由于经济不富裕。

二、一部目录反映的清代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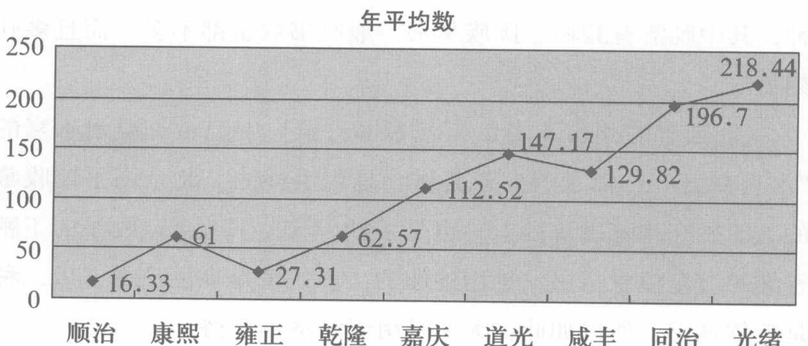
历史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这是研究历史不可忽略而又时常不被注意的；“经济落后而文化先进，政治稳定而文化萎缩，军事强大而政治文教都极为落后”[1]；晚清72年，不仅时间上各段落不一样，地区的差异更了不得，一个总的数字并不能真实反映。

【1】朱维铮:《维新旧梦录》，71页，三联书店，2000年。

民国的出版物，陈原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议并组织进行了《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工作，能了解其大概。清代，我们只能利用《清史稿·艺文志》和其《补编》，但那是清代的著作目录。出版界至今还没有组织过对清代出版图书的统计，不清楚总数，更不知道出版过多少版本。近年南京师范大学李灵年等6位先生，费10年功夫，辑录了《清人别集总目》，收录清代19 500余人的别集4万余著作和版次，对清代出版史研究是份极宝贵的材料。别集是旧时读书人最普遍的著述结集形式，从此足以窥豹。该目录按著者姓氏排列，笔者将之逐一改为按朝统计，得出各朝的数量。计41 619版次。其中没有年代的有6 396版次。清各朝年数相差很大，仅仅有各朝数不足以感受状态，现在再按各朝年数得出年平均数，就足以比较。成下表：

项　　目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民国
版本总数	294	3878	355	3754	2813	4415	1428	2557	7427	741	7561
朝代年数	18	61	13	60	25	30	11	13	34	3	37.75
年平均数	16.33	61	27.31	62.57	112.52	147.17	129.82	196.70	218.44	247	200.29

将数字变成曲线，或更直观：



从曲线上可以看到3条上升线（顺康、雍道、咸宣），3个低谷（雍正、咸丰、民国）。民国的下降，是时代变化，促使人们的文化趋向发生了变化，人们已抛开了以诗文为核心的文化修养，个人文集的减少是个正常的变化，并非坏事。咸丰低谷是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影响。太平天国主要活动地区在有剩米余钱的东南富庶地区，军事骚扰使文化受损。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都在北方，北方不是晚清的出版中心地区，没有大的影响。道光二十年后的72年，仅仅个人文集一种类型就从年均出版75册增加到131册，是非常可观的。但有清一代对读书人思想表述禁锢甚严：清初福临入关后，就下令："严禁士人建白军民利病。""顺治九年，立卧碑于各直省儒学之明伦堂。凡一切军民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1] 所以清代个人诗文集的文化价值总体上并不高。

【1】钱穆：《国史大纲》，修订二版，841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需要指出的是，如此多的个人文集，从书名内容看，基本是流传不广的个人诗文，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略有社会意义而由书商出版。这个数字里没有乾嘉学派的成果，也没有与现实政治政策有关的官员的奏折集。

钱穆先生说清代"学者间绝口不谈朝政时事。清臣不敢自刻奏议，恐以得罪"。[2] 钱穆先生此说不很完整。乾隆中期开始，官员才不刻奏折。康熙早年张惟赤退职后就刻有奏折集，名《入告编》。[3] 同光间"中兴大臣"的包括奏折在内的全集都是身后他人刻。曾国藩的由湖南士绅刻，李鸿章的由他的幕僚刻，张之洞的全部文字，则直到1928年才由北京的文华斋书铺刻成《张文襄公全集》229卷。所以21 482种次这个统计数字的意义，愚以为不在文化而在对文化政策的了解。当然仅仅凭数字是难以了解文化和政策的。

【2】钱穆：《国史大纲》，修订二版，857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3】张元济：《〈海盐张氏涉园丛刻〉叙》，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184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三、藏书家刻书

出版有横、竖两大任务。一是传播当代人的思想言论，是为横向传播。一是延续前人出版物的生命，是历史的垂直传播。在

包括晚清在内的古代，延续前人著述，藏书家由于他们精于版本识别，富有财产，藏书众多，能选择最佳母本，所以他们在明清和民国时期，成为翻刻古书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往往将极罕见的书翻刻，使普通读者获得罕见旧本。就出版讲，他们起的古代文化传承作用，是专业出版者所无法比拟的。

从明代开始，因为宋本书的难得，藏书家开始翻刻宋版书。到清代，不仅宋元版，明初刻本也是翻刻的重要内容。众多罕见著作、罕见版本赖以保存，对于文化有特殊的贡献。民国年间的北方藏书家傅增湘曾就罕见版本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有过文字。乾嘉学派成就最大的是王鸣盛、赵翼、钱大昕3人，他们不是在个别字的文字学、释义上下工夫，而是精于对史籍的考证。他们功力之深，有赖于掌握各种古旧版本。现代藏书家傅增湘在谈到钱大昕的缺失时说，有些"终难奋笔以显为刊正，则以未获多见旧本，无所取征也。第旧本难致，自昔已然。钱氏晓徵，博极群书。然观其《旧唐书考异》，言关内道地理，于今本多所致疑，似于闻人铨本未全寓目。明刻如此，遑论宋元"。又说他朋友做学问缺少版本的事："合州张石卿亦吾蜀好学之士。尝侈言欲重勘全史。持书遍谒胜流。共和之初遇之海上，告以欲校古书，宜先求善本，否则劳而鲜获，壮志难酬。石卿不喻斯旨，矻矻廿年，取材之书不越殿本、局刊，再上汲古、北监而止。年逾七十，于迁《史》始见震泽王氏本。身后以遗稿见托，则疏失孔多，未堪问世。追惟往事，深足矜怜。"[1] 足见讲究学问于版本之必要。而藏书家的翻刻，正胜任选择最好的母本版本。

【1】傅增湘：《校史随笔序》，张元济：《校史随笔》，卷端，首页阴面，商务印书馆，1938年。

明清藏书家都翻刻罕见旧本，但做法不同。明代读书人好以己意改旧本，对不懂的字、句好以己意任意改动。到清代乾嘉，训诂之学兴盛，明代刻书的弊病被发现，藏书家遇有认为值得翻刻的书，都尽可能以各本校勘后出校记发刻。藏书家校勘后发刻的书回复了古籍的原貌。

乾嘉学派的训诂，实质是整理古籍，将因为年代久远而今人难读的，或有所失佚的古籍使能正确理解。清代因为训诂而使复

原的书很多，最典型、费力最多的是恢复《墨子》的活动，从乾隆到光绪二十一年，百余年前后几代人，才将一部湮没的书恢复能读。俞樾说："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文，更不可晓。而墨学尘薶终古矣。"[1] 到乾隆，毕沅开始对《墨子》作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校雠，途经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瑞安孙诒让，乃集诸说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2]《墨子间诂》直接引用有毕沅、顾广圻、王念孙、王引之、俞樾、戴望等诸人的成果；又参考黄丕烈影抄的明代吴宽写本残卷。墨子古本原有古字，而"为后人所窜定者，殆不知凡几。盖先秦诸子之讹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几代藏书家和校勘家百余年孜孜于此，使"二千年古子，厘然复其旧观"。[3]

【1】俞樾：《墨子序》，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本本集卷端，1页。

【2】俞樾：《墨子序》，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本本集卷端，2页。

【3】孙诒让：《〈墨子间诂〉写定后记》，《墨子间诂》，《诸子集成》本本集卷端，6页。

《墨子间诂》是训诂的登峰造极之作。一般书自然不必那样艰苦。但值得记录的是，清代藏书家刻书，从黄丕烈开始，都以校勘作为翻刻的必要条件，并且将校勘成果以校勘记形式附于书后而绝不改动正文。吴县黄丕烈刻《士礼居黄氏丛书》，一反明人刻书任意改动错字的做法，正文一以母本为准；经过校勘认为有错的字，不改动而以校记说明。《士礼居黄氏丛书》翻刻的第一种是嘉庆五年（1800年）刻的《国语》，用的母本是宋天圣、明道间（1023—1033年）刻本，是当时所存最古的本子，但是经过与其他本子校勘，也还有不妥处。对这些错误黄丕烈并没有像明代人那样擅自改动。因为学也无涯，字的差异，很难说是古人刻错，还是自己不懂；另外，翻刻是供今人和后人读的，他们较之古本刻书人离原著人更远，容易接受今天的文字，如果擅改，成为有心之错，后人不易发现，而且有心之错又在所谓"古本"中出现，易于使后人误解前人思想。黄丕烈的做法解决了清人发现明人刻书臆改而找不到新的做法的问题。他的做法被吴大徵等人充分肯定。

不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因为他的校勘记早在决定翻刻

前已经流传，跟随黄丕烈的做法就很自然。此后出校记的做法成为翻刻古籍的传统，直到今天。但是在清末开始，商业利益占据翻印古籍市场后，尤其在石印影印古籍中，佞宋出版家欺负读者见不到母本和不懂石印技术，为了“叫座”，竟然发展到为宋本“声誉”，任意改动宋版“错字”。这种改动的影印古籍大量流传，使无缘见到母本的读者误认为宋本原貌。这种翻印者的“功绩”自然不值得“颂扬”。但在出版史著述中，也有明白真相而曲意辩解、随声附和者。1997年山东大学图书馆竟然有位教授著文为这种做法辩护。说：“先生校史，不独定异文是非，且援据众本，择善而从。融死校活校于一炉。自卢［文弨］、孙［星衍］、黄［丕烈］、顾［广圻］以来未尝有也。”校勘谁都是“择善而从”，有什么牛值得吹呢！问题是出版选择影印母本应该校勘众本，得出某本最好。得到出众的本子后，如果你雕版，你排版，遇有母本有错，你可以用你认为好的任何方法处理。因为那已经成为你的本子了，你负责。你在宋版书上乱改而用影印，你又不申明，改对改错都让宋代人负责，岂非不讲道理。这同明代人乱改有何差别。明代人离宋代也就是二三百年，以自己意思改尚且要改错，民国离宋代更远，语言用法变化更大，擅改更易错。而且读者买影印本不是为读，是为考订。你擅自改动，将把他人的学术研究引入误区。

晚清藏书家翻刻宋元明古籍，由于一家一户，缺乏组织，虽以丛书形式，但受制于个人藏书的有限，缺乏系统性，是他们的共同不足。但他们不惜资财，不惜古本翻刻后母本身价降低，矻矻于传播古本，使他人阅读方便的精神，是极崇高的。如黄丕烈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中母本就有极珍贵的《仪礼》及校记。孙毓修说：“［宋］咸平中，又校勘《七经义疏》马氏《经籍考》载其先公得景德中官本《仪礼疏》四帙，极为爱重。黄丕烈‘百宋一廛’亦有此本。黄氏诧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者也。”[1]

【1】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万有文库》本，9页，商务印书馆，1920年。

晚清藏书家刻书较之民国，人数要多，而刻书数要少。这是藏书家的经济来源有所不同所致。晚清藏书家靠田产，民国则有

商业收入支撑。另外，晚清政制变化，原有藏书家的藏书流散，流入愿意翻刻的藏书家手里，进入民国成为翻刻印源。

晚清翻刻古籍，值得一提的还有黎庶昌。他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出使日本。在日本时期，正值日本废弃汉学，原先流入日本的我国古籍被藏家轻视，低价流入市场，由于他熟悉我国古籍现存状况，收购得一大批，其中不乏在国内已经见不到的。他在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选择国内已经见不到的就近在驻日本使署内影刻，称《古逸丛书》。因丁忧，十年八月召回，所刻前后仅26种。刻26种并不算多，但考虑翻刻仅1年多，已很可观，如果不因丁忧，所刻必多，且所刻版本都很名贵。叶德辉说："海外卷抄，刻印俱精，惜假手杨校官守敬，不免师心自用，英雄欺人之病。"[1] 但他并没能具体指出杨守敬"师心自用"的错处。《古逸丛书》是抢救性的古籍翻刻，仅仅按原样影刻，没有校勘，是能理解的。《古逸丛书》因为收书名贵，丛书名成为一个品牌。1922—1957年，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辑印罕见古籍46种，称《续古逸丛书》。建国后，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规划中就有《古逸丛书三编》。

【1】叶德辉：《书林清话》，252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有清一代多藏书家，校刻书的藏书家多，但最值得称颂的有孙星衍、黄丕烈和缪荃孙3位[2]。前二人均乾嘉时人，缪荃孙是光绪、民国间人，他刻书，贵在如一般藏书家刻书注重校刻外，还注意于补辑阙文。他在晚清刻《云自在龛丛书》和《藕香拾零》两套丛书，其高明处，叶德辉说是"孙、黄不能过之"；进入民国后他帮助他人编书更多。

【2】叶德辉：《书林清话》，252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孙毓修说："有清诸收藏家，皆喜刻书，做宋元者，有绝精者。校勘之勤，更非前人所及。如歙县鲍廷博之'知不足斋'，广州伍崇曜之'粤雅堂'，皆以私家之力而刻书数百种。若刻至数十种者，尤数见不鲜云。"[3] 晚清藏书家刻书的还有多位。

【3】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万有文库》本，25页，商务印书馆，1920年。

四、坊间刻书

说坊间刻书的宗旨就是为赚钱，大致不会错。以往政府档案

没有记录，究竟历朝历代有多少书坊刻书，刻了多少，刻了些什么，只能靠现存书目和书籍。至今缺少足够的书目资料作为出版史可资借鉴的材料，而坊刻资料更少；但还是有一些踪迹可循，虽然不能全面。

(一) 苏州书坊刻书

坊刻中心历代有所变化，一般从历代文人笔记中梳理。就晚清坊刻，应该以当时人叶德辉、孙毓修为准。北京是政治中心，官员流动多，又是会试所在，应试学子往来多，适应这两种情况，书坊以买卖旧书为主要业务。叶德辉说北京书肆，“五柳居陶氏，在路北，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延庆堂刘氏……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1] 说明苏州书肆是可以供书给外地同行的。又说经太平天国，书业面目全非，“玄妙观前，无一旧书摊，无一书船友”。[2] 苏州刻书历时最长。苏州鱼米之乡，富有的读书人多，苏州书坊林立，不仅刻书，也还有旧书的流通。而太平天国时，书籍遭厄运，书业资本雄厚者，迁移到上海，本小者从此覆灭。

吴刻有精整传统。胡应麟《经籍会通》说：“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率其地梓也。”[3] 孙毓修说：“清代书坊刻书之多，莫如苏州扫叶山房。如《十七史》、《四朝别史》、《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其最著者。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4] 显然，作为苏州坊刻代表的扫叶山房刻书是晚清最上乘。有说扫叶山房刻《十七史》，其实它是收购汲古阁书版。它开创在汲古阁前，资财胜于普通书坊，但远不如汲古阁厚实。虽不如汲古阁厚实，但它讲究经营，像试帖之类，汲古阁是不刻的，扫叶山房刻。它刻过乾隆40年进士、国子监祭酒、上书房师傅吴锡麒的久久流传的《有正味斋试帖诗注》8卷；当然还有其他供应试用的书籍。尺牍、日常用书、历书、字书等等常销书它都刻，从光绪六年起至宣统二年，它已迁至上海，完全不必管苏州禁刻小说令，陆续刻有《小五义》、《青泥莲花记》等通俗小说20种。它讲究经营，才能自明代中叶至建国后，前后

[1] 叶德辉:《书林清话》,259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2] 叶德辉:《书林清话》,257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3] 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万有文库》本,35页,商务印书馆,1920年。

[4] 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万有文库》本,35~36页,商务印书馆,1920年。

维持400余年。它的资财雄厚，又在富庶之地，所以能稍别于普通书坊，刻写数量大、要求高、可以多年刷印的书。扫叶山房在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陆续出版的《扫叶山房丛钞》是晚清坊刻的高品位书。

叶德辉说北京书坊从苏州运书回去，不一定全是苏州刻书，或有旧书流传。苏州刻书有科举用书流传到北方。1983年，中华书局编辑马绪传先生送给我一本残本《青云集》，他的跋说，1951年抗美援朝时，他路过安东在旧书店购置。书辑注于道光五年，光绪四年用铅字排印竹纸本。手写封面书签下面有个贩卖店印记，文曰："盛京，永和堂记自在江苏检选古今书籍发行"。当时上海属于江苏松江府。

（二）福建四堡刻书

古代和晚清书坊基本不能或不必区分刻书和贩卖，刻书利大，但需要资本。刻书者往往是由贩卖者"升任"的。清代建本就是如此。

晚清坊刻的一个重要地方是福建四堡村。福建建阳从宋到明末代有刻书，远销各地。乾隆四十年皇帝甚至让查考建本。但是后来建本逐渐在文人笔下消失和模糊了。清人"施可斋（施鸿保）《闽杂记》（仅1卷，《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九帙收录）：'是明时麻沙书且官监校矣，今则市屋数百家无一书坊。或言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所印之书讹脱舛漏，纸甚醜恶。数百年擅名之处，不知何时降至此也。'"[1] 这儿施鸿保说的"书坊村"在何地，人们都不知道，仅仅郑振铎提到过，叫"四堡村"。直到1992年春福建省新闻出版局调派得力干部深入调查访问，才获得明晰历史：光绪四年（1878年）《临汀汇考》说："长汀四堡乡，皆以书籍为业，家有藏版，岁一刷印，贩行远近。虽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经生应用典籍以及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市有点，乡以肩担。不但便于艺林，仰且家为恒产。"[2] 四堡村民中有邹葆初在外贩卖书籍获利，康熙二年回乡，开办书坊，逐渐乡人跟随，成为一个"专业村"，替代了明末被火灾烧毁掉的建

【1】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万有文库》本，31页，商务印书馆，1920年。

【2】本段关于四堡坊刻的材料，均摘引自吴世灯：《清代福建四堡刻书业调查报告》，不再一一。吴文原发表于叶再生等主编：《出版史研究》第2辑，后收入宋原放等主编：《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二卷，307~341页。

阳刻书业，直至光绪末年。

四堡刻书现在能找到的图书实物和文字记录表明，200年间出书489种，连重复品种计算是667种。当然这是根据保存下来的实物和文件所记录，年岁久远丢失必多，实际出书要大大超过此数。除了一般启蒙读物、科举实用图书，还有很多大部头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资治通鉴》。

四堡地处乡间，书籍的出售靠外地，主要是江西浒湾书商来批发。每年春节各家将可供书刷出样张贴在门口，彼此间协调，灯节时接待批发户订货。四堡自己有人专门从事外销，也有人到外地开书店。

四堡刻书业虽延绵200年，但并没有发生大的影响，而且日渐衰落。有份族谱说："吾乡在乾嘉时，书业甚盛，致富者累相望；至咸同以后，乃不振。间有起家者，多以节啬积赢而致，然亦不及前人矣。"愚以为原因在于，他们虽从事一项需要全神贯注的经营，却沿用落后的生产方式。《临汀汇考》说："不但便于艺林，仰且家为恒产，富埒多藏。食旧德，服先畴，莫大乎是，胜牵车服贾多矣。"编写临汀志的先生"食旧德，服先畴"的思想，正反映了当地当时的生产方式的思想：将书版看成田产，用经营田地的方法经营。

书籍制版成本的分摊原则，决定了书业是一次投入、多次收回从而获得回报的行业。所以需要有经营规模，有较多品种，不断投入，不断产出，从而形成一个循环圈。这个圈越厚实越大，越容易获得读者，读者是最后利润提供者。吴世灯先生提供的材料里有几份"分单"，即财产处置单。四堡现在知道的书版共有667副，而现存乾隆三十八年到光绪二十三年5份分单，就涉及325副书版，占1/2。弟兄分居而将父业分拆，只能越拆越小，每户只能成为刷现存书版的刷户，而缺少投资刻新版的可能。这就不能增加能循环的书籍，不利于发展。同时期的苏州扫叶山房，他们历代不是分拆父业，而是统一经营，分配利润，就使事业维持和扩大。

书业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更随城市发展而有新的变化。进入近代，城市发展，市民消遣用的书籍增加，最多的是小说。小说最早指琐屑小语，后来指演述故事。这儿指的是后者。小说的发展与城市发展成正比，据王清源等资料，南宋仅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1种，元代则有两家出书6种，明代前后有134家。清代，特别是自道光到宣统，新增的小说出版者有664家，出版的小说达到1 459种。当时没有著作权，非常多的小说是大家都出版的，《今古奇观》有60个版本，《东周列国志》有64个版本。《济公传》不仅一续再续一直续到四十续，还有《济公活佛传》、《济公后传》等。乾隆九年《济公传》问世，到光绪末年就有很多《济公续传》出现。这个数字，反映了城市的发展带来市民文化的发展。

第十三章　新出版的发行

“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1] 出版是一种社会活动，除了有一定组织的信息，在其复制后，还必须将其推广进行传播。

【1】许力以：《出版和出版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卷端，8页。

出版的目的是流通。没有流通，一本书即使印出了一大堆，也不能叫“出版了一本书”。另外，作为经营的出版，必须有良好的流通才能收回成本，进行再生产；有了盈利才能扩大再生产。

第一节　依靠水运的图书发行

图书只有能在异地发行，才能扩大发行量。我国地域辽阔，因为古代重农抑商，相应交通不很发达，出版受制于发行。到近代，运输相对发达了些，也没能摆脱这种制约。当然最根本的是城乡居民的购买力限制了文化需要。此外，缺乏有效的图书宣传手段，使出版者与读者的供需信息不能沟通，也是原因之一。运输手段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古代图书用纸轻，体积和重量比小，陆路运费高，靠水路运输。叶德辉在1920年刻的笔记《书林清话》中谈到苏州书市的衰落时，就用“书船”表示贩书人：“上海飞凫客，群翔集于茶坊酒市之中。而吴门玄妙观前，无一

旧书摊，无一书船友”。[1] 在讲北京书肆时说，五柳居陶氏“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2] 说明书籍远地贩运靠水路。

【1】叶德辉:《书林清话》,257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2】叶德辉:《书林清话》,259页,古籍出版社,1957年。

书籍依靠水运，极大地限制了发行半径。这种情形，到整个晚清都没有改变。同光年间地方官书局刻的书，也仅能在江左江右及其附近流传，北方流通极少。晚清提倡汉语统一读音的劳乃宣，在光绪七年担任直隶南皮县令时，曾经给总督李鸿章上有一个卖书的建议。禀中说：“窃思为治之道，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之兴，以读书为根本。畿辅民风笃厚，士习敦朴，通儒硕学代不乏人，而人文终不能如南邦之盛者，以舟楫不通，书籍难致。往往有向学之士，无可读之书，是以成就者少也。尝见乡塾所读之书，率皆滥恶俗本，讹谬不可读。”[3] 这种书读不出学问，所以他建议拿出三四千两由天津招商局便船去南方官书局运书回来，在保定和天津发卖。李鸿章同意了这意见，并发交各使、道议处。经过半年，终于办成，在保定的志书局、天津支应局发售。[4] 自然，人在政在，人去政亡，不可能维持多久。

【3】劳乃宣给李鸿章禀，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29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4】梁长洲:《关于劳乃宣建议直隶售书事》，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290~298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由此可见晚清传统图书发行的局限，这种局限的根本在于社会经济水平。当李鸿章命令直隶布政使、按察使、清河道议处劳乃宣提议时，对原先建议书籍运到省城后，可开具书目发州县，由州县酌定经办商户代卖。并规定书籍由保定、天津运至州县的费用由各州县支付，不准加入书价一条，议论的意见是：“查书籍交各州县发卖固可广为流布，但寒士仍属无力购买。惟买书存储书院，俾肄业者得以借观，最为培植寒畯良法。”[5]

【5】同上书，296页。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光绪朝朱批奏折里，就有“陕甘总督至湖北买书奏片”、“山西巡抚为晋省赴沪购书奏片”，可见西北因贫瘠而书籍买卖难以维持。[6]

【6】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299~300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光绪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开明书店店主著有《金陵卖书记》和《汴梁卖书记》，记述赶考场卖书情况。[7] 内中记述了内地士子对新知识的贫乏，基本原因还在新书难以在内地销售。

【7】同上书，303~325页。

第二节　新旧分界的发行死结

这是讲书籍内容和外在形态都是旧学的书的发行。至于新学书籍期刊，是另一景象。

如果你翻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式出版物，不论书籍或期刊的版权页，你会惊奇地发现，在卖书卖刊的地方的名单中，书店、书庄竟然很少，而西药房、铜锡铺、茶馆、别发洋行、陆军医院等等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却是这本或那本书的代售处。还有某某牧师处、私人住家，等等，稀奇古怪什么都有。

我们可以把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时务报》刊登的各地寄售处名单列在下面：

《时务报》各地派报处名单

京师　赣宁馆　电报局　中西大药房　武阳馆　时务报分馆　西学堂　厂甸总报局　中街吴宅　王宅　周宅　杨宅　李宅　平则门大街吴宅

天津　文美斋书坊　闸口西学官书局　时务报馆分馆　关道署内周　紫竹林钱公馆

保定　傅公馆　电报局　莲池书院　清苑县署内　史家故址庵存厚堂

济南　中西大药房　电报局　洋务局

烟台　潮州会馆　电报局　四明公所

潍县　电报局

太原　水巷恽公馆

太谷　凤山书院杜允明

开封　陈公馆

武陟　右堂社

兰州　电报局　聚贤斋书坊

西安　务本新报馆　聚贤斋书坊　味经书院

成都　吴氏宗祠　李宅　志古堂书坊　果子园杨宅　步月山

房书坊　新街本分馆　盐道署内杨　南门内马宅

重庆　同文局　马宅　善成堂书铺　古冈栈恒泰安霍乐三　东川书院　渝报馆　怡和行　川东道署　新关内沈

万县　电报局

夔州　杨宏发杂货铺

武昌　新街官书局　巡官书局　自强学堂翟声谷　时务报分馆　善后局　粮道署

汉口　大英药房　黄陂街江左汉记　乙海春戒烟药房　关道署内　铁政局

宜昌　江左汉记分局　怡和渝行

沙市　江左汉记分局　张幼庭和□王

长沙　湖南矿务总局　校经书院　艺学堂官书处　学□内

常德　乙海春戒烟药房　黄金台八障公局宁藏

衡州　左

南昌　福康轮船公司　系马庄邹公馆　灵应桥汪公馆

九江　福康轮船公司

吉安　电报局

安庆　藩经厅署内吴韦斋　电报局

芜湖　电报局　关内署

庐州　电报局

寿州　文德堂书坊

上海　格致书屋　六先书局　六堂书坊　千顷堂书坊　恒顺泰号　同泰号　文富楼书坊　纬文阁书坊　两宜斋　复兴号　王济川　王子安　傅潮

江宁　杨公馆　江义和钱铺　坊口大街松茂室　孝顺里陈宅　石口街黄宅

苏州　张公馆　丁香巷吴宅　墨林堂书坊　南仓桥吴宅　马宅

常熟　景古阁书坊　醉尉街张宅

淮安　刘公馆　罗公馆

常州　龙城书院

无锡　售《申报》处　王宅

太仓　复豫钱庄　税务坊杨宅

清江浦　电报局　善后局　程公馆

扬州　电报局　盐知厅署　丁家湾连公馆

江阴　永恒义庄

镇江　盐店巷吴宅

徐州　府经厅署

泰州　周宅

昆山　振记庄

松江　陈寓　王宅

南翔　东市艾宅

南汇　惠南书院夏宅

杭州　圣观巷汪宅　九曲巷楼宅　防军局

嘉兴　电报局　谭宅　陶宅

硖石　萃古斋

湖州　姚宅　邱宅

宁波　岱盐局

绍兴　墨润堂书坊　儒学翁

温州　学计馆　利济医院

瑞安　学计馆

兰溪　电报局

诸暨　金大成染坊

嵊县　宝和银楼蔡仲甫

台州　柯泰丰　升祥泰号

余姚　王宅

福州　天泉钱庄　南台闽海关科房　三牧坊杨宅　船政局赵

厦门　合和茶栈

建宁　电报局

泉州　闽海关科房

广州　圣教书楼　中西报馆鸿安栈　时务书局　知新书局

全经　堂书坊　义一斋书坊　邓宅

佛山　百元堂

潮州　陈再兴纸行　广聚栈

汕头　双和市广福斋蜡丸点

嘉应　保安总局黄

桂林　广仁善堂

梧州　临全大公堂内梁

贵州　长春巷李宅　吴公馆　官书局内雷

昆明　天顺祥票号

澳门　知新报

香港　恒顺泰　鸿安栈　文裕堂书坊　聚珍书楼　维盛茶号

槟榔屿　岭南栈

新加坡　鸿发栈

神户　同茂泰

大阪　同茂泰

东京　精神社

全国十八行省均有代售处，合75城镇，国外五城市总计202处，绝大部分不是书店。

这种现象，反映了新式出版物发行的艰难。而出版物发行困难，使出版难以为继，走上绝路。

各地原有的书店、书坊所以不卖新内容的书刊，自然是商业考虑。因为去那些老书店、书坊的读者对新式书刊不感兴趣，加以老书店的门市只有展示书籍书根的书架，没有展示书封面的设备。他们不代卖新式书刊从经营上讲是合理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出版的发展。但当新式书刊能获得老书店读者欢迎时，老书店也很愿意代卖。典型的例子就是商务印书馆1903年夏天创刊的《绣像小说》连续刊，当年代售者的名单如下：

"上海　各书庄和《世界繁华报》

汉口　商务印书馆

保定　府官书局

北京　公慎书局　有正书局　撷华书局　顺天府工艺局

天津　同文仁记　格致书室　广益书局　联兴　时新书局　文美斋

广东　开新书局　时敏书局　英文书局　圣教书楼　华洋书局

南京　明达书庄　中西书局　启新书局　自强书会

苏州　开智书室　东来书庄　知新书室　东学堂　来青阁　华英药房

镇江　复春　文成堂

常州　晋升山房

江西　广智书庄　嘉惠书庄

杭州　史学斋　浙西书林　德记书庄　总派报处　崇实斋　申昌室　采办书报处

宁波　文明学社　汲绠斋　华美药房　华英药房　孟晋书社

绍兴　墨润堂　会文堂

南浔　萃珍格耶稣堂

嘉兴　缀云阁　江左汉记　同源祥

武昌　以新书局　松华楼　文明书室　新政书局

汉口　江左汉记　全发源　中西药房　政新祥

宜昌　江左汉记　新堤　江左汉记

沙市　江左汉记

岳州　江左汉记

长沙　江左汉记

福州　美华书局　寿人氏药房

香港　聚文格　文裕堂　锦福　别发洋行

四川　少年学社　二酉山房　崇文书局　文林堂　点石斋

重庆　中西书室

太原　山西大学堂　书业昌记

广西　浔养学堂

陕西　学署

山东　济南府陆军医院　官学堂

芜湖　益智书局

日本东京　三省堂书店　横滨别发洋行

新加坡　别发洋行"[1]

细细品味这个清单，可以有很多内容。书店数量的增加，表示五六年间经售新书新刊的书店数量的增加。第二，有些地区仍有非书店在卖。第三，书业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比西北大为发达。第四，这个名单，是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他们聘请"老书坊里杰出人才"沈知方，[2] 开拓是他的基本思路，所以能在很大的区域内找到愿意代卖的书店。从店名看，这些书店中，有专卖新书刊的，也有专卖古旧书的。古旧书店能被沈知方说动代售，果然是沈的发行本领，也是客观上有利可图。

1879年北京聚珍堂将石玉昆的说唱脚本《三侠五义》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市民文学的卖点从历史演义转到武侠。这些正是旧书坊出售。武侠小说占领了20年时间，读者需要换口味时，李伯元、吴研因等的谴责小说问世，符合了读者新口味。仅仅是也受市民欢迎，书坊才代卖《绣像小说》之类。

小说和小说不一样，虽然有老书店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却不代卖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他们只能在上海找一家绸布店代售。那时已经是1909年。可见，新出版物发行的艰难。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很晚。这种状况迫使新式书店开设自己的外地门市。出版者自己搞外地发行门店，最直接的结果是发行成本增加。

第三节　卖书只有小书店

发行渠道的不通畅，始终是困扰新出版的因素，直到解放前夕。开设外地门市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一个出版者自己的品种够不了门市的维持费用。最早除了《申报》的申昌书屋和点石

【1】《绣像小说》，第5册，封底，上海书店翻印本。

【2】高翰卿：《本馆创业史》，《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斋有实力，而且自己有几百种书卖，一般出版者就完全没有这种条件。所以他们都只能委托书店代卖。而卖新书新刊的新书店，与旧书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利润薄，很难发展，所以全国始终没有大书店。

古籍，大半依靠付赁版钱借版刷印的办法生产，所以书籍除官书局有规定售价外，其他没有固定售价。而且以前书籍价昂，书籍用完后不随便丢弃，书坊担任的流通职能不仅限于新书，主要还是旧书流通。旧书流通由于私人卖出时不知行情，书坊可以杀价。旧时书籍集中在南方，地处潮湿，夏天必须晒书防霉防虫，非常麻烦，所以有读书人去世后子孙没有读书习惯嫌麻烦而卖先人遗书的。他们对书的价值更非所知，书贾因此而获大利。

新书、新刊，则写明定价。传教士早期在海外的刊物均属非卖品，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华出版活动增多，书刊成为发卖，他们实行定价制度。最早1853年由香港马礼逊教育会主办、华英书院出版的《遐迩贯珍》（图55），开始定价发卖。后来上海墨海书馆按西法印刷的世俗出版物，如《六合丛谈》也标定价。后来续《中西闻见录》的《格致汇编》，内封就以大字印“每季出印一卷，每卷洋二角半”。这些书只能按写明的定价卖，所以利润极薄。有书证为凭：孙士颐在广州开书店，在给汪康年的信里说：“惟制造局、广学会诸书，只能照其原价。如该店毫无沾润，似亦未妥。请两兄为我酌定章程。”[1] 扣除运费、利息和损失等，书籍零售店的利润极薄。因而，所有卖新书新刊的书店，无一例外地都带卖文具和球类等体育器械，才能维持。因而很难发展成大店。旧书坊开始卖书，可以自己刻些畅销书，获得出版和发行两层利润。这些新书店是做不到的。因为售书业的利

【1】《孙士颐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4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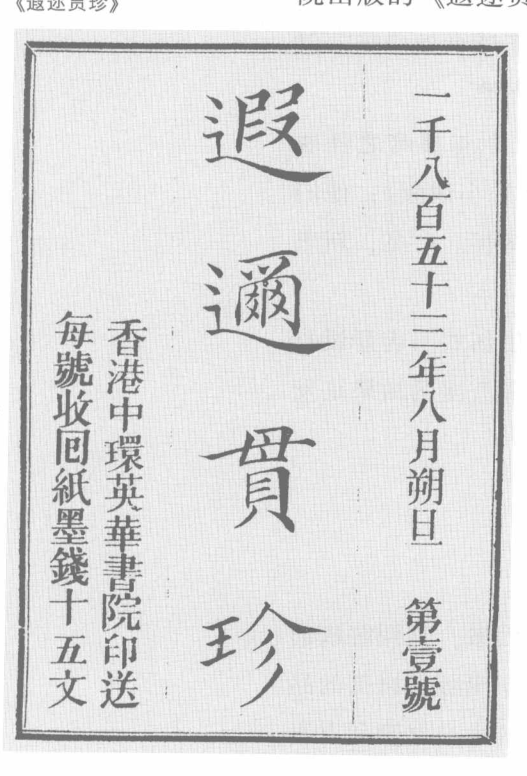


图55
《遐迩贯珍》

润薄，自身难以发展，所以旧中国直到全国解放，始终没有能产生大的书籍零售店，自然也没有书籍批发商。更何况晚清！

第四节 在外地开分店获得发展

晚清各出版社在外地开设分店，没有统计数字，可以借民国时期的一些情况来推测。

书业前辈张静庐，可以说是书业的多面手，而且经营出版颇有创新。他在1938年40岁时写了一本《在出版界二十年》，是本自传体的出版经验谈。其中谈到发行。且不说他编印出版了《小说林》和《滑稽林》两种杂志，交给马路上报摊和书店代售，到结账，人家根本不承认，[1] 就是正规的请人代销，也是满眼荆棘："书店的营业是靠'放账'的，出版的书，委托各地贩卖书店代售，卖出还钞。很多卖出了也不还钞，于是乎有了'账底'。这'账底'，也可以说是千年不还，万年不赖的长期欠款。一家书店要先有了一层'账底'，然后可以逢年过节，在'账底'以外的欠款项内，收到三五成已经卖掉了的书款。"[2]

在民国时期，社会发展，读书人远比晚清多，情况尚且如此，同样受发行制约的晚清的出版经营绝不会比民国时好。很多书刊出版者都因此而难以持久。试以蔡元培、张元济等10余人集资创办的《外交报》为例。开始集资4 400元，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一议定的章程第五条说："本报之设，志在裨益时局，启发民智，非为牟利。初办三年不给官利。年终结账如有亏蚀，难再支持，同人不愿再添股本，或另找人承办，或即停办，届期由创议股东另议。"[3] 说明办期刊是准备赔本，赔完拉倒。《外交报》因为后来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发行由商务印书馆协助，因而持续了10年，创当时期刊维持的最长年限。但最后还是因为"代销"而停刊，因为在商务印书馆没有分支机构的地方，仍然需要委托他人代售。在张元济先生的哲嗣仲木先生处保存有一份《外交报社庚戌年结账清单》。清单表明，刊物"每期

【1】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46~47页，上海书店翻印本,1938年。

【2】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92~93页，上海书店翻印本,1938年。

【3】汪家熔:《〈外交报〉股单、章程跋》的附件,《出版史料》1991年第4期,41页。

总有一些卖剩的刊物，每年总有一些收不回的代销刊物的账。日积月累，整个资金完全成为剩刊和呆账，无法再周转”，[1]终于停刊。

【1】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讨取这些欠账的成本太高。以上面《绣像小说》的代售处讲，有34个地方。其中只有杭州有7处，有几个地方五六处，更多一个地方就一二处。如果去讨，即使能顺利要回，不一定够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的开支。要不回的可能性很大，更亏。

唯一能避开收不回欠账的办法是自己在外地开设只做发行的分支机构。在晚清能站住和发展的极少数出版社，无一例外都在上海以外开设有分支机构。但必须有足够的、为读者需要的出版物，才能支撑分支机构的开支，才有价值。

晚清能开设分号的仅仅两家：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他们都是依靠教科书。

文明书局是最早在北京开设分店的出版社。1898年，江苏无锡年轻人俞复等举办一所“三等学堂”，即小学。那时还没有学校课本，他们参考日本小学的课本，一边编，一面教。他们一共编了7册。1900年慈禧被迫宣布实行所谓“新政”，其中有举办学校一条。在江左经济发达地区，此时纷纷成立学校，需要教科书。这7册课本被以《蒙学读本全书》名称出版。1902年由廉泉、俞复、丁宝书等创办文明书局，先出《蒙学读本全书》，接着出版修身、算学等小学配套课本。当时只有时敏书局有龙伯纯编的《修身科讲义》（1902年5月）和南洋公学陈懋治重编的《新订蒙学课本》（3册1902年12月）。文明书局生意很好，就有条件至外地开设分号。在1902年已经由廉泉具名在北京开设分店，1903年出版的教科书上已有北京、保定两处分店。

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10月后编纂小学教科书。不久癸卯学制公布，商务印书馆按照学制规定，初小5年编制10册课本。1904年1月第一册国文出版，接着陆续出齐。取文明书局而代之。课本的成功，使商务有可能设分店。它没有采取与文明书局对垒的办法，将北方让给文明书局而在经济发达的南方占领。它第一个

分馆在汉口，第二个在广州。汉口交通发达，九省通衢，实际是一大片；广州是经济发达地区。

出版社自设门市的销售是有限的，必须依靠遍布各地的代销点，才能提高出版物的发行量，获得较多利润。专司发行的分支机构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就近掌握代销同行的具体情况，及时收账，避免坏账损失。更因为能就近掌握情况，就敢于放账而扩大发行。

商务印书馆在南方站稳后，它的课本声誉传到北方，在1905年夏，清廷宣布立即废除科举后，商务印书馆立即在北方，首先是天津开设分馆。加以它编的课本门类齐全，这时再也没有能撼动他的力量了。

第五节　学者开书店

出版物的价值，只有到了读者手里才能实现。鸦片战争以来，整个时代，不仅仅有学者从事出版，宣传新学，推广民主意识，还有学者开书店，以推广这些出版物。毛泽东在长沙办文化书社就是范例。在晚清读书人是新出版物出版的主干，办理发行的量也不在少数，惜记录难找。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些材料，可略见一斑。

有四月十九日谭镳、梁启昌给汪康年信，信中有“卓如近日有入鄂消息”，当为1897年。信中说：“启者，弟辈以粤省西书价昂书少，不便学人购读，约得令戚孙君振叔创开书局，专售时务各书，以开风气，谅已闻达左右。”又说：“至此局之设，原拟兼发贵报，亦望照单统发若干份。”[1]

谭镳是广东新会人，公车上书名单中列名，当是举人，保国会成员，余不详。梁启昌情况不清楚。孙振叔，名士颐，字正叔，一作振叔，清末任驻小吕宋总领事。他们合开的书店在广州，接盘双门底原六雅斋铺址。孙士颐原准备自己开一书店，后来见报纸报道谭镳兄弟和梁启昌、陈子褒4位举人要开办时务书

【1】《谭镳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四),34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局，推广西学，目的相同，就商议合作。[1] 后来因时务书局店伙不可靠，而分办，店名义一斋。在孙士颐致汪康年第二信中，提到“闻徐君冕亦拟设肆发售西书，不知有托尊处否？”第十一信中有“前日治师言欲附股”。“治师”即秦治。可见当时读书人愿意办书店推广西学的不是个别。

【1】《孙士颐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4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自然读书人办书店难处多。孙士颐在时务书局开办两月后就感困难，想代办《时务报》在穗业务：“此间既名时务书局，非有千金，西书不能粗备，且亦不能支撑店用也。派报一事，如蒙见委，拟请统交敝店。”[2]

【2】《孙士颐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412~14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时务报》时期没有政治风险，是“自改革”思想最活跃时期，此后就不一定了。

第十四章　拳拳于民族解放的出版人

前面概述了晚清出版对国家民族复兴的贡献。事是人做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先贤前哲。发掘、研究历史是为了明白过去，进而了解今天。历史是不会重复的，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是照抄他们的具体做法，而是学习他们以出版作武器献身于民族复兴的精神。高山仰止，他们贡献了终生，我们将学习终生。更有一批“业余者”，秉承古代家刻传统，出版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图书，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晚清最重要的出版人是张元济。他从1899年到1959年，1个甲子从事出版。他鉴于帝国主义和腐败清政府相勾结，民族复兴的根本出路只能寄托于民众素质的提高和民众的奋起。他拳拳于出版，立志以出版扶助教育。茅盾称他为“新出版的辟草莱者”。他毕生贡献于出版，成绩是多方面的。为了给本书读者以完整印象，他的事迹集中在“民国卷”里叙述。

整个晚清，在出版领域里作出贡献的，和以爱好“业余”印书者，何止千百。本卷各处随出版物的叙述，对有关的出版者已陆续有所介绍。本章仅仅叙述几位没有谈到，而又有较大贡献的几位。

第一节 不该被遗忘者——卢靖

一、要先谈严复的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虽有仁人志士呼吁，觉醒者不多。直到甲午战败，才有较多读书人觉醒。《马关条约》割地赔款震动了读书人，唤醒了被清廷压制的读书人本应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这就是维新求变。在小说里有“维新党”，实际读书人虽然觉醒，“君子不党”的思想束缚远不能解脱。不结党，思想不容易一致。有各种不同主张，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氤氲相感，嘤鸣相召，各以文字寻求知音。康梁自然是一派；汪康年以《时务报》联系了一大批人；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很有势力的一派；严复则是舆论发动很早、影响很大、与他人联系不广的一位。正因与人联系不广，不参与政治活动，戊戌政变没受牵连。从甲午至丁酉（1894—1897年），是严复一生思想最辉煌的时期。这4年中，其他主张变革诸位，对政治的症结所在、改革方法，以及态度，没有哪位能比严复强，包括黄遵宪这样多年在海外关注政治的人。蔡元培说：“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人］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1]蔡元培所说“常常说”，是指严复在1895年2月4日至5月31日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4篇文章和《原强续篇》，在甲午战争惊心动魄的年代第一位提出深刻的振聋发聩的诤言。文章的爱国激情感人至深，为人所称道；对当时政治的臧否可以说前无古人；对于造成政治弊病的科举的批评，无可辩驳；以西方政治科学对比，指出必须改革和批评执古不化者。[2] 在《原强》中他介绍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他不是徒呼物竞天择，而指出了西洋之所以强，在于民主和科学。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

【1】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4卷，353页，中华书局，1984年。

【2】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上，1页，中华书局，1986年。

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1] 他在《辟韩》中尖锐地驳斥韩愈的《原道》推崇君主专制，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2] 当时清廷虽然正在焦头烂额，对这种言论无暇顾及，而且他还是在前面加上一句“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直报》影响不大，两年后，1897年4月12日《时务报》该文转载在第23册上，张之洞看到后下令禁发和追究。叶瀚有短信专门传达给汪康年：“顷念劬来，传南皮帅意云：《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属布告。合行奉闻。敬颂节祺。”[3] 严复可能从此小心了些，在翻译《天演论》及他书时的按语，不敢切入现实政治。

【1】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上,11页，中华书局，1986年。

【2】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35页，中华书局,1986年。

【3】《叶翰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2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天演论》出版的价值

严复留学时正是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英国和西方正被这本书所发挥的进化论所震撼，受其影响是必然的。他1895年写《原强》时引用了达尔文的学说，赫胥黎《天演论》的原书出版于1894年，后来严复翻译。《天演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众所周知，1897年10月严复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办《国闻报》，而仅在《国闻汇编》第二册上有该译文“卮言一”，即后来的“导言一 察变”。此后就不再续刊，或和《辟韩》被张之洞追究有关。虽有人说陕西味经书局书目有1895年刻本，但至今没有发现实物；而严复的译序是丙申（1896年）重九。如果真有味经书局1895年本，必是传抄的未完稿。

这部书稿，严复说“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沔阳卢木斋诸君借抄，皆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4] 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5] 这是后来《译例言》的最后一条。这条在慎始基斋本上有，1905年《天演论》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因为提

【4】“慎之”名卢弼，戊戌前后在湖北经心书院。

【5】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1323页,中华书局,1986年。

到梁启超名字，他已成“钦犯”，所以删了这条。这就使卢木斋违背严复打算首刻《天演论》的事不为人所知。

《天演论》刻毕付印是戊戌四月二十二日。这就是《天演论》最早的“湖北沔阳慎始基斋木刻本”。次日光绪宣布“明定国是”，没说“变法”，但大家知道是必需变了。虽然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的，当时面临的“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 但他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这样一个大变动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三世说”已经被宣布为“非圣无法”成为禁书，不受守旧人士欢迎。而且充其量他也只是提出了变的必然。严复译书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当时将进化论演绎社会学的有两家：斯宾塞和赫胥黎。前者主张“任天为治”，后者主张“可争可取而不可降”，强调主观能动。严复选译后者。他在译序中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2] 众所周知，严复在《天演论》中的按语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的按语有极强针对性。当时我国所需要的是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而我国儒家伦理中是把利和义对立的，对资本主义发展是种障碍。康梁所着眼在吏治变化，没有触及伦理。《天演论》下卷“论十六　群治”一节，赫胥黎讲人口增长，生存困难。人类相应“合群制治，使之相养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可以乱群害治者，皆以为不义而禁之。设刑宪，广教条，大抵皆沮任性之行，而劝以人职之所当守。盖以谓群治既兴，人人享乐业安生之福。夫既有所取之以为利，斯必有所与之为偿。”严复作如下按语：“自营一言，古今所讳，诚哉，其足讳也。虽然，世变不同，自营亦异。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3] 这两段话既宣传了民治，也讲

【1】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奏牍卷24，106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2】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1321页，中华书局，1986年。

【3】严复译：《天演论·群治》，《严复集》，第5册，1395页，中华书局，1986年。

清了利与义的关系在于两利。所以《天演论》不仅是唤醒自强，也是当时唯一结合国情的维新理论基础。

光绪帝的“明定国是”诏推动了这本书的流传。这本书在当时发生了轰动，但并没有对变法有影响。一则时间有限，根本原因中国维新人士们瞎搬日本经验。日本维新是人们不满幕府屈从西洋诸国，因而尊皇之风大盛。在这背景下天皇下讨幕令和颁布五条誓文，——天皇允诺把从幕府收权后的利益分一小点给百姓。这讨幕、自强才能成功。而中国所谓的维新，满不是那回事。是在人们普遍对朝廷失望的时候，官员们向朝廷要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光绪帝对变法的积极，或因而他可以从那拉氏手上拿回些本该是他的。惜乎那拉氏的宗旨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说维新是闹剧并不为过。但《天演论》却是当时所有论说、宣传文字中唯一有强大生命力者，一直到辛亥革命后，它仍然是催人跃起最重要的一本小册子。现在能见到的清末版本不下30余种，说明其影响之广。鲁迅、胡适等人的故事说明其影响之深。回过头看，如果正像严复所想“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或稍后再出版，就不一定如此受人注意。再说，那《天演论》的稿子梁启超看过，康梁很早就有出版机构，他没有拿去出版，缺少对这本书的政治敏感。政治敏感是做好出版最重要条件。所以，在谈到《天演论》影响的时候，不能忘记卢木斋。

三、卢靖资料

木斋是卢靖的字。卢靖的资料很少，在他家乡，现名湖北仙桃县，也没有查到任何资料。据上海图书馆藏的汪诒年追记，约略知道他“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卒于民国三十七年。清光绪十一年举人。曾任天津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直隶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知县，直隶提学使、奉天提学使。辛亥革命后解职回天津，开办木斋学校，并创设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及北京木斋图书馆。”是汪康年办《时务报》社“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被汪吸引者之一，现在保存有1897年农四月、六月卢致汪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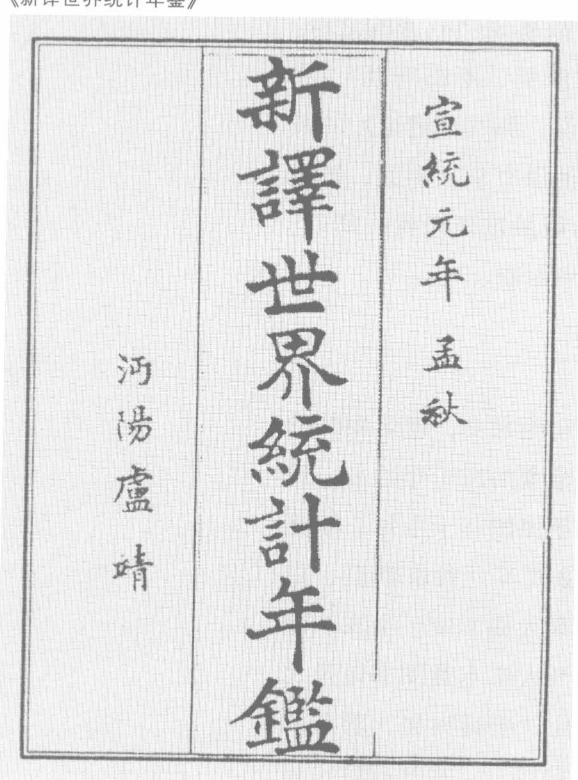
信各一；他积极于推广维新活动；资助过《农学报》、《时务报》、不缠足会等经费银350元。曾拟办过格致小学堂。后来办没办不清楚。

汪康年办《时务报》有个“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目的。卢靖就是被他“套牢”的一位，前面提到1897年农历四月廿三日卢靖给汪康年的信，其中说：“前闻贵报已派至七千余份，近数月来当更加推广。曷嘱派报诸君将阅报衔姓里居各录一册送贵报。或分省，或分姓记录，以备不测时号召勤王之用。如何？”[1]当时北京并没被谁的武装包围，他谈“勤王”指什么？当时他任丰润知县，还计划筹备印刷机构，“拟翻印各种新书，如算术、农学之类。”（注：均该天信）后来印了没有，不清楚。

【1】《卢靖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982~29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当时出版《天演论》足见卢靖别具慧眼，是被《天演论》打动的人。卢靖还出版过其他书，其中环绕着自强的有4部年鉴。我们以往没有年鉴。我国有年鉴自卢靖始，晚清一共有4部年鉴，都是他组织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图56）、《最新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1909—1911年）。这个材料是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李维民将军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里发现的。

图56
《新译世界统计年鉴》



四、提倡横向比较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各省学政，设提学使，卢靖任直隶提学使。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调任奉天提学使，直至辛亥革命。年鉴是供查阅的工具书，但卢靖是把它和救亡联系起来的。两千余年专制愚民统治下，不仅一般民众贫穷落后愚昧，读书人还多一项自大。清末，国门已经洞开，

但作为民众骨干的大部分读书人的思想还是闭塞的，还是盲目自大的。自大就丧失了发愤的必要。虽然当时有书刊讲述我们的落后，但对一般读书人讲，对落后或还是模糊，或感觉不到。需要有横向坐标，才能有比较，这样落后的观念就非常具体了。卢靖就做了这件事。

他在《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序中说《书经》“《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乱悔亡’。吾读斯语，惕焉以思，皇然而悲曰：有是哉！甚矣，弱者、昧者、乱者、亡者不受天之眷顾，古昔已然，况当竞争最繁烈之世耶！当其弱也、昧也、乱也、亡也，其国人决不自知也。设自知之，岂有不思易弱为强，易昧为明，易乱为治，易亡为存者。其不自知之故，岂不原于无比较。自以为富也，而不知取世界各国之生产力而比较之；自以为强也，而不知取世界各国之海陆军而比较之。幅员虽广，而不知世界各国领地之日辟，故日蹙百里而不惧；人民虽众，死亡之速率过于生殖之速率，不知世界各国之户口日增。未与世界各国之输出品类相较，故物产蕃殖纯任天然，而不思改良制造；未与世界各国之五金产额相较，故矿业丰富，弃利于地，而不思开采。全国识字者之无多，尚自诩为文明古国，而不知取世界各国教育之美备以相较。”指出了要知道他人的富强，才能有自强的要求。年鉴为横向比较提供了最简捷的条件。

当时他请提学司里留日归国学生将日本编的年鉴翻译，由提学司出版。他希望“假吾国士夫治事之暇，案置此册，流览而借鉴之，庶几能免于弱昧乱亡；且进而求夫所以兼攻取侮之策。是则印译此书之所祷祀而求者也”。[1]

作为提学使，更关心世界教育，所以1909他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两部世界统计年鉴后，1910年3月组织翻译出版了《世界教育统计年鉴》，1911年3月又组织翻译出版了《欧美教育统计年鉴》。

《欧美教育统计年鉴》序说：“盖有人类而无教育，此林林总总者木石耳，鹿豕耳，有人与无人等。虽广土众民，决不能争存

【1】卢靖：《〈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序》，李维民编：《中国年鉴史料》，5页，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2003年。

於世界。不其惘欤。使者暗昧，忝司教柄，每览是书，不胜相形见绌之惧。虽然山海之大基於壤流，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吾国之执教育权者，苟常存不若人之耻而进行不懈，安知不与彼文明先进诸国有齐驱并驾之一时耶。然则是书也虽谓为进化之鉴，祖生之鞭，座右之铭也。愿与阅是书之君子时勉之而已。"[1] 他将年鉴看作"进化之鉴，祖生之鞭"，或可见当年。

【1】卢靖:《〈欧美教育统计年鉴〉序》,李维民编:《中国年鉴史料》,9页，北京志鉴书刊研究院,2003年。

1923年，卢靖还辑印了《湖北先正遗书》68人73种721卷。郡邑丛书发端于晚明樊维城辑《盐邑志林》，光绪年间才有人接续；都是编纂人辑集家乡历代名人著作。俄语中家乡和祖国是一个词，区别于政权概念的国家；中文里国家一词则包含两者。晚明和晚清之出现郡邑丛书，表彰先贤爱国爱家乡的活动，正是在国家存亡续绝之时读书人无可奈何的爱国表现。《湖北先正遗书》是非常著名的郡邑丛书，选得好，影印母本好。其中10种据《四库全书》文津阁本，或系他在北京办木斋图书馆之时所辑印。

第二节　服务总编辑的总经理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读书人就出版物的内容等等，可能掌握很好，但一个出版机构还要能很好运作，并且发展，对此旧时读书人一般说就比较棘手。出版是个长周期事业，需要不断增加新书，而原有出版物成本还不能收回，因而就要不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就民国的38年间，在《民国时期总书目》上统计，前后共有8 200个出版主体。而能维持较长年头的，却只有十余家。这恐怕和出版经营的难度有关。研究张元济的贡献，除了发掘他自身的要素外，必须探讨那几根扶助他的"桩"。他从事出版，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有夏瑞芳、高梦旦、陈叔通、王云五，都在相当程度上出力扶持。陈叔通说还有高凤池，从另一面给予补充，这才形成了商务印书馆健全的领导层。没有他们几位，张元济难以取得如此成就。

陈原同志说："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是投身于一项

爱国事业。有一群爱国志士聚集在这事业的周围。他们理解他，他们信任他，他们支持他。有三个人毕生与他在一起。其中头一个蔡元培……另外两个人是夏瑞芳和高梦旦。”夏瑞芳“后人称他有骨气，有魄力，算得上一个民族企业家。张元济说过：‘昔年元济罢官南旋，羁栖海上，获与粹翁（夏瑞芳）订交，意气相合，遂投身于商务印书馆。’”[1]

张元济因为南洋公学译书院印件而与夏瑞芳认识。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农历新年，是一个仅仅有3 750元资本的印刷厂。合股和办事者大部分是清心书院学生，因而都是基督徒，又是姻亲。清心书院是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办的学校。穷苦人家孩子去教会学校，不要学费，还可以得到资助。清心书院属于清心堂。清心堂有鲍哲才牧师。他有三子三女前后都在清心书院读书，因而与同学婚配；行四为女次公子鲍钰，适夏瑞芳。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教会差会收入减少，清心书院兼办印刷《圣经》，一个钱当两个花。学生半工半读，学印刷，因而熟知技术，毕业后多有从事印刷者。其中高凤池在美华书馆任华经理；夏瑞芳和鲍咸恩在英文《捷报》(*China Gazette*) 馆做工。报馆经理英国人奥夏（O'Shea）对待工人十分粗暴，他们二位内心十分痛苦；想到脱离外人自办印刷厂。经过匡算可以维持，又经高凤池研究认可，就在姻兄弟间集资开办。

当时正值维新思潮风起，出版的繁荣使印刷业有了发展的前途。但商务印书馆能在众多印刷所中异军突起，在于他们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研究中国文化的实藤惠秀说“《昌言报》开始三期印刷和《时务报》时代一样，而到第四期突然面目一变，三号铅字成为四号铅字，并且比之过去给人一种鲜明的感觉。因为铅字好了。仔细观察，从这一号目录的旁边有‘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字样”。[2]

当时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与印刷所多有往来的杜亚泉说：“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时上海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3] 石印“本

【1】陈原：《读〈张元济年谱〉》，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卷端，2~3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2】实藤惠秀：《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映雪书院，1940年。

【3】杜亚泉：《鲍咸昌先生事略》。

甚明了，但现今石印局中不甚考究，故石印之书不及铅印者可贵。"[1]

【1】杜亚泉：《文学初皆》，卷五之三十七。

张元济1898年戊戌政变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所以李鸿章在安排他到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不能任院长，而是"译书院总审"，主持译书院。南洋公学有美国人福开森任监督。他"管得宽"，张元济难以容忍。曾告诉严复，要自己办出版。张元济是办事认真的人。他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处理印件时，必然会研究哪个印刷所最好。他和汪康年既是同年，又有极密切关系，代发《时务报》和《昌言报》，是每期必看。他必然会有实藤惠秀的感觉和杜亚泉的经验而找商务印书馆。而两年多的接触中，张元济应该说必然会全面认识夏瑞芳。当他考虑投资办出版时，商务印书馆是张元济考虑的可以利用的现成资源。

另一面，当时在金粟斋工作的包天笑回忆当年为印书和商务印书馆往来时说：夏瑞芳"颇思有所发展，极想自己出版几种书，但不知何种书可印，何种书不可印。不过他很虚心，人家委托他们所印的书，他常来问我是何种性质？可行销于何种人方面。当然他是为他的营业着想，要扩展他的生意，忠实于他的事业。他又常常询问我：'近来有许多人在办理编译所，这个编译所应如何办法？'我说：'应当请有学问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则专心于营业。'夏君摇头叹息道：'可惜我们的资本太少了，慢慢地来。'"[2] 这是夏瑞芳力图发展的基本面。

【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263~264页，香港大华出版社。

这就是办事十分认真的张元济能投资于敬业乐事夏瑞芳的商务印书馆的原因。可贵的还在于夏瑞芳接受张元济提出的合作条件："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3]

【3】《张元济诗文》，24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张元济1901年夏天投资商务印书馆后，规划出版事宜，负责编译。就印刷业务讲，是种加工，几乎没有风险。编译从经济活动上是种经营，是种风险，和经营印刷不同。夏瑞芳和张元济合作后，他的经营有了以前所没有的变化。但他既同意和张元济合作，又答应"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对书稿的意义他自然得听从张元济的意见。他得冒风险支持自己不懂的事业。作为筹措资金

的总经理，他违心地丢掉自己的想法而同意张元济的想法。荦荦大端至少有下面几件：

1. 顺从张元济意见出版社会科学图书。张元济投资并进人商务印书馆，基本目的就是舒展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受掣肘不能很好实现的介绍西方学说的抱负。但他不知道在译书院有经费支撑，而民营经济要靠自己血本。但夏瑞芳完全听他的。从1901年夏到1903年10月，共出版90种左右社会科学翻译著作。但是这些书销路不佳。夏瑞芳用停止发展原先的英语读物和双语词典来支持出这些书。

2. 顺从张元济意见，编辑国文课本。1904年 1月13日，清廷颁布癸卯学制。这个学制课程设置很不合理。小学不设最重要的，现在称做语文的课程，而从初小一年级有文法课。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正在编撰小学语文（当时叫国文）课本。见到癸卯学制后，夏瑞芳对编译所在编的课本不符合学制极不放心，怕不合课程出版后没人采用，希望按学制规定课程编文法课本。编译所各位鉴于学制的不合理，一致反对夏瑞芳的意见。最后张元济支持编译所各位，夏瑞芳也就同意。编译所继续编完后，一炮打响。商务印书馆从此兴旺发达。

3. 支持《辞源》的编纂。 高梦旦很早就有编纂一部融中外古今于一炉，以词汇为释义单位的中文词书。这是中文词书的大革命。这个选题要讲究质量，需要相当大的资金、资料、人力的投入。开始时没有力量，高梦旦等着。直到课本成功，盈利大幅度增加，有足够资金，到1908年开始投入。当时估计不足，认为两三年足够。结果4年虽已有成稿，但质量不够高。这时股东和高级职员意见很大，认为花了大量钱和人力，而预期没有收益，损害股东现实利益：因为投入所消耗费用都在每年的费用里开支，影响现实利润、股东的红利、职员的花红。夏瑞芳坚持以高质量完成，还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人不够再增加。结果8年完成，出版后轰动社会。从晚清到共和国建立前，旧中国一共出版13万种书，它是唯一的品牌书，——建国后只有《辞源》和《辞

海》经过完全另起炉灶的“修订”，但仍能用《辞源》、《辞海》的书名。

4. 支持张元济花巨款购买善本书。一般藏书家在故世以后，由于后人不钟情于此，藏书往往易主。著名藏书家陆心源富有藏书。他的善本藏书楼称“皕宋楼”，意为有两百部宋版书。其藏书不乏海内孤本。他过世后，他后人要出卖。晚清和民初，民穷财乏。藏书家流出图书，没人出高价。日本和美国看成是千载良机，挟款前来抢购，大量珍贵藏书和文物外流。有识之士只能尽自己力量收买，但究属有限。皕宋楼藏书价值太大，个人无力。张元济曾向学部大臣荣庆上书，建议政府收购，既保存了皕宋楼珍贵图书，又可充实京师图书馆。荣庆没有下文。这时夏瑞芳主动提出，馆里出7万元供张元济用于购买这批书。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资本是105 000元。这批书商务印书馆虽然没有买成，但仍可见夏瑞芳对张元济的支持。很早，张元济就以商务印书馆款项购买古籍。对股东说，自然是编译参考。当然是遁词。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书籍并不需要古籍，更无必要用善本。1921年胡适在商务印书馆考察，暇时参观涵芬楼。他说：“善本书颇不少，不能细看。今天见的有一部黄荛圃藏的《前汉书》二十册，价二千元。其实二千元买一部无用的古董书，真是奢侈。他们为什么不肯拿这笔钱买些有用的参考书呢？”[1] 胡适不知道张元济当年买书的动机。商务印书馆后来根据缪荃孙的建议影印古籍，其中一部分母本就自己所藏，收回一些投入。那是后话。

【1】胡适：《胡适的日记》，上册，145页，中华书局，1985年。

5. 商务印书馆虽说一开始就是股份公司，夏瑞芳的股份并不比人多，但他的敬业精神把商务看成自己的事业。商务教科书获得成功后，原有场地不够用，在宝山县买地盖厂房。建厂在宝山，因为那儿地价比上海市里便宜很多。但有个问题：工人都住在上海市里，每天早上赶到宝山已经筋疲力尽，要影响工效。必须在宝山为工人解决住宿问题。但当时企业不为职工提供住宿条件，需要以商业办法建房租给工人，卖给职工。这事由夏瑞芳承担，和沈季方两人私人合办，组织宝兴公司运作。建筑成片房出

租是长线投资，所以依靠贷款运转。1909年世界经济恐慌，汽车生产停滞，导致1910年上海发生陈逸卿事件，钱庄挤兑引起金融恐慌。两江总督一面调拨500万两银子用于缓解现金短缺，一面要求上海道清理钱庄人欠。官员不按习惯办事，不管债权、债务当初协定，凡欠款必须马上还清，否则拘押，不论到期与否。这就逼得宝兴公司变卖房产。而那时正是上海金融恐慌，房产极不值钱。宝兴公司损失很大，最后都由夏瑞芳承担。

夏瑞芳对商务印书馆成功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出版史活动中有些先生的“史学”观，搬弄一些旧时小报杂文，千方百计贬低夏瑞芳。对此，陈原同志指出：“近来有人对夏略有微词，这是不公平的。如果夏不得人心，不会有几千人为他送葬，蔡元培也决不会为他作传。蔡元培对夏的评价是把他同商务这个文化事业联在一起的，说他虽死了‘而君所创设之事业，方兴未艾，及其于教育之影响，所则展转流布而不能穷其所届，虽谓君永永不死可也。’”[1]

【1】陈原：《读〈张元济年谱〉》，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卷端，2~3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第三节　“润滑剂”高梦旦

“在张元济主持商务工作的鼎盛期（1903—1921年），所有重要编务都有高梦旦参与。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商务在发展的兴盛时期，如果说张元济的精神、理想支柱是蔡元培，那么他的务实左右手就是高梦旦。高梦旦最大的业绩编教科书和《辞源》。”[2]

【2】陈原：《读〈张元济年谱〉》，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卷端，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一个好汉三个帮。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还不能忘掉有3位重要的助手：夏瑞芳、高梦旦、陈叔通。

高梦旦（1870—1936），名凤谦，字梦旦，以字行；崇尚实事，痛恨清谈，所以笔名崇有；福建长乐人。幼时治科举，双亲没后无意功名，涉猎译书。后在表兄福建船政总稽查魏瀚家教授，有机会与船政局出洋学生交往，藉悉西方政治、经济、司法、财政、教育等，倾心维新。曾撰文主张废除跪拜，极受《时务报》汪康年、梁启超器重，成莫逆交。后在浙江蚕政学堂、求

是大学堂任教职，以留学生监督职赴日本。在日本年余，考察日本所以兴盛，首在教育，而教育根本在小学，小学教学重在课本。因发编辑小学教科书之愿，1903年辞职归国，进商务印书馆，直至逝世。1905年广西巡抚林绍年召，1909年被推为复旦公学监督，民初其仲兄召任驻外使馆职，均不就，拳拳于出版事业34年。

高梦旦入商务编译所，就主持国文部，编辑小学国文等教科书。编写前先定原则，确定各课难度、字数以及所涉生活、社会等方面各占比例，再着手编写。发扬各编写者智慧，每课都采用合议办法。每课课文，编写诸位各提建议，经辩论后采定。以往文人相轻，文字不愿他人增损一字。力矫之，课文成，必互相批改，以求至当。每成一册，且袖之以求知友批评。如此精细，第一册印成，仅三四天即售缺。自此，我国始有较科学之小学教科书。

我国历来仅有字典而无词典，尤无解释西学新词之书。高梦旦青年时阅读译籍恒以一二术语之不解而废置，亟感词书之必要。入商务后屡以为言。1908年遇陆尔奎，议及词书，所论大洽。归以语张元济，邀陆君主其事，而高无日不参与其间。是役历时8年稿始成，参其事者40余人，即我国现代词书之开创者《辞源》。

高梦旦能断大事，虑无不中。辛亥后商务印书馆日益扩充，编译所长张元济主持总公司，高梦旦以国文部长代主编译所。他思虑周密，10余年主持编译所，所定选题切合社会需要，无重大积压损失。因他思维周密，所以商务高层遇重大进退，皆取断于高，张元济视之如左右手；人称之为参谋长。

高梦旦性方行园，严于律己，待人诚恳。其举措，从无退而有言者，在商务威信最高。商务高层出身、经历、利益、性格均不相同，方枘圆凿扞格不入。高梦旦以理游说折衷其间，30余年始能无大冲突。人称之为润滑剂。1920年高去北平游说胡适。当时商务印书馆因为有巨额闲置资金，为其流向，张元济与高凤池

争论激烈，无人折衷，张愤而辞职。张元济的性格言必果，无人能劝他收回。高梦旦从北京赶回，和陈叔通商量。高出任调解，张元济始取消辞职。

高梦旦淡于名利，素持成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在我之旨。早年与汪康年、劳乃宣、王照等研究统一读音及简化汉字，有特识。黎锦熙、钱玄同等主张注音字母，林语堂、王云五研究检字法均乐为赞助而不列名。四角号码检字法初成，重号多，难以使用。他日夜筹谋计算，设附角，始能应用至今，亦不列名。辛亥前后开始实际运作编译所，七八年无名位、待遇，从无怨言。

1918年高梦旦任编译所长。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商务印书馆难以适应。高梦旦毅然提出辞职，请胡适自代，多次往邀。胡适荐王云五。王云五进所后高协助其熟悉业务，经过三个月，高退而担任出版部长，居王云五之下襄助。

高梦旦早年即有文章、译著问世，自进商务后，修改他人文章，补苴罅漏，为他人作嫁衣裳，文字均未署名。1936年逝世后，汪怡年曾致书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请裒辑遗文流传，可惜未蒙首肯！

附录一　近代出版大事记[1]

[1] 本附录参考过宋原放《出版纵横》有关资料。

1815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澳门印刷出版6卷本英汉双语《字典》，1823年出齐。

1816年　阮元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共836卷。

1827年　贺长龄刻魏源等编《皇朝经世文编》120卷。

1829年　学海堂辑刊《皇清经解》，收70人173种著作1 400卷。1861年补刊本加6种8卷。

1832年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刊《中国丛报》。1852年停刊，前后20年记载有当年重要史料。

1841年　林则徐组织人摘译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成《四洲志》。

1842年　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纂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增补成60卷本，1852年成100卷本。

1843年　英国伦敦会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配备有铅印设备。

1849年　王韬受墨海书馆聘。

1850年　英商奚安门在沪创刊《北华捷报》周刊，后改名《字林西报》。

1851年　香港花华圣经书房柯尔刻华文字模4 700个，是为1839年以来刻华文铜模最成功者，习称“香港字”。

1852年　太平天国占领永安，正朔，颁《太平天国历书》。

1858年　美华书馆姜别利发明用将木质字电镀制铜模，称“美

华字”。汉字铅字开始有小号字。

1865年 李鸿章署两江总督，利用曾国藩校刻《船山遗书》人员校刻经书，后名金陵书局。

1867年 农历四月鲍源深上《请购刊经书疏》。五月上谕：江苏省自遭兵燹，各府州县学校所藏书籍大半散失。准鲍源深请，令各督抚先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这道上谕颁发后，江浙等地纷纷成立官书局。

1868年 曾国藩奏准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

1872年 英商美查、伍德瓦德、蒲赖尔、瓦基洛合资设申报馆，4月30日开始出《申报》。后设申昌书局，1876年又设点石斋。前者排印中国作者未刊稿，后者石印旧著。

11月申报馆出版《瀛寰琐记》，约月出1册。28册后改名《四冥琐记》。《四溟琐记》出版12册后改名《寰宇琐记》，出12册。从1872年11月到1878年年初左右，前后4年多。是我国最早编辑的期刊，也是我国第一个文学期刊。

1873年 香港英华书院结束，印刷器材一部分卖给王韬、黄胜，设立中华印务总局，并创刊《循环日报》。一部分卖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衙门成立印刷所，替代被焚后武英殿的出版。

1879年 北京书坊出版石玉昆著《三侠五义》。俞樾读到后大加赞赏，为之作序、改写第一回，并改书名为《七侠五义》。

1881年 徐裕子、徐润在上海开设同文书局。有石印机12台。据说用工达500人。他们所印书籍质量好。曾为宫内按原大影印《古今图书集成》100部。他们拼贴的《康熙字典》，其版子现在中华书局还据以印行。

1884年 点石斋创刊《点石斋画报》，是我国发行画报之始。

1888年 王先谦主持江阴南菁书院，辑印《皇清经解续编》。收100人著作209部1 430卷。接续1829年学海堂所辑刊《皇清经解》。至此，有清一代的经学成就全部汇辑。加上1680年成德（纳兰性德）所辑刻《通志堂经解》，自唐以迄清末的所有对儒家原始经典的解释得以完整保存。

1892年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由他自己以万木草堂名出版。

1896年 陆续出版各宣传维新的刊物：《强学报》、《时务报》。《时务报》最为著名，影响最大。

1897年 商务印书馆开业。陆续有《知新报》、《湘学报》、《湘报》、《集成报》、《农学报》、《经世报》、《实学报》、《求是报》、《国闻报》、《译书公会报》、《渝报》、《演义白话报》、《蒙学报》等介绍新知，鼓吹变法的刊物。南洋公学师范院为外院学生编《蒙学课本》3编。

1898年 4月，卢靖以"湖北沔阳慎始基斋"出版严复所译《天演论》。不几天光绪宣布改革，该书受到普遍关注。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清议报》，至1901年12月21日出版100期。冬，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汉语语法），是以西方学术方法整理我国文法第一书。

1899年 正月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魏瀚出资，俗谓家刻本，在福州出版。不久，经高梦旦介绍，将书版让度给汪康年，即称"素隐书屋"本。冬，章太炎《訄书》初刻本问世。孙中山在香港筹备《中国日报》，随后由陈少白主持。

1900年 《开智录》在日本横滨创刊，冯自由等主编。杨廷栋等留日学生创刊《译书汇编》。文通书局在贵阳开办。

1901年 罗振玉在沪创刊《教育世界》，王国维主持编务。是我国第一份教育期刊，以介绍外国经验为主。1908年因罗、王二人进学部而停刊。蔡元培、张元济、赵从藩等发起创刊《外交报》，宣传国际知识，以抵制盲目排外。夏，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次年辞南洋公学职，全身心进入商务印书馆业务。

1902年 《大公报》创刊。文明书局创办，出版《蒙学读本全书》7册，图文并茂，备受学生欢迎。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提出小说是社会道德之源，民众道德是政治之本。当时社会腐败由于民众阅读腐败小说。要改良社会，必先"新民"，新民必先新小说。

1903年 邹容著《革命军》。蔡元培率领南洋公学退学学生成立

爱国学社。创刊《童子世界》，宣称“外拒白种，内覆满洲”。爱国学社教员章士钊等负责《苏报》编辑，宣传革命。6月刊文介绍《革命军》，又有驳康有为文章，导致《苏报》被封，章太炎、邹容入狱。农历十月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股，聘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等编辑教科书。

1904年 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之首册《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问世，初版4 000册四五天就卖完。

1905年 邓实、黄人等组织国学保存会，刊发《国粹学报》、《国粹丛报》等。主张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热肠”。辛亥革命成功，即宣告任务完成。曾朴著《孽海花》。5月8日军机处下令查禁《革命军》、《支那革命运动》、《浙江潮》等等一批书刊。上海书业商会成立。适应废科举、兴学校，清廷设立学部。清廷宣布接受袁世凯等大臣联名奏请立即废除科举。一批以石印科举用书的书坊倒闭或接近倒闭。

1906年 学部设立编书局，意图统制教科书，先实行审查制。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三学部公布第一次审定暂教科书表。计初小103种、高小75种、中学194种，共372种。商务印书馆最多，计116种。其次舆地学会76种。

1907年 6月留日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注意讲习会”出版《天义报》。同时，在法人员张静江、李煜瀛、吴敬恒等在巴黎组织新世纪社，出版《新世纪》月刊，及其他宣传无政府主义书刊。12月颁布《大清报律》。

1908年 江浙粤三省旅沪士绅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出版会刊《预备立宪公会报》。先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宣布预备立宪，12月上海群益印刷编译局出版《预备立宪官话报》，上海宪政研究会创刊《宪政杂志》。预备立宪公会为最重要宪政团体。

1909年 先是，为遏制地方督抚势力，1907年命各省筹设咨议局；1908年8月颁布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法；1909年12月颁布府州厅县自治章程。上海出版江苏自治筹备处创刊的《江苏自治公报》，济南商报馆创办《山东自治报》。

1910年 章太炎在日本创办光复会机关报《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

1911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16日武昌湖北军政府创刊《中华民国公报》日刊。

附录二　参考书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
【3】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
【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5】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9、20卷
【6】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二册
【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9】彭明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
【10】冯天瑜：《晚清经世实学》
【11】戚其章：《晚清史治要》
【12】汪林茂：《晚清文化史》
【13】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4】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5】《龚定庵全集》
【16】《谭嗣同全集》
【1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8】梁启超：《东籍月旦》
【1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20】萧一山：《清代通史》
【21】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
【22】《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
【23】《汪康年师友书札》

后　记

70年的晚清占了9卷本《中国出版通史》的1卷，转型的70年事情既多又重要。

我们以近2 000年时间花大力气修筑长城，城墙只能防止入侵，充分说明了我们民族的性格。到明末，进入近世，世界开始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国由文化相对后进，又事事恪守祖训的民族统治，于是，失掉了与世界共进的可能。“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个永恒的真理。我们在北面筑了长城，外侮却是从东南沿海侵入，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人的鱼肉！

我国虽热爱和平，但为了维护和平与自由，从不吝啬自己的生命。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甲午战争唤醒了读书人，运用手中笔，前赴后继在民族自救中尽力。于是，与读书人紧相连的出版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著书立说不再为三不朽，而是为民族的前途，一批原可以成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自愿去做出版，成为四民之末的出版商，去传播与国家命运攸关的新文化，直到今天。对此，沈雁冰称之为新出版。

对历史见仁见智是读者各自的认知，不必由史料发掘者和写史者代劳。所以，此间不作“历史结论”和“经验教训”的评述。

出版是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剧烈变化的晚清，历史现象的归纳和描述，决不是平庸如我所能胜任的，承编委会诸君错爱，命家熔滥竽，错误不实、遗漏之处，千祈方家指正。

本卷初稿承王建辉先生过目，三稿由刘德麟先生审读。内文插图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屈宁提供，彩色插页部分图片由中国印刷博物馆提供。十分感谢！

汪家熔谨志　时年八十

2008年10月14日


ISBN 978-7-5068-1789-9
9 787506 817899 >
定价：54.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出版通史　7　清代卷　下
作者=汪家熔著
页数=409
SS号=12211962
出版日期=2008.12